成都旧事

郑光路 著

一次民风民俗的捕捉，
一场城市记忆的相遇

四川人民出版社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版权信息

书名：成都旧事
作者：郑光路
排版：陕西数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03-01
ISBN：9787220104879

本书由天津博集新媒科技有限公司授权亚马逊发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出版前言
浸透历史文化韵味的成都街道
　　成都最早的街道
　　清代成都街道的重建
　　民国时期的成都街道
　　春熙路的沧桑
　　蜀中古街“东大街”
李劼人和天回镇
　　作家是“地方志”专家
　　为什么将天回镇作为特定历史舞台
　　生动定格记录的古镇
四川第一座公园
　　玉昆将军倡建少城公园
　　令人眼花缭乱的“多功能”园林
　　成都最早最大的公众体育场所
成都百年劝业场
　　周善培倡建劝业场
　　开现代文明新风
　　百年沧桑多酸辛
成都庙会的历史风云
　　老庙会自古闻名
　　清末的“劝业会”
　　乱世“花会”云烟
闻名全国的青羊宫“打擂”
　　民国后兴起打擂台
　　上擂台发狠争输赢
　　取胜因素种种
　　20世纪40年代后的兴衰
文殊院的前世今生
　　武担山下早期的梵呗声
　　文殊院究竟建于何时
　　“人间佛教”——丛林
一百年前的成都人“过年”

杀年猪、腊八粥和吃“祷牙”
“祭灶”和“辞岁”
从“走喜神方”到“游百病”
成都的“老皇城”
成都历代开国君王
开明九世、公孙述、刘备
李雄、李寿、范贲、谯纵、萧纪
王建、孟知祥、李顺、张献忠
四川名将岳锺琪
战功赫赫国之栋梁
清朝历史大案的主角
老将出马建奇功
四川总督丁宝桢
初到四川“栽筋斗”
山东和四川近代工业之父
都江堰和宫保肉丁
一清如水死四川
清末奇人傅崇榘
报刊出版界先驱
彩票和黄包车风波
价值非凡的《成都通览》
巴金的“家”和《家》
巴金的“老家”
巴金祖辈入川脉络
嘉兴“老家”寻踪
成都的“家”
广元的“家”
巴金的“家”和小说《家》
离开成都的“家”
1949年以前的两次回“家”
“文化大革命”前的两次回“家”
1987年第五次回“家”
清末成都的外国领事馆
最先入川的外国使臣和外国人
清末领事馆的建立
保路运动的冲击
惊涛骇浪到上海
成都近代慈善事业
清末慈善机构众多
民国“慈惠堂”成为中流砥柱

出版前言

“巴蜀”地区（包括现在的四川省和重庆市），号称“天府之国”，历朝历代都是对中国产生重大影响之地。

巴山蜀水历史悠久，充满神秘色彩。其中许多奇闻秘事，不但外地人不清楚，就是许多土生土长的四川人，也并不了解。巴蜀文化，已成为越来越引起中外人士普遍关注的热门话题。

如果你是土生土长的四川人，通过此书你将了解你以前并不知道的许多身边奇事。如果你是外国游子、异乡客人，翻开此书，你将会为这块神秘土地所吸引，渴望亲历巴山蜀水。

每个地方都有她的今天和昨天。从古至今，地方典籍、乡土野史中包含着丰富的人文传统，蕴藏着广博的历史知识。鲁迅先生曾说：“野史和杂说，不像正史那样地装腔作势。”（《华盖集·这个与那个》）他还说：“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但如看野史和杂记，可更容易了然了，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太摆史官的架子。”（《华盖集·忽然想到》）

野史杂说，因其真实性、趣味性、可读性，从古至今极受人们重视，有着正史经传绝不能替代的重要作用。一部记录乡土文化的优秀地方图志，不但受本乡本土读者青睐，而且更受异乡人士欢迎。这类书籍，如陈年老酒经久越醇，极富收藏价值，足可传之子孙后代。

成都是四川省省会，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中国西部最大的经济、文化、交

通中心城市之一。成都历史上号称“六朝古都”“七朝古都”，从有确切记载的开明九世建都成都算起，至今已有约2500年历史。而21世纪初成都金沙遗址的发现和发掘，更把这个时间延长到了3000年以上。成都今日的辉煌，是建筑在昔日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之上的。因此，了解成都，了解四川，了解她的历史和文化，使之不被遗忘、不被湮没并得以传承，这既是我们的需要，更是一种责任。

这本雅俗共赏的《成都旧事》，披露了许多并不广为人知的或几乎被淡忘了的成都历史上的奇闻秘事，极具特色。本书作者郑光路是学者型的作家。他人生经历丰富、交游甚广：从高级官员到底层民众，从文人雅士到武林豪客、僧道人士等三教九流人物……作者谙熟巴蜀文化和四川、成都历史，收藏各种旧资料和文物极为丰富，所以他写的文章题材和视角都很独到，极具内涵，受到各界好评。

本书内容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方面，叙述了成都的一些历史掌故、街巷园林、风土人情。如《成都历代开国君王》，介绍了从上古直至明末在成都称帝称王的12位君主。《浸透历史文化韵味的成都街道》介绍了许多成都的古街、老街形成、演变的历程及其名称的来由和沿革。许多为我们所熟知并经常使用却又不知其所由来的老地名、老街名，读完本篇会令你有恍然大悟之感。此外，还有介绍老成都风土人情、民俗风貌的《百年成都劝业场》《成都庙会的历史风云》《闻名全国的青羊宫“打擂”》《一百年前的成都人“过年”》等。

第二方面的内容，叙述了一些历史人物的趣闻轶事。如《四川名将岳锺琪》为我们介绍了一位战功卓著而又经历坎坷艰险的四川提督大将军；《四川总督丁宝桢》记叙了清末四川总督丁宝桢一身正气的慨然形象及其建树和传说；《清末奇人傅崇矩》介绍了成都近代史上一位勇开风气之先、堪称“百科全书”的奇人；《巴金的“家”和〈家〉》，叙述了成都巴金老家、巴金祖籍、他的创作道路及1949年以后巴金数次回故乡的情况。

本书第三方面的内容，介绍了一些有重大历史影响的事件、史实或人物，

具重要史料价值。如《成都的“老皇城”》，讲述了非常年代中成都的珍贵文物古建筑“老皇城”的历史；《清末成都的外国领事馆》记录了成都较早的对外交往过程，等等。

本书具有三大鲜明特色：

第一，极具史料和学术价值。本书几乎每篇文章都披露了许多作者苦心收藏的独家史料，足可以补正史之不足。每篇文章都“持之有故、言之有据”，文后附有注释，标明史实根据或资料来源。事实上，本书很多文章的初稿曾在《文史精华》《文史博览》《炎黄春秋》《体育文化导刊》《名人传记》等国家级、省级学术刊物及《党史文苑》《党史纵览》《党的建设》《青年作家》等严肃刊物上发表。

第二，本书可读性极强，融学术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炉。本书作者主张发扬司马迁《史记》中“文史结合”的优秀传统，长期实践以大众化语言叙事，用尽可能生动的语言叙说枯燥复杂的历史事件和学术问题，避免让读者昏昏欲睡的那种“论文”式写作模式……

本书披露的“奇事”，并不仅仅是“解密”“搜奇”，实际上大都是某种历史话题的研究。但作者这种研究，不是故作深沉、玩弄玄虚和卖弄技巧，而是像和老朋友摆“龙门阵”一样娓娓道来，令人读起来趣味无穷、欲罢不能。正像国内外一些报刊评论的那样：作者行文风格看似朴实无华，实则显示了深厚的学者风范和写作功力。

第三，本书配有珍贵老照片多幅，文图并茂，令人赏心悦目。

附带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本书是《四川旧事》的姊妹篇，也可称之为“续集”或补充。成都是四川之一部，而四川为成都之所在。二者不可能截然分清。之所以分为《四川旧事》和《成都旧事》二部，主要是为了编排和篇幅安排上的方便。事实上，这两部书里的很多内容，都是很难用地域上的“成都”和“四川”来区分开的，这点尤需提请读者们注意。

二〇〇七年五月

浸透历史文化韵味的成都街道

成都最早的街道

成都历史悠久、文化厚重。老街，是这座古城的沧桑年轮、历史碎片，更是体现成都特色和传统文化之根。但，你能说清成都最早的一些老街在哪里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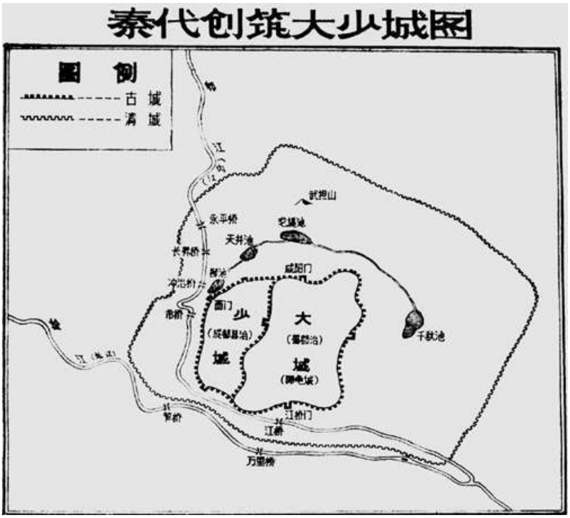
赤里、文翁坊、石室巷、文庙街

距今约3500年的夏商之际，就建立有古蜀国。大约在2500年前，蜀王开明九世把都城从广都樊安（今双流中兴镇一带）迁到成都，建起土城。公元前316年秋，秦灭蜀国，改蜀国为蜀郡，设成都县作为蜀郡治所。公元前311年，秦惠王据张仪建议，令蜀守张若按咸阳格局修筑成都城，城周12里，高7丈。后人便多以公元前310年作为成都建城的时间，距今已2300多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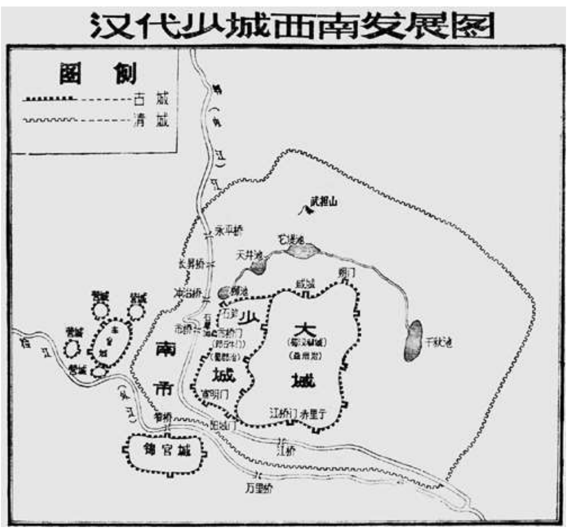
这座城市的无数街道，迭经多个朝代的多次兴废。明末清初的1646年，成都又一次城毁人空，至1659年后四川巡抚张德地等人才又重修成都城。故清代成都街道遗留至今，翔实可考者约340年。[1]

难道说成都老街只有300多年历史？当然不是！

通过浩瀚典籍和详考城市地理，可追溯出这座古城的许多“老街”。这些“老街”至今仍大致存在于古时原址，或一直给现今街道以深深影响。这就是成都老街名充满历史韵味的原因。



秦代筑成都大城、少城示意图（出自：《成都城坊古迹考》）



汉代成都城示意图。从图中可见，汉代成都大城外另筑“锦官城”“车官城”。“锦官城”位置大致在今南门大桥至百花潭之间（出自：《成都城坊古迹考》）

据东晋人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说：张仪、张若修筑的成都城，东边叫“大城”，西边叫“少城”（不是清代修的少城）。大城和少城在同一城墙内，中间又以城墙相隔，古人称为“层城”或“重城”。“大

城”北近武担山（今北较场成都军区内），南至秦人新建的赤里。书中还说“成都县本治赤里街”，这里明明白白地说秦汉时蜀郡官衙所在地是“赤里街”。

“里”相当如今说的居民点（现成都仍有三多里、祥和里等）；古时“街”则指通衢大道。很可能筑城之初，“赤里”主要是民居，日渐繁荣后改称“赤里街”。它在什么位置？北宋乐史撰写《太平寰宇记》卷七十二中说：“成都之南街名赤里。”民国版的《华阳县志·古迹一》中说得更明白：在清朝嘉庆前“仍称赤里，今则通呼南大街，而赤里之名隐矣。”由此可知“赤里街”在今南大街一带，这是秦汉时期成都的中心街道；“赤里”或“赤里街”的古街名一直保留到清朝嘉庆年间（1796～1820）才逐渐消失。

所以，“赤里街”应当是成都建城后确凿可考的“最早的老街” [2] 。

到汉景帝（前156～前141年）时，有位江西人文翁当蜀郡守。他在秦城南垣外创建周公礼殿，又在此以石料为主修起图书馆和“学官”（即官办学校），被称为“石室”或“玉堂”。文翁兴学，开全国地方办学之先，朝廷令全国仿效文翁建“学官”，对后世中国影响非同小可。文翁“学官”所在地，即今石室中学校址。 [3]

“石室”一带当时自然成为一条文化街，称“文翁坊”。这一带顺理成章地也就有了和“石室”相关联的街名，“石室巷”很可能就是那时就有而流传至今的。到唐朝后，在周公礼殿旧址修建专祀孔子的文庙，此街也因此叫“文庙街”，历代不衰。我儿时随外婆居此街数载，大人们牵着我常从文庙街和旁边“石室巷”穿过，他们会对我说：“古时候这巷子两边是文翁大人藏书办学校的，你走了这巷子，长大就要好好读书！”那时，尚残留的文庙典雅房廊令我心驰神往……我切身体会到古街对成都一代代人潜移默化的影响。

君平街、支矶石街、天涯石街

距今2000多年的西汉成帝年间（前32～前6年），离文翁“石室”不远的一条街上，有家卜卦铺子，每天门庭若市。一位仙风道骨的高人，坐在堂中为人卜卦。这条街，就是汉朝成帝后出现的“君平街”。

严君平，土生土长的成都人。可别小看这位算命先生。原来，严君平认为算命职业虽低微，但也可给老百姓做好事。年轻人来算命，诱导他要尽孝道；弟弟来算命，诱导他要尊重哥哥；当官的来算命，诱导他要勤于政事……总之，“各因势导之以善”[4]。不难明白：这位老先生占卜仅是形式，而以“做思想工作”为主。所以《华阳国志》说他：“雅性澹泊，学业加妙……假蓍龟以教。”[5]他每天只算几个人，得一百钱能养活自己就关门大吉，放下门帘为人讲学，大文学家扬雄就曾是他的学生。他还发挥老子、庄子的思想，著《老子指归》等书。



1999年的君平街

算命先生严君平其实是一位不慕仕途的杰出民间学者和思想家。如果说文翁是以创办官学著名，严君平则是中国历史上继孔子之后的又一位杰出民间办学的先行者，这一点以前常被忽视。他节操清奇，

享年90余，史书称其受“蜀人爱敬”。他居住过的街道很自然地名为“君平街”，且2000多年来从未改变。这位“大隐于市”的高人对后世影响深远，唐宋许多大诗人都写诗歌赞咏。

而支矶石街也与严君平紧密相关。“支矶石”是一块高2.12米、宽约0.8米，呈不规则方柱形的大石头，如今有人认为是陨石，也有人认为是古蜀人为祭祀而立的碑或古蜀墓碑。成都支矶石、天涯石、五块石这类大石，通称为“大石遗迹”。因为严君平先生太杰出了，后人难免将他老人家视若神仙。于是严君平死后200多年，他和这块闹不清来历的老古董支矶石就被扯到一起。西晋人张华在《博物志》中说：有个海岛上住的人，见每年八月都有“浮槎”（即木筏）漂来，这个人便麻起胆子带上干粮“乘槎而去”。十多天后沿天河到一城郭，“遥望宫中多织妇”，还有一个牵牛小伙。此人即问：“这是哪里哟？”牵牛小伙答：“你去蜀地访严君平，就晓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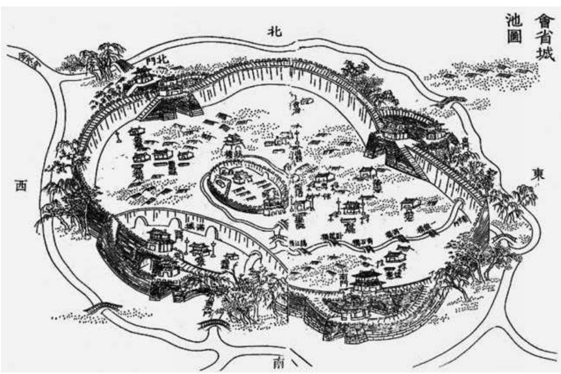
这个“探险者”后来被各种史书附会成汉朝通西域的张骞。如《蜀中广记》等典籍上，记叙博望侯张骞探寻黄河源头，归舟中载一大石，去见严君平。君平惊讶地说：“去年八月有客星犯牛郎和织女星，原来就是你嗦？这是织女支撑织布机的石头嘛！”张骞佩服得五体投地，说：“对头！我寻河源至一处，见女子织锦，丈夫牵牛，问此何地？女子答：‘此非人间也！此石送你，回去问蜀人严君平，他会给你说个明白！’”

唐朝大诗人岑参到成都，去君平街吊古，写《卜肆》诗云：“君平曾卖卜，卜肆著已久。至今杖头钱，时时地上有。不知支矶石，还在人间否？”可见有严君平遗迹的君平街在唐时已非常有名。唐诗人李商隐更生风流奇想，写《海客》诗说：“海客乘槎上紫氛，星娥罢织一相闻。只应不惮牵牛妒，聊用支矶石赠君。”织女不怕牛郎哥哥吃酸醋，居然红杏出墙跑去婚外恋，把支矶石作相思信物，赠给地球人……我想：李商隐先生很可能是全世界写宇宙“外星人”恋爱的鼻

祖。

唐朝赵璘所撰《因话录》中说："今成都严真观有一石，俗呼为'支矶石'，皆云：当时君平留。"这是说：至少唐朝后期，建于君平街遗址的严真观内已有支矶石，并被蜀人视为神物。据同治时修的《成都县志·艺文》中说：到清代有人建小庙保护支矶石，还有人焚香祭祷，还有个老太婆居此司香火……

清代修建满城以后，君平街改称"君平胡同"。民国初年，因这里有上述的支矶石小庙，就把街名改成支矶石街。这街东起长顺上街，西止下同仁路。但那时改街名的地方当局觉得历史悠久的君平街还是应当保留，又把满城南垣东接陕西街、西止小南街南口长约一里的那条新街定名为君平街。也就是说：历史上的君平街其实就是现支矶石街一带 [6] [7] 。



清代初期成都地图（出自：清代刊本《嘉庆成都县志》）

民国初期这一不大慎重的改街名，改去改来给后人造成了一些混乱。支矶石1958年移至文化公园水池边，并新刻"支矶石"三字。

成都以石头命名的街还有天涯石、五块石等。宋朝朱秉器《漫记》中说：天涯石在"蜀城东隅，高二丈，厚仅半尺，瘗根土中，曳之皆摇摇可引，撼之则根不可穷。"明陆琛《蜀都杂钞》："天涯石在

城东门宝光寺侧，有亭覆之。”可猜度现在的天涯石街至少宋朝前就应有了。

成都以古老石头为街名，这不仅仅是传说，而是蜀中前辈们以此寄托探索宇宙奥秘的殷切希望。这在整个中国都是不多见的。

锦里、锦官驿、驷马桥、琴台

汉代成都两江环抱，十八座城门。西汉末年的扬雄在《蜀都赋》中说：“乃其都门二九，四百余闾，两江珥其市，九桥带其流……”真是繁华之极。

晋朝左思的《蜀都赋》写得更气势辉煌：“既丽且崇，实号成都……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都人士女，袨服靓妆。”“隧”就是街巷，“肆”就是商铺。这首为成都写的赞美诗一出世就被纷纷传诵，“洛阳纸贵”的成语就由此而产生。

从赋中可见1800年前成都繁华情景：男男女女身穿炫目漂亮的时装逛街，成百条街巷，上千家商铺，货物堆积如山……诗赋中的画面，简直让人油然联想到现在喧闹的春熙路来！但左思先生大笔却不曾记录下他也许认为是琐屑的汉晋时成都的街名，这实在令今人遗憾！

武侯祠旁边历时三年打造的“锦里”，于2004年11月1日正式开市，有“成都版清明上河图”之称。我曾听到过不少人议论：这新修的“锦里”究竟有没有历史依据？

详考史籍，汉代的“少城”南部是商业区；后来发展至城外，故城门叫市桥门，桥叫市桥，桥南即商贸发达的南市，大概位置在现在锦里西路到西较场一带的锦江两岸。

成都汉时的清碧江水，真令现在的人们羡煞！蜀国自古蚕桑业发达，连古蜀王也名叫“蚕丛”。成都丝锦，在悠悠江波中漂洗后更佳。汉时织锦已成为成都的“支柱产业”，蜀汉时诸葛亮说：“决敌之资，唯仰锦耳！”丝锦已成军费主要来源，可见织锦业之繁盛。故蜀汉之前，已专门修筑锦官城。城中有“锦官”，即织锦大街坊，其“官办”性质也许和文翁“学官”相似。锦官城在什么位置？晋朝常璩《华阳国志·蜀志》中说：“夷里桥南岸……其道西城，故锦官也。锦江，织锦濯其中则鲜明，他江则不好，故命曰‘锦里’。”南北朝时梁朝李膺《益州记》中说：“锦城在益州南笮桥东，流江（即锦江）南岸。昔蜀时故锦官也。号锦里，城墉犹在。”

详考成都历史地理可知：汉时夷里桥（即笮桥）位置，在万里桥（今老南门大桥）上游不远，应在现彩虹桥至百花潭之间。所以“锦里”在汉朝时的大体位置，约在锦江南岸现在的百花潭公园左右一大片区域。

而明朝以前的武侯祠（即丞相祠）在惠陵（即刘备墓）西面，地临原锦官城旧址。锦官城西晋后虽渐废，但唐时街坊遗迹仍不少，所以杜甫老诗翁才有“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的写实咏叹。五代韦庄的《怨王孙》词说：“锦里蚕市，满街珠翠，千红万妆……日斜归去人难见，青楼远，队队行云散。”可想见锦里从汉到唐都是游人如织的极繁华街市。

武侯祠旁新修的“锦里”，很接近汉时锦官城旧址。而且，汉代后锦官城、锦里都渐成成都别称之一，“锦里”还可泛指古代成都街市。如杜甫《为农》诗说：“锦里烟尘外，江村八九家。”新修“锦里”的主要目的是“集中展示巴蜀民风民俗和三国蜀汉文化的”街市。综合上面两大因素，以“锦里”命名当然是非常有历史根据的。

而原来的城边街、羊皮坝街现在命名为锦里路。它紧临锦江北岸，不合古籍“流江南岸”的记载。但这一带也很接近古锦官城，如果

再考虑2000年来河道或有偏移，这条街名为锦里路也是很接近历史的。

锦官驿，也应是汉时就有的老街名。因蜀锦如此发达，在两江汇合处专设驿站发货水陆外运，应是情理中事，所以才有流传至今的锦官驿街。早年我读中学时每日经过此处，犹有成都东门外大码头风采。

如果说汉时锦里为写实之街名，驷马桥和琴台则是汉代流传下来的最富浪漫色彩的老街。

2002年12月30日，整修后的琴台路正式开街，以汉唐仿古建筑群为依托，以展示汉代礼仪、舞乐、宴饮等风土人情为主。同新修的“锦里”一样，许多人也弄不懂建此街的历史依据。

西汉司马相如（前179～前117年），是汉赋鼎盛时期的代表作家，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一页。这位风流才子以弹琴唱情歌《凤求凰》的手段，勾引小寡妇卓文君私奔成都，成为流传千古的风流佳话。我当知青时，就下乡在卓文君家乡邛崃县。有段时间修南河，我天天打着糊满泥巴的光脚板从文君井所在的临邛镇里仁街上经过。不远处是县人民公园，听人说文君老爸、临邛首富卓王孙故址就在此（明代曾在这里发掘出卓王孙贮藏五铢钱的大瓮，乡人建有“瓮亭”）……

司马迁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说：两人私奔成都后，“文君当垆，相如自著犊鼻裈，涤器于市中。”夫妻店里，卓文君在放酒坛的土墩子（垆）边卖酒，相如穿着牛鼻裤充当店小二洗盘子……很有点如今开“冷淡杯”苍蝇馆子的味道。所以富甲蜀中的老丈人卓王孙被这“肇皮”行为气得鼻子都歪了，忙给一大笔陪嫁，让相如收刀停业。相如北上长安求官，走到城北升仙桥，觉得靠老丈人施舍太窝囊，就发狠在桥柱上题字赌咒：“不乘高车驷马，不过汝下！”果然，到京城

后，以《子虚赋》《上林赋》等获汉武帝赏识，被封为中郎将，乘驷马高车喜洋洋地衣锦还乡了。

升仙桥从此更名为驷马桥。成都自古多以桥名作街名，所以有流传至今的驷马桥街。史传相如成都有宅，住家附近还有琴台，西汉后也就成了街坊地名。故杜甫《琴台》诗中说："茂陵多病后，尚爱卓文君。酒肆人间世，琴台日暮云。"但宋朝后琴台街坊就湮灭了，北宋诗人宋祁《琴台》诗中说："君不见成都郭西有琴台，长卿遗迹埋黄埃。"



清末驷马桥老照片



成都仿修的古街琴台路古意盎然



仿古街道琴台路上的汉代车马和文君酒楼

“文君当垆，相如涤器”的旧宅和琴台究竟在哪里呢？后来讹称现王建墓是司马相如的琴台。据南北朝时梁朝李膺《益州记》说：司马相如宅在成都笮桥北一百步、市桥西三百步。据地理史料分析，其址就应在今西较场一带，是“汉旧州市”所在，做生意的好口岸。[8] 而相如的琴台，据绍风先生考证似应在现在青羊宫中降生台处[9]。现琴台路同西较场仅数步之遥，而青羊宫也在附近。所以，琴台路的新修也是非常有历史根据的。

据梁李膺《益州记》所记，南北朝时城内有120坊（一作112坊）。但书中只记下第4坊名叫碧鸡坊的街名，余皆无记。此外见于宋朝以前典籍的，除上述文翁坊、锦官坊外，城西还有花林坊、果园坊；城西北有金容坊、书台坊；城北有龙池坊、石镜坊；城东有富春坊、大相坊等。还有五门街、观街、石笋街、夹街、中坝街、木行街、马务街、国清寺街；浣花里、升仙里、笋里、锦浦里、煮胶巷、府楼巷等街巷名[10]。但这些街坊现在大都已不存了。

赤里、文翁坊、石室巷、君平街、支矶石、锦里、驷马桥、琴台……我想，这些汉代就开始有的一批最早的老街，如像流淌了2000年的血脉，才使成都有了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鲜活的灵魂！

[1] 参见四川省文史馆编：《成都城坊古迹考》，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

[2] 参见《蓉城添景"文化再现工程"将再现老街历史》，《天府早报》2003年4月10日。

[3] 参见四川省文史馆编：《成都城坊古迹考》，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

[4] 参见东汉班固：《汉书·郑子真、严君平传》。

[5] 参见晋常璩：《华阳国志·蜀郡士女》。

[6] 参见李金彝：《成都街名考》，《成都志通讯》1984年第3期。

[7] 参见《成都大辞典》，四川辞书出版社，1995年。

[8] 参见石湍：《从卓文君在哪里卖酒说起》，《成都文物》1986年第2期。

[9] 参见绍风：《琴台考实》，《成都文物》1987年第1期。

[10] 参见冯举、谭继和、冯广宏：《独特的城坊水道文化》，载《成都府南两河史话》。

清代成都街道的重建

成都建城至今2300多年，其间饱经无数劫难。明末清初的战乱，更使成都遭受空前大破坏，街道无存。清朝后的重建，终于奠定近代成都街道典雅辉煌的基本格局，再次展示了这座历史名城顽强的生命活力。

战乱中毁灭的城市

翻开明朝末年华阳县知县沈云祚的儿子沈荀蔚写的《蜀难叙略》，340多年前的惨烈画面令人震惊：“时成都城中绝人迹者十五六年，唯见草木充塞，麋鹿纵横，凡市廛闾巷，官民居址，皆不可复识！”



明朝《天启成都府图》（《府治三衢九陌宫室图》）。从这张1621～1627年绘制的地图上，可想见明末成都的繁华景象（出自：《成

都城坊古迹考》）

明朝天启年间（1621～1627），成都府城新建成的“三衢九陌”为主干的街巷，是何等繁华——如今却已荡然无存了！

亲历战乱、九死一生的沈荀蔚，于1659年自洪雅县回到离开16年的成都，眼前情景令他“惨不忍见，梦魂皆咽”。他看见城中两万多口水井，大都填满尸骨。几个残存的老和尚，在军营中找来些人力车辆，从各街道废墟中搬运尸骨出城，每天要拉几十趟，城外已是“白（骨）山累累”……[1]

李白“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诗中的锦绣城市，怎么变得如此地狱般凄惨？让我从众多历史典籍中，为读者勾勒出350年前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城市灾难图：

明崇祯十七年甲申，也即清顺治元年（1644），李自成攻入北京，绝望的明思宗朱由检煤山自缢。这年农历八月九日，张献忠的“大西军”呐喊着用炸药炸开西北角的城墙，杀进成都。蜀藩王朱至澍夫妇先吞药、后跳井；明朝四川巡抚龙文光等大批官吏也哭号着自杀“殉国”。

农历八月十五日，“八大王”张献忠在成都建国，国号大西，改元大顺，自称大西王，令臣民称自己为“老万岁”。张献忠这个超级杀人狂，攻陷成都后曾屠城三日：每十个百姓拴成一串，屠猪羊般赶到东门外中园较场杀死。后来他又发兵到川南各州县剿杀。

“老万岁”以杀人多少论功行赏。部下杀人太多，难以搬运统计，只好把手掌、人头、耳朵、鼻子堆成堆来计数，以致“凡有军官衙门所在，手掌如山积，几于假山千峰万叠！”记录这段骇人史实的人叫欧阳直，当时在大西政权任职。他亲见一个副将升为总兵的请功札子，“其札头空白处用朱笔细字备注，功级算手掌一千七百有零”。区区副将就砍杀一两千人，所以欧阳直在《蜀警录》书中哀叹：“呜

呼！惨哉！由此推之他更可知也！”

欧阳直还记述：张献忠以“科考”为名，“调远近乡绅赴成都，尽杀之。调各学生员，到则禁之大慈寺……（士子）鱼贯而行至城门口，打落行李，剥去衣服，出一人甲士即拿一人，牵至南门桥上斫入水中。师生主仆悉赴清流，河水尽赤，尸积流阻，十余日方飘荡去尽。”据载仅这一次就杀了17000多个读书人……

欧阳直还在书中记述了当时骇人听闻的街道奇景：张献忠把不屈服于他的官员、士绅剥皮，“凡所剥人皮，渗以石灰、实以稻草，植以竹竿，插立于王府前街（即今天府广场位置）之两旁，夹道累累列千百人，遥望如送葬俑！”[2]

这个“大西皇帝”先杀百姓，次杀军眷，再次杀部下士兵、妃子和亲信。四川百姓杀光了，“老万岁”的皇帝梦也泡了汤。张献忠称孤道寡不到两年，便狼狈逃离成都。

被张献忠抓获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类思和葡萄牙传教士安文思，亲眼看到张献忠逃离时“下令将皇宫焚毁”，“复令将全城四面纵火，一时各方火起，公所私地，楼台亭阁，一片通红有似火海。大明历代各王所居之宫殿，与及民间之房屋财产，均遭焚如。转瞬间，川中首城已成焦土，人畜同化灰烬！”[3]

张献忠登基的老皇城大殿修得牢固，烧不起来，他命令士兵“灌以脂膏”；盘龙石柱烧不烂，则“裹纱数十层，浸油三日，一火而柱折”……[4] 正像李劼人先生所说：“成都城经张献忠这一干，的确是焚完毁尽！”[5] 张献忠离成都后仍杀杀杀，一路杀到西充，1647年1月3日终被清军射死。

破坏成都、四川的还不止张献忠。张献忠死后，张献忠余部、残明军队、清军、吴三桂……走马灯样在巴山蜀水反复折腾，一直闹了

三四十年。

田园荒芜，兵匪所到之处只好捕人作“人粮”，将活人按整猪羊之法而宰食之，闹得人口锐减。成都明末清初的这段浩劫，典籍中充满悲哀的记载：“真是尸积如山，血流成河，逐处皆尸，河为之塞，不能行船。锦绣蓉城顿成旷野，无人居住。一片荒凉惨相，非笔舌所能形容……”“城内杂树成拱，狗食人肉若猛兽虎豹”，“成都地区千里无烟”，“举城尽为瓦砾”，“成都空，残民无主”[6]……城内残存少数身体稍好的人，也成兽类，“聚众掠男女”，把其他人杀了晒成肉干充饥。接着瘟疫流行，人又死殆尽。最后成都成了虎豹豺狼的天下，以致“渡水登楼，州县皆虎”j。“成都残民多逃雅州，采野菜而食”，“民逃深山中，草衣木食，遍体皆生毛”，成了野人；还有无奈流落到深山去为土司当奴隶娃子的……[7]

所以1647年清朝李国英大军进入成都后，只能在杂草丛中居住，省治也只好暂设保宁府（今阆中）。直到清顺治十六年（1659），四川巡抚高民瞻才把省治迁回成都。而此时的成都，《滟滪囊》等史书的记载是：“尸骸遍野，荆棘塞途。昔之亭台楼阁，今之狐兔蓬蒿也；昔之衣冠文物，今之砾鸟鼠也。昔之麻桑禾黍，今之荒烟蔓草也。山河如故，景物顿非，里党故旧，百存一二”……

当高民瞻登上残破城楼，眺望一座“死城”，这位清朝汉军镶白旗将军不禁悲从中来。

我注意到一个历史细节：甘肃、陕西一些百姓随清军到成都（有“支前”性质的民工杂役），这些人可说是清初最早入川的移民。据沈荀蔚目睹，高民瞻对他们实行多劳多得的占地政策：“俱伐树白之为界，强有力者，得地数十丈不止”。移民们“先施棚帐于髑髅瓦砾间”，用作建筑工棚；接着砍树做房柱，割下齐人高的蒿草做屋顶……慢慢地，随军百姓和兵士中有了简单的物品买卖，外省商人也渐“趋利而来”；但可怜，残存的四川本土人则在千百人中找不到一两

个了！[8]

瓦砾废墟中的这些“战时建设”和市场，自然也是没有街道可言的。

城坊街道的重建

清顺治十七年（1660），汉军正蓝旗人佟凤彩任四川巡抚，上奏朝廷请重修成都残破城邑[9]。但1661年清廷第一次户籍清理，全四川仅有8万多人，成都只1万多人，财力实在有限，修城只好作罢。到了康熙六年（1667），汉军镶蓝旗人张德地任四川巡抚，才和布政使司廷湘、按察使李狮霄、知府冀应熊、成都县知县张行、华阳县知县张喧等人一起，共同捐资重修成都城墙。[10]

新修城墙有四座重要城门：东边叫“迎晖”，南边叫“江桥”，西边叫“清远”，北边叫“大安”。此后逐渐形成东大街、南大街、西大街、北大街四条纵横贯穿成都的重要街道，所以清人竹枝词中说：“东西南北一城环，四条大街对四关。十字分开详细算，东华门是正中间”[11]。这种街道基本布局影响至今，东华门在今盐市口附近，仍是市中心。

道路、街巷是最基本的市政设施，清朝历代官府很重视街巷建设。康熙五十七年（1718），四川动员全川力量，由各府、州、县分段承包，再次修建成都城及街道。雍正五年（1727），四川巡抚宪德又增修成都。1729年冬，宪德专门给雍正皇帝写《奏报垫铺成都低洼街道折》说：东门大街一段“系商旅往来要路，低洼积水，不利行人”，请求把原明朝蜀王府（即皇城）倒塌的城墙砖用来铺砌街道。



由成都“照相楼主人”吴绍伯于光绪二十年（1894）绘刊的清末《四川省城街道图》（出自：《城市规划与建设》）

乾隆四十八年（1783），四川总督福安康“奏请发帑银六十万两彻底重修”成都城。修整后的大城十分巍峨：周围长二十二里八分，砖高八十一层，城楼顶高五丈。修城同时，用石条“创修”了不少城中街巷 [12] 。清代中期成都各街道也大都有“阴沟”等排污设施，且各街有“土地会”民间团体，负责每年淘浚阴沟等“环卫”工作。 [13]

贵州黔西人李世杰（1716～1794）是个很被称道的官员。他继福安康任四川总督，又搞了两年的城市街道建设。李世杰在其《北门修路记》中说：出北门的重要街道直达京师，“行旅往来如织”；但街道低洼，“每于夏秋之季，淖（烂泥坑）深数尺，车马困于泥泞”……他带头捐钱，并倡议下属官员们都掏腰包捐款作修路经费。这条道路后来一直铺砌到十多里外的三河场，从而使北门内外道路“宽平修整，履之坦然”。我查阅清代杂书，发现有个叫杨燮的诗人在竹枝词中对此大加称颂：“驷马桥头石路平！” [14]

五代蜀后主孟昶在成都大植芙蓉，从此芙蓉城成为锦绣成都的代称。李世杰为了“复五代之旧，符锦城之名”，还命令官民在城内外空地及街道两旁“遍种芙蓉，且间以桃柳”。他认为这并不仅是美化，也是为了保护城市。他专门写了《成都种芙蓉碑记》，说：绿化后的成

都将“葱葱郁郁蔚为茂林”，不仅“春秋之季望若画图”，而且可防“风雨之飘摇，冰霜之剥蚀”……这位李总督的“环保”意识可称超前。

清代成都街道维修常常只能靠官员和民间捐钱当善事做，故街头巷尾常有“修桥补路”的功德碑，我小时在东门一带街边桥边，见过许多这种半截埋在土里的残碑。地方志中也记载了不少这方面的“善人”。但因无固定市政经费，烂街也不少，民间竹枝词中也就有了“最是‘南府街’洼下，雨中门板当船拖”的滑稽场景……[15]

对近代成都街道产生重要影响的大事，是“少城”的修建。

康熙五十七年（1718），荆州八旗兵3000人来川。康熙六十年（1721），时任四川巡抚的年羹尧上奏朝廷，要在成都大城垣内新筑一城，专驻八旗官兵及其眷属，以免与汉人杂处滋生事端。此“城中之城”称作“满城”，又叫“少城”。从酝酿到建成完善，前后历时二三十年……

“少城”方圆约十里，范围大体上南起现在的君平街、小南街，东自半边桥街至东城根街，北至八宝街、小北街，西至同仁路。有四座城门：南名“安阜”，北名“延康”，东边两门一叫“迎祥”一叫“受福”。“受福”门在今祠堂街口，清末时城楼内有“少城旧治”、外有“既丽且崇”的巨匾，巍峨壮观。[16] [17] “少城”内房屋街巷是按照八旗军传统及五行相克律来规划的，使“少城”内街道形似蜈蚣：将军衙门（旧址约在今金河大酒店处）像蜈蚣脑袋；城内中心宽街（今长顺街）像蜈蚣身子；宽街两侧共有官街八条（八旗分驻）、兵丁胡同三十三条，就像蜈蚣百脚。



清代成都幽深的少城内一条小街道（［德］弗里茨·魏司摄）



清末成都少城内的道路（［英］尔尼斯特·亨利·威尔逊摄于1908年）

“少城”的建成，给清代成都街道至少带来以下五大变化和特点：

首先将“胡同”这样具北方特色的名称带到成都，如现在著名的宽巷子、窄巷子为正蓝旗驻地，原名就叫仁里头条胡同和仁里二条胡同（辛亥革命后废“少城”各胡同之称，改为街、巷）。其次，形成至今城西一带街巷密布、错综复杂的格局。第三，形成“大城中又有二城”（老皇城、少城）格局，产生了与城垣有关的很多新街名，如东城根街、月城街、东门街、东西顺城街，等等。第四，使成都街道更

增添耐人咀嚼的历史渊源和淳厚的文化品位。如现“祠堂街”，清时叫喇嘛胡同，是因1718年旗人驻军为纪念修筑“少城”的年羹尧而建生祠于此而得名；最奇特的要算半边桥街，这是因为“少城”东边城垣跨桥而筑，一桥两分，满汉各占一半。清代就有竹枝词道其古怪：“筑城桥上水流下，同一桥身见面难！”这道奇异风景可能全国都罕见。第五，“少城”密布的大小庭院，种种古朴风貌，为成都街巷增添了无穷秀丽典雅：街巷林荫茂密、鸟语花香；金河碧波横贯东西且可航船，两岸夹杂稀疏农田菜畦……难怪清末傅崇矩《成都通览》中说：少城内“景物清幽，花木甚多，空气清洁，街道通旷，鸠声树影，令人神畅！”



1911年傅崇矩绘制《新订成都街道二十七区图》中的少城，可见每一条胡同

至今我们走到城西同仁路等街巷，仍可感到其风景好于它处；这也是如今许多老街荡然无存，宽巷子、窄巷子已成为成都老街孑遗珍宝的重要原因……

清末街道的辉煌和污垢

清初从全毁到开始重建，仅隔二十来年。因旧踪易寻，成都街巷仍大致保留前朝格局。在光绪三十年（1904）的成都街市老地图中，可发现其街巷建设仍基本沿袭明代以前顺应河川地势，房舍多形成棋盘方格式布局，体现了“道法自然”的传统原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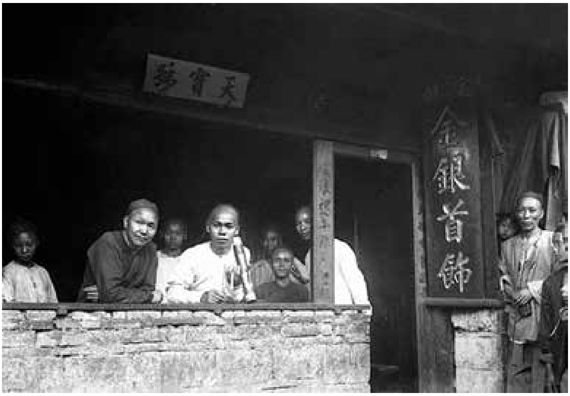
战火中毁灭的成都，如凤凰涅槃般在烈火中重生。我在《华阳县志》等方志中查到，距1644年明亡后不过六七十年的康熙后期，成都“人民廛市殊倍于昔”，街道已相当繁华。再过几十年后的乾隆、嘉庆年间，更是“商贾辐辏，阛阓喧闹，称极盛焉！”



清末东大街上，有专卖彩票的店铺（［美国］张伯林摄）

据100多年前的清同治《成都县志》卷二记载：成都当时的主要街道有117条。到宣统二年（1910）《四川官报》统计，成都共有街道438条，小巷113条。诸如玉器、纱帽、骡马、牛市、书市、盐市、绸缎、银号、油米、木柴，等等，常集中在某街巷而形成专业街市（如弓箭鞍鞯铺在提督街、衣铺多在鼓楼街），使成都再现中国西南重镇的辉煌。至今我们一提到骡马市、打金街、盐市口、打铜街、

染房街等数不清的街名，虽然如今大都只徒留虚名，但仍会勾起我们对梦幻般老街的历史的回味，产生深深遐想和追念。



清代成都繁华的珠宝街

清代中后期成都街道很有近代商业大都市风采，已誉满中外。

1870年，一个大胡子洋人兴致勃勃地出现在街头，这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男爵。他满怀感情地给本国友人写信说："成都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之一，也是最秀丽雅致的城市之一……街道宽畅，大多笔直，相互交叉成直角"。街道两旁房屋墙壁上处处可见的壁画、雕塑令他欣喜不已："这种艺术情趣在周围郊区随处可见，而每一个小城镇在这方面都好像是成都的再现。由红砂石建成的牌坊在乡间触目皆是，所有的旅游者无不为其精湛的艺术而感到惊异……其中一些不愧是中国的艺术杰作。这种优美在人民文雅的态度和高尚的举止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成都府的居民在这方面远远超过了中国其他各地！"[18] 1897年，另一个身体健壮、眼神锐利的法国人马尼爱来到成都。他是法国研究地理旅游的组织"舆地会"成员。他在《游历四川成都记》中说：成都"景色清幽，如龙盘、如虎踞"。城内几条街市令他吃惊："甚为宽阔，夹衢另筑两途，以便行人，如沪上（指上海）之大马路然。各铺装饰华丽，有绸缎店、首饰铺、汇兑庄、瓷器及古董等铺，此真意外之观！"他几月中已遍游中国，认为成都比"沿海一带及内地各

城”都好；在清末衰败的中国“十八省中，只此一处，露出中国自新之象也！广东、汉口、重庆、北京，皆不能与之比较。”“尚有城市规模者，此为第一！”[19]



清代成都繁华的玉石街（［德］弗里茨·魏司摄）



清末成都街头的老茶铺

1905年，短小精悍的日本人山川早水到成都，他说：“东大街足有十七八公尺之宽，其他各大街也不逊色。同不能两轿并行的上海城内的街道比，真是不可同日而语，真有大城市的气派；而且，街道整

洁（比较而言），我去过的城市中，还未见过像成都这样的城市……如果将其与北京相比，其面积固然不可及，而其整洁远在其上。”[20]

但我们如因此而为清末成都街道沾沾自喜，也太失之浅薄。百年前那位研究城市建设的法国“老外”马尼爱，在赞美的同时也一针见血地批评：在成都“巍峨气象”外表包裹中，其“脏、乱、差”也吓得死人！他说：衙门、商贸等面子街道当然是“金碧辉煌”“宽衢华厦”，但更多偏僻街巷却不仅狭小，还“随路秽积”“恶陋无比”。这位马尼爱先生坐一顶小轿子“穿羊肠、越鸟道，所经房屋秽败摧朽，如人身之患大麻疯，无一块好肉”。更丢人的是，他的两个轿夫时时“跨过垃圾之堆”，“又踏遗粪”（踩了一大脚缺德人在街巷中乱屙的臭屎），弄得“跌撞不止一次”，样子极为狼狈……[21]



清末少城内一景

说实话，与李希霍芬男爵的热情赞美相比，我更欣赏马尼爱先生“贬多于褒”的评论，正如百年前《经世报》《渝报》等中外各报刊登此文时加的编者按语所言：“阅者如能反思，亦借镜之一助也！”

辉煌与丑恶现象并存，这才是清末成都街道的历史真况。

---

[1] 参见沈荀蔚：《蜀难叙略》。

[2] 参见欧阳直：《蜀警录》等。

[3] 参见古洛东：《圣教入川记》。

[4] 参见费密：《荒书》等多种史书。

[5] 参见《李劼人说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1年。

[6] 参见费密：《荒书》等多种史书。

[7] 参见费密：《荒书》等多种史书。

[8] 参见沈荀蔚：《蜀难叙略》。

[9] 参见《清史稿》列传六十。

[10] 参见雍正年《四川通志·城池》。

[11] 参见《成都竹枝词》，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

[12] 参见同治年《成都县志·城池》。

[13] 参见四川省文史馆编：《成都城坊古迹考》，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

[14] 参见《成都竹枝词》，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

[15] 参见《成都竹枝词》，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

[16] 参见四川省文史馆编：《成都城坊古迹考》，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

[17] 参见成都市满蒙人民学习委员会编：《成都市满蒙族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

[18] 参见［美］罗伯特·A.柯白：《李希霍芬男爵书简，1870～1872》，《四川军阀与国民政府》，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页。

[19] ［法］马尼爱：《游历四川成都记》，载《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1979年。

[20] ［日］山川早水著，李春德、李杰译：《一百年前一个日本人眼中的巴蜀风情》，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6～67页。

[21] ［法］马尼爱：《游历四川成都记》，载《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1979年。

民国时期的成都街道

民国时期，成都街道曾有三次大变化高潮。但半个世纪的战乱，使解放前夕的成都街道已年久失修、破烂不堪……

拆少城建街巷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诞生。3月11日，四川都督府在成都成立，尹昌衡为都督，张培爵为副都督。象征“五族共和”的五色国旗代替了大清龙旗，“呼呼呼”地飘扬在蓉城街头……

满族旗人独居“少城”的局面令人不满了。那时你如从西御街进入巍峨的少城“受福”门（今祠堂街口），回头一望：大城那边全是房屋、商铺、石板街，市民摩肩接踵、人声喧闹。而“少城”内，则仿佛鸟语花香的郊野，到处是碧树、荷塘……你再沿一条土路往前走，会在绿荫中看见一条条幽雅的街巷，古色古香的房屋，墙内也全是花树。正像李劼人在《死水微澜》中说的：“满城里，你走完一条胡同，未见得就能遇见一个人……而这里的人，男的哩，多半提着鸟笼，搀着钓竿；女的哩，则竖着腰肢，梳着把子头，穿着长袍，拖着一双没后跟的鞋，叼着长叶子烟杆，慢慢地走着；一句话说完，满城是另一个世界。”[1]



1912年，从成都城市中心皇城南望，贡院街一片荒凉

难怪在都督府的一次会议上，有人拍着桌子激烈发言了：“少城乃前清成都之独立王国，光复既已成功，理应拆毁。少城内‘胡同’本为满洲名词，亦应废去，一律改名街巷！”

很多人赞同，纷纷说：“且先不论满汉之分。单就交通而言，‘少城’街巷自成封闭体系。现府城内外共有街道516条，因这座城中之城，使城西如壁谷，致全城塞阻！”“对极！如今大城中繁华如南大街、北大街、总府街、文庙街等，只有二丈左右宽，其余小街小巷更曲折如羊肠。且各街面年久失修，石板破烂不堪，泥土路面雨天泥泞，晴天尘土飞扬……成都为蜀中首府，事关中外观瞻。建城必以拆少城、治街路为先导！”

于是，民国后成都街道的第一次大变化高潮掀起了。

四川军政府为要去除清王朝影响，下令建“忠烈祠”，以纪念辛亥保路运动中的死难先烈。明代有座“都会府”，清代重修后改称“会府”，每月朔（初一）望（十五），全城文武官员聚此朝会大典。庙堂内原有“当今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的“九龙万岁牌”，故又名万寿宫。现在“万岁牌”被取下，换成诸辛亥烈士灵牌。万寿宫改建为“忠烈祠”，并正式命名所在街道为“忠烈祠街”。（民国中后期后，这个庄严之地慢慢成为旧货市场）

一些前清官衙旧地也辟为街道，如四川藩台衙门所在地后建成“藩署街”“藩库街”。

1913年拆除了“少城”。时任四川督军的胡景伊下令在西较场城墙边新辟一城门，取《左传》中“通商惠工”之意叫通惠门，民间称为新西门，街名通惠街，自此成为成都西线重要街道。城内外“赶青羊宫花会”的红男绿女们不再“甩火腿”多绕路吃苦了，所以刘师亮写有竹枝词赞道：“通惠门前十二桥，游人如鲫送春潮。与郎走过桥头去，笑指仙都路不遥！”[2]

此后，在通惠门外护城壕上修建十二桥格的木篷廊桥。此处碧波映月、林密花幽，是蓉城一景。据说在光绪年间任翰林的富顺人宋育仁曾在桥头勒石题字，大意是：“古扬州有二十四桥，此桥虽仅得其半，也可‘平分扬州明月’也！”晚唐诗人杜牧诗：“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原来“十二桥”是根据这首千古绝唱来的。修桥后，桥头新建街道命名为十二桥街（旧址约在现西安路和琴台路之间）……也许现在已很少人晓得桥、街最初命名的典雅含义了。



1913年的通惠门（出自：1927年《成都市市政年鉴》）

拆“少城”后命名的“东垣街”更让后人寻味：有人误以为“垣”即城墙，不过东城墙下一条街罢了。其实“东垣”是人名。据陶亮生先生说：陈东垣，清末贡生，留学日本学习警政，回国后任成都西城分局局长。他清正廉明，拆城建街路时从不贪污吃“黑钱”，也不侵扰百姓，深受拥戴……故民众公议以其名名街，还竖立“西城大邱”大碑记其功德（东汉陈寔任大邱县令，很有德政）……可见为政者是非功过，后人总会评说。

“少城”拆除后，将“胡同”之名全改为街、巷。如君平胡同改为支矶石街；纪念修筑“少城”的年羹尧的喇嘛胡同改为“祠堂街”；养马的仁德胡同改为东马棚街；右司胡同改为西胜街……

1914年，又在东较场侧新开一城门，叫武城门，民间习称新东门。1915年新建武城门大桥，将城外天祥寺等街与城内各街相连。这是一座高拱大石桥，我儿时每年洪水季节常见许多人在桥上不用鱼饵“撒白钩”，大呼小叫地从汹涌波涛中拉起尺把长的大鱼，构成难以忘怀的古城风景画……此外，东南西北四城门都有“月城”（城墙和城门是双层，形如半月），民国后都陆续拆除并辟为街道。如城北靠内城墙一带因乱建房屋而交通堵塞，后拆房辟街，取名“通顺街”。

军政府为解决满城八旗子弟生计，拆“少城”后以支矶石庙宇为基地办起“同仁工厂”，主要招收旗人就业，取汉、满、蒙各族“一视同仁”之意，故街名同仁路。所生产机织线袜、毛巾等销路甚广，可算是近代成都有名的“街道工业”。因这里靠近原“少城”西城墙，又习称西城根街。

1918年年底，在原“少城”东城基上修筑“靖国路”（后称东城根街），以纪念孙中山领导的四川靖国之役取得胜利。1923年，又重新扩筑同仁路。靖国路和同仁路的建成，打破了清代城西交通的封闭格局。故时人冯家吉写的竹枝词称赞道：“喜门钱纸今日烧，添出游民路两条。车有东洋藤有轿，春天不怕雨潇潇。”[3]

1922年，川军总司令刘成勋将提督衙门改为“中山公园”（解放后改为文化宫）。公园后卖鸟雀的小街巷“汉阳街”也改为“中山街”，以纪念孙中山。

从1912年至1923年，虽然入主蓉城的军阀走马灯样在换人，但街道仍逐渐发展：一些街巷拓宽，新辟了许多街道，一些街道改换成具有新时代色彩的街名……

杨森修马路

1924年5月26日，四川军阀杨森威风凛凛杀进成都，当了总揽四川军政的“督理”。他雄心勃勃地吼出“建设新四川”的响亮口号。整修街道、马路，是他“新政”的第一要点。于是掀起民国后成都街道第二次大变化高潮。

当时的成都街巷皆用石板、石条铺砌，许多街巷建有牌楼或栅门，东大街等繁华街道夏天沿街还搭设凉棚。古色古香的街巷仅可通行人、驮力，常见的交通工具是闪悠悠的“街轿”“滑竿”和鸡公车、黄包车、马车。“九里三分”的城墙内，是绝对见不到汽车影子的。连名震巴蜀的东大街，这时也只有三丈多宽。达官贵人坐在铃声当当的私人“黄包车”上，那神气派头不啻如今玩“奔驰”“宝马”。

杨森下令将东大街沿街店铺拆除，拓宽成大马路，东大街上有座巍峨牌楼，横额写有“既丽且崇”四字。此时，这座精致典雅的古牌坊也消失在拆除的尘埃中……

今春熙路市一医院至东大街一带，为前清主管全省司法的“臬司”衙门旧址，因内设牢房，占地极纵深。民国后此处乱建不少店铺，极为脏乱。杨森下令强行拆迁，修建一条连接东大街和总府路商业场的黄金通道——这就是有名的春熙路。

杨森不准一路乱屙臭屎的马车和损坏路面的“鸡公车”（独轮车）

再通行城区，违者被巡查队员抓住要罚打手板心。

杨森推行“新川政”，许多人认为是历史进步。但他的一些横蛮做法，也遭到讥笑和反对。他修春熙路的时候，甚至骇人听闻地把一个谋杀亲夫的女人在闹市用“剐刑”，被外国报纸斥责为“这在20世纪的四川是闻所未闻的！”[4]



1925年杨森督川时正在重修的总府街（出自：1927年《成都市市政年鉴》）

杨森貌似“新潮”，脑壳头却迷信。他的公馆在成都猫猫巷（巷口有一石柱，柱顶刻有虎头，川人戏称老虎为大猫）。这位督理大人，因嘴巴较尖，人又很精灵，绰号“耗子精”。耗子住进猫猫巷，岂不危险？于是杨督理下令：把猫猫巷改为将军街（此街名至今犹存）。

另一军阀刘湘也异曲同工：他的公馆原在刀子巷（清朝时以铸刀剑而得名），刘湘恶其不祥，加之他又死过儿子，为避讳和祷祝，硬改街名为“多子巷”（此街名也至今仍存）[5]。这成为民国中强权改街名的趣闻。

抗战的影响

1937年7月8日午后，成都大街小巷响起急促吼卖《抗日战争爆发了》的号外声！抗战，掀起民国后成都街道第三次大变化高潮，留下了深深的历史烙印。

我从记事起，就记得“跑警报”躲日本飞机轰炸是父辈嘴巴头常说的话题。1939年5月9日，市政府为便于市民跑警报，严令昼夜施工增开古城墙新出口：如东门的新南门、新东门、东较场，北门城隍庙，南门南较场、瘟祖庙……

“复兴门”（俗称新南门）外的锦江上，这年建成“复兴桥”。桥东侧建成街道，名“复兴里”。不要小看“复兴”这两个字的命名，它体现了当年成都民众抗日救亡的坚强意志。

当时大批外省难民逃到成都，新辟“复兴门”后，市政府在锦江南岸，东至四川大学、西接华西坝、南抵田野的大片区域修建“新村”，安置难民和疏散市民。“新村”由西向东建有三条主要街路，取名为致民路、龙江路和新生路。这三条街路上，由南至北又建有多条小街巷。大概因街巷较多，难以逐一命名，干脆简单按序数叫十一街、十二街……十七街。



1939年因日本飞机空袭，在城南中、下莲池之间增辟复兴门，习称新南门

但“新村”最长的主要街道“致民路”，其命名则寓意深长。地方史料中少有准确阐释其意的，仅以“致民以治”四字来含糊解释。我遍查资料，见《吕氏春秋·爱类》中有言：“《神农之教》曰：‘士有当年而不耕者，则天下或受其饥矣；女有当年而不绩者，则天下或受其害

矣。’故身亲耕，妻亲织，所以见致民利也。”古人主张在“贵公”“去私”的前提下，无论官民都要劳动，男耕女织，才能“致民利”……战争时期难民大量涌入，不能全靠政府救助。“新村”街道以此命名，是很有积极意义的，体现了全民抗战的时代精神。

现新南门汽车总站所在的“龙江路”，四川音乐学院所在的“新生路”，也有“东方巨龙”“中国新生”的“抗战”含义。

新南门建成后，修起直通现一环路磨子桥方向的大街道。因在“新村”西北方向，故命名为“西北路”（1966年改称红星南路，1981年后改为新南路）。我收藏有民国31年（1942）的“成都市区图”，上面有“新村”册字形街巷区域，有西北路、致民路、龙江路、新生路等重要街道。图上，西北路上的“新村办事处”（现七中北侧位置）标志明显，应是当年市政府设的重要机关。

新南门稍上游也建了供疏散的桥（约现锦江大桥位置）和街。南虹本是上海地名，因抗战后“南虹艺专”迁锦江南岸，故命名为南虹桥和南虹桥街。

1938年春，金陵大学（今南京大学）西迁成都，校本部在西北路西侧的大片菜田里建屋舍，逐渐形成街道，命名“金陵路”。一时名流云集，如史学大师陈寅恪、蒙文通、冯汉骥，中文系名教授吕叔湘、程千帆等人的身影，每天出没在这条新辟的街道上。

“新村”“金陵路”这类新区域的修建，使城区扩展、街道向两江外延伸。我把1942年的地图与清末成都“光绪三十年图”对照：38年间，城内、城外都增添了不少街道。



民国时期1944年前后的成都街道



1944年成都城市远眺图

抗战时期，像“南虹”“金陵”这样把外省地名作为成都街名的，城北还有。1935年后，中央军校（前身即黄埔军校）在北较场建成都分校。现军区大营门到原军校大门之间，本是观音堂街，后改为黄埔路。

抗战爆发后，“军校”附近几条街都以校本部及几处军分校所在地改命街名：武备街（又名止戈里）改街名为“白下路”（白下为南京别号，中央军校总部曾在南京）；苦竹林街改街名为“江汉路”（有武汉军分校）；仁风里街（清代曾名武担山街、武备前街）改街名为“洛阳路”；丰豫仓街（清代在此储粮）改街名为“昆明路”……

年近九旬的吴友生老人对我说：黄埔路和江汉路的“丁”字形交叉处，那时有个灯塔式的碉堡，下有甬道直通校内。市民可遥望黄埔路北侧大门上极醒目的对联：“升官发财请走别路，贪生怕死莫入此门。”国共合作的抗战年代，军校内时时传出《大刀进行曲》《我们在太行山上》等慷慨激昂的歌声，令市民振奋。

末世的破旧苍凉

民国半个世纪间，战乱不已。街道年久失修，使锦绣成都变得蓬头垢面、周身污垢。

我家旧居在望平街，如今紧靠东风大桥的繁华之地，当年却还是郊外。我家房屋后就是东门大粪商叶海清贮粪远销的几亩大方格式“粪塘子”（民国时粪商雇粪夫把粪便从城中运至城边储粪坑，习称“粪塘子”）。近郊农民也每天入城，挑着粪桶沿街吼叫：“倒马桶子啰！”婆婆大娘手端宝贝一拥而出……经常难免一路“抛撒黄金”。现在已算市中心的浆洗街，当时也有很多“粪塘子”；与浆洗街紧临的桓侯巷，还有个狗屎市场，专做“肥气重”的狗屎买卖。浆洗下街，捶牛骨头卖骨粉肥料的作坊很多，更是臭气熏天。

像望平街、浆洗街这些成都四城门内外的街巷，都分布着粪商和农民的数千个大大小小的“粪塘子”。此外，环抱成都两河的“尿水码头”也很多。我小时常在府河的天仙桥后街和南河的九眼桥等河岸码头，遥望粪尿顺十多米长的木槽流入“尿水船”中的奇景……沿河街道污染，苍蝇乱飞。

除春熙路、东大街、祠堂街等少数大街外，城中心街道同样糟糕。

“皇城”外（现天府广场位置），曾是贡院街、三桥正街等脏乱街巷；东倒西歪的烂棚户星罗棋布，连皇城城门洞口两个威武的大石狮

子也被包围得严严密密。“御河”淤为臭阳沟，两岸成陋巷，有的河床段也搭建了许多烂棚子。“皇城”内，脏乱的街巷如“丐帮”大码头，无业流民乱搭建许许多多的棚屋。“皇城”后子门处，则是由煤渣和臭垃圾堆砌几十年而成的“煤山”。

街道记载城市历史。民国后期的成都街道，夕阳鸦噪声中，形成一幅末世衰亡图画……

---

[1] 参见李劼人：《死水微澜》，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

[2] 参见《成都竹枝词》，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

[3] 参见《成都竹枝词》，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

[4] 参见［美］罗伯特·A.柯白：《四川军阀与国民政府》，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2页。

[5] 参见陶亮生：《成都街名琐记》，载《成都掌故》第一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0页。

春熙路的沧桑

春熙路，中国西南最具现代化商业气息的城市街道。它的沧桑历史，却如夕阳晚照下越来越远去的老人，只留下依稀背影让后人猜想……

修建春熙路时的“拆迁”风波

宣统小皇帝被掀下龙庭，中华民国建立，巴山蜀水却并不太平，各路英雄豪杰你征我伐……1924年5月26日，20军军长杨森威风凛凛地杀进成都。

杨森（1884～1977），字子惠，广安县人。1908年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毕业后迅速崛起，1924年被北京政府委任督理四川军务[1]。



1925年任“督理四川军务善后事宜”的杨森

杨森当四川“督理”后，雄心勃勃地吼出“建设新四川”的响亮口号，推行“新政”：一、修建马路；二、开辟公共体育场；三、成立通俗教育馆；四、提倡“朝会”。

为什么修建马路会成为他“新政”的要点？

成都那时全城四门及附郭大小共500多条街道，都很狭窄，且皆

用石板、石条铺砌。较繁华的南大街、北大街、总府街、文庙街等，只有二丈左右宽，其余多不及二丈。成都繁华的东大街和“劝业场”（今商业场）中间，狭窄的科甲巷更是可怜，“宽仅数尺”，想来两个胖子并肩走过也麻烦……[2] 而科甲巷羊肠小道周围，是废置的清朝时代的按察使衙门，空地上胡乱搭建的店铺不少，污水横流，极影响市容。所以当秘书陈维新、穆耀枢等人建议仿照外国改进成都市政时，杨森欣然采纳，下令将按察使衙门和沿街乱建店铺拆除，把东大街拓成马路，再在东大街到劝业场之间修建一条南北向的马路。他委派市政督办王缵绪兼任马路督办，卢作孚任通俗教育馆馆长，穆耀枢协助筹划……

杨森修春熙路，也在打“卖地皮”的算盘：他的军队已逾十师，军费浩大，何不利用这一带的官产、庙产之类来开辟财源？

王缵绪组织勘测后，将新马路规划为东西南北四段，十字交叉，中辟一街心花园……[3] 据说这是杨森采纳了英国牛津大学毕业的“戴顾问”的“新潮设计”。

但“拆迁”风波陡起，商家因拆店断了财路，纷纷抗命。成都著名的“五老七贤”尹昌衡、宋育仁、曾鉴、徐炯、陈钟信（五老），方旭、赵熙、胡峻、曾培、文龙、颜楷、刘咸荣（七贤），都是清朝的遗老（翰林、进士、举人、拔贡）。他们自称代表民意，颤巍巍地去督署见杨森，说：“成都又没几辆汽车，修马路实无必要。子惠督理啊，修路扰民，请缓修吧！”

杨森沉下脸斥责说：“各位老辈子！我拆一点房檐屋角，你们就大惊小怪。如果我当初进入成都时，把四城门关上，放一把火烧他妈个精光，再让士兵乱来一通，是不是还省了不少麻烦呢？请你们不要干涉我的新政建设，回家自享清福抱孙子去嘛！”“五老七贤”老脸丢尽，敢怒不敢言，只好垂头丧气地回家[4]。

但尹昌衡自恃曾杀过大清四川都督赵尔丰、当过民国初年的大都督，他有宅院当拆，就坐在街中阻挠，杨森大怒说：“五老七贤就杀不得么？！”饬令王缵绪限期拆完。军士数百人围绕尹昌衡身边乱拆，土木石瓦横飞……吓得尹家人忙将这位“过气将军”扶回家中[5]。

杨森、刘师亮和俞凤岗

当时有人写歪诗道：“市镇人缘何太忙，因修马路拆民房。既开通俗教育馆，又辟公共体育场。五老七贤来请求，蛮横督理不买账！”[6]

有一位文人刘师亮，写文章喜欢“操乱说”，在小报上刊登了一副语意双关的对联。上联是：“民房早拆尽，问将军何日才滚？”“滚”，既指压路机滚平马路，也咒骂杨森“快滚出成都”。下联是：“马路已捶平，看督理哪天开车。”“开车”既指开通汽车，又是四川方言中“爬开”之意。

有不少人说杨森因之暴跳如雷，派人抓打刘师亮、封报馆，似乎杨森只是个不会用心计的赳赳武夫。笔者查阅到杨森老部下杜重石先生的一篇回忆文章，披露了少为人知的事实。原来，杨森知道后，问他的秘书陈维新：“刘师亮何许人？”陈答：“成都有名的喜欢乱骂人的无聊文人。”

杨森不假思索地说：“我看他还有些才气，倒想见见这位读书人，向他领教领教……对读书人要恭敬些，不要随便叫，拿我的名帖去请他来。”

陈维新秘书打算利用人多口众，唇枪舌剑，窘刘一场。刘师亮应邀到了督理府，对杨森微欠身开口：“师亮今天来督理府，是来向督理讨打的。”众人一愣，他接着说：“督理提倡穿短服，我却穿长袍来

见督理，这不是我居心冒渎虎威，该挨打吗？打赤膊的罚打手心，我是该打屁股了！”众人都笑，客厅气氛顿时轻松起来。杨森说：“穿短服是为节省布匹。有了现成的长袍放起来不穿，再去做短服，这不是节省，反是暴殄天物。有人叫我是蛮干将军，这是以讹传讹的道听途说。遇事蛮干，不讲道理是行不通的。”

刘师亮晓得是为对联之事，就开门见山地说：“师亮草芥庶民，拙联只不过表示我渴望马路早日滚平，从速开车以孚民望而已。”

杨森呵呵一笑说：“先生把我当成武夫，还听不懂语意双关骂人之妙吗？”刘师亮见杨森很和气，便说：“师亮昔日只仰将军龙虎雄姿，今当面聆教得亲凤麟华采，真乃儒将大风。师亮舞文弄墨，实属班门弄斧，惭愧！惭愧！”

杨森戴了高帽子，也感快活。刘师亮就派兵强拆民房一事进言说：“督理善于纳谏，故师亮敢言。《孙子兵法》说：‘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再次伐兵，再次攻城。’足见使用武力乃不得已而用之。以师亮愚见，建设新四川实行新政令也要以‘伐谋’为上，取得民心。”

杨森听了哈哈大笑说：“先生意见很好，建设新四川，要以‘伐谋’为上，取得民众拥护，才能有成！”乃当刘面对陈维新说：“刘先生很有见地，叫各机关法团、部队要多订阅《师亮周刊》，开放眼界，增加知识。”

两日后，刘师亮收到杨森给他月送舆马费百元的督理署咨议聘书和给《师亮周刊》资助费500大洋。从此《师亮周刊》的发行量由原来六七百份增至近2000份[7]。之后，刘在《师亮周刊》常撰文称赞杨森是“宽心容物，平心论事，虚心受善，知人善任”的儒将……[8]

以上可算中国城市建设中“拆迁风波”的一段历史趣闻。

修路过程中，普通街民被士兵强拆房屋，流离失所，却也有人不

买杨森的账：春熙路本打算修得笔直，但总府街馥记药房老板郑少馥是法国领事馆翻译，他借洋人之势拒不拆迁，杨森也只好罢了，所以春熙路到孙中山铜像处还是倒了一个拐……

凤祥银楼老板俞凤岗原在上海经商，很有商业头脑。他和馥记药房是紧邻，郑少馥既不愿拆，正好是他的良机，于是主动谒见杨森：愿将自己在总府街的凤祥银楼拆为路口，以不误工期。俞凤岗的算盘是，银楼后面是他住宅，修路后变商铺，老母鸡变凤凰，岂不发大财？



1925年快修建成功的春熙路（出自：1927年《成都市市政年鉴》）

杨森自然喜出望外，俞凤岗趁机要求：新马路两侧的公产让他优先承买，以弥补他的损失，杨森爽快答应，并支持他当了成都商会会长 [9] 。

俞凤岗开始大施手脚，把春熙北段四分之三的地皮独自买下来，从此大发其财。

“春熙路”的得名和扩展完善

为什么街名取为“春熙路”？说法较多。

一种是：马路建成后，在街心花园建纪念碑。杨森请前清举人双流人江子渔为马路取名。江老举人是长于“之乎者也”的老古董，却也

很懂送高帽子的艺术，他给这新马路命名为“森威”路，因北洋政府授予杨森以“森威将军”头衔，杨森果然大乐。后来“森威将军”垮台，江子渔又建议将“森威路”改为“春熙路”，因“春”寓意春风和煦的“阳升”，与杨森谐音[10]。

但通常的说法是：晋代潘岳《秋兴赋》中有“登春台之熙熙兮”（“春台”二字则本《老子》中的句子：“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台……”）[11]

而依我之愚见，经商赚钱，在中国古代叫作“货殖”。修路之初取名春熙路，更可能隐指此处为繁华商业区域。《史记·货殖列传》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逛街的想买“相因”（川话中便宜之意），卖货的“漫天喊价”……一条路上熙熙攘攘，正是皆大欢喜、充满春天阳光的“货殖”（经商）口岸！

杨森主张移风易俗，提倡讲卫生、穿短服、搞体育活动，妇女不缠脚等。为扩大他个人影响，他大搞“杨森语录”，以“杨森说……”的形式书写在木牌上，钉在全市电杆、行道树和墙壁上面，诸如：“杨森说，应该勤剪指甲。蓄指甲既不卫生，又是懒惰！”“杨森说，打牌壮人会打死，打球、打猎弱人会打壮！”“杨森说，穿短衣服，既可节省布匹，又有尚武精神！”违反的，巡查队捉住当场罚打手板心！

杨森还在成都的四城门派驻士兵，用他特制的大剪刀把旧式长衫剪短……[12] [13]

政坛如戏台，很快杨森在他发起的“统一四川”之战中吃了大败仗，连督修马路的爱将王缵绪也临阵倒戈，“森威将军”被迫狼狈不堪地沿长江逃出四川……

但杨森的新政“杰作”春熙路却繁荣了。为加强管理，筹资招募专门消防队员20人（后增为40人），是成都解放前最负盛名的消防队。

商人罗俊丞等又集资5万元，筹组光明电力公司，在科甲巷设厂输电，专供商家照明，自此春熙路大放光明…… [14]

1928年1月30日，春熙路街心花园修建的孙中山先生铜像落成。铜像由雕塑家江小鹈负责设计，24军军长刘文辉、28军军长邓锡侯等人主持落成典礼。这是一尊孙中山先生着短服站立像，两眼眺望前方，双手下垂相握，肘挂“文明棍”……耗铜料约千斤，由成都造币厂铸塑，因时间仓促故较粗糙。碑前上方刻有“总理遗嘱”，碑的四方刻有“大道之行，天下为公”8个大字。

其后军阀混战，各路诸侯为招兵买马争造银圆，四处高价收购铜器，连寺庙的铜佛像也被铸为川版铜钱。仍是那位“怪物”刘师亮，1928年仲春又为“国父”担心了，在孙中山立像前贴了副对联：“两眼瞪着天，准备今天淋暴雨；双手捏把汗，谨防他日化铜圆！”



1926年刚修建成功的春熙路，图中为原郑少馥馥记药房地址，后来成为四明银行

1928年，又增建春熙路东段、西段 [15] 。于是春熙路四通八达，已具如今基本格局。1944年后，余仲英任成都市长，请著名雕塑家刘开渠重塑孙中山坐像。1948年3月11日新铜像落成。此铜像座高1.8米，脚踏上塑梅花三朵以象征三民主义。孙中山短发，浓眉深目

作沉思状；右手抚靠椅背，左手握《建国大纲》……这尊雕像保存至今，成为春熙路的中心[16]。

春熙路成了连接东大街和总府路“劝业场”的黄金通道，商家云集，经营西洋钟表业的先后有“及时”“亨得利”“亨达利”“协和”“时昌”“大光明”……银楼有“天成亨”“天长亨”“天宝”“物华”“新凤祥”“宝成”……文化性商铺有“胡开文”笔店、“诗婢家”装裱、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正中书局、新中国书局、广益书局……报馆发行处有《中央日报》《新新新闻》《复兴日报》《新中国日报》《新民报》《华西日报》《兴中日报》……此外，还有稻香村糖果铺及各色百货、绸缎布匹、鞋帽、照相、娱乐、药品、饮食等商铺鳞次栉比。

这里吃喝嫖赌样样齐全，有豪华的“撷英”“耀华”餐厅，以西餐闻名，还有什么卡尔登（鸦片烟馆）、春熙院（妓院）、中西饭店……剧院有“青年会”（后改“大华”）、“三益公”（后改“新闻”、新明、春熙大舞台）。

这里还是江湖神仙“跑滩”的风水宝地，看相、算命的如“蜀山仙客”“通法女士”“六神通相士”等人“指点迷津”的布幌子随风飘荡。

春熙路也曾涌动时代风云。抗战期间，这里响彻“抵制日货、抗日救亡”的呐喊声，一队队川大学生在此热血沸腾地讲演，商家们热泪盈眶地捐金。

我在旧资料中见一个文化人在1938年这样描写春熙路：“‘大光明’、‘中央’、‘新明’、‘春熙大舞台’、‘三益公’、‘新又新’……就一律在开映或开演之前，挂出了‘上下客满，明日请早’的黑底白字的牌子。在夜晚，春熙路是带着颇为浓厚的近代大都会情调的。当夜幕初垂的时候，街灯开始投射强烈的光线，霓虹灯开始闪动；而播声机也开始尖起喉咙，哼着‘桃花江’、‘毛毛雨’，或是京腔、川戏……”[17]

不难想象，20世纪30年代后的春熙路，已是四川近代第一条最具现代商业气息的城市街道。



20世纪60年代冷冷清清的春熙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春熙路发生巨大变化，藏污纳垢之处彻底消失。1953年“公私合营”后，私营金字招牌消失了，店招上方不是“国营”就是“公私合营”……春熙路虽然没有了以前的畸形繁荣，但仍是成都最热闹的商业中心。

2001年后史无前例的大改造

“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春熙路再现繁荣，一天比一天热闹。它与紧临的青年路一起，成为中外闻名的“西南第一街”，是四川改革开放的一处缩影。

1992年9月12日，春熙路历史上首次“夜市”开张。第一批摊主刘清华清楚地记得：那几年，一个夜市摊位转手就可以卖四五万元，可见生意之好！

2001年4月24日，这在春熙路历史上又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从此以后，热闹了近10年、闻名中外的春熙路“夜市”成了历史，春熙路开始进行史无前例的改造。

按照事先的安排，春熙路“夜市”晚上10时30分准时停电歇业。当停止给各摊位供电的那一刹那，商家们一边收拾货物，一边还在恋恋不舍地向顾客叫卖，告别风风雨雨的9年“夜市”，有的商家还伤心落泪[18]。

不久后，孙中山铜像侧的一座小洋楼，成都的最后一家古色古香、由蜀中著名书法家刘东父题写匾额的“古籍书店”，终于带着许多无奈和市民的遗憾，消失在拆除的尘埃中……

如今，改造后的春熙路，成为四川最具现代化商业色彩的“样板”街道，也成为成都一张流光溢彩的“名片”……但知晓这条大街沧桑变化的人又有多少呢？

---

[1] 以上参见《四川近现代人名录》杨森条目，四川辞书出版社，1992年，第94页。

[2] 参见周询：《芙蓉话旧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

[3] 参见姜梦弼：《杨森、喻凤岗、成都春熙路》，《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1981年。

[4] 参见马宣伟、肖波：《四川军阀杨森》，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

[5] 参见新建：《成都谐联》，载《龙门阵》1980年第1期第70页。

[6] 参见马宣伟、肖波：《四川军阀杨森》，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

[7] 参见钟茂煊：《刘师亮外传》相关章节，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

[8] 参见杜重石：《杨森的新川政》，载《民国政要多棱镜》，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年。

[9] 参见姜梦弼：《杨森、喻凤岗、成都春熙路》，《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1981年。

[10] 参见孙仲达：《成都基督教青年会的体育活动》，载《四川体育史料》（内部资料）1983年第2期。

[11] 参见四川省文史馆编：《成都城坊古迹考》，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

[12] 参见孙仲达：《成都基督教青年会的体育活动》，载《四川体育史料》（内部资料）1983年第2期。

[13] 参见马宣伟、肖波：《四川军阀杨森》，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

[14] 参见姜梦弼：《杨森、喻凤岗、成都春熙路》，《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1981年。

[15] 参见四川省文史馆编：《成都城坊古迹考》，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

[16] 参见魏道尊：《孙中山铜像建立记》，《成都掌故》，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

[17] 参见任钧：《安哥拉的点和线》，载《文艺阵地》第二卷第四期，1938年12月1日。

[18] 参见《别了，春熙夜市》，载《成都商报》2001年4月25日第A6版。

蜀中古街“东大街”

从唐朝时就存在的这条街路，是出川必经之道；从古至今，不知有多少外省人、四川人的马蹄声，嘚嘚地敲响了脚下的石板路……

这就是成都的东大街。

清朝末年的东大街

宣统元年（1909）秋，烟雨迷蒙。一个形象干瘦的官员，骑着一匹健驴也走上了这条街。他叫周询，贵州麻江人，多年在四川为官，此次是到省城述职。

当年成都不大，所谓“穿城九里三”，府河上东门大桥已是城外。周询下驴倚桥边石栏杆远眺，对仆人周三喜说：“这东门大桥乃百姓俗称，实名‘长春桥’，又叫‘濯锦桥’。光绪癸未年修补时挖出宋碑，说明这桥宋代就有了！”

但见清流中艄公摆渡，渔翁搬罾垂钓，河畔岸树青青。周询遥望远处跨金水河合江处的“大安桥”和雕栏画廊的安顺桥，捻须叹道：“美哉，芙蓉城！此地9万余户，30万人……过桥就是东大街，进了两江环抱之省城了！”[1]

苔藓斑驳的城门上大书“迎晖门”。毛驴“哒哒哒”地进了东门城门洞，闹市顿入眼帘。

东大街从城门洞向西走，有下东大街、中东大街、上中东大街、城守东大街、西中东大街、西东大街、盐市口，共7条街。

周询对憨头憨脑的三喜说："前年官府统计，全城四门及附郭大小共516条街道，都很狭窄。较繁华的南大街、北大街、总府街、文庙街等，只有二丈左右宽，其余多不及二丈。科甲巷更是狭得更可怜，仅数尺宽……这条东大街富丽无比，可并排走四乘八人大轿，真是名震巴蜀呢！"

东大街两旁人家屋檐都与阶齐，下雨时行人可以檐下避雨，晚上又可摆"夜市"。只见满街各字号的首饰铺、绸缎铺、皮货铺、土洋百货以及专卖京、苏、广货的商家鳞次栉比，黑漆金字大招牌像比赛般一家比一家辉煌，行人熙熙攘攘。街边隔不多远便摆有三尺多高、盛满清水的长方形石缸。缸内水草飘曳，鲫鱼、鲤鱼在里面悠然游荡，像在显示老城的慵懒闲适和古旧……

原来，石缸是用来贮水灭火的，叫太平缸。乾隆四十九年后东大街发生过几次大火灾，后来为防患未然，重修建筑时处处有高耸的风火墙，造型典雅、多彩多姿。街边还摆着麻搭、火钩等救火家具——那是后来丁宝桢当四川制台时命各商铺制备的。

路面全铺着红砂石板，城里人、乡下人，都把逛东大街当成最时髦而快活之事，石板路上已很有些坑坑洼洼 [2] 。

下东大街处有座牌楼，横额写有"既丽且崇"四字，出处是汉左思《蜀都赋》"既丽且崇、实号成都"之句。1924年杨森当省督办独霸成都时，实行"新政"，为拓宽东大街，拆除了这座牌楼。

街北有个"府城隍庙"。在这个鬼怪争雄的城隍庙里，酒馆、汤圆面店、百货店、算命卜卦、杂耍跑滩……罗列，闹哄哄的。周询主仆二人也兴致勃勃地进去观玩一番，还在城隍菩萨下破旧的供桌上敬了

一炷香，恭恭敬敬地磕了几个响头……（解放后城隍庙废，1982年2月1日后，这里改建为成都市立体电影院，再后被拆除）。

主仆二人走到中东大街纱帽街口，周询说："此处为明代税课司茶局所在地，如今为陕西泾县会馆……"到城守东大街，周询又慨叹："此处明代为都司、提学道署所在地，到我大清为守护省城之'城守游击署'，故有此街名！"[3]（"抗战"时期，"城守游击署"旧屋成为四川省图书馆）。

街南有以腌卤菜而享有盛名的"香风味"饭馆，以"蘸水豆花"出名的"荣盛"豆花饭店……阵阵香气飘来，令人酸口水直冒。过了"荣盛"，再走几步是个丁字路口，周询指着左边一条热闹街市说："那是走马街，你看全是带铺板的青瓦平房，好气派！"

身后仆人周三喜问："老爷，咋个叫走马街呢？"

周询答道："这走马街再往左一拐，就是督院街。自我大清入主中原后，每年全四川各州县有许多官员骑着高头大马，去督院拜见总督大人，所以这街就叫走马街……"

主仆二人再往前走到中东大街暑袜街南口，周询在毛驴上指着两旁街楼说："这里明代有长史司署，清设四川按察使署。街南有宝元通百货公司，又有万钰银楼，为省城银器业最早最大之商铺。又有中西大药房，创设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是省城西药业最早的！"[4]

东大街是成都最富庶的街道，几里长的街上有很多两三层楼的铺面，又高、又大、又深；招牌全是黑漆金字，富丽堂皇。外地旅客到达成都，大都住到东大街各处旅店……再往前走，是盐市口。周询说："街口原为鱼市所在，盐市口，乃全城大盐市。东大街从东门大桥至盐市口，数里长街，真乃芙蓉城之《清明上河图》啊！"

周询后来曾说："仆髫龄随宦，久寄此邦，壮岁入官，复临故地。"耳闻目睹，他1936年写了本记述成都的《芙蓉话旧录》，虽着墨不多，也留下上述雪泥鸿影……[5]

但繁华的东大街却如厕困难，民国时成都人"展言子"说："东大街找茅房——没门！"

而这条街上的茶馆却多，最著名的是工商界人士廖文长的"华华茶厅"。它开在城守东大街，有茶座一千多，可称西南最大的茶馆，当然自备厕所……[6] 黄金口岸公厕少，看来是至今都未解决的"历史难题"。

"夜市""灯市"流传千年

详考东大街，在整个中国都可称"历史悠久"。

据确凿文字记载，唐、五代时大慈寺南（即今东大街一带）就为繁华集市所在，尤其"夜市"习俗一直流传到近代，可说是"中国之最"。如宋朝祝穆撰写的《方舆胜览》中说："每岁七月七日夕，蜀人登大慈寺前雪景楼观夜市。"元代有个成都人费著，他编写的记蜀中风俗地理的《岁华纪丽谱》中也说："七月七日晚宴大慈寺设厅，暮登寺门楼，观锦江夜市，七巧之物皆备焉……"

资料记载，20世纪30年代前，"夜市"从大慈寺门口空坝起，至城守东大街止。此后扩展到盐市口……每天黄昏后，百货萃集，街两边屋檐下摆满货摊，游人摩肩接踵，有如赶集。入夜，设地摊的人仍在吆喝，直到打二更为止……

东大街的营业情形约分四段：城守署至走马街口（现东大街春熙南段一带）多为饮食摊贩；走马街口至南新街口（现东大街青石桥路口一带）多售旧字画、铜器；南新街口以西售古玩、铜器、鲜花；再西至盐市口一段售旧书、玩具、乐器、铜器、首饰、鞋帽……

除雨、雪之夜或春节期间，这里几乎天天开夜市。辛亥革命前夕，夜市物品旧货居多，即当铺到期未赎由当店出售者。入民国后，有零星洋广百货等进入夜市，时间延长至夜半。附近各县商贩都到此购货，夜市范围更扩展至提督东街、总府街。自民国20年（1931）扩建公路后，车辆频繁，夜市逐渐衰落。其后商贩迁至附近青年路，燃电石灯摆地摊……[7]

至今春熙路还不时开展“夜市”，而盐市口“九龙商城”等处更是每天半夜三更开始交易……我想都有东大街“夜市”的遗风。

“夜市”离不开灯火，东大街“灯市”也由来已久。

据费著《岁华纪丽谱》和唐人的《放灯旧记》说：唐明皇逃难到成都时，正逢元宵佳节，他由道教大师叶法善陪同到街市上观灯，街市华灯齐放，大慈寺前的冰灯精巧奇绝，把这位风流皇帝看得如梦如痴……难怪清代四川才子李调元在《正月十四至成都是夜观灯》中大赞：“试灯节届渐闻声，次第鳌山压锦城。十字楼头星共灿，万家门口月初明。”

清末，东大街观灯名震蜀中。周询《芙蓉话旧录》说：“繁盛街道，大都有牌坊灯，细木作架，髹以金漆；上段幂以细纱，绘说部杂剧，中置灯烛，间三四十部，即安放一架。尤以东大街者为最精致，灯上绘三国演义全部，人物栩栩如生。”

每年正月初八起，牌坊灯便竖立起来；初九名“上九”，是日正式“开灯”。东大街各家铺户的灯笼，有玻璃彩画，有绢底彩画，常画的是《三国》《西厢》《水浒》《聊斋》《红楼梦》……还有大型龙狮灯队，各处放焰火、燃花灯、响爆竹、踩莲船、玩高跷、打连宵、擂太平鼓、百技杂耍……万灯齐明、游人如织。



20世纪40年代的东大街

每夜人流如潮，不免拥挤纷争、打架斗殴。乡下人脑壳上的燕毛大帽、生意人头上的京毡窝帽、读书人头上的苏缎棉瓜皮帽……常有被小偷乱中抓去的。丢失怀表、烟壶、荷包、散碎银子的更数不胜数。

李劼人先生回忆：有年城守东大街臬台衙门照壁后，有两个看灯火的少妇被一伙流痞围了起来。虽被“卡子”（相似如今的治安点）上的清兵总爷们一阵马棒乱打救出，但两个女人的红绣花鞋、玉手钏、镀金簪子都被抢走，还着实被轻薄了一番，连粉红布兜肚都“春光泄露”……李劼人在《死水微澜》中写当年大“操哥”罗歪嘴，就在这条街上表演过“英雄救美”的武打戏。[8]

慈禧太后70岁时（1904），成都办了盛大灯会。东大街搭起几丈高的鳌山灯、戏文故事灯……东大街灯市年年相传，解放后演变为青羊宫灯会流传至今，闻名全国。

古意盎然的“城隍出驾”

成都旧时有三座城隍庙，郡城隍庙（即府城隍庙）就在离东门大桥不远的东大街上。另外成都、华阳两县各有县城隍庙。

城隍菩萨在神祇中只相当于“七品芝麻官”或如今的“县团级”。但在小老百姓眼里，却有主宰祸福之权威，所以东大街“府城隍庙”的香火鼎盛。庙内十余丈高的银杏树，叶如华盖，挂满红布，人称“神树”。凡每年“灯市”开灯那天，银杏树上悬灯百盏，名为“百果灯”，据说可消灾避难。灯火从庙内延伸到大街上，真正是“火树银花”！

据先贤周询说：城隍庙外殿之像为不能移动的泥塑，而内殿之像则为木雕，手足皆能转动，且可更换四季衣服。[9] 内殿菩萨如此设计，主要是便于“城隍出驾”。这种习俗流行于四川各地，常在城隍会、劝农大会、清明会、祈福祛灾等民间集会上举行。许多地方都把“出驾”说成是城隍菩萨陪伴娘娘回娘家，神圣中添了些插科打诨。

每年共有三次“出驾”：农历三月“清明节”祭祖先，七月十五“中元节”祭孤魂野鬼，十月初一“牛王节”送寒衣。城隍“衣衮冕出巡”，很像官老爷装模作样去视察。各街巷“士女罗拜，焚香帛无数”，所以当过清朝官员的周询说：“如人世官府之散账也！”

怎样个“出驾”法？在出驾前一日，凡城隍老爷要经过之街道，要以四轮车上载大瓦盆，点燃盆中松柏枝叶，后随数人用扇扇烟以“祓除不洁”，其实是先酝酿拜神气氛。[10]

出驾前一天，凡随驾人员都到庙中进香，许多人在庙中整夜不睡。他们要“摆摊子”：把面具、刀叉、旗锣伞帐等陈列在戏台，乐队吹打。“喜神”们（即扮成凶神恶煞的五猖、鸡脚神等，因忌讳凶恶字眼，改称“喜神”）还要在庙内“站班”“跪蜡”……许多人在庙中进香，直要闹到半夜[11]。

出驾之日，外北万福桥的成都县城隍菩萨，和坐落在昭忠祠街的华阳县城隍菩萨，要先抬到东大街诣见府城隍，这叫作“两县迎府驾”，酷似凡间两个“县令”先拜会“知府”大人，再一起“出巡”民间。



20世纪90年代的东大街城隍庙旧址（曾一度成为四川首家“立体电影院”，现已拆毁）

三个城隍菩萨浩浩荡荡从东大街出发。伺神之“卤簿”，列于神轿前；最前为旗、锣、伞、扇，“悉与官府仪仗大致相似”，绵延不绝……[12]

据白景纯先生介绍，出驾时有“清道”：木架上置铁锅燃柏树枝以消除秽气，两人抬着走在最前面。“开道”：两人并排，肩抬竹竿，其上悬红旗挂铜锣，边走边敲；扮成皂隶的人，挑着各种刑具边走边长声悠悠地吼：“喔——”这叫“开锣吼道”。“净道”：两人扮成皂隶模样，手执长鞭，“噼、噼、噼”地“净鞭”……这些无疑都是人世间官员“玩官派”的翻版。

“仪仗队”的彩旗和红色幡伞迎风招展，“威仪牌”上有“肃静”“回避”及神号等字样。根据东大街上各行当扎成的伞，如五谷伞、蔬菜伞、五色丝线伞、绫罗绸缎伞、瓷器伞、水果伞……千姿百态。一人扮成“开路神”，手执铜锤雄赳赳地走在前面。

“喜神队”穿插在“出驾”行列中行进：腰上插着“巡风”小旗的小娃娃；赤发蓝脸、头生怪角的“开路神”；手执钢叉的五个花脸“五猖神”；手执铁索、雨伞，口拖长舌的“鸡脚神”；头戴白高帽，一手撑油纸雨伞、一手拿“正在拿你”木牌、口吐长舌的“无常”（“吴二爷”）；

还有用猪肺作脸壳、猪肝作长舌、耸着肩跳着走的“油腊神”和“判官”“小鬼”。他们押着披枷带锁的犯人，有带耳箭的、有钢刀穿腹的……真是把地狱搬到闹市来了！

后面还有“挂灯队”：人人赤裸上身，每人头额和两臂各挂一盏、背部两盏、胸部两盏共七盏灯，用清油烧灼皮肤……据说挂灯人是屠宰业的人在忏悔杀生，也有孝子为父母祈求平安的[13]。



成都东大街《城隍出驾》图。图上文字是：“十月初一成都之城隍出驾俗名赏寒衣。”图中“大安门”即成都东城门（出自：傅崇矩主办的《通俗画报》）

周询说：“城隍菩萨后，有人扮成地狱中牛头马面，无常鸡神，每种二三十人。又有阴五猖、阳五猖，每起必五人，皆扎纸钱于头，朱绿涂面，状殊阴惨！”“更有饰罪犯者，前一人作鬼役形，以铁链系罪犯而曳之，罪犯则或剚刃于身，或贯叉于腹，然当是伪作。唯挂灯者，则以银皮作小灯盏，中置菜油，燃灯于盏喙，灯后作曲柄，锐其锋，挂于肉里。其人裸上身，两手握以红漆小杖，头束青纱，自额以迄脚踝、两肘、背际，共挂灯十余盏”，“又有富贵人家，饰数岁孩童，作神仙英雄等状，乘骏马，锦鞍玉辔，两豪仆左右扶持之”，“每神轿前，必有一大汉，饰作判官状，背负大算盘，长五六尺”……[14]真可说是奇形怪状、光怪陆离了！

“出驾”这一天，成都万人空巷，热闹非凡。一府两县的神轿闹哄哄地从东大街行进至盐市口，再闹闹哄哄绕行全城，然后才分道“回驾”各归本庙。

这些活动蕴涵着中国人惩恶劝善的“教化”思想和丰富的巴蜀民俗色彩，不能简单化地斥之为“封建迷信”。

东大街浓缩百年交通历史

1905年，日本人山川早水到成都，对东大街赞不绝口：“其长度虽不过几百公尺，但商店宽敞，高高的屋檐有漂亮的橱窗，檐头所挂的招牌，长短参差，金碧炫目。试借《蜀都赋》之句来形容，即‘金铺交映，玉题相辉，比屋连甍，既丽且崇。’作为中国的市街，并非夸大其词！”[15]

清末交通落后，东大街上除闪悠悠的“滑竿”、轿子外，“公交车”就是马车了。马车上有五六个座位，招手即停，每日街头铃声当当。马车总站就设在城守东大街口，这里马粪臊臭冲天，行人掩鼻而过。1924年后，军长杨森不准马车再通行春熙路、盐市口等繁华市区，只能走城外……直到1960年后，牛王庙宏济路口都还有骡马车，但此时多用来运货了。

清末就有少数“进口”的和傅崇矩自制的黄包车。1913年留学日本的郭玉珊、韩子葵等人归国后，在包家巷成立省甲种工业学校，大量生产仿日本式黄包车，又名东洋车，民间作坊也纷纷仿造……于是四川老交通工具“轿子”和“鸡公车”（独轮推车）风光不再，黄包车逐渐成为主要交通工具。身穿黄布背心号衣的黄包车夫躬腰拉车的身影，长年出现在东大街上。达官贵人则以拥有华丽的私人“包车”为荣。东大街上，老爷、太太、小姐抱着大包大包的货物高坐包车上，叮当之声不绝于耳，车夫在前面呼哧呼哧地跑，年轻跟班、丫鬟紧跟车后，构成闹市繁华图……

抗日战争初期出现了脚蹬三轮车。1950年以后，黄包车才逐渐减少。

1920年后，东大街上有了自行车，多是英国“邓禄普”“三枪”等牌子，每辆需银圆150元左右，相当于店员打工三年多的工钱。于是旧自行车也走俏，一些人只能去买以旧翻新的“洗澡车子”，成都人“展言子”说：“骑了又漆，漆了又骑”！（成都话“骑”“漆”同音）

坐落在青石桥口与西东大街拐角处的“马裕隆”商铺于1907年开业，是省城最早、最大的百货商店（抗日战争时改设茶厅，解放后又曾改为东城区草药医院），招牌上大书“各国通商货品”！1926年，上海“马裕隆”为成都店订购了一辆英国“哈雷”牌巡警用双缸大型摩托车，从长江水运直抵成都。店主的大公子正读中学，居然无师自通驰骋自如了。从此东大街上摩托车轰隆轰隆、烟雾滚滚，连野狗也追随其后怪吠……其风流状比现在“帅哥”还“酷”！青年后生艳羡无比、妙龄女郎秋波频送，站在东大街上齐呼：“啊哟，打屁车开来了！”

“华达”汽车公司创始人是营山县人何羽仪，他1923年从法国留学回来，和天全县人胡又新耗资10余万银圆，1925年到上海购回七辆美制1.5吨改装汽车，在成都成立第一家公共汽车公司。公共汽车由东城门洞到西城门洞，途经东大街、东西御街、祠堂街……每站收取车费铜钱100文，游环城收大洋5角。公共汽车于1926年元月正式营业，但守旧的人却讥讽为“洋房子走路，花轿打屁！”鼓楼街市民还拦住公共汽车大吼：“鼓楼下有海眼，碾爆海眼全城就成汪洋大海了！”更麻烦的是北门有座贞节牌坊，有天汽车不小心轰地撞在石柱上……成都“五老七贤”鼻子都气歪了，联名上告：“以外夷之物，辱我节烈妇女，岂可任其恣意狂行？汽车隆隆其声，巍巍其状……形如市虎！”“省督办”刘湘下令公交车停业，华达公司营业仅两月就告“夭折”。

不久，东大街上的“马裕隆”又从上海运回一部四缸“小奥斯汀”轿

车，店主两爷子大起胆子学开车，在东大街上冲烂一家店铺挂伤人，赔了几十个大银圆才完事。店主不敢再玩了，“小奥斯汀”被刘文辉部下“花花太岁”石肇武旅长买去。1929年6月的一天，石身着大绸长衫，头戴软草帽，戴副墨镜，与两个女郎从宽巷子石公馆直奔东大街兜风，横冲直撞，在凤祥银楼前把一个讨口子和一个挑担卖汤圆的小贩碾死。卖汤圆的老婆八方喊冤，得了100元安埋费。讨口子由凤祥银楼老板俞凤岗捐钱，抬到五桂桥塔子山乱葬坟掩埋了事。这是成都早年最著名的“交通肇事案”[16]。

此后东大街又可偶见黑色老式卧车轰轰而过，被市民称为“推屎爬汽车”（因形状像“屎壳郎”虫子）。抗日战争中，随着美国飞行员的入川，吉普车也常见了……

东大街，当年曾是成都跨出盆地、走出四川的标志！

川军出川抗战也走此路。1940年，成都有关方面聘请雕塑家刘开渠设计，与成都“万兴隆”号主人江万兴（铜匠），朱木均（工匠）历经3年协作，铸造“无名英雄铜像”。1944年7月7日铜像落成揭幕，基座铭刻有“川军阵亡将士纪念碑”全文，铜像造型是一国民革命军人，着短裤、绑腿、草鞋，手握步枪，身背大刀、斗笠、背包，俯身跨步，眼望前方作冲锋状，形态威武，长期为成都市民敬仰。它同1938年刘湘死后，其部属在盐市口中心为之建立的刘湘铜像一起成为东大街新象征[17]。

刘湘铜像解放后拆毁，改建街心花坛，即现地下商场出口处。“无名英雄铜像”也于1966年被捣毁，后又重塑，改放在万年场……

2002年4月10日，东大街开始拆迁，这是“总投资约18亿元、横贯成都东西的城市大道拓宽工程”[18]。

这年我走到东大街，两旁店铺贴满“搬迁抛货，大吐血价”等标语。带有明清时代建筑风格的府城隍庙，已孤立在瓦砾中，柱头飞檐的木龙双眼圆睁、大嘴张开，似对即将被拆毁的命运感到无奈……

曾为东大街陶醉的周询，1936年曾在《芙蓉话旧录》序言中说：“锦波东去，流大江日夜之声……王侯第宅，燕去谁家？城郭人民，鹤归不识。九衢车马，尽花样之翻新，十里华亭，唯草色其依旧。对河山而举目，咏陵谷以惊心！”

读到这样的句子，真让人感慨万端、欲说还休……

---

[1] 参见周询：《芙蓉话旧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

[2] 参见李劼人：《死水微澜》，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

[3] 参见四川省文史馆编：《成都城坊古迹考》，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

[4] 参见四川省文史馆编：《成都城坊古迹考》，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

[5] 参见周询：《芙蓉话旧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

[6] 参见龙在天：《华华茶厅》，《成都掌故》第一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

[7] 参见四川省文史馆编：《成都城坊古迹考》，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

[8] 参见李劼人：《死水微澜》，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

[9] 参见周询：《芙蓉话旧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

[10] 参见周询：《芙蓉话旧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

[11] 参见四川建设网，2002年4月11日。

[12] 参见周询：《芙蓉话旧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

[13] 参见白景纯：《观成都一府两县的城隍菩萨出驾》，《成都掌故》第一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

[14] 参见周询：《芙蓉话旧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

[15] ［日］山川早水著，李春德、李杰译：《一百年前一个日本人眼中的巴蜀风情》，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6～67页。

[16] 参见王泽华、王鹤：《民国时期的老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9年。

[17] 参见魏道尊：《孙中山铜像建立记》，《成都掌故》，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

年。

[18] 参见四川建设网，2002年4月11日。

李劼人和天回镇

作家是“地方志”专家

李劼人以成都天回镇为背景创作了小说《死水微澜》，使他和这座小镇都扬名海内外。这是历史、乡土文化和文学三者间水乳交融得极佳的典范之作……

当历史即将掀开20世纪首页，慈禧太后这个老朽女人还牢牢控制着中国数亿人的命运，华夏腹地的四川，似一泓绝望的死水……

但戊戌变法、义和团、八国联军犯京、洋教渗透……如风如雨，越过秦岭、巴山吹进四川。封闭的成都平原上，确已“死水微澜”。历史风云被录入李劼人的历史长篇小说“三部曲”：《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文学评论家早就指出：在李劼人之前，还没有任何一个中国现代作家以这样的大手笔，写出过如此浩繁的反映历史生活的鸿篇巨制。[1] 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李劼人的作品或将不朽，后人定能从中隐隐听到它拍打历史堤岸之涛声依旧……

评论李劼人作品成功的因素很多，如政治性、思想性、艺术性……但我认为：最重要的因素，是他成功地描写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李劼人笔下的典型人物，不是子虚、乌有先生，而是川妹子邓幺姑等鲜活的四川人。这些人物赖以生存的“典型环境”，不是虚无缥缈的乌托邦、伊甸园，而是极真实极独特的川西坝子。

我坚信“越有地方性就越有世界性”的审美标准在很多情况下对评判文学作品也是非常适用的。李劼人以浓郁地方特色和乡土气息

的“独特河床”，去流淌历史烟波，其作品才如五粮液、泸州老窖等川酒，历久越醇越香……

李劼人，自称“成都土著”，原名李家祥，1891年6月20日出生。1908年秋考入四川高等学堂附属中学。同学中群英荟萃，有王光祈、曾琦、郭沫若、周太玄、魏嗣銮、蒙文通、张煦等，后来都成为中国各界之精英[2]。

郭沫若回忆：李劼人不甚高，一脸“烧疮”（青春痘），有一双活敏的眼睛，蓄“拿破仑头”，戴一顶素结子的玄青布京帽，素爱整洁，绰号“精致”，人呼“精公”。中学生“精公”嗜好小说，无论新旧、文白、中外，见书就读，同学们常缠着“精公”摆龙门阵……[3]

1911年，李劼人与郭沫若等人是“保路运动”的积极参与者。罢课、罢工、罢市、抗议、示威……亲历新旧时代巨变的狂风暴雨，成为李劼人宝贵的人生财富和创作之源泉。

青少年即有深厚文学功底和丰富生活体验固然重要，但我认为李劼人之所以能成为独树一帜的大作家，更得力于他对巴蜀乡土文化的精深把握。

李劼人不仅是小说家，更是名副其实的杰出“方志”专家。20世纪40年代他曾自任社长创办重在传扬巴蜀乡土文化的《风土什志》；他也曾创办《四川时报》副刊《华阳国志》；还与郭沫若、马宗融等发起创办《蜀风》半月刊……[4]这期间，李劼人曾发表《成都历史沿革》《中国人之饮食》《漫谈中国人之衣食住行》等系列文章43篇[5]。特别是约15万字的《说成都》，在“说大城”“说少城”“说皇城”“说河流”“说街道沟渠”等若干方面集民俗、地方志于一体，系统考证了成都方方面面的历史和乡风民俗[6]。1958年，时任成都副市长的李劼人还写了《成都的一条街》……

如此精熟于巴蜀文化的李劼人，如同手艺高超的川菜大厨师，他的作品才像他笔下的“夫妻肺片”“麻婆豆腐”“宫保鸡丁”一样，充满麻辣烫鲜的活泼川味；他的作品才能以最正宗的“川派”风格，在中国文坛占据独特之地。

---

[1] 参见廖全京：《李劼人精选集》序言。

[2] 参见李劼人《自传》。

[3] 参见郭沫若：《反正前后》。

[4] 参见李劼人《自传》。

[5] 参见《风土什志》1943年9月2卷3号。

[6] 参见《李劼人说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1年。

为什么将天回镇作为特定历史舞台

从1935年5月始，李劼人用两年的时间潜心写作《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三部曲。小说从甲午战争写到辛亥革命前后，时间跨度将近二十年；空间结构则以成都与天回镇为中心，涉及全川并辐射全国。

遍查地方旧资料，成都市郊大小场镇达400多个。清末傅崇矩的《成都通览》记载，仅成都县周大乡场就有“苏坡桥、望仙场、崇义桥、太和场、两路口、青龙场、三河场、洞子口、犀浦场、土桥场、龙场、天回镇”，华阳县则更多[1]。

李劼人为什么要把天回镇作为特定的历史舞台，来反映中国近代重大历史事件呢？

成都市区以北约20里的天回镇，地处天回山、凤凰山两山对峙的交通要冲，历来为四川首府成都北出秦岭的门户，通常认为始建于唐朝。但我读众多史料后揣度，形成集镇的历史极可能更为久远。

汉代辞赋家扬雄《蜀王本纪》中说：“杜宇自天而降，号曰天隳。”天隳，即今成都北郊天回山，这句话的意思可能是说：古蜀的部落首领杜宇率蜀人从岷江上游迁徙到成都平原，最初落脚点就在天隳山附近。唐朝以前出土的汉碑记载，天回镇这一带叫汤家岭和岳家坝，按理当时不可能没有集镇。

清代江苏常熟人顾祖禹撰述的《读史方舆纪要》，其书言山川险

隘，具有浓厚的历史军事地理学特色。书中说：“天回山，在府北二十里。《蜀纪》云：以杜宇自天而降，号曰天隳。及玄宗幸蜀，返跸时经此，土人呼曰天回山，下有天回镇。”[2]

这可能是隳字太生僻，后人改为通俗的“回”字。另有一说：唐玄宗李隆基避安史之乱逃到天隳镇，叛乱已平，銮驾返京。所以大诗人李白说“天旋地转回龙驭”，故曰“天回”。



天回镇上的一条老街，似乎还有百年前的痕迹

天回镇，自古乃出川入川要隘重镇，满人入川最先恢复的便是北门外一线驿路。京城任命的官员经川陕栈道赴任必从北门进入，所以清时天回镇和成都北门李家巷都建有“迎恩楼”，北门大桥又叫“迎恩桥”，取“皇恩浩荡”之意[3]。

成都北门外自古草寇猖獗，难怪清人《竹枝词》中说：“南官北匪各争奇，东贫西富事可疑。一座城中同住下，然何分别竟如斯？”意为南门出官，北门出匪，东门多穷人，西门多富人。清朝以前成都北门外就一直是匪乱之地，清末城北闹哥老会（袍哥）更凶……

地处蜀人滋生地之一，又是古今军事、商旅要冲的天回镇，堪称历史大潮的“洄水沱”（漩涡）。李劼人要以史诗般的笔力，描摹历史

巨变中的广阔社会、世态人情、新旧冲突，我认为：精熟于乡土文化的他选定天回镇为特定历史舞台，虽可说是慧眼匠心，舍此似乎也难有更佳选择。

---

[1] 参见傅崇矩：《成都通览》下册，巴蜀书社，1987年，第33页。

[2]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中华书局，2005年3月。

[3] 参见陶亮生：《成都街名琐记》，载《成都掌故》第一集，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

生动定格记录的古镇

在缺少影像技术的年代，李劼人要将1894年到1901年间四川农耕社会末期的种种画面浓缩到小小的天回镇上。今天的我们得感谢他将古镇风貌活灵活现地定格保留了下来。

巴金曾盛赞李劼人：“过去的成都活在他的笔下。”[1] 郭沫若也说：“这是一支令人羡慕的笔。”[2]

《死水微澜》开卷不久，就把读者带上了古老的川北大道：

路是弯弯曲曲画在极平坦的田畴当中，虽然是一条不到五尺宽的泥路，仅在路的右方铺了两行石板……每日每刻，无论晴雨，你都可以看见有成群的驮畜，载着各种货物，掺杂在四人官轿、三人丁拐轿、二人对班轿以及载运行李的扛担挑子之间，一连串的来，一连串的去。在这人流当中，间或一匹瘦马，在项下摇着一串很响的铃铛，载着一个背包袱挎雨伞的急装少年，飞驰而过，你就知道这便是驿站上送文书的了。



民国时期川西农民赶场卖猪

沿着这条古道，古老的天回镇已扑进眼帘：

从大路的尘幕中，远远的便可望见在一些黑魆魆的大树荫下，像岩石一样，伏着一堆灰黑色的瓦屋……高高突出几处雄壮的建筑物，虽然只看得见一些黄琉璃碧琉璃的瓦面，可是你一定猜得准这必是关帝庙火神庙，或是什么宫什么观的大殿与戏台了。镇上的街，自然是石板铺的，自然是着鸡公车的独轮碾出很多的深槽，以显示交通频繁的成绩，更无论乎驮畜的粪，与行人所弃的甘蔗渣子。镇的两头，不能例外没有极脏极陋的穷人草房，没有将土地与石板盖满的秽草猪粪，狗矢人便。而臭气必然扑鼻，而褴褛的孩子们必然在这里嬉戏，而穷人妇女必然设出一些摊子，售卖水果与便宜的糕饼，自家便安坐在摊后，共邻居们谈天做活……镇街上还有一家比较可观的铺子，在火神庙之南，也是一个双开间的铺面……至今被风日剥蚀，黑漆只剩了点痕迹，但门枋、门槛、铺板，连里面一条长柜台，还是好好的并未朽坏。招牌是三个大字：兴顺号……[3]

其后仅写天回镇赶场时的情景，粗略统计就用了约3500字。书中写到天回镇的鸡市、粮市、米市、菜市、肉市，独特的鸦片烟馆、鸡毛栈房、茶馆……天回镇居然有三四家红锅饭店，厨子大多是郫县人，颇能炒几样菜，但都不及云集栈门前的饭馆有名。云集饭馆蒸炒

齐备，就中顶出色的是猪肉片生焖豆腐……



清末四川乡镇赶场情景，“鸡公车”上猪与人搭配成有趣平衡（［英］莫里循摄）



很有巴蜀农耕社会特色的商贸风情（［美］西德尼·戴维·甘博摄）

李劼人由天回镇再写到成都的街道、灯会，写到婚嫁时迎亲、拜

堂、撒帐、揭盖头、老人传授性知识、谢客、婚宴、闹房，等等，再现了种种巴蜀传统风俗。

《死水微澜》并不是单纯描摹孤立静止的乡风民俗，而是作为人物和情节的重要舞台背景，与整个作品血肉相连地融合在一起。书中人物具有鲜明的个性，说的是地道的四川方言，如：“油大”（荤菜）、“冲壳子”（吹牛）、“清汤寡水”“心里有个打米碗”……还有许多袍哥黑话，如：“搭手”（帮忙）、“水涨了”（情况危急）、“肥猪”（被绑架的人）、“开红山”（胡乱杀人）……

我们踏着天回镇上鸡公车的独轮碾出深槽的石板街面，从一连串灰黑瓦屋下黑漆剥落了门枋、铺板、长柜台的兴顺号杂货店前喧嚣脏乱的集市中走过……100多年前的蔡大嫂、罗歪嘴等主人公，就活灵活现地出现在我们眼前。

李劼人把真实描写巴蜀乡土背景，作为自己的创作基调。他曾不客气地批评郭沫若同样表现辛亥革命历史的《反正前后》：“把20年后的思想行动，生生地装在那时人的脑里身上。”他表示他的书绝不能“弄成郭大头的《反正前后》”。他强调：“必须尽力写出时代的全貌，别人才能由你的笔，了解到历史的真实。”[4]

他还说：“所写的生活距离现在已经50年了，要写得使自己的心神完全走进那50年前的古人社会才行，决不能让当时的人讲现代的语言，穿现在的服装，用现在的器物。这类细节必须认真，不能潦草。”[5]

但李劼人并不是如“村学究”那样，短视地记录生活中的鸡毛蒜皮（尽管这也很真实）。李劼人曾留学法国“喝洋墨水”近五年，对福楼拜等西方批判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文学手法心领神会，他以刻画真实历史（包括细节真实）为主旨，以极扎实的乡土文化为血肉，以“中西结合”“土洋并用”的讲故事（摆龙门阵）为叙述手法……

这就形成他最为独特的风格："以小说形式来写信史、地方史志"；反言之，是"以写信史、地方史志的严谨来写小说"。所以，他写的不仅是文学作品，也堪称地方史、民俗专著，是清末川西乃至巴蜀社会之缩影和《清明上河图》。

与写北京的老舍，写浙江绍兴鲁镇、未庄的鲁迅，写湘西的沈从文等作家相比，李劼人写的是四川，是天回镇。

老舍曾说："对于中古时代的作品，我读得不多"，"它们历史的、地方的、民俗的价值也许胜过了文艺，可是我的目的是文艺呀。"[6]

而李劼人作品中的文艺价值，却恰恰深深融入"历史的、地方的、民俗的价值"中。所以，李劼人被郭沫若誉为"中国的左拉""小说的近代史""小说的《华阳国志》"[7]。法国汉学家温晋仪称李劼人的作品是中国现代文学中"中西影响相融合的一个范例"[8]。刘再复说："也许以后的时间会证明，《死水微澜》的文学总价值完全超过《子夜》《骆驼祥子》《家》等。"

[9]

李劼人激活了古老沧桑的天回镇，但天回镇远远不如沈从文笔下的湖南凤凰古镇出名。不久前我曾去过凤凰古镇，那里中外游客车水马龙，全镇数十上百家书摊、书店，版本众多的《边城》每天热销不衰，那情景真让现今写书难、出书更难、卖书尤其难上加难的文人们羡煞！

不是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吗？搞城镇开发的先生们，啥子时候才能让我们的劼人先生以及他笔下的天回镇，也如此风光？

---

[1] 参见廖全京：《李劼人精选集》序言。

[2] 郭沫若：《中国左拉之待望》，《李劼人选集》（第一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页。

[3] 李劼人：《死水微澜》（汇校本），四川文艺出版社，1987年。

[4] 参见李劼人：《“大波”第二部书后》，见《大波》，作家出版社，1962年。

[5] 参见韦君宜：《悼念作家李劼人》，《光明日报》1963年1月12日。

[6] 参见老舍：《读与写》，载《老舍研究资料》，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488页。

[7] 郭沫若：《中国左拉之待望》，《李劼人选集》（第一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页。

[8] 参见《李劼人简介》，四川文艺网·文学·名家典藏。

[9] 参见刘再复：《百年诺贝尔文学奖和中国作家的缺席》，《北京文学》1999年第8期。

四川第一座公园

玉昆将军倡建少城公园

这里蕴藏了一段深厚的成都历史。当如今人们步入“人民公园”，又有多少人知道其前身“少城公园”的沧桑变化呢？

清宣统元年（1909），一位叫玉昆、号石轩的清朝官员从凉州副都统调升为成都将军，翻秦岭、过剑门，马蹄“嗒嗒”，风尘仆仆入川而来……



身著一品麒麟补服的成都将军玉昆

成都将军是何职？原来，清顺治三年（1646）满族八旗兵第一次从陕西奉调入川。康熙五十七年（1718），荆州八旗兵3000名来川，以后旗兵眷属陆续来川，是满族入川的高潮……康熙六十年（1721）四川巡抚年羹尧上奏朝廷，在成都大城垣内新筑一城，专驻八旗官兵及眷属，以免与汉人杂处滋生事端。此“城中之城”称作“满城”，又叫“少城”，少城从酝酿到建成，前后历时二三十年……[1]

乾隆四十一年（1776）开始设成都将军管辖“少城”[2]。四川总督无权过问“少城”，而成都将军却可监约总督。将军衙门旧址约在今金河大酒店处。

“少城”形似蜈蚣：将军衙门处像蜈蚣脑袋，城内一条宽街（长顺街）像蜈蚣身子，宽街两侧许多小胡同就像蜈蚣百脚……“少城”有四座城门：南名“安阜”，北名“延康”，东边两门一叫“迎祥”一叫“受福”。“受福”门在今祠堂街与西御街之间，清末时城楼上内有“少城旧治”、外有“既丽且崇”的巨匾，好不巍峨壮观！[3]

据《成都县志》记载，少城初建时居住的满、蒙人仅2000余户，5000多人。到同治元年（1862），已增加到4500多户，13700多人……清末孙中山等“会党”、川中“哥老会”都在图谋反清，成都满、汉两族矛盾日益尖锐，且驻防成都的旗籍人口猛增，清制又规定旗民不得务农经商，旗民生活朝不保夕，走投无路甚至上吊抹喉……[4]

玉昆将军到成都时，清廷大厦将倾，蜀中动荡不安。一天玉昆同幕僚议事，“劝业道”总办周孝怀说：“现今上海等通都大邑都已学西洋各国，建公园供百姓游憩。何不利用少城……”

玉昆听到这里，欣然说：“我已明白你的意思。如今，满汉之争不能不加以缓和，旗民生计不能不代谋出路，而堂堂‘天府之国’岂能无百姓游玩之地，遗外人之讥？建造公园当有一举三得之效！”[5]

玉昆从培修旗营专款中，拨银5000两修筑公园、戏院，由周孝怀组织设计施工。园址选在祠堂街关帝庙后侧数百亩水田荒地，历时半年多，方略具规模。（此外，周孝怀还在西郊草堂寺侧扩地数百亩，筑“郊外公园”。该园毁于1911年，后不复存在[6]。1928年市政当局又将东门外的望江楼辟为“成都市第一郊外公园”，由邓锡侯书写公园匾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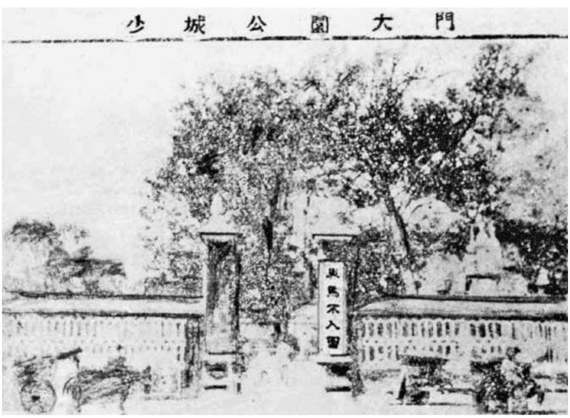
少城公园所在地在清代为少城中的永顺、永清、永济等胡同，原为驻防旗兵的箭厅、马厩、柴薪库、田园。原来，清时八旗官兵的柴粮都由城内金水河运入半边桥水栅内贮藏，后来这里又开辟了稻田、菜畦。闹市中有小桥流水、稻香菜碧，一片村野风光，在此建公园确

具慧眼……

玉昆在1910年后下令开放少城，不限民族任人游观。公园内设楼亭，旗民卖茶水酒饭以谋生计，汉人也可入园经商。长期隔绝的满汉两族，从此得以交融甚至通婚，逐渐相互理解、友情日增。



1928年辟为“成都市第一郊外公园”的望江楼公园（供图：云游雅士）



近百年前初建成的少城公园。大门上挂的招牌是“舆马不入园”

到清宣统三年（1911），公园已略具规模，市民约定俗成称之为少城公园。进公园要买门票，据徐心余《蜀游见闻录》中说：“门票仅铜圆五枚”，不贵。当时公园大门在今天人民公园大门的西侧，斜对永兴街口（此街现已拆）。成都虽原有丁公祠、武侯祠、望江楼、

草堂寺等古迹园林，但大都是祠堂庙宇。[7] [8] 少城公园应是四川历史上第一个“公园”。重庆最早的中央公园始建于1929年（解放后也改称为人民公园）[9] 。值得一提的是：1926年，距成都20多里的新繁县东湖，在新繁知事陈洪赞主持下整修为公园，陈洪赞并撰写园名、对联。公园大门门枋历经80年至今，现苟存于高楼大厦下，状如累卵……它极可能是全中国现存最早的公园大门，应予以保护。

武昌起义后，玉昆以成都将军身份号召旗兵缴枪，终于使成都和平易帜，避免了民族间流血冲突。当时各方都称颂玉昆将军深明大义…… [10]

---

[1] 参见四川省文史馆编：《成都城坊古迹考》，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

[2] 参见成都市满蒙人民学习委员会编：《成都市满蒙族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

[3] 参见四川省文史馆编：《成都城坊古迹考》，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

[4] 参见成都市满蒙人民学习委员会编：《成都市满蒙族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

[5] 参见《成都少数民族》，《成都文史资料》第30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56页。

[6] 参见张际法：《旧时代的成都公园》，《成都文物》1987年第3期，第55页。

[7] 参见四川省文史馆编：《成都城坊古迹考》，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

[8] 参见刘国源：《成都第一个公园》，《成都文史资料》第30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56页。

[9] 参见欧阳平：《旧重庆的中央公园》，载《红岩春秋》杂志1997年1期。

[10] 参见刘显之：《成都驻防八旗和平易帜的经过》，载《成都文史资料》第30辑《成都少数民族》，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79～283页。

令人眼花缭乱的“多功能”园林

民国元年（1912）10月20日，“四川图书馆”在少城公园西侧成立，名士林思进（字山腴）任馆长。图书馆拓址建楼，种松八十株，别号“八十松馆”（1928年更名为成都市图书馆）[1]。少城公园更添文化气息。

1913年后拆除少城，公园也渐荒芜。1914年，四川都督府委派内务司司长尹仲锡扩建公园，引金水河水经园内流向东边半边桥，凿渠之土堆成至今犹存的假山，遍栽林木，自此湖光山色成为公园盛景，假山之西凿荷花池，池中有座慈眉善目的观音大士持瓶喷“甘露”雕像；绕池植柳，树荫下有石桌凳售茶[2]。

孙中山说过：“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要迟一年半载！”1914年成都的一件大事，是在公园内修建起一座巨碑，气势巍峨直指蓝天白云。此碑由留日归国的“双流大铁路公司”股东代表王楠等人设计，胡炳森监工。碑高31.68米，碑座四壁是火车机车和路轨浮雕。碑身四方形，四面均嵌有“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的阴刻碑文，字径大近1米，由清翰林赵熙及川中名流颜楷、吴之英、张夔阶分别以真、隶、篆等不同字体书写，堪称碑中一绝。纪念碑风格中西合璧、典雅宏伟，毫无疑问地成为成都近代标志性建筑（现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



少城公园内的四川保路死事纪念碑（出自：1927年《成都市市政年鉴》）

少城公园于1916年改由警察厅管辖，园务荒萎。

1922年公园改属市政公所管辖[4][5]。（这年在川军总司令刘成勋支持下，还在提督街前清提督衙门旧址新修“中城公园”，后改名“中山公园”，解放后更名为劳动人民文化宫，2005年拆除）

1924年后少城公园迎来它的“黄金发展期”。这年，川军20军军长杨森任四川督理，推行“新政”；卢作孚任教育厅长[6]。

卢作孚把公园内的成都“通俗教育馆”办得红红火火，又修建起各种陈列馆、博物馆、图书馆、运动场、音乐演奏室、游艺场、动物园……一时少长咸集、群贤毕至，集中了成都各行各业专家。前来学习、观赏者一度每天达万人以上。当时少城公园堪称成都政治、科学、文化艺术和游览的中心！卢作孚又受命在同仁路西侧沿城墙狭长地带辟森林公园（此处本有楠木近千株），连通支矶石旧庙址，占地

一百余亩，园内古树森森，浓荫蔽日，命名为“支矶石公园” [7] d。

卢作孚后来离蓉创办实业，成为中外闻名的民生公司“船王”。毛泽东曾称赞他是我国四个不能忘记的实业家之一…… [8]



少城公园内通俗教育图书馆情景（出自：1927年《成都市市政年鉴》）



1925年少城公园内博物馆大门

卢作孚虽然走了，但少城公园“多功能园林”规模已成，其后还不断拓展。

纪念碑以东为体育场，碑西侧空地有茶舍，舍前为有名的较射场，前清状元骆成骧，军阀邓锡侯、刘文辉、田颂尧等人前后任“射德会”会长，常在古意盎然的此地“雕弓较射”。

荷花池与假山之间为动物园，养有熊、豹、猴等奇禽异兽。曾在公园工作过的邓穆卿先生曾回忆有趣往事：当初养了一头凶猛的东北

虎，饲养员叫温兴发，人称“温老虎”。那头虎常对他咆哮如雷，“温老虎”鸦片烟瘾很大，被老虎弄得胆战心惊时心生妙计：每次去喂虎时，口中饱含鸦片烟气，向猛虎一口一口喷去……久之，猛虎便很想闻那扑鼻异香，当“温老虎”去时，它不但不张牙舞爪，反而摇头乞怜，一时“老虎吃烟”成为当年成都趣闻。“温老虎”驯虎有功，公园内把他的大儿子弄来管金钱豹、二儿子管黑熊、幺儿子管小动物和飞禽，连他的妻子也当上了勤杂工……[9]

池侧为通俗教育馆陈列室，里面有刀枪戈戟、明清铁大炮等锈迹斑斑的各种旧兵器，有赵尔丰斩首后之照片，还有汉画砖、古石碑，其中一座“七杀碑”最令人惊骇：“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物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传说这是“大西皇帝”张献忠立的，他把四川人几乎杀光……也不知这碑是真是假，当年却“最扯眼球”。

园之东部为餐馆茶舍区，假山后有静宁餐馆、桃花源等饭馆，烹炒的“回锅肉”“麻婆豆腐”香气四溢，令公园外的行人也馋涎欲滴。静宁餐馆的“肝糕汤”“鸡皮冬笋”远近闻名，尤其是“豆腐鱼”用木炭炉子，以醪糟煨烧豆腐鲫鱼，其味无穷……

最吸引人的，是公园内浓荫、绿天阁、永聚、鹤鸣、枕流、同春、射德会、文化、荷花池等各个茶馆，每天坐满三教九流的茶客。竹椅子、盖碗茶，吃瓜子、谈生意、冲壳子（川话，即吹牛闲聊）……茶铺里不时有人大呼小叫：“来碗茶！”“堂倌”高吼一声：“来啰！”便左手夹着重重叠叠的茶碗、茶船和盖碟，右手提着长嘴铜壶风风火火跑来，变戏法般咣咣当当把“三件头”抛在桌上，眨眼间已泡上沸沸滚滚的香茶……茶客便熟练地用茶盖轻轻搅动茶叶，一面慢慢呷着热茶，连说：“巴适，巴适！”（川话：舒服之意）

湖光山色、鸟语花香，龙门阵大家摆，茶各吃各。三教九流把这里当做结交聚会的好去处。各茶园就是一个小社会，各行各业大都在某一个茶园聚会，如“射德会”茶园是社址所在地，茶客多是国术、体

育界人士。绿天阁、浓荫的茶客多是文化人，连共产党地下人员也常在此说暗号接头……



清末民初的少城公园

当年，各中小学教师职业无保障，每年阴历六月、腊月假期中，被人称为“叫蛄蛄”的教师们人头攒动，在茶舍拉关系、托人情、送包袱，等候聘书。各校名为“优礼延聘”，实则廉价选人。这里竞争激烈，成都市民戏称为“六腊之战”。茶园中，接了聘书者“拈伙食”有望了，自然喜气洋洋。盖碗茶喝得淡如白水仍无人问津者，只好强装笑脸在茶桌间乱窜乱拱去“毛遂自荐”；始终无人聘用者，“苦瓜脸”一张傻坐着发呆……

在假山东边有省国术馆，馆门两侧刻有“仁者必有勇、君子无所争”的对联，这里有时同青羊宫一样要摆擂台比武，馆内不时传出“强国必先强种，强身必先习武”的雄壮吼声……从这里出公园后门即半边桥。

据满族老先生刘国源回忆，荷花池上有“聚丰园”船形餐厅横卧湖面，两面玻璃窗，夏日就餐时开窗，荷香扑鼻。还有戏园“万春茶园”，著名川戏班“三庆会”常在此上演，锣鼓阵阵、名伶荟萃（这里也演电影）。枕流茶馆附设澡堂，因是引入金水河清波，名曰“龙园”，浴后舒坦无比。[10]



20世纪30年代前后少城公园内的金河桥

宗教界也视少城公园为人间乐土。曾任云南讲武堂教官、川军团长兼川北清乡司令的龚缉熙先生，大彻大悟后信仰佛法。1914年他与刘洙源、谢子厚诸居士，在公园楠木林南边发起创设了成都佛经流通处及少城佛学社，常延请法师、居士在此讲经说法，香火缭绕颂声悠扬……龚缉熙，即后来誉满全国的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能海法师[11]。

陈毅元帅和曾任国家主席的杨尚昆，青少年时代在成都上学，课余都爱到少城公园大操场“踢坝坝球”。杨尚昆踢球前先去“鹤鸣”茶铺买一碗“报到茶”，给“堂倌”打个招呼就离开，赛罢返回鹤鸣，买一盆热水洗脸，再端起凉了的酽茶一边细品、一边“侃”球经……直到1983年杨尚昆来成都时，还指名要到公园去坐茶馆。他回忆往事说：“当年不是‘一次性消费’，人暂走茶虽凉，座位仍然有效……花钱不多，其乐无穷！”[12]

少城公园也是当年成都最大的公众集会场所。抗日战争时期，少城公园更是讲演、聚会、募捐的首选之处，《大刀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三江好》《放下你的鞭子》《民主万岁》等抗日歌曲和戏剧在这里演出，令蜀中父老热血沸腾……[13] 川军将领王铭章1938年3月17日在山东滕县保卫战中壮烈牺牲，少城公园内铸塑了王将军

的骑姿铜像一座，更令川人自豪。

1940年9月27日午后2时，日本敌机21架轰炸成都，投弹100枚，轰炸区域以少城公园为中心，炸死32人，炸伤26人，损毁房屋897间；公园内市国立民众教育馆及甫澄纪念医院、王铭章将军的铜像基石被炸。1941年7月27日，日本飞机再次大肆轰炸成都，少城公园破坏惨重，遍地弹痕，尸横累累，死伤者约有千人，紧接公共体育场东侧一座大光明电影院也被炸成平地，连保路纪念碑碑顶也受损坏。义愤填膺的成都民众在这里举行声讨倭寇的万人大会……[14]

少城公园，可说是四川、成都社会方方面面的“缩影”。

---

[1] 参见胡凤亭：《四川省图书馆事业志》，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

[2] 参见四川省文史馆编：《成都城坊古迹考》，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

[3] 参见《成都市建筑志》，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4年，第54至55页。

[4] 参见四川省文史馆编：《成都城坊古迹考》，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

[5] 参见张际法：《旧时代的成都公园》，《成都文物》1987年第3期，第55页。

[6] 参见胡凤亭：《船王卢作孚》第四章，及诸多有关卢作孚的资料。

[7] 参见四川省文史馆编：《成都城坊古迹考》，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

[8] 参见胡凤亭：《船王卢作孚》第四章，及诸多有关卢作孚的资料。

[9] 参见邓穆卿：《成都旧闻》，成都时代出版社，2005年。

[10] 参见刘国源：《成都第一个公园》，《成都文史资料》第30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56页。

[11] 参见宋大鲁居士著：《能海上师传·出家因缘》。

[12] 参见汤明辉：《“鹤鸣”生意经》，载《龙门阵》杂志1994年第6期。

[13] 参见中共成都市委党史委员会编：《成都市委简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9年。

[14] 参见政协成都市文史委员会编：《日本飞机轰炸成都的部分损失统计》，《成都文史资料》第12辑，1985年。

成都最早最大的公众体育场所

玉昆、周孝怀开建公园后，在如今楠木林位置建运动场，当时人称体操场，设有日本式的平台、木马、天桥、浪桥、秋千、木墙、单杠等，另外建有一个木球房，后来又建有简易足球场；此后几十年中，一直是成都极珍贵的民众体育场。1920年11月27日，成都储才中学与资属中学的学生比赛足球，与四川督军刘存厚的士兵抢场地，还发生过轰动全国的大事件 [1] 。

1924年卢作孚把公园、图书馆、体育场融为一体，把原体育场地改建为今楠木林，另新辟体育场，地点在纪念碑东侧，竖有“公共体育场”木牌一面；又在“通俗教育馆”下增设体育部（健康部），聘请成都高等师范学校体育主任陆佩萱为体育部主任。陆主持修建了一个300米的跑圈和一个足球场，又在纪念碑南侧修建两个网球场、一个篮球场、一个排球场；在纪念碑西侧建有平台、木马、浪桥、单杠等，还设有室内乒乓台两张。

“通俗教育馆”1932年后改为“民众教育馆”。据邓穆卿先生回忆：担任过馆长的，除卢作孚首任外，继为曾孝穀、林恕（君默）、熊跃寰、程鸣岐、范英士、吴巽生、王运明、周树人（广安人）、余镇南、谢鸿炎，邓穆卿为最末一任，1945年1月到职，1949年12月离职。 [2]

每到周末和星期天，成都各界人士来此运动、比赛者，络绎不绝，四川参加全国运动会的国术、篮球、足球、网球等选拔赛，都曾

在公园内举行。因除了少城公园，成都解放前没有别的公共体育场所（学校除外）。

我曾听黄体强和冯蓉先老先生回忆：公共体育场主任1923年后是陆佩萱，1931年前后是国立成都大学体育系毕业的周家泽，1934年后是日本东京高师体育科毕业的向志均。当时酷爱网球运动的川军师长、外号“范哈儿”的范绍增，私人捐资大洋1200元，委托向志均修建了一个正规网球场。1938年至1941年，是上海东亚体专毕业的黄体强负责（解放后他在成都音乐学院任教）。1942年后是冯蓉先，1944年到1949年是黄锡嘏……



20世纪30年代前后的少城公园大门（供图：云游雅士）

很值得一提的是：成都围棋在国内享有盛名，而少城公园曾是主要活动场所。

在20世纪30年代，成都即有专门组织“围棋社”，设在绿天阁茶铺楼上。“围棋社”社长刘扶一，会长黄慕颜、陈子杰、谢德堪，监察委员有张夷伯、衷石麟、胡宗汉、程鸣岐、傅剑三，总裁判马自庵，副总裁判韩子朴。欲参加成都棋社，手续很简单，基金一元，每月常费两角，只要你到公园楼上向管理主任包文勋办手续加入，就随时可前往对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少城公园”改名为“人民公园”。

我认为：“人民公园”之名，毫无地方传统特色可言，全国这样的名称不知有多少。“少城公园”才是最具“巴蜀文化”的独特品牌，何不尽快恢复历史旧名！

---

[1] 参见《四川省学军冲突之经过》，上海《时报》1920年12月21日。

[2] 参见邓穆卿：《成都旧闻》，成都时代出版社，2005年。

成都百年劝业场

周善培倡建劝业场

成都新式商场“劝业场”于1909年建成，距今已百余年。它是四川走向现代化的“里程碑”，在四川近代城市建设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901年“庚子之乱”，被八国联军吓得东逃西窜的慈禧太后，在西安躲了好久才回到北京。这个老朽皇太后吃了亏，也要搞“新政”了，颁布上谕要“振兴商务、奖励实业”，在各省设置“劝业道”“劝工局”[1]。

鼓励生产和商贸——这就是“劝业”两字的意思。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成都创立警察总局于华兴上街，1904年创办劝工总局，局址在旧皇城后子门内东端，内分刺绣、陶瓷、卤漆、竹丝、丝绵、麻织品等项。其后又于各县设立劝工局。[2]

这就出了个有名的官吏周善培（1875～1958），号孝怀。他曾两度去日本见过世面，1905年先后出任巡警道和劝业道，在四川最早推行近代警察制度和工商贸易。[3]

1907年，周善培鉴于商人诉讼时无法可依，因订章程101条，公推评议员四人、裁判员四人，仲裁商事纠纷。成都商人集资在总府街购买大宅，成立总商会，各州县设立分会，这在全国也是很早的[4]。（民国后沿袭不变，1930年改为成都市商会。解放后在此新建房屋，设工商联合会）



民国时期的周善培

此时周善培才三十来岁，血气方刚，上任即大刀阔斧来了个“娼场厂唱”：就是限娼妓、建商场、办工厂、修剧院。

他不但大抓嫖娼的“花和尚”以庙产充公，还把沿街拉客的“野鸡”统统集中到天涯石街，改名“新化街”，编为“监视户”。他在街口上修建岗楼，大书横匾“觉我良民”……嫖客去风流时，也只好耷着脑壳羞答答从横匾下做贼一样快跑。气得妓女、嫖客偷偷在周善培的帘官公所街公馆门前钉上“总监视户”的木牌，破口大骂：“从古至今都没得这个烂规矩！”他们送给周善培一个绰号“周秃子”：“妈哟，周善培，你龟儿子做事简直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现在有学者把周善培已经抬得很高，如历史学家唐振常称周实际上是中国设红灯区的创始人！[5] 此后周善培又禁赌、搞川戏改良、办慈善工厂……有关“娼厂唱”的龙门阵且不说了，这里专谈“场”。

1907年，周善培找到成都商务总会协理、华阳县人樊孔周（樊起鸿）说：“如今京师、武汉等处都用藩库银子办劝业场，我们四川穷，你要出些点子帮我。”樊孔周说：“周大人出面倡导，集股商办最好！”

樊孔周成了周善培的得力助手，商会召集各商董、名流、绅商讨论，周善培到会侃侃而谈：“工商业需崇尚竞争，与外省竞，与外国竞，才有进步……每年二三月间青羊宫花会时，虽然设‘劝工会’，但时间短，难达此效，需长期设置劝工场，望诸位共襄盛举！”

到会人士齐声叫好，都赞成集股商办，决定成立“商办成都劝工场建筑有限公司”[6]。（后遵上谕全国劝工场都改为劝业场）

光绪三十四年（1908），公司筹得股金白银四万两，把繁华地段总府街与华兴街之间原老盐店一带地皮买下，作为建场地皮，工程包给当时很有名的工匠江建廷设计施工。1908年7月动工，次年3月建成[7]。

宣统元年（1909）三月初三，劝业场隆重开业。场内场外张灯结彩、喜气洋洋……市民们成群结队、闹闹嚷嚷：“看新式劝业场去！”“买相因巴适的东西去！”

劝业场主街长近百丈，南向总府街，北向华兴街，场中有东西支路，前后场口都有供顾客停马车的“舆马场”。主街两边是一楼一底的商铺，前后有走廊，楼栏回环相通，当时称为“走马转角楼”……[8]

长期以街巷为市的成都商界，从此揭开崭新的一页。劝业场成为近代成都第一个物流中心，从而使成都成为中国西南最大的商贸重镇。

清末成都的街铺，多半是古香古色的小青瓦、铺板房。我仔细观察劝业场的几张老照片，不得不由衷地竖起大拇指：不愧为成都商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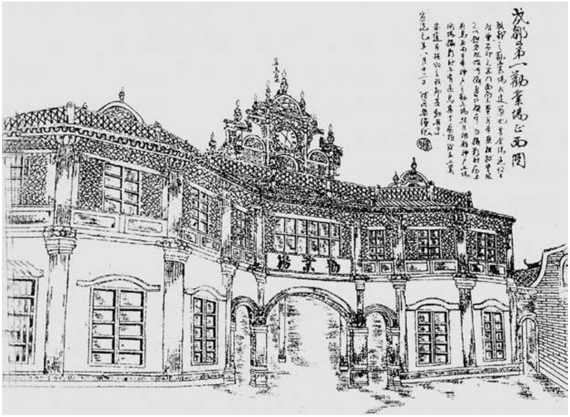
建筑走向现代化的开山之作！

劝业场一楼一底，楼上多向外挑出宽敞的走廊，既供2楼作阳台、通道，又为楼下行人遮阳避雨。檐口设垂花柱，有的柱间设挂落、栏杆或飞来椅等精美装饰。为显示房屋高大，在房屋各处设挑台、百叶窗、三角窗头、飞檐翘角等以装饰楼层，又以拱廊楼梯相连楼层上下。它中西合璧，既具中国传统的古朴典雅，又有西方豪华精美的艺术装饰……[9]

靠总府街的前场大门，更令当时封闭的市民吐长舌头：粗壮圆润的罗马柱、气势辉煌的大小圆拱门、二楼上方高高耸起有点像洋教堂样的塔坊，正中间比箩筐还大得多的报时西洋钟……这种建筑，使人油然联想到北京圆明园的资料老照片。



清末最繁华的商业场（劝业场）



刚建成的成都劝业场（绘图：傅崇榘）

大拱门上方，是周大人亲笔手书的颜体大字“劝业场”，金灿灿射眼；右侧罗马柱上高挂“商办成都劝业场建筑部股份公司”的大吊牌，洋溢着现代化信息。前来开业式看热闹的人交头接耳：“哎呀，好洋盘哟！”

这时的周善培已升为劝业道总办，他的开场演讲实在精彩：“中国自古而还，重农不重商，以为农者生存之本源，商者无聊之末流，故秦汉之制，商贾不得衣着文绣，盖贱之也，致使国贫民瘠！近观东洋之振兴，实为发展工商致之。愿诸君共振兴实业，裕国裕民！”[10]

他是浙江诸暨人，随父宦游来川，江浙口音夹杂川话，又不时引经据典，让人难懂。但密密麻麻的观众，从他挥舞手臂慷慨激昂的断言片语中，不难明白他的意思，都议论纷纷：“周大人说得对头，是要发展工商、振兴实业，国家才能富强嘛！”

周大人演讲一完，成都和温江、崇庆等附近州县赶来看稀奇的人，早急不可耐地一拥而入了……

---

[1] 参见夏东元：《洋务运动史》，第19章《洋务运动尾声》。

[2] 参见四川省文史馆编《成都城坊古迹考》，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36～

437页。

[3] 参见《四川近现代人名录》，周善培条目，四川辞书出版社，1992年，第215页。

[4] 参见四川省文史馆编《成都城坊古迹考》，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36～437页。

[5] 参见岱峻：《百年前他改变了成都》，《成都日报》2002年5月22日。

[6] 参见姜梦弼：《商业场的变迁》，《成都掌故》第2辑，1998年。

[7] 以上参见《成都市建筑志》，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4年，第49～50页。

[8] 以上参见《成都市建筑志》，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4年，第49～50页。

[9] 以上参见《成都市建筑志》，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4年，第49～50页。

[10] 参见姜梦弼：《商业场的变迁》，《成都掌故》第2辑，1998年。

开现代文明新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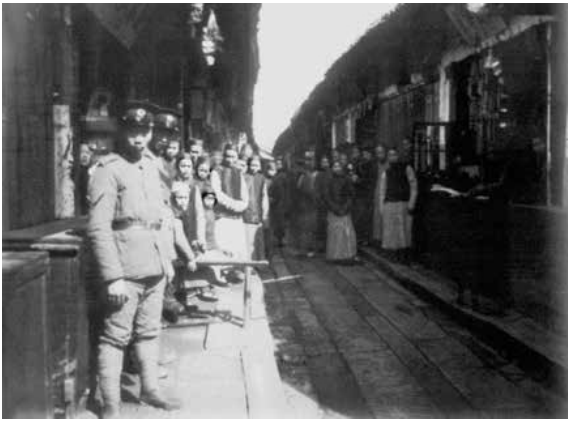
劝业场内有百货、饮食、茶铺、客栈、书画、玉器、糖果、烟酒等各行店铺150多家，都是本行帮中的“名牌”“正宗”。如“正大裕”号扇庄，“谦益祥”号玉器铺，“裕国春”的宫粉香胰，“松竹轩”刺绣、绢扇，“荣身久”衣裤、皮袍，“鼎升荣”的官帽，“熙德隆”的靴鞋，“月成新”的袍套，“陶长兴”的毛巾，“仁义和”的梳篦，“三都重”的书画……

官办局所的产品也琳琅满目：陆军制革厂的鞍鞯，乞丐工厂的卤漆，习艺所的印刷物，茶务所的茶叶，火柴官厂的磷头火柴，图书局的书册……大多数产品，都在青羊宫“劝业会”上得过奖。

劝业场房铺奇俏，想进场号个摊位不容易。据说“味虞轩”京果铺的桃片虽在青羊宫花会上得过奖，但股东反对新繁县这家外县小铺子进场。周善培却为它租得一间小门面，还建议用快马每天去新繁县运来当天出炉的产品到劝业场出售，以保信誉……

劝业场开业初期，樊孔周代商务总会报督宪的呈文中说：“四川地大物博，利工宜商，为他省所不及……抵制外人，踵美邻之集。”就是说：为发展地方实业，只卖本地货物。

但这种“地方保护主义”是根本行不通的。开场一年来，交易总额33.3万两白银，本地货营业额不到三分之一，洋货广货却畅销得很。樊孔周等商会中人觉得此情与劝业场和“发展地方实业”已不太相符，就在宣统二年（1910）三月改名为“商业场”。



1911年清末成都狭长的总府街（［美］路得·那爱德摄）

[1] [2]

几十年来，不少民众仍称其为劝业场，或劝业场、商业场混叫。

场内除本地产品外，如巴黎香水、泰国纱缎、法国丝绸、英美烟草、八音钟表、金丝眼镜、五金杂件等“洋货”更独领风骚；打“各国通商货品”招牌的“马裕隆”百货店堪称第一。此外，京广货铺、苏广货铺、福建烟铺等各省商铺也不少……可谓土洋兼陈、中西结合！

劝业场还有一特色：“悬牌标价”。做生意都是“漫天要价、就地还钱”，正像一首成都“竹枝词”写的：“各铺奸商实在奸，凭空喊价黑漫天。奴家不是乡巴佬，就地还他一文钱！”买卖双方胡搅蛮缠。而童叟无欺的“悬牌标价”，确已和现代商业“游戏规则”接轨了……

劝业场的建成，是成都工商业向现代化迈进的标志。成都在1910年仅股份公司便有数十家之多。这数量今天看来微小，但在近百年前，意义何其重大！

劝业场在成都开创了许多全新的行当。说到这里，就要再提到如今很少人晓得的樊孔周了。樊孔周很有商业头脑，他对股东们说：“劝业场要想在省城一炮打响，就必须做到八个字：‘人无我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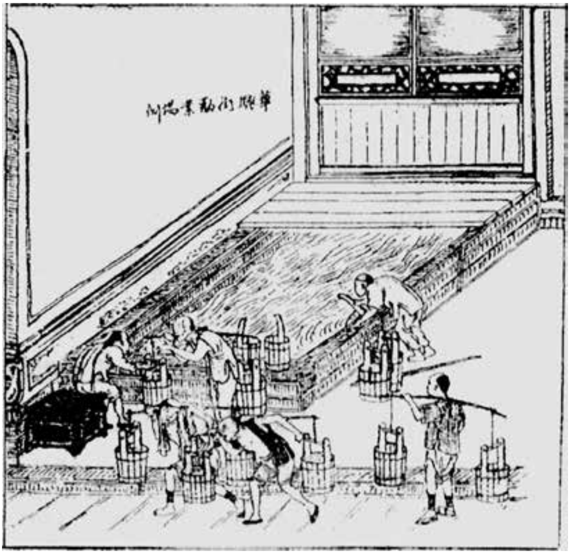
人有我好'！我们先要在劝业场内安电灯，装自来水！”

不要说当时仅上海、汉口、重庆等大商埠才有少量电灯，就是20世纪50年代我是小娃娃时，家中也还是用破调匙倒些菜油、浸条麻线照明。成都普通市民大都如此，连煤油灯都是奢侈品，晚上家家户户油灯如豆、人影昏黄……可见樊孔周当时的思想的确很“超前”。

樊孔周筹股集资白银三万两，创立了“悦来公司”，自任董事长，建起“劝业场发灯部”。

公司从上海买来40千瓦的电机，在劝业场内西北角建厂房。“发灯部”1908年完成安装发电，并向清政府请准在成都供电专利权20年。这是四川电力工业史上的第一家公用电力企业，除供劝业场外，还向附近各街出租电灯约600盏……[3]

劝业场拱门上方二楼上高悬装有电灯的白色“大灯笼”，场内商铺家家户户都安电灯。这一招很灵光，劝业场人气更旺了。每天黄昏时分，前后场口就里三层、外三层挤满来看“洋灯”的人。[4] 听老辈子讲：当发电厂电机的“铁笛”声骤响，劝业场内华光四射、灯火辉煌时，人们惊叹声一片：“洋灯燃啰！洋灯燃啰！”“快看拱门上的洋灯笼，亮晃晃活像他妈个月亮！”



劝业场内的“人挑自来水”（出自：《通俗画报》）

于是，连川西坝子上有几个闲钱的“二簸簸粮户”，也头上裹着白帕子，穿起土布长衫子，邀邀约约从几十里、百里外专门来看稀奇、买洋货。电灯亮时，他们伸长颈项驻足呆看，百思不得其解，抓耳挠腮议论道：“妈哟，硬是怪喃！那个玻璃灯笼严严实实的，拿啥子火伸进去才点得燃嘛？！”

绝不要嘲笑这些乡下土老财。当代大文豪郭沫若那时正在省城读书，他看到“电灯燃了”也兴奋地写诗惊叹：“楼前梭线路难通，龙马高车走不穷。铁笛一声飞过也，大家争看电灯红！”[5]

劝业场第二个“扯买主”的，是最先用上自来水。宣统元年，在周善培支持下，樊孔周等人又联合成立“利民自来水公司”，从南门万里桥下锦江中抽水用管道输送各处。劝业场蓄水池建在华兴正街，场内用户还得雇人去蓄水池挑，被嘲为“人挑自来水”。尽管如此，在成都也算“开天辟地第一回”了！[6] [7]



清末民初康子林、周慕莲在劝业场悦来茶园合演《情探》

劝业场第三个绝招，是“一条龙”服务：将购物、娱乐、休闲融于一体。场内可买、可吃、可喝、可玩、可观、可睡……这甚至比如今的大型超市还胜一筹。

樊孔周等人的“悦来公司”在紧靠后场大门的华兴街老郎庙修建起“悦来茶园”，从宣统元年（1909）起，邀名戏班演唱，每日“光扯、光扯、光光扯”的锣鼓声唱声，响遏行云。在周善培的主张下，戏院首次出售女宾票，虽然是“分门进出”，但成都女子总算有和男人一样公开进出戏院的权利了……“三庆会”川戏班中老角色多、新角色好，杨素兰的《大劈棺》，刘文玉、周名超的《柴市节》，李翠香的《三巧挂画》，邓少怀、康子林的《放裴》，蒋润堂的《飞龙寺》，游泽芳的《痴儿配》……吸引来一潮潮看客，悦来茶园成为成都川剧的“大码头”和发祥地……[8]

“悦来公司”又在场内偏东修建旅舍，既有小院平房又有小洋楼，专供外地客商或游人携眷住宿，在宣统元年（1909）五月十八日开张。

劝业场内，还有味美可口、丰俭由人的中西餐馆、酒肆。最有名气的当数“楼外楼”，菜肴多、味道好（烹、蒸、卤、烧、炖、炒……有两百道以上）。其他小餐馆也别具一格，据说周善培微服出游，在望江楼前挑担担卖水饺的小摊上偶吃一碗，连称：“皮韧耐嚼，馅多

味鲜，好吃好吃！”他设法让小贩也在劝业场中租了间铺子，亲题招牌“江楼水饺”。这个“走红运、撞贵人”的小贩从此“发”了！

“劝业场”曾是巴金的大哥李尧枚工作之处，月薪24元，如今算“白领”了。很少人谈到过“劝业场”还是成都新思想、新文化的发源地。我从巴金著作中看到，巴金曾在此流连忘返，读到了《新青年》等大量新潮刊报……

劝业场内商铺、茶楼、酒肆、戏园、旅舍无不具备，自然成为成都游乐佳处。楼上茶铺里，每人要出两角半铜板茶钱，却魅力更大。为啥子？正像李劼人书中写的：“劝业场内既能吃茶，还可以看很多女人！” [9]

千万莫认为这是“语言黄色”！须知百年前封建礼教旧规下，妇女“藏在深闺人未识”，有了劝业场，妇女终于可以扭扭捏捏以购物为名，头插鲜花刻意装扮，从“鸟笼子”里钻出来见见世面了。而男人们也多了一处“观花”审美之地。还是那位大文豪郭沫若，当时仅十七八岁，却也春心荡漾，写了两首很传神的诗：“蝉鬓轻松刻意修，商业场中结队游。无怪蜂狂蝶更浪，牡丹开到美人头”；“新藤小轿碧纱纬，坦道行来快似飞。里面看人明了否，何缘花貌总依稀？” [10]

小郭是近视眼，看来深以看不清楚花容月貌而遗憾……

---

[1] 参见姜梦弼：《商业场的变迁》，《成都掌故》第2辑，1998年。

[2] 以上参见《成都市建筑志》，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4年，第49～50页。

[3] 参见四川省电力公司：《百年风雨坎坷 追寻世纪之光》，四川电力在线，2005-07-04。

[4] 参见王泽华、王鹤：《民国时期的老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9年。

[5] 参见卓琴：《略论郭沫若与中国现代化》，载《郭沫若学刊》。

[6] 参见姜梦弼：《商业场的变迁》，《成都掌故》第2辑，1998年。

[7] 参见王泽华、王鹤：《民国时期的老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9年。

[8] 参见《川剧词曲》，中国戏剧出版社，1987年。

[9] 参见李劼人：《死水微澜》，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

[10] 参见卓琴：《略论郭沫若与中国现代化》，载《郭沫若学刊》。

百年沧桑多酸辛

劝业场开业那天，周善培像有预感般对樊孔周说：“此场修得好，真可用‘栋宇堂皇、商肆罗列’来形容！但可有弊病？”樊还未开腔，属员娄仲光应声说：“在下以为，楼台虽好，但铺房稠密、街道狭窄，一旦失火则难以施救！”[1]

樊孔周在1912年民国后被选为四川省临时参议会议员。他当年创办成都第一家晚报，并接办《四川商会公报》，改名为《四川公报》，在四川影响大、销路广。他对成都走向现代化很有建树，但因揭露军阀专权，1917年被川军刘存厚手下的团长张鹏午派遣暴徒枪杀，枪眼遍体……[2] 民众都很愤慨！文人刘师亮当时写有“樊孔周周身是孔，刘存厚厚脸犹存”之句，痛骂军阀。

说来也怪，樊孔周屈死不久的这年腊月十五深夜，商业场失火，繁华商场顿化灰烬。

此后商场由江建廷重建。原悦来旅馆修成“悦来商场”；电灯厂门前到总府街“普镇堂”庙宇一段，修建为“新集商场”；新建的商业场和悦来商场、新集商场以东西支路连接，三个商场连成一体，呈“川”字形，楼上有天桥可通。

三个商场共设店铺约300家，盛况更胜往昔！新建店铺，每间花费工料250个银圆，三个商场均仿原劝业场“走马转角楼”样式。场口第一、二、三柱是楠木，四、五柱是香樟木。当时人评论该工程“工

坚料实、接头斗榫处灰尘不进”[3][4]！

哪晓得1933年，商业场又遭大火！

其后，房主各自因陋就简修建。修来补去，所有店铺已非原样，生意渐淡……抗战后，外省人涌入成都，商业场生意又兴旺了一段时间。如“马旭梁百货”雇请洋鼓洋号搞打折甩卖，门庭若市。新集、悦来两个商场新开“二泉”“白玫瑰”茶厅、弹子（台球）房和台式高尔夫球，还有老招牌的“沂春浴室”，也扯来不少买主[5]。

尤其是晚间场口的烧腊摊子和抄手等“鬼饮食”一家连一家，长嘴铜油灯一盏接一盏，香味四溢、人声鼎沸……形成蓉城最具民俗风味的一景！一位老艺人对我讲：悦来茶馆唱戏的许多川剧演员当时生活很苦，深夜下场出来，女的“唏呼唏呼”吞碗摊子上的红油抄手，男的则啃只鸭脑壳下二两烧酒，其乐无穷。这些吃红油抄手、啃鸭脑壳的男女演员中，解放后不少人成为著名的川剧表演艺术家。

到解放前夕，混乱世道中的钞票贬值如废纸，商家实难支撑，绝大多数店铺关门大吉，一片萧索。商业场从此一蹶不振，早年风采如过眼烟云、已成幻梦……

20世纪70年代，我在附近某医院当医生，每天中午都要到商业场那条旧街上逛逛。

往昔显赫的商铺，如今冷清地立在街两边；斑驳墙壁活像老妇人脸上条条皱纹，似在无声哀怨昔时的青春美丽不再……许多门面成为住家户，屋檐破竹竿上晒满“火炮”短裤、小儿尿片。不少街铺都关门闭户，至今留有印象的是那家三开间“四川文物商店”，郭沫若题的黑漆招牌，我常去闲看，但肚皮都填不饱的年月，“文物商店”更是寂寞。

还有家“大光明理发店”，是商业街上老牌名店，生意也不太好。

我曾麻起胆子花一元二角钱去理了个“拿波头”（当时我月薪30来元，此举属高消费）……大师傅理完发，双手捧面大镜子在我脑壳后头乱晃，让我从壁上大镜中能看到自己的后脑勺，他殷勤地问：“巴不巴适嘛？”还说：“‘大光明’自从在商业场开张后，从来都是认真的！”



商业场华兴街后门的小餐馆

印象最深的是商业场与华兴街拐角处的一家面店，据说已开了50多年——那才是我中午常去商业场街的原因。面店店堂很小，仅一间铺面。红油素面一角二分外加粮票二两，清汤炸酱面一角八分也外加粮票二两……我每天中午在此一边狼吞虎咽，一边夸年已70岁的杨师傅手艺好。如果买主少，杨老师傅就会一边“吧嗒吧嗒”抽叶子烟，一边说：“这算啥子哟，以前劝业场热闹的时候……”

听他絮絮叨叨，想起“白发宫女在，独坐说玄宗”的旧话，令人惆怅。

1985年后，我看见“商业场街”突然忙乱起来——原来要重建商业场了！



2003年的商业场华兴街后门

不久新商业场开场了，前后场分别悬挂着由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和国防部长张爱萍题写的“商业场”大字，黑漆金字，亮光闪闪。

新商业场四层新楼，外看略有点飞檐仿古，进去却俨然一座“现代化商场”，毫无传统风格、历史痕迹可寻。

越有地方性才越有世界性。一座城市的独特文化犹如独脉香火，理应一代一代传承。当大刀阔斧进行城市建设时，绝不应做破坏历史记忆的傻事。

---

[1] 参见姜梦弼：《商业场的变迁》，《成都掌故》第2辑，1998年。

[2] 参见《四川近现代人名录》，樊孔周条目，四川辞书出版社，1992年，第326页。

[3] 参见姜梦弼：《商业场的变迁》，《成都掌故》第2辑，1998年。

[4] 以上参见《成都市建筑志》，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4年，第49～50页。

[5] 参见姜梦弼：《商业场的变迁》，《成都掌故》第2辑，1998年。

成都庙会的历史风云

老庙会自古闻名

成都传统庙会历史悠久，这是一幅如梦如幻、五彩斑斓的巴蜀“清明上河图”……

庙会，顾名思义，就是因庙而聚会，其历史可以一直上溯到古老的“社祭”。自汉代以后逐渐形成的“庙会”传统，成为中华民族一种重要的社会风俗。



1910年的四川成都关帝庙。平时非常幽静，庙会时则是另一种热闹情景

（［英］尔尼斯特·亨利·威尔逊摄）

佛教从东汉时期开始传入中国，这时期道教也逐渐形成。无论佛、道，每年都有烧香祭祀庆典，称为香期、香会、过会、出会……慢慢被称为“庙会”。唐、宋后，佛、道都达到全盛时期，宗教活动更繁多，如圣诞庆典、坛醮斋戒、水陆道场，等等。为突出其报答“神佑”，宗教仪式上增添了许多娱乐内容，如演武、杂技、舞蹈、戏剧、曲艺、工艺表演……这些民间百艺的集中演出，有很强的竞赛性质，所以也称“赛会”。

另外，中国自古就是农耕社会，民众平时很少往来，庙会自然也成了人们交流和物资交易的好机会，所以又称“庙市”或“节场”……[1]

这样，但凡庙会，善男信女、凡夫俗子都趋之若鹜。大的庙会甚至能吸引千里外香客、商贾前来游玩、贸易，许多王公贵戚甚至皇帝老倌、皇后娘娘也要去赶庙会。我读后蜀皇帝孟昶最宠爱的花蕊夫人的一首诗：“春早寻花入内园，竟传宣旨欲黄昏。明朝随驾游蚕市，暗使毡车就苑门。”这位娘娘听说第二天要陪皇帝去大慈寺逛庙会，兴奋得头天晚上就吩咐预备车马！[2]

成都庙会源远流长，从古至今佛教的大慈寺、道教的青羊宫及二王庙的庙会，在中国都非常有名气。

大慈寺，本名大圣慈寺，唐代至德年间（757）修建，为川中第一大丛林。大慈寺一带也是商贸集散地，到宋代更是庙会频频：每年二月十五日卖花木蚕器，称为蚕市；五月卖香药，称为药市；冬月卖用具器物，称为七宝市……庙会时常聚万千游人，官宦名流宴饮游赏。如宋朝有个成都太守田况的《大慈寺前蚕市》诗：“高阁长廊门四开，新晴市井绝纤埃，老农信步忧民意，又见笙歌入寺来……”歌舞升平的庙会情景如在眼前。

中国元宵灯会传统很受佛教影响：佛家法会上除点灯笼外，还特制一种“灯轮”，又称花树、法轮。隋炀帝是倡导灯会的祖师爷，他一反其父隋文帝限制观灯的律条，使元宵赏灯成为我国节庆的主要传统习俗……

大慈寺庙会以灯会最为出名，在唐朝堪称第一。据唐人《放灯旧记》说：唐明皇到成都时，由道教大师叶法善陪同到庙会观灯，从大慈寺的冰灯到昭觉寺的佛灯、青羊宫的道灯，精巧奇绝，引人入胜……这位大唐天子看得乐不可支，据说庙门前匾额“大圣慈寺”即是他御笔亲题。

南宋诗人陆游在《丁酉上元》诗中也大夸成都灯会盛况："突兀球场锦绣峰，游人红女拥千重。鼓吹连天沸午门，灯山万炬动黄昏！"直至清代、民国，大慈寺附近东大街一带灯会都名扬海内，每年正月初一到初九的庙会也热闹非凡……[3] [4]

两千多年前，李冰父子凿离堆，开堰建渠使天府之国"水旱从人、不知饥馑"，带来的福泽一直为蜀人崇敬，秦汉时就为他父子设庙。齐建武时（494～498）在灌县建立"崇德庙"，五代王建踞蜀后改称二王庙。历史上都江堰每年既有官方主持的祭典，也有老百姓的民间朝拜，故这里庙会的历史应该更久。传说旧历六月二十四日是二郎生日，二十六日为李冰生日。川西民众不辞艰苦跋涉，扶老携幼，带着祭品来庙祭拜，每日多达万人……至今庙会时，二王庙里仍是香烟缭绕，人山人海。[5]

青羊宫庙会也有1000多年历史。传说道教始祖李老君生日是农历二月十五日，唐代以来就在此举办一年一度的庙会。春光明媚的二月又是传统的"花朝节"，所以又习称花会。宋代大诗人陆游赞颂："当年走马锦城西，曾为梅花醉似泥；二十里中香不断，青羊宫到浣花溪。"……这位老诗翁写诗时，说不定正喝了二两烧酒喜颠颠地骑着毛驴去赶庙会呢！

成都周边如新都、华阳、什邡、新津等郊县场镇，庙宇甚多，也定期都有庙会，如彭县东岳会（三月三十）、简州（简阳县）白塔会（三月初二）、簇桥单刀会（五月十三，祭武庙关羽）、崇宁县十王会（五月二十八）、资阳县城隍会……此外，还有观音会、药王会、王爷会、土地会、五显会、老君会、佛祖会、川主会、牛王会，等等，名目甚多，难以尽述[6]。

庙会历时数天到数十天不等，远近善男信女纷然前来，烧香、敬神、诵经，戏班锣鼓昼夜不绝。大批商贩、江湖跑滩匠也前来扯圈叫卖，摊棚相连不断……赶庙会，成为老百姓最快乐的盛事。

[1] 参见小田：《在神圣与凡俗之间——江南庙会论考》，人民出版社，2002年。

[2] 参见《全蜀艺文志》卷七。

[3] 以上参见《华阳县志·古迹四》，民国版。

[4] 四川省文史馆编：《成都城坊古迹考》，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

[5] 参见《青城山志》，巴蜀书社，2004年。

[6] 参见傅崇榘：《成都通览》，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

清末的“劝业会”

这是约100年前成都古城中一幅真实的“清明上河图”：

春光明媚、艳阳暖人、江流碧澈……许多士绅官宦在老南门大桥一带问：“到青羊宫，如何走？”轿夫们忙涌上去：“六十文抬你去！”一番讲价还价，大多讲成四十几文钱一乘……轿夫一路喊着“得罪，得罪！”飞奔而去。

赶庙会的人太多，到巍峨古老的南门城门洞前，人群更拥挤。无数行人和各种轿子聚集在三丈多宽的一条出路上。城墙上支着警察局新制的木牌告示：“出城靠右手走！”挤出了大城门洞，几个道口上都站有警察在指挥。轿子与步行的在靠城墙一边新辟的路上走；骑马的则要过大桥，走一条较为幽静而尘土极大的小路；坐马车的则走极窄极烂的柳荫街……这要算成都最早的“交通管制”了。



清朝末年青羊宫庙会内的临时货摊（［美］路得·那爱德摄）

出柳荫街眼界猛地就开阔了。右面是巍峨的老城墙，城墙下是贫民的菜圃和一家家茅草房。人多路少，菜圃中早踏出了一条丈把宽的土路来。一辆辆木轮裹铁皮轴的“土东洋车”、吱吱嘎嘎叫着的“鸡公车”、滴滴答答跑着的“溜溜马”，还有许多老头、老太婆拄着红皮甘蔗做拐杖……各色人群吵吵嚷嚷、嘻嘻哈哈都在这条灰路上走着，扬起一道道灰幕，随风飘到正俯在城墙雉堞间向城外闲眺的人们的鼻孔里。

马路左边是清清锦江，河岸上竹木蓊郁。到了百花潭水榭，乘船来赶庙会的人也手牵手上岸……青羊宫一带到处都是现搭的篾棚，宽敞的田畴菜畦变成临时街巷。会场门口大书“劝业会”三个红字，在阳光下分外耀眼 [1] 。

庙会又怎么成了“劝业会”了呢？原来，中国历来重农抑商，清代庙会时交易物资很少，仅农具之类在青羊宫正门外场坝，花木则临时于道观西侧旷地有交易。晚清行新政，颁布的上谕第二条即“振兴商务、奖励实业”。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四川商务局总办沈秉堃首先在这里“扩充会场、建筑列肆”。在青羊宫左侧二仙庵前修建临时房屋，举办全省性“劝工会”，令各州县劝工局将产品拿来此陈列展销。 [2]



清朝地方官员们在青羊宫庙会“授奖台”上颁奖（［美］路得·那爱德摄）

沈秉堃外调云南，庙会由先后任职于巡警道和劝业道的周善培（号孝怀）主办。1906年四川总督锡良还亲到庙会讲话说：“制造劝工导风，商会健举，进拙于巧，化窳为精。”庙会结束时由官员和商会对展品评比授奖。劝工会至1908年改名劝业会。[3]

这种有意识地将庙会和大规模物资交流融为一体，在近代中国可称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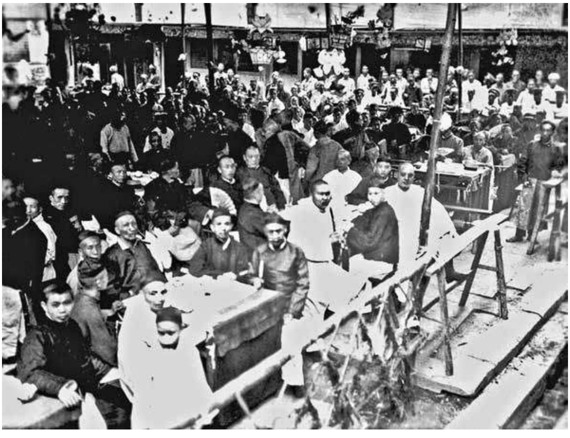
此前赶庙会，由老西门及老南门出城，都要蜿蜒数里才能到会场，轿子、鸡公车、“溜溜马”和游人挤成一团。劝业道于是在老南门外锦江北岸筑马路以达青羊宫东之马家花园，长三里余。又由商人自上海购回新式四轮马车载人往来……这是成都最早的马路和马车。宣统元年（1909）马路延伸至青羊宫西数里的草堂寺，又由上海购回黄包车（称为东洋车）20余辆，由老南门直达，每次取当十铜圆四枚，游人争坐……民国2年（1913）“少城”拆除，当局又在老城墙西南角开辟通惠门，使赶花会的成都人更获捷径。[4]

赶庙会的人一潮一潮的，人人梳妆打扮。女孩儿是“乡女村姑态

若何？却把胭脂打一坨”；风流少妇是“行路手拿甘蔗嚼，短短青裙窄窄裳”；连老太婆也是“老去徐娘尚戴花，可怜半口已无牙”“何物村婆不害羞，画眉敷粉老风流”……这情景真如另一首竹枝词中所说：“青羊宫里似星罗，乘兴家家戴酒过。小妹戏呼阿姊语，今年人比往年多！”[5]

但男女有别：男人走旧大路的男宾入口，女人则走另一条新开的路进会场。刘师亮在“竹枝词”中说：“入口端因女界开，小桥一座架河隈，劝郎且莫伤离别，转过湾湾就拢来。”为何如此防范？因每年都“男女双方有鼺神”……为防止混混流氓或暗娼在庙会中“乱风流”，二仙庵外专门立了两根“鼺神桩”（当时把不正经的男女称为“鼺神”），逮住这些男女就绑在“鼺神桩”上抽马鞭子严惩。[6]

青羊宫内有古代铜羊两只，被民间视为神羊，俗传摸羊能治疾病，妇女摸羊肚子可生男孩，故人们到青羊宫游玩时，多喜摸羊。有人便开玩笑写竹枝词：“闻说铜羊独出奇，摸能治病祛巫医。求男更有新方法，热手摸他冷肚皮！”[7]



清末青羊宫庙会内的竹棚茶馆。长条凳、盖碗茶，少长咸集其乐陶陶



清末庙会殿堂外情景

摸铜羊成了赶庙会的惯例，我小时就每年跟在大人屁股后，把小手混在无数大手中把铜羊周身摸个遍，耳朵里听一些“扯师”胡说八道：“快摸羊屁眼儿，不生痔疮！”“快摸羊脚板，不长鸡眼！”“快摸羊鸡鸡，专医阳痿！”三清殿内嬉笑声一片……

青羊宫相邻处还有“二仙庵”“马家祠”“孝廉坊”“会仙桥”等名胜。庙会内到处都有茶园，如“绿天”“同春”“浣花泉”……到处都有酒楼餐馆，既有大酒家“承香楼”“五柳楼”“聚丰源”，也有“卤鸭醉虾青果酒，每馔不过二百文”的小酒店“崧记”“四座”等，还有卖各类日杂百货、竹木家具的种种商摊货架不下几百家。无数卖糖饼、关刀、风车车、香烟瓜子、豆花等小贩穿梭叫卖于红花碧叶、春风杨柳之间[8]。青羊宫庙会时，还有全国少见的武术“打擂”。

人人脚板在走，嘴巴在嚼，此情景刘师亮在1928年写的一首竹枝词很传神：“玫瑰苕皮丢满阶，苕皮踩倒谨防栽。仰天一个翻筋斗，崴断人家高跟鞋。”人世间苦乐不均，也有可怜讨口子：“何人落魄走天涯？饥饿难捱只自嗟。最是凄凉堪怜处，桥头独啃白泥巴！”[9]

每年“花会”，各界人士倾城出观，挥汗成雨、呵气成云。这“会把眼睛都看花”的“花会”，确乎为蜀中最具地方色彩、乡土风味的庙会习

俗了，还引起外国人关注。日本人山川早水1906年在他的书中绘声绘色地写道：

寂静的锦江河畔，（会期）人马轿舆不断，烟尘滚滚，前后难辨；过双孝祠，走到二仙庵前面，早就人如潮涌，非常拥挤；左侧有流动照相馆，乐队虽然不能令人满意，但也可增加一些气氛。走入二仙庵内，上百个盆景店布满广场……是这个会的主会场。教育部、工艺部、美术部、演艺部等机关的红旗，在人群头上飘舞。二仙庵的殿堂走廊全成了展览的地方，道路分为往、返两条路。手执木棒的警察，在各个重要路段维持秩序……另外还有西洋杂货店、中国杂货店、古书店、古董店排列于檐下与中庭，除通路外没有插足的余地！

会场偏东树林深处，大竹席棚中由成都川剧界的名演员从早演到晚。逛完二仙庵转向青羊宫，写着“工农部”红底白字的大旗迎风飘舞。树下摆着家用器具扫帚羊杂货，还有人卖虎、豹、豺、狼、猿、狗等头骨……

这个日本人还说，花会中用竹席临时搭起的饮食店不少，店里热气腾腾。有个日本女教习在一家五香菜串店，喝了一瓶酒，吃了一盘红烧鲫鱼和一碗荞麦面，要价两元。第二天她忽然生起气来，认为被敲了竹杠，跑到四川总督那里告状。山川早水觉得可笑，说：“真乃僻乡之奇谈！”[10]



民国时期庙会内的小食摊子

---

[1] 参见李劼人：《死水微澜》，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

[2] 参见傅崇榘：《成都通览》，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

[3] 四川省文史馆编：《成都城坊古迹考》，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

[4] 四川省文史馆编：《成都城坊古迹考》，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

[5] 参见刘师亮：《续青羊宫花市竹枝词（民国十七年春日作）》，载《成都竹枝词》，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

[6] 参见刘师亮：《成都青羊宫花市竹枝词（民国十二年春日作）》，载《成都竹枝词》，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

[7] 参见刘师亮：《续青羊宫花市竹枝词（民国十七年春日作）》，载《成都竹枝词》，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

[8] 参见《成都竹枝词》中各诗零散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

[9] 参见刘师亮：《成都青羊宫花市竹枝词（民国十二年春日作）》，载《成都竹枝词》，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

[10] ［日］山川早水著，李春德、李杰译：《一百年前一个日本人眼中的巴蜀风情》，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

乱世“花会”云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几年，因担心“封建回潮”的罪名，“花会”名称一度曾改为“成都物资交流会”，青羊宫庙会实质上已消失了。

1959年，春光明媚。邓小平、朱德、贺龙、彭德怀等先后到成都。为迎接中央领导人，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指示：拨专款办“花会”。邓小平等人兴致勃勃地观赏了“花会”，还在内部餐厅品尝四川小吃。李井泉说：成都原来有个专卖烤红薯的“马红苕”很有名，但现在不知踪影啦……邓小平很感兴趣。市长李宗林派许多人去找，几天后才了解到姓马的早已死了，后来找到其徒弟到“花会”中烤“马红苕”。邓小平称赞说：“花会还不错，有特色，菊花、盆景要争取占全国第二位。”朱德元帅也很欣赏花会，说：“兰草太少了，要争取发展一万盆。”

“大跃进”运动后全国大饥荒，“花会”名存实亡。以前哄小娃娃转糖龙的糖画摊子前（四川称“糖饼摊摊”），连成年壮汉也争买。指甲盖大小的小糖饼，拥挤半天每人限买五粒，卖完为止。要想抢购一个锅盔（烧饼）、一小碟“三大炮”（糍粑），更要挤出一身臭汗……难怪吴丈蜀先生在《1962年成都灯会竹枝词》中说：“佳节空城往看灯，连年跃进‘庆升平’。天寒不怕奔波苦，二两锅盔四体倾！”“巧式花灯只等闲，愿闻一炮响三连。层层壮汉争糖饼，半日腰酸换嘴甜。”

如此寒碜的“花会”，在“文化大革命”年代仍遭到无情批判，说这

是“资本主义复辟”！

“文化大革命”结束，成都“花会”“灯会”绝处逢生。本文作者1983年写有几首竹枝词，记录下成都庙会由衰而盛的情景：

灯会年年在翻新，丙辰“大闹忠义庭”。丁巳“江青扑香粉”，今年“啃瓜猪无能”。

（注：灯会亦随政局而变：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前，江青等“四人帮”的“批判《水浒传》”“尊法反儒”等运动轰轰烈烈，这年灯会有李逵大闹忠义庭反招安灯。而1977年政局已变，灯会有讥笑江青不断甩脑壳往脸上打粉的灯。1983年为猪年，遂有猪八戒啃西瓜的巨灯）

人人都到青羊宫，春兰茶铺闹哄哄。两个操哥争椅子，吵得筋涨脸又红。

（注：偌大花会仅茶园两个。春兰茶铺今年设于八卦亭前，地方狭小茶客特多，故吵架不断）

今年花会更稀奇，坝坝头有旧飞机。你想进去望一眼，一角五分快取起。

（注：双流民航一架退役旧飞机放于灯会，门票一角五分）

八卦亭后多小吃，凉粉、豆花、三合泥。三清殿中演川戏，游人看得笑嘻嘻。

荣乐园在大殿中，单锅小炒香喷喷。划拳在吼“来就来”，不觉夕阳已残红。

（注：道观被破坏还未恢复，殿内遍设小吃摊，而三清殿内戏班

子卖票唱川戏，真是余音绕梁！）

爸爸妈妈牵娃娃，吃遍小吃笑哈哈。肚儿就像大罗汉，装尽酸甜苦辣麻。

（注：过来人思今抚昔感触良多，岂止是酸甜苦辣麻）

糖饼摊摊多又多，起码都有百多个。一转就是十来盘，全是小姐和幺哥。

（注：转糖龙，每次一角钱。不单小孩去转，无数小伙、大姑娘也转金龙逗乐，一转就是一元多钱）



1996年青羊宫“花会”大殿墙外的小吃摊

闻名全国的青羊宫“打擂”

民国后兴起打擂台

天府之国从古至今武风甚浓，形成闻名天下的“峨眉派武术”。练习武术，在四川叫“操扁挂”，又叫“打打行”（háng），在城镇乡坝、士农工商、三教九流中都不乏爱家。在清朝时，四川各地就遍设“武棚”“箭道”，专门聘请武艺超群者传授“弓、刀、石、骑射”。学武的人去“武科”考试，逐级考取武童生、武秀才、武举人、武进士……



清末古城内的习武者，中坐者此门派的老师傅

晚清时璧山县农民邓显扬（邓四教师），长于轻功，驰走甚捷，人誉为“国技家”。光绪初温江赵华山，精“铁汉碑”和弹腿，授徒甚多。光绪末在成都设棚教徒的马黑子，人称“神腿”，其徒马镇江腿功深得其真传，人称“无影腿”，曾任清军十营总教师。龙泉驿的谢昆山（谢打滚）精于地□拳。省都督尹昌衡的镖师“铁人”马宝（1960年去世，享年八十余），精于南拳，其他如青神杨海泉，绵阳方和尚，简阳余发斋及民国后杜自明、郑怀贤、钟润生……这些武林高手都曾为成都地区的武术发展起过积极作用。

清朝末年，青羊宫内就常有武术表演和打擂赛。辛亥革命后，虽已改朝换代，但武风照样浓厚。1912年，居住成都的武林名手马镇江、马宝、刘崇俊等，以提倡国粹、强国强身为名，在成都忠烈祠正街正式成立“四川武士会”，推省都督尹昌衡为名誉会长，马镇江为会长，刘崇俊为副会长，尹昌衡的镖师“铁人”马宝实际负责。于是乎，早晚都有“操扁挂”的人在武士会里打拳踢腿，耍刀弄棒，其中技艺精良者推荐至四川军队中充任武术教官或各级军官。



青羊宫打擂台的入口大门

1918年，四川军政当局以团结尚武为号召，在成都青羊宫举行首次全省打擂。当时共设三组擂台，第一组擂主为督军的查马长李国超，副擂主为唐伯坍、唐公辅；第二组擂主为余发斋，其子余鼎三为副擂主；第三组擂主为马宝。每组主台三日。比赛结果，公认李国超武技精湛高超。

自此以后，除特殊情况外，每年春季成都青羊宫“花会”时都举行一年一度的打擂赛。武风之浓，以至前清遗老，有名的骆状元（骆成骧），除了翘起胡子吟诗作赋外，还挽起袖子跳跳蹦蹦地打拳射箭，来他个“老夫聊发少年狂”……1925年他还亲自主持，取得军政当局赞助，在少城公园半边桥边修建四川武士馆，正式成立“四川武士总会”。一代文魁的状元公成了武坛领袖，担任馆长，刘崇俊任副馆长。1929年5月，国民政府颁布《省市国术馆组织大纲》，于是在成

都成立“四川省国术馆”，省主席刘文辉任馆长。除特殊情况外，每年春季仍按旧例进行擂台赛。[1]

青羊宫每年农历二月十五日举行庙会，又称为“花会”，一年一度历代相沿。成都市各界人士倾城出观，真是挥汗成雨、呵气成云，人山人海、摩肩接踵。而“四川武士总会”主持举办的打擂比赛，更给“花会”增辉添彩。

过了八卦亭，穿过二仙庵，在一大片空旷草坪上搭着一个大擂台：由土筑成一个六尺三寸高、三丈六尺见方的台，上搭棚遮太阳。擂台四周有物遮拦成一极大的圈子，门口大书“柔术场”。进场看打擂需买入场券。圈子里设有茶座，往往擂台上龙争虎斗，打得一塌糊涂，台下却品茗饮酒，吟诗作对，喜笑颜开……真所谓“坐山观虎斗”，管他牛打死马还是马打死牛。

一些文人酒酣耳热骚兴大发，往往一边看打擂一边还摇头晃脑即兴吟几首竹枝词、打油诗。像“怪物”刘师亮就写的有“今年劝业八回开，多少英雄摆擂台。手艺若潮休要去，谨防舂你下台来！”“擂台角艺抢金章，集合江湖打打行。柔术本来为国技，大家努力更提倡。”[2] 徐重蕃写的有“登台较技问谁强？出手双方各主张。却怪旁观空展劲，说他起腿不相当！”“柔术场中尽教师，多少先生学打捶。劝郎莫向旁边立，防他言出手便随！”[3]

自1922年后，又增加了女子打擂、学生打擂等。这在当时还很稀奇，故有人曾作竹枝词叹道：“更有片言需记取，打擂来了娘子军！”[4]

---

[1] 参见孙仲达：《四川近代传统体育》，载《四川体育史料》（内部刊物），1983年。

[2] 参见《师亮随刊》第43期。

[3] 参见《成都竹枝词》，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

[4] 参见《成都竹枝词》，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

上擂台发狠争输赢

武术本是大众喜爱的传统体育，富贵子弟有条件习武，贫苦人家为少受欺侮，更要练武。富贵子弟习武，常把家产花得精光稀烂，故常将希望放在打擂获胜后收回“本钱”；穷人也希冀打擂得胜名利双收翻梢发家……故练武的人大多吃苦耐劳，各练绝招：插沙子练“铁砂掌”，打树干练“铁碑功”，打吊包练“铁拳”，踢墙壁练“神腿”……有的早晨起床后先嚼一把生胡豆，谓之“壮力丸”。一入秋冬季节，更是养精蓄锐、摩拳擦掌，为来年的打擂比赛而跃跃欲试。

春节后，一年一度的打擂在青羊宫花会开幕了，各路英雄豪杰纷纷而至。参赛不限地区、身份，死、伤自负，故要报名注册。比赛由武士总会主办，有军政各界人士赞助资金。

比赛方法是“拈阄”（或抽签）配对，不像现在散手比赛要分轻重量级。也就是说，你如果一百斤体重，却可能遇上一个两百斤的大汉。比赛顺序是：先赛“资格”，再赛“蓝章”（类似现在优胜纪念章），取总参加比赛人数的一半。再复赛“银章”（银质奖章），取十名。最后复赛“金章”（金质奖章），分为打金章一选、二选、三选；三选胜了，参加金章决赛，最后分一、二、三名。以上各奖均有证书，打金章确非易事。

擂台是花会中现搭的高台，民国初期擂台外大书“柔术场”三字（那时许多人称武术为柔术）。20世纪30年代后则习称“第×届国术擂台赛”。

参观者需买入场券，擂台下有茶座卖茶，主擂者多为“四川武士会”“省国术馆”中的武林名手，但有时也邀请其他人士主擂，如1931年的打擂就曾邀峨眉山的“铁砂和尚”及湖北武当山的“云空长老”主擂。



民国16年第一次柔术场奖章（供图：王子玉）

比赛时，一般擂台四角各坐一位裁判；另外一名主裁判手拿小铜铃在台上，宣布比赛开始或暂停时则摇铃铛；有时还有执旗评判执蓝白小旗二面，蓝胜举蓝旗，白胜举白旗。如赛手间乱打胡扭时，则上前用旗隔开。

比赛争夺激烈。“上场不认父，举手见高低！”“擂台不认亲，只要拳头赢！”这是武林悉知的口头禅……比赛一开始，赛手们恶狠狠、豹眼怒睁，凶煞煞，钢牙咬紧；你进我退、拳来腿往；蹿蹦跳跃、腾挪闪转、吞吐浮沉……每对赛手一般打三个回合（三轮），以击打点数的多少、见红（打出血）、倒桩（倒地）、甩翻（打落或丢下擂台）等判胜负。

比赛实行淘汰制，三打二胜。规定不准挖眼、锁喉、摘桃（抓下身）；流血、倒地、下台、闭法（即丧失打擂技法）为全输。因习武者一般讲究武德、息气，加之亦有一定防护措施（如裁判发现双方技艺悬殊，则不许强方乘胜击打），故当场打死的情况罕见，筋伤骨折则时有发生……

除了打擂，有时还穿插有套路、器械等单人表演，行家们谓之“外场功夫”，以供交流和台下看客观赏。

比赛通常由省国术馆总务股负责，下分八个股：1.财务股。2.医务股，负责受伤比赛人员的医治。3.编配股，负责编签配对。4.检查股，检查参赛者有无暗器、是否剪短手指甲。5.评判股，即裁判组。6.交际股，负责内外接洽。7.招待股，负责接待远近来会的人员。8.售票股。此外，还有人专管擂台上摆设长短兵器的“威武架子”。

比赛时间一般两三个月，也有较短时间就结束的；也有从春节后赶“花会”一直赛到近端午节的。除青羊宫外，有时又在少城公园（现人民公园）省国术馆内比赛。

比赛一结束，夺得“金章”的自是一跃龙门、身价百倍，由主持擂台赛者将金章挂于胸前，然后骑上高头骏马，身披红色绸缎，依一、二、三名的顺序，打马逛街，前呼后拥，吹吹打打，鞭炮齐鸣，好不威风荣耀！还有专人飞奔前往获金章者的住家处或工作单位张贴烫金大喜报……其仪式气氛，与清朝考中武状元、榜眼、探花类似。

此后，获金章者的亲朋好友设酒席祝贺，获金章者多也设酒席回庆相谢。此后，获金章者还要向教授过自己武艺的师傅“封衣”（缝制全身新衣、鞋帽）或“封礼”（礼品或金钱），以示不忘师恩。

比赛惨败者情况自然相反：或垂头丧气，愧对江东父老兄弟；或皮肉受损，从此大彻大悟再不争气斗狠，偃武修文另寻路径；或怨天尤人、怒气填膺，发誓回家再精打苦练，待明年再来报仇雪恨……



青羊宫国术打擂以川军24军军长刘文辉名义赠发的奖章（供图：王子玉）

我所拜的一位师傅就曾打得金章，这是他一辈子最风光之事，解放后卖了金章还买了两间瓦房。而与此相对比的是我所知的另一位老拳师，解放前参加打擂被对手一掼锤（摆拳）打得下巴骨折，人虽没被打死，却落得终身面部畸形，羞提往事……

取胜因素种种

习武的人能打个金章，武林同道必刮目相待；金章本身很值钱，这些且不说，那时社会弱肉强食，大鱼吃小鱼，打了金章在武林中就变成了条大鱼。当时川军中，上至军、师级，下至连、排级，一般都设有武术教官，待遇都较丰厚，打金章者就可以堂堂正正受聘去当教官，也可受聘于机关单位，大、中学校，取得一个说起嘴硬的饭碗，还可被巨商大官聘为“镖师”。最不济者，也可以正大光明开设“武棚”收学费授徒，绝不致招人“说闲话”……

所以打“金章”既有名又有利。如连续两三年的打擂中都获得金章，还要将其大名刻于“少城公园”旁“四川省国术馆”门外石匾上，以示褒奖。

青羊宫打擂有时还举办“特别组”比赛，参加者都是历届擂台赛中打过金章的，这更是花中选花、强中较强。1948年的“特别组”打擂，武林高手刘新吾、余克俭获金章，代表四川参加在上海举行的第七届旧中国“全运会”，刘新吾获全国拳术第六名。1984年刘老师在简阳贾家场家里对本书作者谈起往事，还兴奋不已。可见武林中人把“打金章”当成孜孜以求的人生大目标。

决定胜负的主要因素是赛手的武艺水平，即所谓“一打功夫”。第二，因抽签配对存在偶然性，如抽签碰上比你重几十上百斤的壮汉，或你虽苦练十年，却一下碰上苦练二十年的高手，结果就有可能连“资格”都打不到，相反却可能连获“蓝章”“银章”……这即“二打运

气”。第三是所谓“三打人缘”：武林中拉帮结派的江湖恶习甚浓，赛手凭交情或“塞包袱”（贿赂）取得主持者暗中偏袒，如甲分明打中乙，裁判却可视而不见……

其他五花八门的名堂还多。我听老拳师讲：有一年比赛，成都西部有一个“刘一锤”（形容拳头刚硬，一拳就能获胜）的农民，在赛金章时与川军中一个手枪连长相遇。那连长自知不敌，头一夜找“刘一锤”进行“私约”：要他输给自己，许暗中重酬。“刘一锤”年轻好胜，次日擂台上毫不相让，那连长败阵。刚下擂台，“刘一锤”的师兄报信：“哥子，情况不妙，台下有许多手枪连的丘八！”结果，“刘一锤”连忙跳出青羊宫高墙逃跑，后面无数当兵的持枪追赶，幸亏刘轻功甚好才逃脱，未饮弹丢命！可见在旧社会，要纯粹靠武艺获胜是很困难的。

20世纪40年代后的兴衰

1940年秋，由成都市民众教育馆主办成都市第二届市民运动大会武术打擂，曾任中央国术馆理事长的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也前来参观。比赛结果，第一名景书堂（成都），第二名朱仲康（眉山），第三名卢从璧（资中）。

1941年3月，由省教育厅主办打擂。参加比赛人数有60多人，第一名景书堂，第二名徐德弟，第三名张福全。

1942年国术馆打擂不分名次，打得好的得优胜奖章一枚，上写“四川省春季劳军运动大会国术比赛优胜章”。

1943年打擂，时间一个月，参加人数有200多人，取前五名。第一名梁绍武，第二名陈用和（郫县），第三名张俊良，第四名吴柏林，第五名刘震南，均获金章。女子组取前三名，第一名曾淑伟，第二名陈淑萱（郫县），第三名尹国术（郫县）获得金章。

1944年打擂，参加人数300多人，分军士组和普通组。军士组第一名王俊杰，第二名王学如，第三名郑荣山，第四名何显荣，第五名张礼显。普通组第一名是朱仲康，第二名景书堂，第三名陈相如，第四名刘文龙，第五名张福全。

这次比赛主要由四川武林名家刘学渊、颜联五、叶海波、王道宗、张益生、朱甫臣等轮流评判；执旗评判是詹品三；名誉评判有太极名家李雅轩、查拳大师张英震及关宝光、朱国祯、郑怀贤（解放后

曾任全国武协主席）、王书田、张长海、李斌生八人。

本书作者看过景书堂这年得的金章，上方写的是："民国三十三年春季国术比赛大会冠军"，中间是四个篆字"发扬国粹"，下方是"四川省国术馆赠"。金章证书写的是："四川省物产展览会国术比赛大会金章第二名证书，右给景书堂，民国三十三年三月郭有守"……

1945年青羊宫打擂，时间一个月，参加人数有200多人，取前三名，第一名刘文龙，第二名吴世荣，第三名邵孝仪，均获金章。因军阀杨森又赠金章三枚，共六枚，故胜者都得"双金章"。

1946年春青羊宫打擂，参加人数有200多人，取前三名，第一名兰久成，第二名王兴安，第三名李孟常（本书作者师傅之一），均获金章。

1947年打擂，第一名是黄刚明，第二名方金山，第三名是陶光华，均获金章。紧接着四川省国术馆第二次全省国术选手选拔会开始省考，这是解放前的最后一次省考，规定必须得过金章前三名的才能报名，故又称"特别组"。共分三个组，参加打擂的有王远罄、王子成、谭仲伦（温江国术馆馆长）、刘新吾（简阳县国术馆馆长）、张绍柏、王学如、温玉堂、张俊良、余克俭、吴柏林、景书堂等共11人。打擂胜手是余克俭、景书堂，击剑第一名是王远罄，扎枪第一名是邓善堂。

1948年后，国民党政府风雨飘摇，"打擂"也终止了。

"轰隆隆……"炮声震动秦岭群山、剑门古道。1949年底，解放军几路攻进四川，11月30日，重庆解放；12月30日，解放军18兵团在贺龙统帅下浩浩荡荡解放成都。

解放军举行入城式的第二天，早晨约七时许，天寒地冻、树木萧瑟……成都体育活动中心少城公园楠木林中，一个膀粗腰圆的精壮汉

子脱去了棉衣，亮出了赤膊，同他的学生彭俊臣一起开始了一天的晨练。这汉子就是景书堂，成都国术界高手，他每天都要赤着臂膀撞打树子，以“铁臂”享誉武林……

景书堂“噼噼啪啪”用手臂狠打树身，口中“嗨嗨”运气……一会儿走来了三个气宇轩昂的人，后面还跟着两个雄赳赳、腰挂盒子炮的贴身警卫员，一看就知是解放军中“当官”的。为首的长着浓浓小胡子的人向景书堂走来，声音洪亮地问：“你在练功夫？是武士会的会员吗？”

景书堂转身一抹汗水说：“过去叫武士会，以后改成国术馆。国术馆每年举办武术擂台比赛时，有几百人参加，打完擂台花会结束后，人也就散了，平时国术馆只有勤杂工两人。”

小胡子朗声说：“我们共产党，是要大大提倡武术的，你去向国术馆的负责人说，叫他们去军管会登记，以后好开展武术活动。”他还用手抚摸景书堂硬邦邦的手膀子，夸赞说：“很棒！”

景书堂当时并不知道，这个解放成都第二天就跑到少城公园了解情况的小胡子，就是大名鼎鼎的贺龙；另一个是王维舟，两人都是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还有一个是贺炳炎，后任成都军区司令员、四川省体委主任。

1950年2月，青羊宫物产竞赛会（“花会”）又举办了打擂，参加的有二百多人，第一名张松林，第二名黎自根（年仅17岁），第三名郭涛，均获金章。



1986年3月“首届蓉城武术擂台赛”。主席台上为：（从左至右）刘震南、李孟常、车辐、景书堂

此后四川省国术馆举办的打擂赛到此终止，国术馆也被解散。1953年旧历六月十三日，成都市举办六项体育选拔会。其中有民族体育较技（即打擂），但这次是戴手套打中国式的拳术，形式同过去打擂相同，分五打三胜。主办人是成都市市长李宗林，地点在成都市体育场，中心设一木制擂台。评判长是郑怀贤。分男子组和女子组。男子组第一名景书堂，第二名胡绍义，第三名张绍清。女子组第一名冯素霞，第二名邱桂贞，第三名曾俊成。景书堂回忆说：“这次打擂是我打得最激烈最勇猛的一次，有三人受重伤……此后，西南区的体育选拔会就将此项目取消了。”

直至1986年3月15日，成都以“首届蓉城武术擂台赛”名义在成都提督街工人文化宫举行打擂赛，声称要恢复青羊宫打擂传统。本书作者作为国内一家体育杂志的记者对比赛进行全程采访，有行家评价这次打擂说：“看不到中国体育的人文精神，没得国术传统风采！”

近代闻名中国的成都“青羊宫打擂赛”，真成了绝响？

说明：本文资料来源，除下面注释外，主要根据刘新吾、景书堂、李孟常、刘震南等老武术家给本书作者提供的口述史料。本文曾作为专业论文发表于国家体育总局文史委员会主办的中国体育核心期刊《体育文化导刊》。

文殊院的前世今生

武担山下早期的梵呗声

每天无数中外游人来到红墙碧树、木鱼声声的文殊院古刹。但有多少人知道：这块佛门净土，正是2000多年前古蜀国的宫殿群落！

那历史太遥远，连大诗人李白也只能浩叹：“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我们如今大致只晓得：距今约3500年的夏商时代，古蜀国建立，延续了约1500年，前后有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等王朝。大约在2500年前，开明九世的臣民们，身披兽皮、麻片，赶着牛羊，在乘坐牛车的蜀王带领下，“呜呀、呜呀”地吹着苍凉的牛号角，把都城从广都樊安（即今双流中兴镇一带）迁到成都。

开明九世下令在成都从现文殊院街到南大街一带建起土城，今天文殊院街一带，就是开明王“王城”所在地；南门，是供古蜀王建宗祠的地方；西门则是墓葬区[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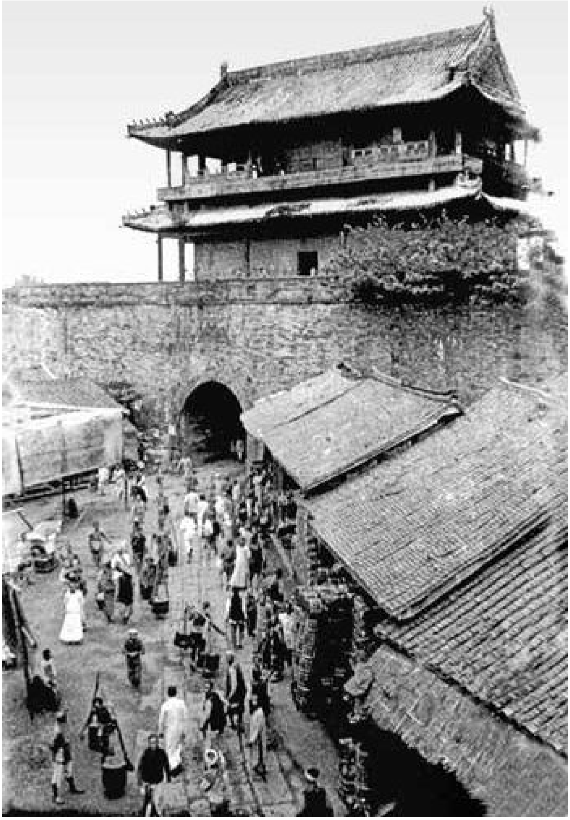
据《华阳国志·蜀志》说：这位蜀王很会享乐，修过珍珠为帘的七宝楼、鹦鹉舟，他还在武都（今甘肃省成县，另说绵竹、江油也有武都）找来一个美女当王妃，专门作《东平之曲》取悦她。但王妃不习水土，终于郁郁而死。开明九世伤心欲绝，在离现文殊院不过一箭之遥的北较场费尽民力大筑蜀王妃墓，后代称为武担山。

东晋哀帝兴宁三年（365），高僧法和入蜀弘法；安帝隆安三年（399），高僧慧持入蜀，佛寺大兴，四川佛教迅猛发展。隋末，四川一度成为全国佛学中心……[2]

宋代罗泌《路史》中载：梁武陵王萧纪曾在武担山“发掘得玉石棺，中有美女如生，掩之而建寺其上。”我认为：这句记载有极重要意义！它明确地告诉我们：早在六朝之梁朝萧纪时（552），武担山一带已开始建佛寺，寺名就叫武担山寺。从此，悠悠梵呗声响彻成都北门……

唐时，武担山寺很有名气。初唐四杰之一的诗人王勃在《晚秋游武担山寺序》中说：“鸡林俊赏，萧萧鹫岭之居……”鸡林，指佛寺，王勃盛赞此寺之秀丽，说这一带如佛所居之鹫岭，竹树萧萧。

在《全唐诗》第73卷中还有唐明皇时期苏颋写的《武担山寺》：“武担独苍然，坟山下玉泉。鳖灵时共尽，龙女事同迁。松柏衔哀处，幡花种福田。讵知留镜石，长与法轮圆。”这位当过益州长史的诗人深为世事沧桑佛法永存而浩叹……武担山上的石镜，圆形光洁，半埋土中，还被杜甫喻之为月轮、薛涛比之为妆镜。后经掘出，乃腰鼓形之大石。古蜀遗俗，墓前或墓顶立巨石，现称“大石文化”。所以，武担山寺历史上曾又名咒土寺[3]。



1911年时的成都北门瓮城内

今人每把武担山视为北较场中狭义遗址区域。其实，在清朝未修北较场以前，武担山一带一直是背郭临江之幽静旷野，它无疑包括现文殊院片区，乃北门名胜。因武担山为长形，中凹而东西凸出。此二凸出之处，又名东台、西台。宋朝诗人陆游就有“东台西台雪正晴”诗句。宋朝四川双流人郭印政和年间中进士，写有《登咒土寺东台》：“倚郭繁华地，斯游喜屡经”，说寺庙在繁华都市北门城墙边，所以人们常去游览……[4]

唐宋诗文中，还出现一个与武担山一带有关的寺庙，寺名很古怪，叫静乱寺。

据唐玄宗时当过中书令、封燕国公的张说在《卢舍那像赞序》里记载："武担山静乱寺，卢舍那丈六铁像者，沙门履彻为先妣用无价黄金之装也。彻师俗姓刘氏，青城真人知古之弟……"大意说：佛像是和尚履彻为已死母亲用无价的黄金铸造的。履彻的哥哥知古是青城山道士，而儒家又最讲孝道。儒、释、道融合在履彻一家中，故"张说闻其事而怿之，合掌西南，遥礼！"[5] 这说明：盛唐时期，静乱寺不但很有名，而且修建豪华。

唐代，帝王礼佛崇道，成都庙宇宫观林立，大慈寺、草堂寺、尧光寺、青羊宫等均兴建于唐，宏伟如宫殿。如大慈寺绵延东门半城，占地千余亩，到明朝仍常住僧众两万人左右。宋时建在今汪家拐一带的正法院，竟然占田万亩以上……[6]

我们似乎听见历史天空上悠悠震荡的金钟法鼓之声，为成都平添无穷的文化名城之神秘古韵。

---

[1] 《成都城市史略》，见吴世先：《成都城区通览》，成都出版社，1992年，第1页。

[2] 冯学成：《四川禅宗史概述》，载《巴蜀禅灯录》，成都出版社，1992年，第45页。

[3] 参见四川省文史馆编：《成都城坊古迹考》，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25页。

[4] 郭印诗转引自李剑国、任德魁：《"蒲氏漫斋录"新考》，《文学遗产》2004年第6期。

[5] 参见《全唐文·卷二百二十六·张说辑》。

[6] 参见成都历史文化初中乡土教材《四川历史》，及成都市城市科学研究会1987年内部出版的《名城成都的保护与发展》，第294页。

文殊院究竟建于何时

总投资达22亿多元，占地403亩的文殊坊，已在2006年10月1日开门迎客。2006年8月，国内各媒体纷纷载：“千百年来，文殊院香火不断，建筑风貌始终如一，历经了1400余年的岁月变迁……”[1] 我还不止一次地在香烟缭绕的文殊院中，看见一个个导游在向中外游人朗朗解说：“成都文殊院即古益州信相寺，又名信相院，相传创建于唐代，距今已1000多年……”

历史真相果真如此吗？

说“文殊院创建于唐代”的主要根据，当为《大清一统志》及嘉庆《四川通志·寺观》。其中说：文殊院即宋初妙圆塔院。嘉庆《成都县志·寺观》中也说：“即妙圆塔院，又名信相寺”。

但宋代黄休复《茅亭客话》中却说：妙圆塔院在大东门外，其地距文殊院很远。我在《龙泉驿区志》中查到，信相寺在隋唐之际建于今洛带镇，又曾名叫圣母院。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宋真宗下诏，赐名瑞应禅院，清嘉庆年间改称燃灯寺至今……而洛带镇恰在成都外东。我又在《蒲江县志》中查到：北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宋真宗敕赐蒲江原“莫佛院”为“信相院”，称“第一名山”……这些都与现文殊院所在地不符。[2]

所以有相当权威性的四川省文史馆所编《成都城坊古迹考》中说：文殊院即古信相寺或妙圆塔院之说“似亦未可深信。复按文殊院

现存文献，对上举两说，亦无法作确切之判断。晚明人之著录，亦不见文殊院之名。天启《成都府志·祠庙》谓有文殊院，但同时又谓在‘温江治北’，自与成都文殊院无关。”



清末寺庙内和尚们做法事时的情景

这实在让想把文殊院历史上溯得更久远的人们深感遗憾了！

我有相当理由猜想：武担山寺自隋、唐、宋后，在不同时期一定有不同名称。武担山寺既然曾经叫咒土寺，很可能上文说的静乱寺也是它的别称或俗称。一庙多名是惯例，如著名的大慈寺，直到如今仍被人叫为太慈寺、太子寺。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武担山寺也有可能一度改名为妙圆塔院、信相寺、信相院……但客观而言，这些都没有确凿史料为证。

我再仔细观看所藏的明朝《天启成都府图》，这张在1621年至1627年绘制的成都地图上，大慈寺、石牛寺乃至现今仍存的北郊昭觉寺等寺庙，都历历在目，却无武担山寺、静乱寺，更无妙圆塔院、信相寺的踪影，这说明：至少在明朝后期，现武担山到文殊院片区的佛寺早已凋零甚至湮灭了。

文殊院的“前世”，也许就是武担山寺，或是其附属小塔院，但这

些也仅仅是猜想。所以，报章中赫然刊载的“千百年来，文殊院香火不断，建筑风貌始终如一”之类生花妙笔，都是没有历史依据的，只是在辉煌的成都历史上增添破“补丁”。

我要实事求是地讲：确切可考的文殊院历史仅300来年——因为一位形容憔悴但眼神坚毅的杰出僧人，正从历史长卷中向我们迎面走来！

这就是慈笃超存海月禅师。他顺治十六年（1659）生于成都柳氏，自幼即由井觑和尚剃度出家，19岁时由昭觉寺丈雪和尚授比丘具足戒，后得法于重庆华岩圣可和尚。

这时，巴山蜀水血雨腥风，正是四川历史上异常惨烈的时代：1644年，张献忠破蜀；张献忠死后又有其余部及残明军队、清军、吴三桂……走马灯样在巴蜀反复“拉锯战”，一直闹腾了三四十年。

慈笃出生这一年，被清廷任命的四川巡抚高民瞻，身着戎装骑高头战马，在秋风瑟瑟中率大军刚入成都。眼前地狱般的情景让他瞠目结舌：“时成都城中绝人迹者十五六年，唯见草木充塞，麋鹿纵横，凡市廛閭巷，官民居址，皆不可复识！”城中两万多口水井，大都填满尸骨。几个残存的老和尚，在军营中找来些木车，从废墟中搬运尸骨出城，每天要拉几十趟，而城外已是“白（骨）山累累”……[3]

康熙二十年（1681），乱世中幸存下来的慈笃已22岁。他迈着沉重的脚步从峨眉山归来，从大安门（即成都北门）走到寂无人烟的武担山下。蒿草遍野，枯骨处处，满目疮痍……这不仅是四川百姓横遭屠戮的时代，也是巴蜀佛教惨遭灭顶浩劫之时。孤苦凄凉的慈笃，眼前浮现出师长们以凄惶之声讲述的一幕幕惨景：

顺治元年（1644），张献忠攻成都，大慈寺僧兵曾在府河边迎战，猛追张部（后世因此才留下猛追湾地名）[4]，张献忠因之对佛

门恼怒异常。此时大慈寺有僧千人，因该寺藏匿过明蜀王一位宗室，张献忠便将大慈寺和尚杀个精光，又下令兵卒对成都远近所有寺庙大开杀戒，一时间血肉横飞、杀声震天，众多寺庙悉化为灰烬，仅这年就杀成都僧众两千多人……[5]

慈笃又想起破山禅师忍辱弘法救人的往事：顺治七年，张献忠旧部李立阳屯兵涪陵，杀人如麻。破山劝其止杀，李说："和尚吃肉，我即不杀人。"破山答："公不嗜杀人，僧何惜一口。"遂食之。此后被执者，多因此得活。

狐兔出没的荒野蒿丛中，慈笃发现有数尊锈迹斑斑的铁铸神像和两株古杉树历劫尚存。这是何朝何代何寺的幸存物啊？慈笃顿时泪流满面，用颤抖的双手摩挲着神像……如电光石火在脑中闪耀，慈笃立下宏愿："身为破山禅师的嗣法弟子，我此生当振兴成都佛寺！"

他在两棵古杉树之间结茅为庵苦行修持，开始惨淡经营修建佛寺；随着城市的复苏和人口增长，慢慢慈笃的德声已传播远近。

于是，有了神奇的传说："师结茅于信相院荒址，时人见毫火遍锦城西北隅，咸疑失火，官兵疾询，而无火，众以为奇，依迹寻之，乃师坐处。"

传说越发神奇：远观慈笃居处红光中出现了文殊菩萨像！于是，康熙三十六年（1697）四川巡抚吉图尔、成都太守张文灿等人，发动官绅军民捐资大修庙宇，寺成初名信相文殊院，迎慈笃禅师当住持。吉图尔还将慈笃乃文殊显圣的稀奇事上奏朝廷。康熙皇帝得知后，三次传召慈笃和尚，慈笃均以有病为由婉拒。康熙四十一年（1702），康熙亲书"空林"二字匾额及御书《金刚经》《药师经》《海月》诗轴赐文殊院。康熙五十九年（1720）慈笃坐化，享寿61岁。[6]

可见，慈笃实为文殊院初祖，文殊院初建距今实实在在只有310

年。

---

[1] 参见《十一到文殊坊》，《天府早报》2006年8月2日。

[2] 参见《蒲江县志·社会风土·宗教》。

[3] 参见明朝末年华阳县知县沈云祚之子沈荀蔚：《蜀难叙略》。

[4] 参见陶亮生：《成都街名琐记》，载《成都掌故》第一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

[5] 参见欧阳直著《蜀警录》等。

[6] 参见《文殊院志初稿》，《巴蜀禅灯录》，成都出版社，1992年，第537～538页。

“人间佛教”——丛林

清道光年间，四川提督罗斯举又带头集资数十万两白银，重修已破朽的文殊院。48根大石柱，从金堂淮口镇运来，因城门窄狭，拆毁北门一段城墙才运入城内……文殊院由此成为名闻天下的“四大丛林”之一。

清朝历任四川官员为什么热心整修文殊院？

北门，历来为成都北出秦岭到京师的门户。清人入川最先恢复的便是北门外驿路，官员赴任也必从北门进入。所以清时北门李家巷建有“迎恩楼”，北门大桥又叫“迎恩桥”，取“皇恩浩荡”之意。为让外地人一到四川首府成都，就留下太平繁荣和安定祥和的印象以显治绩，封疆大吏重整北门应是当然之事。加之清代北门一带本是繁华之地：珠宝街、珠市街、金丝街、银丝街、白丝街等豪华商街，都集中在文殊院附近。正如已故陶亮生先生所言：寺庙道观也多集中在北门几条街内：真武庙、火神庙、五岳宫、白云寺、喇嘛寺、狐仙祠、文殊院、灶君庙、如是庵、文庙、楞伽庵、金沙庵、爱道堂……几乎每条街都有庙观，甚至一街有两座庙宇[1]。

寺院身处省城闹市，使文殊院片区蕴涵了太多“佛法在世间”的人文色彩，构成浓郁的成都本土文化。

与文殊院一墙之隔的武担山下，清朝后修成北较场。清兵从北较场到大安门（北城门）来回都要经过文殊院街。在《成都竹枝词》

中，常可读到小和尚们溜出庙门，瞪大眼珠子去看那些演武的奇形怪状的兵卒：“氆氇马褂氆氇袍，手持弓箭带腰刀。鸟枪背得沿街走，定是营中演大操！”“堂堂鞭辔马闲闲，趁值天晴出北关。洗炮健儿排队去，笑言今打凤凰山！”



文殊院寺庙大门


文殊院寺庙附近的文殊巷

四川考武举之地也在成都北较场，乡试时遍设“武棚子”。文殊院街平时很冷清，武考时市民都涌来游乐观看，人头攒动十分热闹。《锦城竹枝词中》说：“北较场考武举人，文殊院侧武棚邻。闲时芳草行刑处，秋夜萤飞讶鬼磷。”诗作者杨燮诗后自注云：“武生每到科

场年进省，操演处各武棚子，自文殊院到北较场，比邻而居。又，北较场系犯人决罪正法处。”

原来清朝中叶后，刑场就在北较场。较场口有一小桥，因人犯至此已吓得尿湿裤裆、丧魂失魄，故叫“落魂桥”。名不雅，后曾改成“落虹桥”[2]。想必杀人角号“呜呜呜”凄厉吹响、犯人被“砍脑壳”之时，文殊院内的木鱼也正“哔剥哔剥”敲打得一声比一声紧……

清时，成都法会多集于此寺。如每年农历七月十四是中国传统中元节，又称盂兰节，也称鬼节。文殊院和尚照例要大做法事超度亡灵，所以竹枝词中留下了半夜三更烛火映天的生动情景：“三更放戒正临街，台上高僧慧眼开。焚起托生符万片，孤魂野鬼一齐来！”

文殊院得到从皇帝到地方官员的大力护佑，香火旺盛且有大量田地出租，僧侣生活优裕。一些和尚也附庸风雅，艺本平庸却乱以诗画邀虚名，嘉庆时有竹枝词写道：“文殊院内际微僧，字体龙蛇浪得名。画竹马辰画马杜，千秋总是有公评。”清咸丰乙卯年吴好山（1855）出版的《笨拙俚言》中也写道：“大厦高楼四望环，收来租谷堆一山。袈裟一领安居食，四百僧人得安闲！”[3]

闹市中的文殊院，目睹了历史风云变幻。光绪二十九年（1903）四月初八日，成都出现最“新潮”的一幕：乘车坐轿来的一百多个放脚太太和反对缠脚的先生们到寺中隆重开会，在成都文殊院成立起“放足会”，这给封闭的古城吹来一股破除恶俗的春风[4]。

抗日战争时期，北较场成了黄埔军校。《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雄壮歌声时时飘到文殊院。日军轰炸成都历时5年，以昌园法师为首的四川佛教会僧人们，本着慈悲救世宗旨，自动组织“僧伽救护训练班”，在文殊院紧张集训后，英勇奔赴爆炸声声的空袭现场，不顾生命危险救死扶伤……



民国时期设在武担山下的黄埔军校，与文殊院近在咫尺

1938年1月21日，出川抗战的川军将领刘湘病死武汉，灵梓运回成都后较长时间暂厝文殊院，由寺僧做法事超度祭奠[5]。炮火连天的抗战中，印度大使、美国援华空军“飞虎队”陈纳德将军等外国友人，都曾到寺中一聆法音……

岁月如水，30多年弹指过去。再逢盛世，近年我常游此处。文殊院街出售香烛、纸钱、花圈、神龛等宗教、殡葬用品的竹棚摊子鳞次栉比。寺门前常有瘸腿、断手、瞎眼者向人乞讨，还有阴阳怪气的江湖卖卦算命者流。叫卖声、乞讨声、解签声，伴随红墙内铛铛钟磬声……短短一条街，生和死、乐与苦、庄严佛法和红尘世俗，糅合得如此和谐、如此从容。

2006年10月，寺外文殊坊建成了，这无疑是成都城市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庄严佛土文殊院的钟声，或将悠悠飘荡千年不绝……

---

[1] 参见陶亮生：《成都街名琐记》，载《成都掌故》第一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

[2] 参见周询：《芙蓉话旧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

[3] 参见《成都竹枝词》，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

[4] 参见张达夫：《清末的“维新变法”在成都》，《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120页。

[5] 参见郑光路：《川人大抗战》，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

一百年前的成都人“过年”

杀年猪、腊八粥和吃“祷牙”

常有人感叹中国传统民俗文化变味，如今春节已不中不洋：十亿人看一台“春节晚会”、打麻将、海吃狂饮、外出旅游……其实，中国人的“过年”，更多体现的是人与人、人与大自然的高度和谐。本文作者的祖父讲述的一百年前成都一家人过年的情景，就是一幅真实而生动的民俗风情画。

公历1902年1月10日，农历辛丑年十二月（腊月）初一。成都椒子街，一家黑漆公馆沉重的大门“呀”地打开，一个30多岁的男子走出来，站在斑驳的石狮子旁。见远处有性急的儿童已在放小鞭炮，他叹了一声：“啊，黄老幺欠我的烂账还没收回来，就要过年了！”

这男子就是我爷爷，脑壳后拖着的猪尾巴辫子油光铮亮——这时是光绪二十七年，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还坐在龙庭上呢。

为过年，我爷爷早就忙乎起来了。每年“立冬”后，家家户户“杀年猪”腌香肠、腊肉，不单农村到处肥猪悲声嘶叫，城内也常见到又白又胖的大肥猪被开膛破肚的情景。我爷爷家后院厨房每年用残汤剩水喂一两头猪。这时他吩咐下人：“杀猪这天要按十二属相，不能和我家中任何一个人的属相相同！”

选好日子，猪被按在结实的矮脚板凳上。杀猪匠鬼板眼多，他两手紧按猪头，一副不能脱身之状。看热闹的小娃娃往往会把杀猪刀递给他。杀猪匠低声嘀咕道：“猪大爷，不是我要杀你哈，是递刀的叫

老子杀嘛！”

“杀年猪”时主人家只允许杀一刀，如一刀不死，预示来年不顺。很顺利，猪一刀毙命！我爷爷笑眯眯地用一张草纸在杀猪的刀口子上蘸点血烧化给猪，作为它西归路上的“买路钱”……

于是我爷爷屋檐下密密麻麻吊起一串串或乌黑或红亮的腊肉、香肠……他吧嗒吧嗒抽着水烟，心里盘算：“过年时要先吃猪头，一年才会开个好头。婆娘家不要吃猪舌头，以免多嘴多舌。唔唔，小娃娃嘛，多吃猪耳朵，才听大人的话……腌猪肚子嘛，留着五月端阳再吃，吃了以后不会肚子疼！”以上这些都是先人遗风，也不知是确有道理，还是“合理分配”和勤俭持家的经验？

不论贫富，都讲究新年穿新衣。腊月，我奶奶忙着为全家做新衣新帽。腊月初八吃“腊八粥”，我奶奶一大早就亲自下厨烧粥。娃娃们用筷子数碗里面的莲子、栗子、枣子和花生米，看谁运气好。

“腊八”后，“过年”日近了，气氛也日浓。市面熙熙攘攘、行人慌慌忙忙，准备年货、打米酥、蒸年糕、送年礼、点百果灶、贴春联和“喜门钱”……我爷爷开的“老元吉”绸庄也开始“大拍卖”，他把“年关在即、止账候收”的告白贴在黑柱上。连街上拖襟襟挂绺绺的讨口子脸上也喜气洋洋，因为不但几个慈善会在这时都要施舍可领钱米的“钱飞飞”和“米飞飞”（票单子），连天仙桥街“粥厂”施舍老弱病残的清汤稀饭也稠了许多！

腊月十六日，是“祷牙”（又叫“倒牙”）日。一般贫穷百姓每月初二、十六两天才能开荤吃肉，幽默的四川人把这种偶尔开荤比喻为隆重祭祀鬼神，名曰“打牙祭”。腊月十六日的“牙祭”就称为“祷牙”日，我爷爷这天照例要请店铺中的伙计们吃顿肉。

几大块回锅肉下肚后，我爷爷挨个敬酒：“孙长顺、胡水长、李

宏兴……明年好好干，我不会亏待你们的！”这几人立刻兴高采烈。

我爷爷又给陈二娃斟满高粱烧酒，笑呵呵说：“二娃啊，你今年也辛苦啦，但小店池小难养大鱼，过年后另请高就吧！”平时有点“啰嗦”的陈二娃霎时成了苦瓜脸，晓得这是“最后的晚餐”，来年的“饭碗”已打烂了！

“祷牙”日的下午，繁华的东大街上出现不少酒足饭饱却又垂头丧气的“陈二娃”们……

“祷牙”日后，成都少城外“将军衙门”、督院街等处官衙也“封印”不办事了，所以这天又叫“倒衙”。戏班也在这天后“封箱”，明年正月初一才又演戏。

这时，街面上会出现一些奇形怪状的端公道士、尼姑和尚，他们或敲木鱼，或打铁盘，叮叮当当挨家挨户讨钱，嘴里念念有词：“过年过年！消灾除邪！”我爷爷见这些人大都是闯州吃府的野僧妖道，便不想给钱，可你不给他不走，“叮叮当当”一声比一声敲得紧、敲得响，而且那架势像要硬闯进大门，我爷爷吓得赶紧掏出一大把铜钱，换了几张揩屁股手纸般皱巴巴的“祛邪符”，野僧妖道才嘟嘟囔囔地走了……

“祭灶”和“辞岁”



旧时过年“祭灶”用的灶神图

随着“红萝卜蜜蜜甜，看着看着要过年”的童谣声，满街小娃娃“嗡嗡嗡”的“响簧”（竹簧）声，哔哔剥剥的“巴郎鼓”声和呜嘟嘟的铁皮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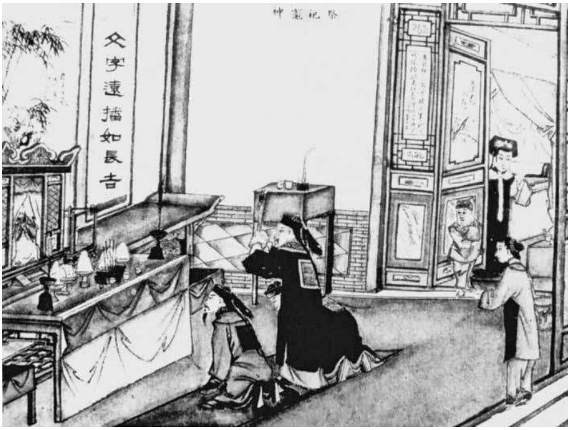
号声……过年进行曲即将奏响。

腊月二十三、二十四日是“祭灶”日，通常“官三民四”，做官的在前，平民百姓在后。灶神又称灶王爷、灶王菩萨，全称是“九天东厨司命灶王府君”。晚上，家家户户吃过晚饭，把锅灶打整干净，在锅中放一盏油灯，为灶王爷升天引航照路。我爸那时还是个流鼻涕小娃儿，乱开黄腔道：“对泥巴灶台还兴磕头呀？”我爷爷骂他道：“胡说八道，灶王爷是‘祝融’转世，每年这时候上天向玉皇大帝报告家家户户的善恶，安排每家人来年吉凶祸福，功夫了得呢！”

我爷爷把还散发着油墨味的彩色灶王菩萨神像，恭恭敬敬地贴在灶台上，柱头上也贴出对联：“上天言好事，下地降吉祥”。灶台上还供奉着一大盘捏成宝塔形、饰以金银纸图案的“灶糖”，就是现在还有人叮叮当当叫卖的白麻糖。接着点上香烛、摆上酒果。



旧时过年“祭灶”用的灶神图



清末一官员家过年时“祭灶”的情景（出自：清末《祭灶图》）

我爸忍不住又说：“我吃白麻糖要粘牙齿，吃了话都说不出来哩。咋个灶王爷也要吃它嘛？”我爷爷忍住笑，正色说：“瓜娃子，就是要粘住灶王爷的嘴巴，不要上天去说我家坏话嘛！”

我爷爷把从街市上买来的“灶马”“灶述”（即木板雕刻印刷有马和银钱的黄纸符）焚烧了，对我爸说：“‘灶马’‘灶述’是送给灶王爷的坐骑盘缠！”我爸问：“纸做的‘灶马’又不是麻雀儿，能上天嗦？”我爷爷也不理他，只顾跪拜祷祝。

我爸当然也撅着屁股蛋跟着磕头。仪式刚完，小娃娃们把和了纸灰的干黄豆、草屑撒向屋顶，嘴里乱吼：“灶君老爷，吃了糖，骑马马上天了！上天了！”

我爷爷说：“大年三十灶王爷在玉皇大帝那里‘述职’完，才会又骑纸马回归千家万户。”

少年时的我听爷爷翘起白胡子颤巍巍地讲的这些老古董，很莫名其妙。现在似乎明白了：“祭灶”貌似“迷信”，其实是老百姓一年之末的“自我检讨”，是每个家庭“自我约束”的优秀民间习俗啊！

腊月二十四日，家家户户还打扫“阳尘”，做大扫除。从“祭灶”日起，公馆人家、商铺也开始更换“桃符”（对联）。公馆大门大都悬“桶灯”一对，外罩红油纱绸。爆竹之声从此响声不绝……

腊月底是所谓“年关”，当收当付的账，都要在年三十晚上结清。因为过年中是不许逼债的。清末筱廷写的《成都年景竹枝词》：“褡裢账簿带身旁，飞子沿门散去忙。一到临年三四日，敲人门户令人慌！”“乍见官衙结彩新，自愁无计了清贫。商量入市买柴米，门外先来索债人！”[1]“年关”，对有些人真是难过的一关！

所以，除夕这天，因准备过年及收债，全城忙碌，四城门及各街栅栏，按例均彻夜不关，爆竹之声无片刻间断[2]。

我爷爷这几天忙得团团转，因为“黄记成衣铺”老板黄老幺铺子垮杆，还差欠我爷爷30大洋衣料钱，他便外出避债和我爷爷捉起“迷藏”来。

大年三十了，我爷爷家门神、春联、“福”字都贴起了，还高挂起红彤彤的大灯笼。堂屋正面神龛上点起一对大红蜡烛和三根拇指粗的香，中梁下吊一盏灯火跳跃的“神灯”……“团年饭”是一年最隆重之时，杀雄鸡、煮猪头供祖先；鸡鸭鱼鹅几盆几碗摆满饭桌。穷家小户也总有一碗回锅肉、一盘肥腊肉、一盆萝卜汤。

讨口子这一天也过的是神仙日子，成都九眼桥、东门大桥桥下，河滩上有一排歪歪倒倒的用破席碎布搭成的小窝棚。几十个乞丐散在河滩上，用鹅卵石支着破砂罐，将行善的人给的槽头肉和高等级的残汤剩饭回锅，只听得枯枝败叶、碎纸片烧得哔剥响。火光映照着蓬头垢面的人影，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瘸有驼……那情景倒也其乐融融。

这天，我爷爷却坐不住了，说：“不行，我要去收黄老幺的烂

账。这龟儿抽大烟、又滥赌，他赊欠的布料款怕要打水漂！”他急急忙忙跑到离大慈寺不远的棉花街，黄老幺七歪八倒的破笆笆门上贴了一副对联：“穷、穷、穷，我家穷！富，富，富，你家富！”我爷爷一读，急忙吐口水：“这龟儿在讨人家‘口彩’，要念的人穷，反祝他富！”竹笆墙上还贴了张纸条：“太公在此百无禁忌，想收欠账明年再说。”我爷爷敲门无人应，黄老幺早杳如黄鹤了！

我爷爷无法，回身走到老城墙边杂草丛生处，隐约见有个人影蜷缩成一团，还有一点幽幽鬼火晃动。我爷爷一怔，猛地大叫：“黄老幺，你龟儿躲在这旮旯头抽大烟当活神仙！”黄老幺一跃而起落荒而逃。我爷爷气得大吼：“你龟儿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



古时一家四代人除夕夜守岁时其乐融融的幸福情景（出自：清《新年夜宴图》）

吃年饭，是除夕夜必不可少的项目。我爷爷气喘吁吁赶回家，带着儿女向“天地君亲师”和列祖列宗的灵牌磕头……到处是鞭炮声，家家户户祥和快乐。我爸在噼噼啪啪声中接过“老辈子”的“压岁钱”，压

在枕头下，“压岁”谐音“压睡”。他欢喜得手舞足蹈，坚持要和老辈子“守岁”。我爸和其他娃娃们吵吵闹闹开始掷“升官图”。这是一幅毛边纸石印、约二尺见方的“升官图”。玩时，每人轮流转四周写有“德”“才”“功”“庄”的小陀螺，根据陀螺倒下时所亮出的字决定升降。我爸爸从白丁慢慢“升”到童生、秀才、举人、进士，眼看中了“状元”要当宰相了，眼皮却不争气直打架，只好由我爷爷哄着去屙了一大泡尿，上床接着做黄粱美梦去了。

放鞭炮是为“驱邪”。到了午夜，接连不断的爆竹声噼噼啪啪响如惊雷，连空气中也弥漫着浓浓的硝烟味……清朝《蜀中新年竹枝词》说那时的风俗是：“过年火炮响连天，纸说全红子说千。就是贫家生计薄，朝朝也放霸王鞭！”[3]

---

[1] 本文所引竹枝词，均见《成都竹枝词》，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

[2] 参见周询：《芙蓉话旧录》中“度岁”条，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

[3] 本文所引竹枝词，均见《成都竹枝词》，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

从“走喜神方”到“游百病”

大年初一天刚亮，众人从一夜未停的鞭炮声中醒来。大人娃娃都是从头到脚一身新，人人喜气洋洋。一家洗漱刚完，我奶奶即送上每人一碗红糖汤圆，口中连说：“甜甜蜜蜜，团团圆圆！”

过年气象果然不同，连“老虎灶”凌晨除卖“元宝开水”外还免费供热水。大商铺关了门，做小生意的摊贩生意却特别好，专卖小孩子的钱，如甘蔗、橘子、面食、糖人、凉粉、花炮、响簧、小灯、大头和尚、戏脸壳、灯影、风车车……街头巷尾，连平时有仇怨的人见面都要拱手作揖，连声“你好你好”“恭喜发财！”

我爷爷笑呵呵地对我爸说：“乖乖，你今天也不要耍疯了！大年初一也有禁忌规矩，这一天不能动针，因为‘针’和‘争’谐音；不能吃豆，因‘豆’和‘斗’谐音；不能看书，书就是‘输’。也不许说啥子‘死’‘鬼’‘霉’‘惨’这类字眼……大年初一不能扫地，不能把垃圾倒到门外去，以免财气外溢。更不允许吵架哭闹，流马尿水（指眼泪）！”

我爸淘气，问：“那连‘屙屎’也不能说呀？那我想屙——咋个说嘛？”

我爷爷只好不理我爸，站在大门外，笑呵呵抽着水烟看过年街景。讨口子一拨又一拨走过来，有的在唱“莲花落”：“过年你发财，元宝滚进来。滚进不滚出，金银堆满屋！”有的在打“金钱板”：“屋前栽有摇钱树，家头安有聚宝盆，树上铜钱成串串，聚宝盆里堆金

银！”过年也是讨口子们的“黄金季节”，要从初一讨到十五……我爷爷早准备有散碎铜钱，天女散花般乱撒，讨口子们在地上抢得呼儿嗨哟！



清末过年时人们见面互相“拜年”作揖的情景

突然，门口俨然站了一位神道，吓了我爷爷一大跳！原来当时旧风俗：正月初一这天，常有人头戴官帽、身着红袍、腰系玉带、脚蹬朝靴扮成“文昌帝君”的“文财神”；或者金盔金甲、嘴挂长须扮成财神菩萨赵公明的“武财神”；还有的又扮成“春官”。这些“财神”“春官”进项比讨口子高得多，但准备戏装也要花些本钱。装“财神”者常是无法度日才走此末路的，往往为人不齿。所以《成都年景竹枝词》中嘲讽说：“乞儿得意做官时，袍带乌纱手内持。说过千门恒炫耀，春官常挂嘴唇皮！”[1]

此时站在我爷爷面前的“财神”更是不伦不类：他头戴瓜皮小帽改成的官帽，身穿皂袍，墨水把脸染得漆黑，颔下一副黄须是苞谷须；右手高举一根金鞭，是一截烂甘蔗包了层黄纸做的；左手托着一个烂瓷盘，放了金银锡箔纸做成的像金元宝又更像黄狗屎的东西……

这“财神”站在我爷爷面前，不说话、不告求，精瘦的脸上两只眼直呆呆看着人。原来“财神”送宝不能说话，开口就不灵。我爷爷忙掏出枚相当二百文的大铜钱放在他的烂瓷盘里。“财神”嫌钱少不肯走，堵在门口。爷爷只得又添一些，他才蹒跚离去，又到第二家门口站立……我爷爷心头嘀咕：“这‘野财神’好像有点面熟，他是谁呢？”

过年时还有“放炮”“拜年”“打闹年鼓”“敬财神”“迎喜神”“飞名片”“耍龙灯”“耍狮子”“听扬琴”“听相书”“请春酒”“走喜神方”……许多快活娱乐，其中以“走喜神方”最隆重。“喜神方”，即“喜神”所在方向，每年新“皇历”注明新一年“喜神方”是东方、东北方或西南方……成都武侯祠、丁公祠、望江楼、青羊宫，都是“走喜神方”的好去处。

初一，我爷爷带全家到武侯祠“走喜神方”。过老南门大桥，就有许多溜溜马供人雇来骑。一路尘土飞扬，许多轿子、鸡公车（独轮推车）嘎吱嘎吱满路响……到了武侯祠，有身份的官、绅、商、贾多半在大花园的游廊过厅上吃茶观景。我爸爸像所有小娃儿一样，一进山门，就向遍地摆设的临时摊头跑去，转糖饼、吃豆花，还有小春卷、炒花生、红甘蔗、牧马山的地瓜……肚皮就像潲水桶。我爷爷忙说：“娃娃，看吃坏了肚子！”

我爷爷牵着我爸随着密密麻麻的善男信女向塑像磕头礼拜。游人们尤其要在诸葛殿向孔明老先生求一注签，男男女女各人占卜不同：“今年运气好吗？”“我幺妹婚姻大事如何？”卦摊前生意兴隆，正像李劼人先生小说中写的：“几十个道士的一年生活费，全靠诸葛先生的神机妙算！”

大殿下面甬道两边，是“闹年锣鼓”队伍比赛之处，有几十伙队伍。“闹年锣鼓”是古人“击鼓驱疫疠”的遗风，奏响春节的高潮……（2004年后，武侯祠新添有“喜神方”巨石，但游人多不解其意）

初一这天，老百姓、官衙、商铺还彼此贺年。清末周询《芙蓉话旧录》中说：“除至亲密友需亲到外，余多遣人投名片。当时名片以红纸印刷，长四寸许、宽约三寸，名字如胡桃大。铺户无司阍人，投片者皆随带糨糊少许，将片粘悬其门外，以示曾到……”[2] 礼到即行了。

大年初二后，我爷爷忙着到至亲好友处“拜年”。《蜀中新年竹枝词》中说：“队队衣裳簇簇新，相逢道喜贺新春。无愁百岁唯今日，醉里何须谢主人！”[3] 我爷爷天天都喝得个酒气熏人。

正月初五是“牛日”，又是“送穷日”。我爷爷一大早就把两双旧鞋子扔在椒子街上，让讨口子拾去穿，他得意扬扬地说：“有些人只倒烂垃圾、甩烂草鞋‘送穷’，我送了穷又做了好事！”他又到后院河边捡了个漂亮的鹅卵石充元宝藏家中，讨个一年好兆头。

初五以前，街衢游人如织，城内如骆公祠、丁公祠等处，一律开放[4]。

初五这天，是新嫁娘回娘家的好日子，我爷爷出嫁几个月的大女儿凤姑回来了，一家人又忙乱一番……

正月初七叫“人日”，成都人这天要去游杜甫草堂看梅花。此风相沿，听说已历史久远了。所以《锦城竹枝：词百咏》中说：“梅花风里来春阴，尽向公园品碧沉。人日好寻香艳在，环肥燕瘦总留心。”[5]

正月初九，又叫上九，相传这天是玉皇大帝的诞辰，要耍狮子、舞龙灯为玉皇祝寿。周询《芙蓉话旧录》中说：“初九夜起，春灯彩

胜、同时齐出，负龙曼衍、到处游行。繁盛街道，大都有牌坊灯，细木作架，髹以金漆，上段幂以细纱，绘说部杂剧，中置灯烛，间三四十步，即安放一架。尤以东大街者为最精致，灯上绘三国演义全部，人物栩栩如生，十五后，始逐渐撤销……”[6]

最热闹的东大街、科甲巷等处，每晚火树银花、热闹非凡。《锦城竹枝词》说：“府城隍庙卖灯市，科甲巷中灯若干。万烛照人笙管沸，当头明月有谁看？”

当时《成都年景竹枝词》中也夸赞：“花灯大放闹喧天，狮子龙灯竹马全。看过锦城春不夜，爱人唯有彩莲船。”这风俗演变至今，成了年年举办的“成都灯会”。

我爷爷走东家串西家，已累极了，正像《成都年景竹枝词》中说的：“茶点才过又酒盘，接连摆饭吃三餐。腌鸡腊肉已嚼遍，都说连日胃不安！”[7]



清末春节闹市灯会图景（出自：《点石斋画报》）

一直忙到正月十五日，即元宵节，要“观花灯”“烧龙灯”“舞狮子”“猜灯谜”“吃元宵”（汤圆）……

十多天的“年”匆匆过完，留下一句老话：“大人做生意，娃娃捡狗屎！”说的是该各干正事了。但成都人恋恋不舍，还要“过厚脸皮年”。正月十六这天，要爬上城墙去“游百病”，其实就是登高踏春。

我爷爷一家人走到武城门城墙下，见围了一大堆人，一床破席子遮了个死人。围观的人议论纷纷：“唉，他不学好，抽大烟又滥赌，牌九、麻将、压宝……样样都来！”“他生意做垮了，婆娘跟人跑了，还欠一沟子烂账！”“这龟儿子没法，只好去装‘烂财神’，要的钱刚到手，又去狂抽滥赌。钱光了，大年十五又冷又饿死在这里！”

我爷爷揭开破席子一看，惊叫起来：“哎呀，这不是欠我烂账的黄老幺吗！”

---

[1] 本文所引竹枝词，均见《成都竹枝词》，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

[2] 参见周询：《芙蓉话旧录》中“度岁”条，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

[3] 本文所引竹枝词，均见《成都竹枝词》，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

[4] 参见周询：《芙蓉话旧录》中“度岁”条，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

[5] 本文所引竹枝词，均见《成都竹枝词》，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

[6] 参见周询：《芙蓉话旧录》中“度岁”条，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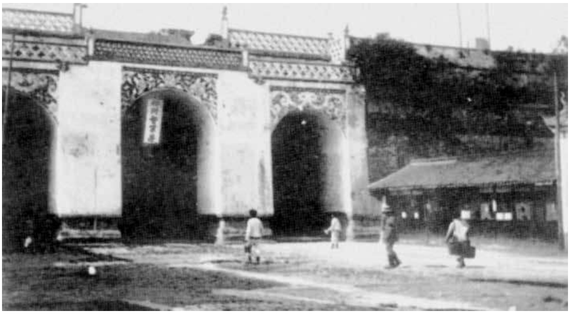
[7] 本文所引竹枝词，均见《成都竹枝词》，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

成都的“老皇城”

如今，当人们经过车水马龙的成都天府广场，来到高大巍峨的省展览馆前时，会有多少人知道，这里就是老成都人为之魂牵梦绕的“老皇城”？

杂花碧树，隐隐约约红墙蜿蜒，墙内黄瓦朱檐，宫阙殿堂森森，金碧辉煌……这是我在20世纪60年代初看到的“老皇城”的情景。

公元前316年秋，秦惠王派张仪、司马错攻入蜀国。张仪、张若于公元前311年在成都筑墙建城，周长十二里、高七丈，是当时仅次于咸阳的大都城。后人以此为成都建城日，距今已2300多年。此后大城内又筑小城，故成都又分为大城、少城、罗城、锦官城等。



1920年前后的“老皇城”蜀王府城门，上挂“四川督军府”招牌（出自：《成都城市规划与建设》）

历代传说三国刘备的金銮殿就是“老皇城”，但这点史书未确载。可信的是，唐末五代的前后蜀国的皇城，实实在在就在这里。

前后蜀国修“老皇城”后，这里长期为巴蜀政治、经济、文化的中

心。“老皇城”时而崔巍宫阙龙凤旌旗，赵女吴姬笙歌彻夜；时而漫天战火杀声四起，城摧墙毁虎狼栖身……

朱元璋成了明朝开国皇帝后，于公元1378年封第十一子朱椿为蜀王。这时，元末兵燹早已毁了“老皇城”，而西南尚未安定，仍有土司作乱。朱元璋在洪武十八年（1385）降谕景川侯曹震：“蜀之为邦，在西南一隅，羌戎我所瞻仰，非壮丽无以示威，汝往钦哉！”

曹震奉旨，自1385年起在成都大城中“皇城”旧址，开始修筑“壮丽”的蜀王府。王府外设四大门：东边叫体仁门，西边叫遵义门，北边叫广智门，南边叫端礼门。

历时五年才修成的蜀王府，被川中百姓习称为“皇城”。“皇城”坐北朝南占地数千亩，在武担山之南，筑“砖城”周围五里，高三丈九尺，城下蓄水为濠，称“御沟”或“御河”，外又筑“萧墙”，周围九里，高一丈五尺。据《四川志》《四川总志》及《乾隆图》载，王府“萧墙”，南垣在今东西御街一线，东垣在顺城街一线，北垣在羊市街、玉龙街一线，西垣在东城根街一线，可见蜀王府占地甚广……[1] 成都于是有了内、中、外三重城垣。

蜀王府从南至北有承运门、承运殿、圆殿、存心殿、王宫（内为蜀王寝居正宫），鳞次五重大殿，层峦叠嶂，雕梁画栋。大殿四周楼台亭阁、山石花草，皇城四周红墙包绕。



“老皇城”内场景

承运门外乃端礼门，有条横贯成都的金水河直通护城御河。金水河上有三座三孔气势雄伟的汉白玉石桥，桥南左右有一对巨大威武的石狮和石表柱（其位置大致应是现在东、西御街稍南侧），尽现皇家宫廷建筑威仪……

金水河桥南正对王城门洞，有条笔直的宽百尺以上、约一华里长的甬道（御道），两侧松柏森森通街道民居。甬道尽头，是道二十余丈长、三丈来高的砖墙“石屏”，涂成红色，名为“红照壁”（此街名今犹存）。[2] [3] 说起修蜀王府，还有个故事。朱元璋派太监康泰宁来督修，康泰宁晓得朱元璋最宠朱椿，故修蜀王府之制全模拟京师。为修城墙大量取土又因之形成了御河，外通金河内连旧皇城的摩诃池，修建王城的原料，也通过此河运到……因成都土太软，筑城之基土还要从汉中传驿运来……一根根蟠龙楠木柱子，每根几千斤重，全由百千里外大山中伐出，再千辛万苦运到成都。足足五年，银子花得淌水一样。

这难免引起地方生怨，闹得朱元璋晓得了，以为康公公中饱私囊，便龙颜大怒，派人到成都赐康公公一杯毒酒！康公公死后，朱椿命人查账，每笔账却清清楚楚。朱椿心中甚为不忍，便修了一座康公

庙，祭祀康公公，从此有了条康公庙街。至民国时改名为“康庄街”，至今街名仍存。[4]

嘉靖十五年（1536），巡抚都御史吴山、巡按御史金粲上奏朝廷称颂蜀王朱让栩功德。嘉靖皇帝下旨嘉奖，并亲题“忠孝贤良”四字，在“红照壁”附近又建了一座极高大的“忠孝贤良”坊。贤良坊外即十字街头，又矗立几座褒扬前几代蜀王贤德之巨坊：东南方有上书“益懋厥德”的石坊，东北方有“永慎终誉”的石坊，西南方有“江汉朝宗”的石坊，西北方有“井参拱极”的石坊……都极巍峨华丽。[5]

这就是约400年前天府广场一带的风貌。

1644年，张献忠杀进四川，在“老皇城”建立大西国。1646年秋，张献忠自知大势已去，干脆把成都彻底弄烂。当时人费密在《荒书》中记载：“焚蜀王宫室并未尽之物，凡石柱庭栏皆毁。大不能毁，则聚火烧裂之……”“老皇城”大殿修得牢固，尤其是两根蟠龙石柱名“擎天柱”烧不烂。清代彭遵泗撰《蜀碧》中记述：张献忠煞费苦心，命令士兵“取纱罗等物杂裹数十层，以油浸之。三日后举火，烈焰冲天，竟一昼夜而柱枯折……贼毁藩府，又尽毁宫殿，堕砌堙井，焚市肆而逃。”



民国时期皇城内明远楼

随同张献忠的外国传教士利类思、安文思目睹：“献忠由川往

陕，离成都时下令将皇宫焚毁。嗣在城外见浓烟腾空，火光烛地，大为狂喜。复令将全城四面纵火。一时各方火起，公所私地，楼台亭阁，一片通红，有似火海。大明历代各王所居之宫殿与及民间之房屋财产均遭焚如。转瞬间，川中首城已成焦土！”[6]

2004年7月9日，成都天府广场地下7米挖出一块被火烧过的“龙爪”，重达一百余斤，是明代皇城建筑物上龙形屋檐的一部分。考古专家据此推测是张献忠火烧皇城的历史佐证……[7]

大弓长矛的清朝骠骑“哒哒哒”地杀进四川了。

明末华阳县令沈云祚之子沈荀蔚1659年曾写道：“时成都城中绝人迹者十五六年，惟见草木充塞，麋鹿纵横……城中豺虎熊□，时猎得之。”原蜀王府内，草茂林密，两三年以后都还像野生动物园！（“故蜀府内二三年后犹然”）[8]



“老皇城”曾成为国立四川大学

康熙元年（1662）始，巡抚张德地等人惨淡经营，在原蜀王府遗址上修建科考“贡院”，老百姓仍习称为“老皇城”。荒凉已久的皇城，再现巍峨雄姿。清代驻成都高官怕有“僭越”之嫌，谁也不敢在此设衙门。

江山易主，1911年辛亥革命后，“老皇城”被尹昌衡作为四川军政

府所在地。民国年间，“老皇城”成为军阀混战必然抢夺的“肥肉”。1931年，国立四川大学也设在“老皇城”内。而“皇城”外的空坝，慢慢成了江湖人士最理想的“扯谎坝”。

凝聚悠久历史文化的成都“老皇城”，不仅是成都标志性建筑，实际上已是成都的象征。

---

[1] 参见《成都城坊古迹考》，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91页。

[2] 参见嘉靖版《四川总志·藩封·蜀府》。

[3] 金水河和御河，解放后犹存，1974年被填埋后改作人防工程。

[4] 参见陶亮生：《成都街名琐记》，载《成都掌故》第一辑，第10页，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从汉中传驿运王城基土及康公庙街事，见吴世先主编《成都城区通览》，成都出版社，1992年，第625页。

[5] 事见《明史·列传第五·诸王二》。

[6] 参见［法国］古洛东：《圣教入川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9至40页。

[7] 《皇城龙爪变“烧烤”，张献忠干的！》，《天府早报》2004年7月10日。

[8] 参见沈荀蔚《蜀难叙略》。

成都历代开国君王

开明九世、公孙述、刘备

成都历来有“六朝古都”“七朝古都”“九朝古都”种种不同的说法。成都究竟曾是多少个朝代的开国之都？本文以翔实史料，介绍了成都12个开国君王。但无一例外，他们都只是偏安一隅的“土皇帝”。

最早何人、何时在蜀地开国建都？这确实是笔糊涂账，难怪大诗人李白就浩叹：“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

在距今约3500年的夏商之际，就建立有一个蜀国，前后延续约1500年。史书记载：蚕丛在蜀国“始称王”，前后有蚕丛、柏、鱼凫、杜宇、开明等王朝。鱼凫王国之后的杜宇，号望帝，是第一个有确切建都地址的蜀王，国都是郫县，离成都仅21公里。传说望帝后来把王位禅让给丛帝鳖灵。郫县“望丛祠”里，有状若山丘的望帝陵、丛帝陵遥相对峙，至今让人凭吊。

丛帝鳖灵，号开明氏，他建立开明王朝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7世纪。蜀国“都城”因为打仗或者灾害，是不断迁徙的。开明王朝先后就以乐山、郫县、双流等地为都城。大约在2500年前，开明九世把都城从广都樊安（即今双流中兴镇一带）迁到成都。

所以，蜀王开明九世是在成都建都的第一个君王。

他下令在现成都文殊院街、南大街一带建起土城，取名为成都。为啥叫成都呢？通常解释是古人“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的说法。这位蜀王会享乐，修过珍珠为帘的七宝楼、鹦鹉舟。他还在武

都（今甘肃省成县）找来一个美女当王妃，为她专门作《东平之曲》。但王妃不习水土，郁郁而死，开明九世伤心得不得了，令五丁力士大建陵墓，至今北较场武担山还有蜀王开明妃墓……蜀王思妃，常惊风火扯地半夜惊醒，于是又在西城王宫内大修“望妃楼”。他也干了些正事：如下令开辟秦蜀金牛栈道，在玉垒山“别江为沱”修水利等。

开明王朝国王共世袭了12代。蜀国势力强大，曾连连进攻秦国，秦国经常是闻风而逃。好景不长，公元前316年秋，秦惠王派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率大军从石牛道南下伐蜀。双方在葭萌（今广元老昭化城）大战一番，蜀军被打得落花流水，贪财好色的开明十二世蜀王当了亡国之君，历时300多年的蜀国烟消灰灭了……

攻入蜀国的张仪、张若于公元前311年在成都筑墙建城，周长十二里、高七丈，是当时仅次于咸阳的大都城。后人以此为成都建城日，距今已2300多年。

汉代后成都街市热闹，城墙坚固，左思在《蜀都赋》中称赞成都“金城石郭，既丽且崇！”惹得无数想坐金銮宝殿的英雄豪杰们大流憨口水，都想在这块风水宝地上过一盘皇帝瘾。

西汉末年，貌似对小皇帝孺子婴忠心耿耿的王莽，于公元9年篡位，当上“新朝”皇帝。他手下大将、蜀郡太守公孙述趁机割据了四川。公元23年，王莽政权垮杆，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王朝。公孙述手下部将李熊劝他干脆也当皇帝！公孙述心里痒痒，被弄得神经兮兮的，梦中也听见有人对他说：“八厶子系，十二为期！”“八厶子系”不就是“公孙”二字吗？公孙述醒来对老婆说：“虽可贵为帝王，但国运太短，只能当十二年，弄不弄得哟？”老婆急着当皇后娘娘，忙说：“古话说‘朝闻道夕死可矣’，何况还能当十二年！有啥弄不得的？”

公孙述想：是啊，他王莽老儿、刘秀小儿都当得皇帝，老子又有

啥子当不得的？但要当皇帝，就也得要像王莽、刘秀那样说假话。鱼复城（今奉节白帝城）中有口白鹤井，常冒雾气。他叫人散布说：“这是‘白龙出井’，是公孙大人登基成龙的征兆啊！”

公孙述于公元25年自称“成家皇帝”，又叫白帝，在鱼复城建“白帝城”，将成都定为国都，国号“成”，年号“龙兴”。统治地区包括今四川、重庆的大部分和陕西、云南、贵州三省的一部分，地盘不小。但公孙述心眼小，无远见（史书称其“性情苛细，不见大体”），连将士都没有论功行赏，就忙着先把两个儿子封为王。公孙述年轻时当过皇帝的侍卫，如今一步登天，也大耍皇帝威风，出入宫殿陈列浩浩荡荡的骑士仪仗。他还在成都修造了一座十层高的红楼，连栏杆都用上等丝帛装饰，侈靡之极……

公元36年春，刘秀挥兵攻蜀，派征南大将军岑彭等人率水陆军六万、骑兵五千、战船千艘逆长江西进；又派来歙等率军出天水（今甘肃通渭西北）南进，合击成都……公孙述军接连败退。到了这年七月，岑彭率主力日夜兼程疾进2000余里，攻占武阳（今四川彭山县东）后，即派精骑袭击广都（双流中兴），成都危在旦夕。十月，穷途末路的公孙述想了个妙计，派人假投降，去刺杀了岑彭。（岑彭死后葬在中兴场，清代末年，当地农民挖出大胫骨两根和石碑，总督岑春煊自认是岑彭后裔，修墓庙奉祀，现墓、庙均不复存。）

刘秀忙调征西大将军吴汉接替岑彭职。公孙述居然回光返照，在十一月三战三捷。这月十七日，公孙述自率数万人向吴汉发动猛攻，从早至午打得天昏地暗，将士皆疲。吴汉乘机用精兵反攻，蜀军大乱，公孙述被刺，重伤掉落锦江，含恨而死……至此，公孙述12年的大成国被灭。此战刘秀派兵上溯三峡入川，是中国战争史上利用江河实施远距离进军的著名战役。吴汉军队在成都纵兵大掠，宫殿楼台被焚个干干净净……

一晃200年过去，到东汉末年，第三个开国君王刘备（字玄德）

又在成都登台表演了。

此时刘焉父子任益州牧，割据四川20余年。刘焉嗜刑好杀，见益州地广财多，也想到皇帝宝座上玩玩，却在公元194年呜呼哀哉了。他儿子刘璋性情弱，于是镇压黄巾起义发家的刘备，在公元221年乘虚入川。刘备几十天也攻不下成都，正为难之际，不料刘璋却先下矮桩，拱手服输。部下不服气，劝说刘璋：“城中尚有兵三万余人；钱帛粮草，可支一年，奈何便降？”

刘璋还有天良，说：“我父子在蜀二十余年，无恩德以加百姓；三年来却战事不断，心何能安？”于是开城投降刘备。

深得“厚黑学”三昧的刘备，见刘璋简直是个随便捏的“桃子”，心子一黑就轻轻松松吞下胜利果实，却又厚起脸皮拉着刘璋大流鳄鱼眼泪说：“非我不行仁义，是无可奈何啊！”于是刘备于公元221年在成都称帝，国号汉（史称蜀汉），年号章武……



武侯祠中的刘备塑像（供图：王正志）

刘备未发迹前曾当“跑滩匠”卖草鞋，被曹操讥笑为“卖履小儿”，所以后人奉他为鞋业鼻祖。清道光乙巳年（1845）五月，成都民间鞋业行会在提督街建三义庙，悬“神圣同臻”巨匾于正殿，匾上写着“道光乙巳年艾月吉旦”，落款是“靴鞋行众弟子立”，这块匾近年落户于武侯祠三义庙。据2002年12月10日《天府早报》报道：中国皮革工业协会理事长徐永来蓉考察，“认定中国鞋业的老祖宗即是刘备”……这也算刘皇叔“永垂不朽”的佳话。

公元223年，刘备病死，其子刘禅即位；公元263年，刘禅降魏。刘备、刘禅两代共历42年。

李雄、李寿、范贲、谯纵、萧纪

阿斗刘禅被晋武帝司马炎逮到洛阳，装得憨痴痴地说：“此处乐，不思蜀！”这才保住一条小命。司马氏的西晋一统天下，好不得意！皇亲国戚奢侈放荡、夸奇斗富，比赛用麦糖涮锅、蜡烛烧饭、锦帛缠山、人乳喂猪、砍杀美女佐酒……昏天黑地胡闹，结果不到20年，就爆发了“八王之乱”。

这时，西北又连年闹饥荒，略阳（今甘肃泰安）、天水等六郡的汉、氐、羌、密等各族民众十余万人“入蜀求食”，纷纷翻越秦岭大逃亡……乱了数年，朝廷勒令入蜀的陕西、甘肃流民返乡。但流民都认准四川比甘肃、陕西好，死活不肯回去。益州刺史罗尚强令遣返流民，还沿途劫杀流民。

公元301年，愤怒的流民公推略阳名门氏族李特、李流兄弟为首领，在绵竹揭竿起事，李特自称益州牧。不久，李特战死，其弟李流继称益州牧，不久也病死，李特的儿子李雄被推为成都王。起义队伍先攻占广汉，公元304年打下成都。

306年6月，李雄称帝，国号“大成”，改元晏平，设置百官。这就是史家所谓的“大成王朝”。李雄是继刘备后又一个在成都登台表演的开国君王。

李雄得到青城山天师道首领范长生大力支持，所以范长生当了丞相，还被封为“天地太师”（即国师）。在范长生的辅佐下，刑政宽

和，百姓富实，据说“由是夷夏安之，威震西土”。李雄当了31年大成皇帝，才于公元335年死了。他这一死不打紧，其子侄们立刻如饿狗抢食般争夺皇位，打得个你死我活。

公元338年，李雄堂弟李寿（李特之弟李骧之子）刀口舔血夺权成功，自立为帝。因他夺权后将国号由“成”改为“汉”，年号为“汉兴”，并废除五铢而铸行“汉兴”小钱，故应该也算作是一个成都的开国君王。史家把他和李雄的大成国常统称为“成汉政权”。

李寿虽只过了6年皇帝瘾，知者甚少，但“汉兴”铜钱是中国最早的年号钱。我听送仙桥古玩市场的藏家说：“汉兴”铜钱是中国货币史上的收藏珍品，能卖大价钱。

李特兄弟子孙六代建立的成汉政权共存在44年之久，是当时“五胡十六国”中最早建国的，也是自秦代以来第一个以成都为中心的少数民族（氐族）割据政权。

李寿死后由太子李势继位，国内混乱。347年，东晋西征将军桓温举兵灭蜀。他见成都城池牢固，很容易滋生土皇帝，便釜底抽薪，一把火烧掉成都城。

但桓温前脚刚班师回朝，原成汉宰相范长生的儿子范贲及邓定、隗文等人纠集散兵余勇就攻入成都，自立为蜀帝，年号为“龙风”。范贲捏造妖言，煽动蜀境，蜀人多半趋附……龙风皇帝在宝座上屁股都还没坐热，不到一年，就被东晋派兵消灭，范贲等人被擒斩。

范贲虽是短命皇帝，但《晋书》《资治通鉴》等史书都记载他曾“称帝”，故也该认为是成都的一个开国君王。

过了50多年，谯纵又跳到台上过帝王瘾。

404年，益州刺史毛璩（现南部县人）率众三万奉命出川东伐叛

军，命参军谯纵出涪水与主力会师巴郡。哪晓得谯纵突然倒戈兵变，于405年引兵攻成都，把毛璩一家子都杀了，自称“成都王”。后来他巴结北方势力强大的后秦，被正儿八经地封为蜀王，在成都当了8年土皇帝。413年，刘裕遣元帅朱龄石挥师破成都，谯纵吓得屁滚尿流、走投无路，道边找了棵树子上吊而亡……

一晃到了南北朝时期。梁国益州刺史、太尉武陵王萧纪，很有武艺韬略，治理蜀地17年了，也想做皇帝梦。公元551年，宫中殿柱环绕树节的地方开了花。树木没干透就砍来修房，生叶开花本也不稀奇，但萧纪又痴癫起来，他散布谣言说：“宫中殿柱开花，是老天爷让我登基的祥瑞哟！”于是就急不可耐地在成都当皇帝了，改年号为天正，还把大儿子萧圆照立为皇太子……本想江山万年，岂料转眼就被也刚在江陵称帝的萧绎攻灭了。

王建、孟知祥、李顺、张献忠

360年后，成都人很熟悉的另一个皇帝又登台了，这就是五代时前蜀国开国君主王建。王建字光图，河南许州舞阳人，排行老八。他年轻时曾杀牛、偷驴、贩私盐，乱吃野钱，所以家乡人称他为“贼王八”。他名声极坏，却长得牛高马大、相貌出众，就去从军。黄巢攻占长安后，唐僖宗逃到四川。山中栈道被火烧，浓烟烈烈，王建身先士卒为僖宗开路。休息时，正背时倒霉的唐僖宗枕着王建的腿就睡着了，醒来见王建为保护他不敢休息，不禁流泪，忙脱下御衣赐给王建……长安收复后，王建被任命为禁军将领。他天天同皇帝老倌打交道，觉得当“天子”真巴适，整天醉生梦死、女人成群，心想有天轮到老子也要过把瘾！



在成都永陵中埋了千余年的王建石像（供图：王正志）

王建慢慢混成壁州（今四川省通江县）刺史。唐大顺二年（891），川中大乱，王建攻取成都，已拥有东、西川40余州。903年，唐朝封他为蜀王。907年，奄奄一息的大唐朝灭亡了，朱温篡唐称帝。

王建见过把瘾的机会果然来了，立马称帝于成都，国号“蜀”（史称前蜀，903～918年在位）。王建称帝之后做了一些好事，他下诏劝农桑，百姓也过了几天太平日子。他当皇帝后也肯接受意见，一次有个和尚挖出一只眼珠子献给他，把他感动得当即下令：要供一万名僧人饭食以相报！翰林学士张格说：小人无故自残邀宠，这样重赏，要导致不正之风泛滥啊……王建当即就收回了成命。

王建72岁死后，庙号高祖。其子王衍继位，只晓得声色犬马，大修宫殿亭阁，绵绵十里，又引水绕宫城为御河，皆可行舟作乐……王衍喜欢艳歌、艳舞，天天和彩娥宫女打得火热，还乱写肉麻的爱情

诗，说啥子：“月华如水浸宫殿，有酒不醉真痴人。”……后唐李严出使前蜀，回去就向后唐皇帝建议：这小子如此不正经，打他！

后唐庄宗在同光三年（925）命郭崇韬率兵攻蜀，只用了75天就兵临城下。王衍想学前代阿斗刘禅，也装个傻冒保住小命，就背起棺材去迎降，不料此招不灵，仍被砍了脑壳！前蜀共传两代，历时23年……

紧接着后蜀国开国君主孟知祥粉墨登场。孟知祥字保胤，河北邢州龙冈人。祖父孟察，父亲孟道，在郡里承袭做军官，伯父孟方立和叔父孟迁都做到节度使。沾家庭背景的光，孟知祥年轻时就被李克用任命为左教练使，李还把一个侄女嫁给他。

李存勖继承晋王后，让孟知祥担任身边要职“中门使”。孟知祥很精灵，晓得以前几个中门使都不合主子意而丢命，于是千方百计推掉这个看似光荣的烫手炭圆，而另举荐郭崇韬。

郭崇韬就是上文中灭王衍的人。李存勖即位建后唐之后，令郭崇韬领兵灭蜀。出发前，郭为报答孟知祥举荐之恩，就向李存勖说：灭蜀后，孟知祥去治蜀地最宜……蜀地已克，李存勖担心郭崇韬学三国时讨伐刘禅的钟会，也做皇帝梦，犹豫着是否要杀郭崇韬。他摆宴送孟知祥去成都当西川节度使时，孟知祥劝道：“崇韬是国家功臣，不会有二心的！”

谁知孟知祥刚入剑门赴任，半路遇上前去杀郭崇韬的宦官已绝尘离去。当他昼夜兼程赶到成都，方知郭崇韬已经兔死狗烹，丢了脑壳……

孟知祥初到成都时，蜀中大乱。孟知祥施政清廉，社会逐渐稳定。《蜀梼杌》中说，“是时蜀中久安，赋役俱省，斗米三钱”，可见很有些丰衣足食的小康光景了。

不久后唐明宗李嗣源取代李存勖，孟知祥就有了割据称王的念头，拒绝向朝廷贡纳税赋。明宗派李严去蜀地当监军监视，孟知祥反以假传诏书罪名将李严杀死。明宗见孟知祥反骨已现，又无可奈何，干脆做个顺水人情，把被扣做人质的孟知祥妻儿送回成都……

君臣虽钩心斗角，但后唐明宗在世时，孟知祥为回报明宗恩遇，没有称帝。等明宗死后第二年，即后唐应顺元年（934），他就不客气了，在成都正式称帝，建国号“蜀”，史称“后蜀”。只是他在宝座上只坐了半年，屁股还没坐热，一天就在酒宴上突发重病死去……

他的三儿子孟昶福气好，即了帝位。孟昶会享乐，连尿罐子都用珍宝装饰。他还让百姓在成都遍种芙蓉，每当九月花开，全城一片锦绣——这就是成都简称蓉城的来历。他是昏君，但如果要选成都历史上的环保模范、植树标兵，他完全应该捧第一名大奖状！他当了32年的享乐皇帝，才被北宋消灭……

孟昶灭后没有几年，另一个君王李顺又登台表演了。

公元992年，西川青城（今都江堰市）人王小波发动了武装起义，吼出“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的动人口号，很快发展到数万人。他攻克青城县后又攻彭山县，把县令齐元振杀死，还剖开肚皮塞满平日贪污来的钱币……这年冬天，王小波率众攻打江源县，额头上中箭而死。他的妻弟李顺又当了统帅，依靠“在城贫民”，“指引豪家收藏地窖”，杀富济贫。弄得地主富人“人心恐悚，投死无地”……

994年正月，起义军攻克汉州、彭州，接着攻下成都。这个打着为百姓“均贫富”幌子的李顺，扯下伪装也要过盘帝王瘾，匆忙建立“大蜀”国，自称大蜀王，改元“应运”，并铸造“应运元宝”铜钱和“应运通宝”铁钱。

北宋朝廷急忙派遣王继恩为剑南西川招安史，于当年5月率军攻

破成都。称王不到半年的李顺据说阵亡，下落不明……我翻阅当时人沈括写的《梦溪笔谈》卷25中说："大蜀"国灭亡30年后，巡检陈文琏在广州逮到李顺，李已经70多岁；陈用囚车把李顺押解到京师砍了头，陈文琏升官两级。沈括在陈文琏家里看过《李顺案专卷》，此事当可信。

李顺的"大蜀王"美梦虽然刚打了个盹就被惊醒，但沉重打击了宋王朝，宋太宗也不得不下"罪己诏"。此外，"大蜀"国搞打土豪、分田地的"均贫富"那一套做法，对后世影响深远，被认为是历史上影响中国的100次大事件之一。

最后在成都登基的皇帝，就是赫赫有名的张献忠。

张献忠（1606～1647），陕西延安人。崇祯三年（1630），陕北农民纷起暴动，张献忠率米脂十八寨农民响应，自号八大王……1644年8月9日他杀进成都随即在此建国，国号"大西"，改元"大顺"，自称"大西王"，称成都为西京。

张献忠以原蜀王府老皇城（就是现省展览馆处）正殿改称承天殿，昭明殿为金銮殿；又铸造"大顺通宝""西王赏功"铜币，命造新历《通天历》，刊刻了"圣谕碑"（现存广汉市人民公园内）；还设置左右丞相、六部尚书；命令臣民一律呼自己为"老万岁"，百姓不拘贫富之家，一律立"西朝皇帝万岁"牌位，四时朝供……他还中西结合，把吓得到处躲藏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类思、葡萄牙传教士安文思找来，封为"天学国师"，要两个洋人为他制作地球仪，看样子还有"统治世界"的雄心壮志呢！

张献忠在四川大开杀戒。据清人沈荀蔚《蜀难叙略》等史料中说：这个"大西皇帝"先杀百姓，次杀军眷，再次杀湖北兵、四川兵……没有吃的，就杀人作军粮。百姓杀光跑光，皇帝梦也只好泡汤。张献忠占据成都称孤道寡仅两年，就不得不逃走了，走前还一把

火把成都烧个精光。他登基的老皇城大殿修得牢固，烧不起来，张献忠命令士兵“灌以脂膏”；盘龙石柱烧不烂，张献忠命令士兵“裹纱数十层，浸油三日，一火而柱折”……



图为梓潼县七曲山大庙中的张献忠塑像



“大西皇帝”张献忠占据四川时所铸“西王赏功”钱

张献忠逃离成都后仍杀杀杀，一路杀到西充扎营，却被统领川兵的叛将刘进忠引导清兵豪格肃亲王等挡住去路，“嗖”一箭射来，在成都历史舞台上最后登基表演的“大西皇帝”张献忠，就这样身亡谢幕了。

从开明九世开始，在成都开国的先后有公孙述、刘备、李雄、李寿、范贲、谯纵、萧纪、王建、孟知祥、李顺、张献忠，共12人，这些人大都有新建王朝、自创年号、自铸货币等“开国”特征，并载诸历代史册。但这些君王们，毫无例外都只是偏安一隅的土皇帝，从未统一神州大地。

帝王尸骨已朽，成都在中国历史上却创造了两个奇迹：一是城池虽屡有兴废，而城址千年不变；二是政权屡有更替，而城市名称从无更改。成都堪称全国乃至全球最具稳定性和生命力的特大城市之一。

参考资料

《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四川古代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

《千年回首话四川》，巴蜀书社，2000年。

陈寿：《三国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杨伟立：《前蜀后蜀史》，四川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

《张献忠剿四川实录》，巴蜀书社，2002年。

四川名将岳锺琪

战功赫赫国之栋梁

成都历史上不仅孕育过司马相如、扬雄等著名文人，也产生过许多杰出的军事家。清朝岳锺琪叱咤风云、屡建奇功，却又屡遭坎坷艰险。他一生跨清康熙、雍正、乾隆三个朝代，为保卫中国领土完整、不受分裂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在中国历史上影响重大的名将。

大清乾隆二年（1737）深秋，成都西郊微雨迷蒙。一泓清波由北而南，另一条碧溪由西而东，两水汇合成一深潭，雨雾中越显碧蓝幽深——这就是有名的百花潭。真如杜甫说的“锦里烟尘外、江村八九家”。近300年前，这里远非如今车水马龙，而是远避尘世喧嚣的市郊。

一个五十多岁的农夫，蓑衣草鞋，头戴竹笠，正荷锄在潭畔田野中种菜……农夫挥锄片刻，静立细听秋风秋雨，喃喃道：“‘万里桥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沧浪。’杜工部这首《狂夫》诗妙绝。杜甫字子美，我字东美，与老杜草堂比邻而居，也算我三生有幸了！”

农夫又吟自己写的《述怀》诗：“豪华往事絮随风，耻向人夸百战功。浊酒未全浇块垒，名花才半绽玲珑。盖棺待论千秋后，大觉迟醒一梦中。读罢《愣亚》空万象，六窗掩映月朦胧……”

河对岸的村人，不时看见这个在百花潭结庐村居的农夫，或潭畔垂钓，或躬耕畴野……人们猜想不到：这个农夫竟是名震华夏的岳锺琪大将军。

岳锺琪（1686～1754），字东美，号容斋，成都人。他父亲叫岳升龙，甘肃临洮人，后入籍四川。岳升龙行伍出身，以战功直升为四川提督，死后于雍正四年被追谥“敏肃”。

岳锺琪自幼饱读诗书，以文官入仕，当了个“同知”。这时正是清初多事之秋，岳锺琪慨然说：“时事艰危，身为将门之后，怎敢苟安！”他请改武职从军，在四川先后当过“游击”、松潘镇“中军”和永宁协“副将”，开始了戎马生涯。

《清史稿》说岳锺琪“长身赪面……临阵挟二铜锤重百余斤，指麾严肃不可犯”，身材魁梧像个红脸关公，智勇双全。



清朝内廷南书房所画的岳锺琪全身像

这时，大西北准噶尔部首领在沙俄扶植下叛乱。康熙五十八年（1719），最先叛乱的噶尔丹死，沙俄又扶植准噶尔部名叫策妄阿拉布坦的汗王入侵西藏。清军入藏平叛，岳锺琪风餐露宿为前锋，遇山开路、逢水搭桥……次年岳锺琪带兵直抵察木多，挑选军中30人化装成藏民奇袭叛军驻地，斩准噶尔部派到西藏策反的使者，督兵大破叛军收复拉萨。康熙六十年，清军“呜啊！呜啊！”吹起得胜号角，凯旋。

此役岳锺琪战功显赫，升为四川提督。这位年仅35岁的四川提督，骑着高头大马威风凛凛从成都提督衙门进进出出，令人不敢仰视……提督衙门所在地为今提督街。提督衙门民国后改为“中城公园”“中山公园”，解放后为文化宫。

不久岳锺琪又升任为四川第一号领导人——四川总督。

雍正元年（1723），厄鲁特蒙古和硕特部头子罗卜藏丹津又在大西北叛乱。这次闹得更凶，把刚坐上金銮殿宝座的雍正皇帝弄得寝食不安。



1925年前后的“中城公园”

雍正急急忙忙任命川陕总督年羹尧当远征军总司令（抚远大将军），四川总督岳锺琪当总参谋长兼前敌总指挥（襄赞军务，奋威将军）。次年三月，岳锺琪向年羹尧请战说：“劳师远征，最忌旷日持久。应乘春草未生，捣其不备……我愿率精锐直捣叛军老巢！”

于是他亲率5000铁骑突袭，从青海西宁城向西急行军，每天不分昼夜奔驰300里。两天后的黎明，罗卜藏丹津的主力正在荒原上呼呼大睡，哪料到岳锺琪精骑杀到！叛军梦中惊醒，战马都没有备鞍，霎时全军崩溃。罗卜藏丹津慌作一团，换上女人的衣服才逃脱，投奔准噶尔汗国去了……

擒获的大批俘虏中，包括罗卜藏丹津的老妈。岳锺琪大军又“呜啊！呜啊！”吹起得胜号角，凯旋……此役岳锺琪出兵仅15天就大获全胜，把约60万平方公里的青海土地完全收复。此役和上次他突袭西藏之役一样，都是中国战史上十分著名的战役。

雍正皇帝欢喜得眉开眼笑。雍正三年九月，岳锺琪第一次到北京觐见皇帝。雍正帝在圆明园专门接见他，赐御宴共进午餐；赐四团龙补服一件，御书五百函，双眼孔雀翎。雍正还为其御笔亲题五言律诗二首：

岷峨称雄镇，专阃赖干城。旧著宁边略，新闻奏凯声。风霆严伐步，云日耀麾旌。三捷成功速，欢腾细柳营。（其一）

一扫搀枪尽，师旋蜀道中。锦城休战马，玉塞集飞鸿。智勇原无敌，忠诚实可风。丹书褒伟业，还与锡彤弓。（其二）

雍正皇帝喜气洋洋地对臣下说：“平定青海，实系岳锺琪之功！”当下封岳锺琪为太子太保，三等公爵，授甘肃提督，赐黄带，参赞军机大臣。雍正三年（1925），岳锺琪升任川陕总督，真可谓“圣眷优渥”。据《清史稿》所记，康熙、雍正、乾隆时期，常是川陕合治。岳锺琪节制川、陕、甘各省，任上政绩甚佳。

雍正三年，岳锺琪将川陕两省乱摊乱派的苛捐杂税30多项，如实上报朝廷。雍正拍案大赞岳锺琪不掩己丑，写上谕说：非但川、陕有乱摊乱派，其他各省都一样！让岳锺琪果断替换掉各府州县的不法贪官……



清朝手执兵器的士卒

当时“湖广填四川”的外省人得政府安置者甚少。岳锺琪为尽快恢复四川人口，在雍正五年上奏请：“湖广、江西、广东、广西等省之民，逃荒入川，不下数万户。请开招民事例，给穷民牛具籽种，令其开垦荒地，方为有益！”

岳锺琪因赫赫军功，施政又颇多善绩，深得时人赞颂。清朝从开国后两百年内，岳锺琪是仅有的以汉人而手握重兵的封疆大吏（直到太平天国起事后，才又有曾国藩、李鸿章等汉人高官）。名满天下的大将军，怎么会当起种菜农夫来了呢？

清朝历史大案的主角

雍正六年（1728）秋，发生了一件清朝历史上影响十分重大的事件，极具戏剧性。岳锺琪就是这幕大戏的主角。

雍正六年九月二十六日，西安古城。岳锺琪这天外出访客后，正闪悠悠地乘轿回到总督府。突然有个操湖南口音的汉子手捧一封书信拦在轿前，高叫："有密信亲交大人！"跟班接书信递上，岳锺琪吃了一惊：信封上写的是"天吏元帅岳锺琪"亲启！

岳锺琪忙回总督府，见这信署名"南海无主游民夏靓、张倬"。"无主游民"，就是不承认自己是皇帝老倌治下的百姓。原来拦轿投书的汉子叫张熙（化名张倬），他老师曾静是湖南永兴一个不得志的村学究，特派他前来投递策反书！

信中说"满人"入主中原是夷狄"盗窃王位"，大骂雍正皇帝有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利、好杀、酗酒、淫色、多疑诛忠、好谀任佞等十大罪状……信中义愤填膺地说：你乃宋朝抗金名将宋武穆王岳飞后裔，今握重兵、居要地，当乘机反清，为宋、明复仇，像岳爷爷《满江红》唱的那样，也来他个"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岳大将军看完信，吓得背上直起鸡皮疙瘩，冷汗直冒。

他十分清楚：雍正三年七月，大将军年羹尧因"谋反"事发丢命，他才得以继任川陕总督。川陕地处险要，早在康熙十九年就定例，此

乃满族八旗要员专缺，汉人不得染指……岳锺琪任此职实属“破例”，直隶总督蔡立还向雍正奏本，称岳锺琪这个汉官“不可深结”！

饱读史书的岳锺琪，深知“威高震主”的古训，虽升了官却十分惶恐。更让他郁闷的是：张熙投策反书的三个月前，在四川成都还发生了一件事：有个叫卢宗汉的人，在闹市大吼大叫：“岳公爷要带领川陕兵马起事造反！百姓呀，快跟随岳公爷造反吧！西城门外已开有黑店，就要杀人了！”

岳锺琪这时正在成都，忙命令四川提督黄庭桂把卢宗汉当成妖言惑众的疯子抓了。岳锺琪战战兢兢上报朝廷：“卑职不敢檄讯，不敢隐匿”，引咎辞职。

雍正皇帝在上谕中意味深长地抚慰说：“数年以来，谗锺琪者不止谤书一箧，甚且谓锺琪为岳飞裔，欲报宋、金之仇。锺琪懋着勋劳，朕故任以要地，付之重兵……今此造言之人，不但谤大臣，并诬川、陕军民以大逆！”雍正下旨：立即将卢宗汉砍头。

此事虽过，但岳锺琪与皇帝老倌关系微妙的流言却在全国传播：岳将军爱民如子，皇上屡召他进京要加害他，岳将军非常害怕，连召几次都不敢进京……这些流言在四川、湖南传说得尤其活灵活现。

现在来看，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朝廷对这个手握重兵的汉人重臣，骨子里无疑深加忌防；另一方面老百姓又错将岳锺琪当成岳武穆化身。岳锺琪本是清王朝大忠臣，这时却“哑巴吃黄连”“黄泥巴落在裤裆头”，夹在中间自然十分难受。所以他见什么“南海无主游民夏靓遣徒张倬上书‘天吏元帅’”的策反信后，气得七窍冒烟，对张倬施以重刑逼供。张倬被打得皮开肉绽，几次昏迷，却咬紧牙巴不招供，说什么“舍身可以取义！”

九月二十七日，岳锺琪亲自设计上演“诱供”闹剧。他又害怕万岁

爷猜忌他“假戏真唱”，坚请一位满籍要员陕西巡抚西琳，躲在屏风后当“舞台监督”。

张倬被绑成缠丝兔一样押进密室。岳锺琪亲为张倬解下绳索，并请坐、吃茶。岳锺琪对张倬说：“我岳某早就图谋反清，只是不知你是真是假，或是有人派你来试探我。对你加刑，实只为掩人耳目。兄弟你受委屈了，请你体谅！”

张倬岂会轻易中套，“嗯嗯”应酬而已。

岳锺琪软诱暂未奏效，为洗刷自己，于九月二十八日以三百里快马奏报雍正皇帝，请“将张倬解送到京”。雍正却回复说：“不宜酷狠用刑，料理急些了，当缓缓设法诱之”……

九月二十九日黄昏，“诱供”好戏进入高潮。

张倬被请进密室，请上坐、吃好茶。这次躲在屏风后当“舞台监督”的是另一位满籍要员、陕西按察使硕色。岳锺琪眼流热泪颤声对张倬说：“我要马上接你老师曾静来当军师，共举义旗……你若不相信，我就和你‘跪拜结盟’，共讨清虏！”

当下两人焚香对天跪拜、叩头泣血。岳锺琪慷慨激昂赌了许多“义结金兰、患难与共，如有反悔、天诛地灭”之类血咒……

张倬是个没见过多少世面的乡下“土包子”，见岳大将军鼻涕眼泪的，早深信不疑，当下也哭哭啼啼拉着岳锺琪，将他老师曾静及其他反清者的情况来个竹筒倒豌豆，一五一十说个干干净净……

岳锺琪很害怕自己演戏太“到位”，引起雍正猜疑，事后忙诚惶诚恐上奏详情。雍正此时正值用人之际，也赌咒发誓，朱批上谕道：“览虚实不禁泪流满面，卿此一心，天祖鉴之！朕与卿君臣之情，乃无量劫之善缘同会，自乘愿力而来，协朕为国家养生者，岂泛

泛之可比拟，朕实嘉悦之至！”意思是说：“我修了几辈子的福分，才换来个你岳锺琪辅佐自己……”这位万岁爷的话不晓得是真情，还是也在“演戏”，但已使岳锺琪“感泣悚惶，惊喜交迫”了。

后来查明：写策反信的曾静（夏靓是化名）乃湖南郴州永兴人，因科考屡次落第，中年后以教书糊口，自称“蒲谭先生”。他突发奇想要煽动岳锺琪造反，在雍正六年五月派遣爱徒张熙和他堂叔张勘去送策反信。两人风尘仆仆经贵州到四川，听说岳锺琪已回西安，又经剑门古道辛辛苦苦于九月十三日赶到西安。两人打听到，岳锺琪此时正得皇帝宠信……张勘灰心丧气偷偷溜了，化名为张倬的张熙，却破釜沉舟来了个“拦轿投书”。

张熙又供出，其师曾静主要受吕留良反清著述的影响，于雍正五年曾派自己去浙江，吕留良的儿子将其父遗稿交给自己……岳锺琪于雍正六年十月初二日再上奏章，请查抄吕留良家并缉捕其他案犯！

在雍正帝亲自主持下，从雍正六年开始直到雍正十年（1732）方结此案——这就是清朝最有名的一桩大文字狱案。最后的处置更有戏剧性：雍正帝亲自编纂了一本“国书”《大义觉迷录》，务要家喻户晓；又下令免罪释放曾静、张熙等谋反犯，让他们戴罪立功到各地现身说法“巡回演讲”，清除流毒。而对著书反清者则毫不留情：吕留良已死几十年，仍被从坟墓拖出来锉尸枭首。其长子吕葆中、学生严鸿逵也被刨棺戮尸、枭首示众。其他活着受株连的人，则处斩、杖毙、发配……全国牵涉人数甚广。

岳锺琪在此案中如走钢丝，虽立了一大功，却又明显危机四伏。

镇守西北的他，每年都要出兵征战数次。他曾在《出征西宁别高夫人》诗中说：“嗟余五载九征蛮，骨瘁力疲神已殚。泸水瘴迷征士泪，天山雪压使臣鞍。别时儿女牵衣泣，归日宾僚握手欢。愿得太平天下缓，牛衣卧对养衰残！”

此时的岳锺琪已很有但求平安以度残年的愿望。汉朝头号开国大功臣韩信被刘邦擒杀前感叹："'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烹！"历朝历代莫不如此……岳锺琪熟读史书，岂不知其中至理？

果然，也就在曾静投书案刚结案的雍正十年，查郎阿等人弹劾岳锺琪"骄蹇不法"，意欲反叛……阴鸷多疑的雍正帝顿时翻脸不认人，大骂岳锺琪"误国负恩、罪难悉数"，处以削职夺爵下狱。雍正本想马上砍岳锺琪脑壳（"拟斩决"），又恐其统率已久的士卒不服，才改判为缓期执行（"斩监候"）。

老将出马建奇功

岳锺琪在狱中引颈待毙。幸好雍正死得早，他坐了整整6年大牢，于乾隆二年（1737）被特赦归故里，在成都百花潭北浣花溪畔结庐村居。草屋名“薑园”（薑即姜），又名“安素园”，堂中悬“世恩堂”匾，门前有竹亭名“爱闲亭”。

我手头藏有本少见的岳锺琪著的《容斋诗集》。其中这样写道：

小筑山居旁渌溪，百花潭北少城西。柳堤沙暖朝调马，竹园人闲午饲鸡。麦浪翻风黄半熟，秧针出水绿出霁。持竿携盍临流坐，碧树荫荫布谷啼。

万里桥西课耦耕，花明柳暗少锦城。白头醒却封侯梦，来与田家说太平。


[illegible]威信公本傳
公姓岳諱鍾琪字東美一字容齋先世湯陰人爲忠武
王飛之後十七世由宜興徙居蘭州父昇龍以永泰營
百夫長從征吳三桂立功累遷至四川提督因家焉[illegible]
謚敏肅公生有至性母苗太夫人疾刲股以療敏肅公
命之射猶忍痛發矢爲兒時好布石作方圓陣進退舉
兒頗有法敏肅公器之以同知銜奏請改武授松潘鎮
遊擊遷永寧副將康熙五十八年西藏達哇藍占巴等
叛 天子命某親王爲大將軍噶爾弼爲副將軍率公
征之公領兵四千駐察木多會齊大軍進討途獲落籠
宗逃脅探知有準噶爾使者在其地誘各番兵守三巴

華陽岳威信公容齋詩集
郫後學孫澍重訂

岳锺琪《容斋诗集》清刻本（供图：彭雄）

他被贬为平头老百姓后如何度日？史书甚少记载。我遍查野史，读到清人张邦伸编的《锦里新编》，说他隐姓埋名，平时爱穿双黑布鞋、披件长布袍游走乡间，“作林泉之游，与野老话桑麻”……而附近村人竟然不晓得这就是有名的岳大将军。

看来侥幸拣回一个脑壳的岳锺琪韬光养晦，已和乡下人“打成一片”了。他除种菜、垂钓、养马、喂鸡外，则吟诗作画自娱，著有《薑园诗草》《容斋诗集》等。

但他仍怀念为国效劳征战沙场的岁月。他在《自题画像》跏趺图诗中说：“肘后仙方即睡方，双桐高荫日华长。尘根尽断黄粱熟，又作封侯梦一场！”还曾在一首《画马》诗中感叹：“谁写骅骝卧碧茵，曹将军骨子昂神。年来未向沙场跨，画里相看也动人！”

诗中欲说还休、欲忘不能的心情，跃然纸上。

鸟影渡波，让他想起大西北高飞的大雁；哞哞耕牛，令他怀念沙场嘶鸣的战马……他心系朝廷、难忘国家安危啊！岳锺琪愁肠百结，转瞬在百花潭畔务农近12年，已垂垂老矣。

岂料乾隆十二年（1747）春夏间，四川境内金川又起战事：大金川土司莎罗奔勾结党羽作乱反叛，四川巡抚纪山等连战皆败！

被弄得焦躁不安的乾隆皇帝下旨：“奏凯尚需时日，何能慰朕西顾之忧哉！”至乾隆十二年十一月，派去进剿金川的大军无数，又拨湖北、江西、广东等省银120万两以上，张广泗、纪山还在请再拨大量军费。清军张兴、陈礼等将佐又丧师殒命……

事态越发危急。乾隆帝再派大学士纳亲前往督师，也多次失败，总兵任举战死。气得乾隆后来把纳亲、张广泗押解到北京，令纳亲“自裁”（赐死），午门前砍了张广泗的脑袋！

乾隆十三年二月，兵部尚书班第密奏皇帝：“大金川地纵不过二三百里，横不过数十里，蛮口不满万人，现在军营已集汉、土官兵及新调陕、甘、云、贵四省兵丁至五万。乃闻将弁怯懦，兵心涣散，土番因此观望……再四思维，唯有岳锺琪父子世为四川提督，向为番邦所信服……”

乾隆皇帝在乾隆十三年四月降旨：“岳锺琪经朕宽恩放还乡里。今当大金川用兵之际，因思伊久官西蜀，素为番众所服，若任以金川之事，自属人地相宜！”清廷又派大学士傅恒为经略，指挥征剿。

岳锺琪这时的身份仅是布衣老百姓，他上奏：“请恩赏提督衔，以便统领部属！”

乾隆乃任命岳锺琪以四川提督衔前往征剿。岳锺琪与傅恒从党坝和泸水水陆并进，分兵合击。好个岳大将军，以62岁高龄率军出征，直攻金川土司老巢勒乌围、卡撒，前后夹攻噶拉依……连连收复失地。

此时叛首莎罗奔本想归降，又怕被朝廷杀头，只好硬着头皮据险顽抗。岳锺琪对傅恒说：“要除祸患，毕竟攻心为上。我愿亲赴敌巢，示之以诚，说服莎罗奔心悦诚服来降！”傅恒说：“那你就多带些人马去！”岳锺琪摇头笑道：“人去多了，就不显诚信了！”

岳锺琪不穿铠甲不带兵器，仅率13轻骑，不顾安危前去招降。敌营如临大敌，刀剑土炮密列以迎！岳锺琪笑着对敌群说：“你们不认得我了？想当年你们当中还有许多人跟随我一道去讨伐过西藏叛军呢！”

众人齐呼：“果然是岳大将军来了！”忙导入帐中。岳锺琪对莎罗奔说：“现国家一统、番汉一家，何必自相为仇、杀戮不已？我担保你等率部归降后，朝廷决不加害你们！”

当下他和莎罗奔等人一同“顶佛经立誓”，叩头为盟，帐篷内外欢呼声一片！叛乱很快平定了……乾隆十四年（1749），耗时3年的金川之战终于结束。

这次金川之役影响重大，清廷共调兵约62500名，耗银近765万两。战后乾隆皇帝曾御制“平定金川勒铭勒乌围之碑”，立在金川境内。

岳锺琪的大军又“呜啊！呜啊！”吹起得胜号角，凯旋……乾隆皇帝令岳锺琪入朝觐见。岳锺琪一身戎装、精神矍铄，乾隆龙颜大悦。岳锺琪加太子少保，兵部尚书，复封三等威信公，赏紫禁城骑马，又命南书房画忠臣全身像。乾隆并亲题《七律·岳锺琪入觐诗》赐岳锺琪：剑佩归朝矍铄翁，番巢单骑志何雄！功志淮蔡无惭李，翼奋渑池不独冯。早建奇勋能鼓勇，重颁上爵特褒忠。西南保障资猷略，前席敷陈每日中。

此后岳锺琪的家也从百花潭乡下搬进城内公馆。据史书记载，这时藏汉等民族间和睦相处、气氛融洽。每年新春，西藏和大小金川的头领们都要派300人的使团到成都拜望岳锺琪，双方十分友好……

乾隆十九年（1754），这位69岁的老将军病逝在资州（今四川资中县）军营，其一生为国尽忠，可说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朝廷赐祭拜，谥“襄勤”。岳锺琪去世24年后的乾隆四十五年（1779），乾隆难忘岳锺琪功绩，写下《怀旧诗》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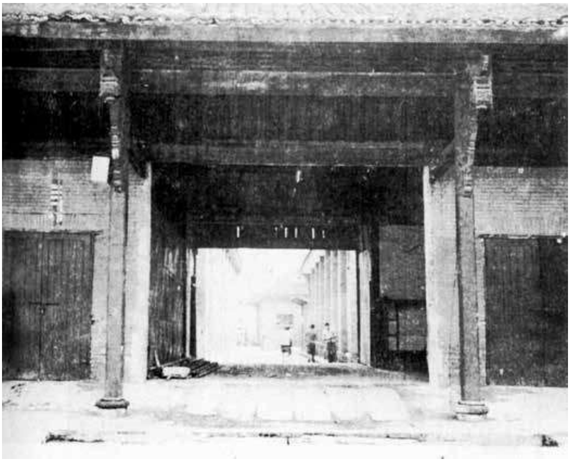
三朝师武臣，锺琪为巨擘。车骑伐准夷，实其算之失。设誓诱张熙，忠诚天鉴赤。家居十余年，命董金川役。单骑入贼寨，大义示顺逆。勇而且有谋，群番慑辟易。受降遂凯旋，实亦资宣力。所见绿营多，鲜克踵其迹。卓有古将风，书勋太常册。

诗写得蹩脚拗口，但不难明白其“高度评价”之意。清太史杨绪

说："风流类叔子，严饬似亚夫，谨慎可兼将相，几于抗迹武侯，精忠不渝始终，雅足嗣徽忠武。"把他喻为汉周亚夫、蜀诸葛亮等名臣，评价可谓甚高。

岳锺琪墓在金堂县栖贤乡境内。此地曾有岳锺琪之别墅，名绿绕山庄，庄后松秀山（又名岳公山）为其墓园。山中松柏葱郁，景色迷人……可惜墓已毁于"文化大革命"。

岳锺琪成都公馆所在这条街，被名为"岳府街"。光绪末年，岳锺琪的后人将老宅卖给川汉铁路总公司，清宣统三年（1911）六月十七日，在这里成立了四川保路同志会，四川"保路运动"的许多重要集会都在这里举行。



成都岳府街上的岳锺琪老宅，清末为川汉铁路总公司办公处，现已不存

（出自：《四川人民革命斗争图卷》）

2003年，成都岳府街小游园围墙上，以黑砂石雕刻成百米浮雕、12幅图画，描绘的就是这位清代爱国名将戎马征战的画面……

参考文献：

《清史稿·列传八十三·岳锺琪》。

（清）张邦伸：《锦里新编·岳锺琪》，巴蜀书社，1984年。

岳锺琪：《容斋诗集》（嘉庆刻本）。

（清）雍正编撰《大义觉迷录》，中国城市出版社，1999年。

（清）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岳锺琪传》，中华书局聚珍仿宋版。

《成都大辞典》，四川辞书出版社，1995年。

四川总督丁宝桢

初到四川“栽筋斗”

清末“洋务派”重要人物丁宝桢，对近代四川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本文以翔实史料和民间口碑传闻，生动地叙述了这位曾任十年四川总督的方方面面……

光绪二年（1876）梧桐黄叶萧萧飘落的冬天，成都东门城外牛市口，平素冷冷清清的驿道突然热闹异常，新搭建的接官厅富丽堂皇、彩旗飘飘……今天接的是新任川督丁宝桢。



丁宝桢

说起丁宝桢（1820～1886），如今很多人可能耳生，但一提“宫保鸡丁”，连幼儿园小朋友都会连声叫：“好吃得很，我晓得！”这道佳肴就和丁宝桢有关。丁宝桢字稚黄，贵州省平远（今织金）人，他23岁中举人，33岁时（咸丰三年）中进士，1869年任山东巡抚。《清史稿》上夸他“严刚有威”。光绪二年（1876）调任四川总督 [1] [2] 。

成都官员为迎接新川督，个个忙得屁滚尿流。他们议论纷纷：“宫保大人文武双全，他同僧格林沁一道治兵鲁、豫，剿河北宋景诗；还曾率领鲁军飞骑北上，击溃捻军保卫京城！同治皇上曾一连下了七道圣旨，嘉奖他武勇忠诚，赏紫禁城骑马……”“是呀！丁大人蒙皇上赏戴一品花翎，加太子少保衔……宫保大人还擒杀慈禧太后宠监安得海，真是胆识过人啊！”

新总督到达省城之日，全城官员排了近一里路，伸长颈项呆等。一直等到太阳升到正中，众官肚子饿得哗哗啦啦乱响……领头的署理川督文格苦着脸说：“据报，丁大人昨晚宿龙泉驿，那里距省城不过四十多里。为何还未来啊？”

正焦急间，忽然一骑快马从城内飞驰而来，远远大叫：“新总督宫保大人早到城内，传谕各位大人速回督院！”

文格惊愕地说：“我等齐集省城要道，并不见官轿通过……丁宫保从天而降不成？”赶忙吩咐：“快抬轿子！”顿时旌旗仪仗乱作一团，道上尘土飞扬。众官员跌跌撞撞奔过“长春桥”（即现在东门大桥）进迎晖门（即东城门），再沿东大街气喘咻咻跑回督院街官衙。

丁宝桢早肃然端坐客厅，文格率众官员忙行礼拜见。官员们抬头一望，吃惊不小：快近午时，一顶普通小轿子从城外经过牛市口，轿内有个干瘦、黄脸、长胡子老头，身着布衣，轿后有一挑行李。那老头脑壳伸出轿窗外看稀奇，众人都以为是个进城走亲戚的乡巴佬，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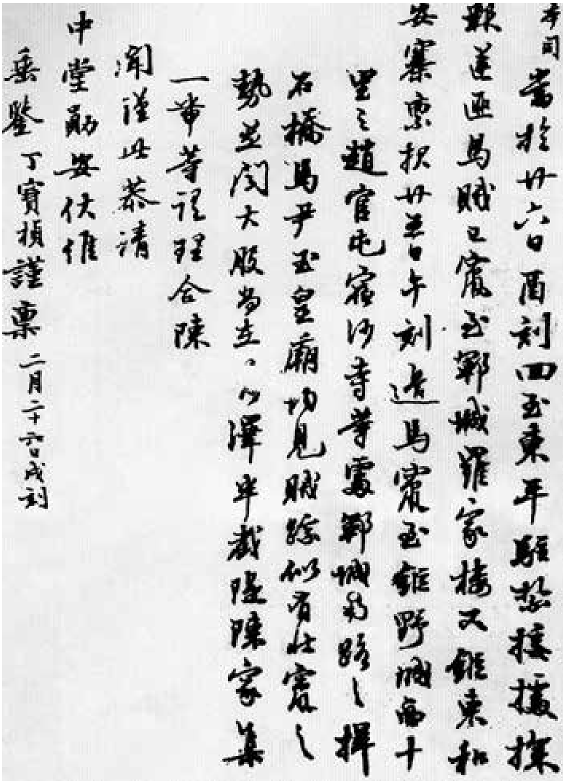
勇呵斥道："此地迎接新总督大人，还不快走！"那老头不发一言，轿夫也避开大道，绕道牛市口田间小路走了……[3]

众官员再看丁大人身上穿的旧官袍已褪色。丁宝桢回了礼，淡淡说了句："今日诸位辛苦啦，我也鞍马劳累，改日再晤吧。"众人肚子里说："看来这丁大人喜欢装怪，以后可要小心点！"

丁宫保"微服入川"很有点戏剧性，确实有其事。丁宝桢虽"严刚有威"却深知宦海险恶。他砍了安得海脑壳后，也怕"老佛爷"衔恨砍他的脑壳，故力戒张狂。"微服入川"不过是升官后的"低调"表现罢了。

但开张不利。原来，靠有恩于慈禧当了四川总督的吴棠，既昏庸又老病，终日咳咳喘喘，把个四川也弄得百病缠身。光绪二年前后，东乡（现宣汉县）民众不堪官府暴敛，闹起抗税抗捐。总督吴棠和其后的"护院"（署理川督）文恪，派提督李有恒率军数千剿办"反民"。李有恒纵兵剿杀烧掠，百姓伤亡数千人，造成震动全国的"东乡血案"。东乡义士袁廷蛟上北京，向川籍京官哭诉。民愤难平，言官交相参劾，朝廷便调丁宝桢来收拾这个烂摊子。

丁宝桢虽然是清官，却绝非圣人，肚子头小算盘也敲打得滴答响：此次他和文恪对调（文恪调任山东巡抚），利益关联难免相互维护。加之吴棠于慈禧有恩，文恪又是皇胄贵族，岂能乱揭这两位前任的烂疮疤？丁宝桢于是仍将此案认定为"暴民造反"。



丁宝桢书法。字如其人，儒雅正直，形神兼备

但以内阁中书肖宗禹为首的47个川籍京官和原两江总督李经羲、四川学政张之洞等人，都奏劾“丁宝桢轻纵李有恒”。朝廷见事情搁不平了，才由刑部判李有恒、孙定扬（东乡知县）斩决，丁宝桢从一品顶戴降为四品，正印总督也改为署理——只相当于“代省长”，以观后效[4]。

---

[1] 参见《清史稿·列传二百三十四·丁宝桢传》。

[2] 参见《清代野史》，巴蜀书社，1998年。

[3] 参见廖上柯：《丁宝桢与四川》，《成都掌故》第1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

[4] 参见《清史稿·列传二百三十四·丁宝桢传》。

山东和四川近代工业之父

丁宝桢入川就栽了个大筋斗，却不露声色。他对幕僚们说：“君子荣辱不惊。我现虽‘署理’川务，也当尽其职责，以不负朝廷隆恩啊！”

他到东较场阅兵，见兵勇使用的多是古色古香的大刀长矛，也有少数长短不齐的破洋枪。他问下属：“川省兵勇洋枪来自何处？”

一个武营管带说：“川省洋枪，均须购自上海洋行。”丁宝桢拍着案头说：“此中弊病甚多，购来之物价值既昂，多是洋人过时废物，又不知修理之法，稍损即成废物，殊为可惜！更况有事之时，弹药无处购办，枪炮也转为弃物了……若购买洋人枪炮以自强，实自欺欺人！”

丁宝桢捻着长胡子又感叹说：“此既靡耗国家银两又受制于人。中国自强之术，于修明政事外，首在精求武备，才能弃我之短，夺彼之长。我因此才在山东任上建机器局，师夷长技以制夷。你等万不能墨守纲常，也要在四川尽快建立机器局！”

属下望着他，频频点头：“大人所言极是！”

丁宝桢吩咐：“我创办山东机器局时，一再叮嘱该局总办徐建寅：不准雇募外洋工匠一人，以免日后由外人操纵居奇。四川也当如此！”

道员夏时不解，问：“制洋枪洋炮，又不雇洋工匠……这、这行否？”丁宝桢大声说：“中华岂无贤才！去年我在山东时，听说候选通判曾昭吉通晓机器制造，其人口拙不善言辞，最初我问他：‘你见过多少外洋机器？’他回答：‘我没见过多少，但自能冥心独造！’我也不大相信，就把英国人所称极好之枪，名为亨利马梯呢的洋枪给他看，问其能否仿造？曾昭吉略无难色，回称：‘机器亦可意造，何必尽求之外洋？’未及两月，他果然造成120多支枪。对空演放，其效比马梯呢等洋枪似乎还有过之……所以我曾专折奏请皇上，请嘉赏曾昭吉。他现已从候选通判升任为同知了！”[1]

1877年，丁宝桢在成都东门内下莲池街创办四川机器局。他委派候补道夏时、劳文翔总理局务，成绵道丁士彬会同办理。丁宝桢极重视网罗人才，想法把曾昭吉从山东聘来，总理工务（负责工程技术）。曾昭吉带来湖南、山东、江苏籍技工数十人，又在四川招募能工巧匠数百名当工人[2]。

机器局仿照西式厂房共建188间，丁宝桢上奏朝廷称：工厂“崇垣大柱、复屋重檐，安设铁炉烟筒、风箱气管，四通八达。取材既富，用工极坚！”他还几分得意地报告光绪皇帝：曾昭吉还成功制造了“水轮机”，利用成都城内的金水河水力发电带动机器，“灵动活泼，视洋人专借火力尤为事省功倍”。只在冬春水枯时，才用锅炉发电。仅此一项，每天可省煤一千数百斤，合计每年可省煤银四千余两[3]。



1906年建的四川机器局新厂（后称四川兵工厂）旧址

当时成功制造水力发电机，在中国工业史上应该是了不起的大事件。

但清廷中的顽固派对丁宝桢这员“洋务派”的“大将”十分嫉恨。光绪五年（1879），给事中（注：官名）吴镇参揭丁宝桢：“不谙机器，私亏库款，纵容私人，徇庇劣员……”其他顽固派也大骂丁宝桢以数万银两，才造了区区数目的洋枪，还不如直接向洋鬼子买。朝廷忙派御史恩承、童华“查办”。不久公布调查结果说：“原参各款，或查无实据，或事出有因。唯所设机器局费用较巨，制造未能精良。著该督即将此局停止，以节靡费！”

四川机器局在顽固守旧派的骂声中遵旨停办了，四川近代工业幼芽面临夭折命运。

洋务派人士愤愤不平。贵州候补道罗应旒上疏打抱不平：“初创之时，开拓地基、修造房屋以及搬运器械，制造器母，种种费用，俱在此六万金之内，非全以六万金造枪炮也”；“若遽行停止，则前功尽弃”；“而中国之人复不能探讨西学神明变化，而思所以胜西人之法！”丁宝桢也据理力争说：“四川较之别省机器局所费仅十分之一，即较之山东省机器局，所费亦省十之四五”；“所造各种轮机器具，已

成未成共有万数千件。虽未竣工，其洋枪堪以临敌备用者已有百数十杆。”

清政府这次还算脑袋开窍，四川机器局于1880年5月26日重新恢复生产。光绪七年（1881），丁宝桢在成都南郊古家坝江畔增设火药厂，人称“白药厂”。

至1882年9月，共造成前后膛枪4815支、枪弹2000发、铜帽2万枚、黑火药2.48万公斤……1884年至1885年中法开战，为满足云南前线军火的需要，机器局又从英国购买价值2万余银两的机床、汽锤、锅炉等设备，并购地扩建，加紧军火生产。1884年，造成各种枪3050支，枪弹18万余发，铜帽628万枚，铅弹53万发，黑火药3万余公斤。这是丁宝桢督川时期，四川机器局的最高年产量 [4] [5] [6] 。

丁宝桢曾翘起胡子眉飞色舞地说：“近来制造枪药，堪与外洋争胜！”

丁宝桢为啥急于创办四川机器局？作为清廷忠臣，一是为了“对内”：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川省介在边陲数千里，番、猓、苗，蛮环列窥伺。而内地人情浮动……臣居安思危，不敢不深谋远虑！”他认为四川乃西南各省中心，必须靠武力保持稳定。二是“对外”：他在光绪五年（1879）说：“窃唯外洋各国，皆以枪炮雄视一时……近来讲求机器，实属目前之要图！”他把建军工厂视为“自强之要务”，是反对列强侵略的“战胜之术” [7] 。

史料载：丁宝桢督川时，共造枪14900余支；单中法战争时四川调拨给南方边境及清军鲍超部的洋枪就有7000多支 [8] 。这无疑大大增强了中国的国防力量。

清末傅崇榘著《成都通览》中说：“成都之以机器制造物件者，自丁文诚公督川时创办之机器制造局为始。现在已大加扩充，银圆

局、造币厂、劝工局、制革公司、火柴官厂、机器新厂、白药厂、官报书局等继之而起……”

这有力地证实：四川机器局是四川近代工业的开端，产生了四川最早的产业工人和技术人才，其重大意义不容低估。我年少时到风光如画的望江公园随70多岁的陈师爷习武，常听见不远处“砰砰砰”试枪之声。陈师爷对我说：“丁宫保创办的机器局历经变迁，1909年更名为四川兵工厂，厂址在河对岸三官堂，1913年改为陆军部直辖四川兵工厂。抗战后为中国兵工署第20工厂，生产的麻花手榴弹和步枪、机枪是川军主要武器，打日本鬼子时贡献不小啊！”兵工厂解放后改称南光机械厂，是四川有名的军工大厂。

追本溯源，把丁宝桢称为“四川近代工业之父”是一点不为过的。

---

[1] 参见《丁文诚公遗集·奏稿》卷20。

[2] 参见《丁文诚公遗集·奏稿》卷14。

[3] 参见《丁文诚公遗集·奏稿》卷20。

[4] 参见张学君、张莉红：《四川近代工业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

[5] 参见《清史稿·志一百一十五·兵十一·制造》。

[6] 刘东父、周询：《四川兵工厂、造币厂的创立》，《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

[7] 参见《丁文诚公遗集·奏稿》卷20。

[8] 参见《清史稿·志一百一十五·兵十一·制造》。

都江堰和宫保肉丁

1974年后，我曾在灌县（现都江堰市）居住数年。离都江堰宝瓶口不远的内江上，有座古朴典雅的廊桥。游人每到此处，都爱倚栏听滔滔江水响声如雷，那画面真是“乱石穿空，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还会让人生出“无事莫凭栏，无限江山”的惆怅……凡游览都江堰的人，无不被这廊桥倾倒。廊桥是怎么修成的？问人，多不知晓。那时廊桥边的离堆公园就是县图书馆，我费劲去查阅资料，发现廊桥竟和宫保大人有关。

光绪二年（1876）丁宝桢到四川后，都江堰失修已久。他不避怨嫌，第二年就奏请朝廷拨十万两银子大修古堰。这位封疆大吏，“轻骑简从，躬冒霜雪，沿江督率”[1] [2] 。他前后亲到工地12次。此次大修以条石筑堤一万二千余丈，同时疏淘内、外江，修建白马槽、平水槽等工程……

古往今来，贪官污吏黑吃“工程款”的太多，这位宫保大人却两袖清风，大修后剩下两万两银子，他吩咐县令陆葆德：“将此款修一座跨越内江的桥，以利两岸百姓！”于是在清光绪四年（1878），陆县令负责施工，建成“普济桥”廊桥，俗称南桥。



民国初期丁宝桢所修灌县南桥（普济桥）桥头（［美］西德尼·戴维·甘博摄）

这年五月岷江洪水暴涨，堰首工程冲垮一段石堤。这时正想大有作为的光绪皇帝，十分关心四川水患，于9月8日（农历八月十二）发上谕："前据丁宝桢奏，都江堰频年泛滥，冲毁民田，现设法筹款修理。旋闻该处江流盛涨，民间已被水灾，正以新筑工程，能否可靠，地方被灾是否深重，廑念方殷！"[3]

丁宝桢上奏：都江堰大修后沿江无大灾害。但他仍恳切自责："臣之办理堰工，唯有于人字堤一段，泥于经久省费之说，易笼为石。致盛涨时，堰工冲损三十七丈有零，无所辞咎！"

他认真检讨失败原因，察知古人用鹅卵石竹笼很有道理（易于使水"溢泄"）。同年十一月，丁宝桢又自筹经费，恢复古法笼石筑堤……重修都江堰大功告成，川西州县无旱涝之忧，百姓安居乐业。当时人们称颂："公之大修都江堰也，凡七至其地，往复履勘，孜孜

不倦，深仁厚泽入人心者深矣！” [4]

丁宝桢殚精竭虑主持完大修工程，登上二王庙。遥望大江东去，他感慨万千，写下《二王庙感怀》：“龙门凿后大河通，告锡元圭报德崇。别导江流分内外，全将地力遍西东。蜀人庙祀由来久，秦代山川尚此同。善创何人能善述，兴怀救弊恨无穷！”

此诗寓意深远：既有改革救世之慷慨激昂，又有办事坎坷艰难之叹……诗成，人们争相传诵，名流雅士纷纷唱和。二王庙为他立起顶戴花翎的塑像……

关于丁宝桢和“宫保鸡丁”的故事版本很多，老百姓最熟悉的是下面的“龙门阵”：

丁宝桢生活俭朴，常对属下说：“有猪肉鸡肉吃，已是不错，何必吃啥子山珍海味？”他每天吃家常菜，喝两杯土烧老酒。家里请的四川老厨师姓杨，手艺有限，好在宫保大人没啥官架子。有天丁大人亲到厨房说：“喂，伙计！咋个炒菜不变点花样啊？”杨厨师惶恐地说：“大、大人，就这些家常菜料，小人手艺又潮……”丁宫保说：“我来试做一盘，你打下手！”宫保大人挽起袖子拿起刀子，把干辣椒剪成小段，与鸡丁一并下滚烫油锅里爆炒，再加麻辣酸咸甜五味……杨厨师心头直喊黄：“乖乖，没得章法嘛！”菜将起锅，丁大人突发奇想说：“我昨天下酒吃剩的炒花生米，干脆也倒在锅头！”厨师肚皮头已在擂鼓：“我的天王老子，你硬是要乱弄怪味嗦？”

好了，菜出锅。丁宫保尝后自鸣得意：“清鲜醇浓，香味沁心——来，你也尝尝！”杨厨师麻起胆子一尝，忍不住放肆地叫起来：“哎哟，大人炒的这个怪菜，味道好巴适！”从此，这道菜就成为丁宝桢招待客人的压轴菜。

四川名菜“宫保鸡丁”就这样发明了。四川老百姓也口口相传，留

下上面这段龙门阵……“宫保鸡丁”流传甚广，湖南菜馆、贵州菜馆、河南菜馆、山东菜馆甚至一些广东菜馆均有此菜。连2005年10月12日中国航天员乘“神六”飞船上天，在太空所吃的太空餐，也有“宫保鸡丁”[5]。

但很多人不解“宫保”（太子太保、太子少保尊称“宫保”）之意，自作主张易“保”为“爆”，直到现在还有一些饭馆还乱写成“宫爆鸡丁”，看来是不大懂“烹饪文化”了……

---

[1] 参见《清史稿·列传二百三十四·丁宝桢传》。

[2] 参见《灌县乡土志》卷1。

[3] 参见《清德宗实录》卷76。

[4] 参见（清）周盛典：《都江堰灵异记》，载《四川历代水利名著汇释》，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

[5] 参见《鱼香肉丝宫保鸡丁，航天员太空吃川菜》，《天府早报》2005年10月12日。

一清如水死四川

丁宫保在四川任上整顿吏治，薛福成、张荫桓等“德才兼备之人”，抵抗外国侵略有功的长庚、鲍超等，都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

丁宝桢另一项大治绩是实行“盐政改革”。他废除沿途关卡苛捐杂税，严惩贪官四川盐茶道蔡逢年等人；又将横行长江盗贩私盐的奸商“江大烟杆”“谭二疯子”等人斩首示众……盐政改革成效显著，“岁增帑金百余万”，四川及西南各省百姓都受益不少。

清史上说丁宝桢“治蜀凡十年……至是诛匪几尽，声为道不拾遗”[1] [2] 。这当然有些夸张，但他使四川混乱局面大为改观，无疑是可信的。

光绪十二年（1886），67岁的丁宝桢病危。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幕出现了：由于俸金多数用于济困助贫，这位封疆大吏此时竟然债台高筑。他挣扎起身，颤抖着手给朝廷写下最后一道奏折：“所借之银，今生难以奉还，有待来生含环以报！”写毕，笔掉地上，丁宝桢死于任所……

此时正当政的光绪皇帝阅罢奏章，大为动容，立即提笔批上谕：“遽闻溘逝，悼惜殊深！”光绪帝赐丁宝桢太子太保（原为太子少保），谥文诚，并令山东、四川、贵州各省建祠祭祀。礼部尚书李端芬奏请将丁宝桢和曾国藩、左宗棠等同举为中兴名臣[3] [4] 。

丁宝桢死后，家眷竟然因“家贫不能举火，成都府供食数月”[5]

。“穷官”丁宫保死耗传出，四川百姓哭喊：“宫保大人，好官啊！清官啊！”

数千里之外的山东省，百姓也悲恸惋惜，请求朝廷将丁宝桢的灵柩运回山东历城（今济南）九华山麓，与其先逝的前妻合葬。一个离任已十年的外乡官员，被山东百姓视为“贤良”，恳请归葬本土……丁宝桢看来确实不愧为“好官”“清官”了！“旧僚赠赙始归葬”，丁宝桢的家眷靠众官员捐赠的一点银两，才凄然将丁宫保归葬山东[6]。

一乘简陋的马车载着丁宝桢的灵柩，在成都百姓的震天哭声中嘎吱嘎吱地出了东城门，过了长春桥，到了牛市口。驿道旁新搭建的丧亭白旗飘飘、纸钱飞舞，夹道送行的众官员和百姓们默默地目送督川十年的丁宝桢灵车远去。龙泉山上枯藤老树昏鸦，古道西风瘦马……一生为国漂泊的丁宝桢沿着十年前来的蜀道去了。

---

[1] 参见《清史稿·列传二百三十四·丁宝桢传》。

[2] 参见《清代野史》，巴蜀书社，1998年。

[3] 参见《清史稿·列传二百三十四·丁宝桢传》。

[4] 参见《清代野史》，巴蜀书社，1998年。

[5] 参见（清）钱茂：《历代都江堰功小传》。

[6] 参见（清）钱茂：《历代都江堰功小传》。

清末奇人傅崇榘

报刊出版界先驱

清末傅崇矩，是一个在报业、彩票、工业等诸多领域勇开风气之先的奇人，所著《成都通览》堪称清末成都社会的“百科全书”。但这位杰出学者长期以来并没得到应有的重视，以至其生平事迹也不可详考……

大清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五（1900年12月6日），古色古香的成都桂王桥北街33号，寒空中突然鞭炮声声……许多人齐集一家公馆前，门上高悬崭新发亮的“成都图书局”黑漆大匾。人们议论纷纷：“又是啥子生意开张啰？”

一个20多岁、身材矮小的黄脸青年，笑容满面地对众人说：“我们不是做生意，是办《算学报》！”许多人一脸茫然：“《算学报》是啥子名堂嘛？”

那青年朗朗说道：“诸位总晓得，省城里早有用锅烟子印刷‘上谕’‘辕门抄’之类的《京报》《纶音捷报》嘛！但这些官府古董只在官场流通，与百姓无缘。报纸，是老百姓也可以开办印刷、老百姓都可以看的，既传送消息，又启发民智。西洋各国最为流行，所以人家也最先进。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上旬，宋育仁先生在重庆办了个《渝报》，这就是我们四川最早的报纸啰。次年他调省城当尊经书院的山长，《渝报》办了16期也就停刊了。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十五，也就是西历1898年5月5日，宋先生又在省城创办《蜀学报》，其实就是《渝报》的延续，也是成都开天辟地以来的第一份报纸……《蜀学

报》多议论时政、倡导维新。敝人和苏星舫先生合办的这个《算学报》，则是宣传西学博算，开启民智，是成都办的第二家报纸！”



很可能这是至今唯一一张存世的傅崇矩像［出自：傅崇矩《松潘》（1916年石印本）］

人群中有人说：“戊戌变法失败，‘六君子’被杀，《蜀学报》响应康、梁的‘戊戌变法’，被衙门查禁！你们今天开张的《算学报》又当如何？”

那青年脸露不平之色，高声说道：“是呀是呀！这几年中，四川真是莫得人敢说报纸了，谁个又敢开报馆呢？为免覆辙，我们在报上已声明‘专说算学，不敢干涉地方事件’……诸位请进去参观，里面有‘阅报公社’，陈列各省书报61种及东洋日本报纸2种，免费任人阅

读。敝人对西洋杂学深感兴趣，还在里面设‘算学馆’，苏星舫先生任总教习，收徒教授西洋算学！”

这位青年就是四川近代报刊、出版界的先驱傅崇矩（1875～1917），字樵村，他此外还有新樵、樵春、樵斧、过来人、樵新子、亦天等笔名、别号。他1898年肄业于成都尊经书院，在《蜀学报》当过“访事”（编辑记者一类）。

众人蜂拥而入进馆参观。客厅左侧是“阅报公社”，木版印刷、线装书形式的《算学报》摆在正中突出位置，还散发着油墨味。墙上挂着傅崇矩龙飞凤舞写的一首诗：“一觉黄粱梦未成，男儿有志事长征。上书空入红莲幕，投笔难随细柳营。阮籍途穷怜壮士，江淹才尽愧儒生。风尘万里逢知己，愿见荆州识姓名。”

有人问：“这首诗愤世嫉俗，看来先生志向非凡……只是百业甚多，先生为何独要办啥子报纸？”

傅崇矩笑说：“敝人是简阳县石盘乡人，家父讳廷玺，道光时举人，曾任江安、泸州两县教谕，卸职后曾在家乡办傅氏小学堂……我自幼不务正业，却喜杂搜博蓄，所以仕途无缘，从军从政都报国无途，年前随家父举家迁省城。自思如今列强凌辱、国事日非，又见蜀中闭塞、民智不开。而西洋各国之振起，莫不以民智为基础、科学为先导。所以敝人不揣浅陋，斗胆创办报纸，以开启民智为己任，还望能多遇知己啊！”

当时的成都确实太闭塞，《算学报》曲高和寡。过了一段时间，眼看报纸办不下去了。傅崇矩叹气道：“可叹可怜，办了两期，莫得20个人肯要！”只好停刊。其发行量之少，为世界报刊史上所罕见。但《算学报》是四川继《渝报》《蜀学报》之后最早的报纸之一，也是四川有史以来第一份自然科学类的报纸，并以此永载史册。

傅崇矩并不气馁，又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创办《启蒙通俗报》，木版印刷，初为半月刊，第14期起改月刊，影响渐大。出资支持者除一些官绅外，还有德国驻宜昌领事米尔雷，法国驻重庆领事安迪。

《启蒙通俗报》有论说、中外历史、杂录、歌谣、图画、教科书、讲义等栏目，介绍西方文化和科学常识。如一篇文章中说：“可笑可笑！古来说日食月食，是不吉兆的事；古来说雷公火闪，是专打恶人的。如今格致学明，才知道日月食，是算得着的；雷火闪，是考得出的……并莫有吉凶一说。”

当时民众不了解报纸的重要性。《启蒙通俗报》1902年8月曾登了条趣闻：这年7月间，四川制台奎俊想标榜新潮，要选拔人才。奎制台出的考题是“欧洲国际法协调约皆无平等权议”。此题一出，参考的人都大眼瞪小眼！原来，此题出在东京出版的《译书汇编》上，蜀中只有启蒙通俗报馆卖过五本。全川仅刘信臣、傅崇矩、龚向农三人读过；待至放榜，三人分列一、三、六名。傅崇矩事后逢人就嘻嘻哈哈地说：“不读报纸，就是聋子、瞎子、瓜娃子！”

此时官府也晓得舆论的重要了，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四川总督锡良办官报书局。傅崇矩已是省城报刊界“权威人士”，他建议该局“总办”陆钟岱创办《四川官报》，至这年十月十日又发行《成都日报》（这是成都第一家日报）……这些官方报纸因得傅崇矩不少帮助，少了许多官腔冷脸，还拉来一些商界广告。


第五年合資改良

通俗報

今日銀元

通俗日報

今日銀元一千一

傅崇榘主办的《通俗报》和《通俗日报》


通俗画報

傅崇榘主办的《通俗画报》

光绪三十二年（1906），傅崇矩将《启蒙通俗报》改为《通俗日报》。最初用土纸单面印，每份一张半，傅崇矩一人编辑，多用白话。初出的时候，因印刷人技艺不熟，常不能按时发行，或因经济困难停版几天。但它社会新闻多，文艺“副刊”也不少，还随时出“诗

钟”“灯谜”：参加者每人每字出钱二文，作中奖人的奖金，每次收入十到二十串钱。《通俗日报》因这种做法居然大有获益。傅崇矩又聘杨叔尧主持笔政褒贬时事，于是报纸销量日增……其后《通俗日报》分为启蒙、通俗两类，由史嶲峰主持，又改名为《通俗报》《通俗新报》。报纸也改在三道馆街文伦书局用机器排印——在成都这是最早采用现代先进排印技术的报纸之一。

清宣统元年三月一日（1909年4月20日），傅崇矩又创办《通俗画报》作为附刊，随《通俗报》附送。画报上刊登的讥讽官场的漫画活灵活现，如有幅《中西人》漫画，讥讽以“改革”“维新”为幌子的官老爷的丑态，画旁题词是：“一身洋装，满口华语；周身洋货，不遗下体。又非讨口，狗棍夹起。好像闷头，软帽穿起。又不屙屎，把烟咬起。金钱外输，国货不喜。只恨父母，非洋种子。不中不西，人而无耻。改良社会，个个笑你！”

这些画，把官老爷鼻子都气歪了。1911年9月7日在“保路”高潮中，傅崇矩的报纸被查封了。

但清朝很快垮杆。1912年6月29日，玩世不恭的傅崇矩站在他桂王桥北街33号“成都图书局”门口，又乒乒乓乓放起鞭炮来，他扯开喉咙高吼：“我们报纸第三次复刊啰……快来看啊，巴适得很！”

彩票和黄包车风波

傅崇矩是“新潮”人士。大约在电影刚传入成都不久的1908年前后，他就宣称：“电光戏，图书局傅牧村现在东洋习演一年，方购回川，立电光馆。公馆衙署约演者价二十元至三十元。若赴图书局（本书作者注：即桂王桥北街33号）观者，每人价二角。”

他在各种“新政”中也大出风头，是四川彩票业历史上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只是这只“螃蟹”实在难吞，把傅崇矩弄得几乎倾家荡产。

18世纪以来欧美国家发行彩票早已合法化。光绪年后，中国官方也开始发行彩票。光绪三十一年（1905）冬，四川总督锡良奏请清廷批准，在成都七家巷口设四川“彩票公司”（后改名为“票捐总局”）。

初办彩票时人们都不晓得这玩意儿为何物，“众商缩手”，而傅崇矩却一马当先跳将出来。这年寒冬，桂王桥北街图书局大门右侧，又挂起块“富记彩票分行”的大吊牌来。原来有个当过县丞的冯昆山，这时是监印彩票委员。他找到傅崇矩说：“你的图书局每期认销三千张，彩票公司给你特别折扣。彩票局总办翁又申大人连连夸你敢开蜀中风气之先，委任你为‘商董’……老弟，你真是名利双收啊！”



傅崇榘曾经营过的晚清彩票



清末大街上有专卖彩票的店铺

傅崇矩冲锋在前，开办起“富记彩票分行”，成都众商家也纷纷领购彩票。彩票公司为此特委任傅崇矩为售票委员，并对他“悬牌奖励”。

冯昆山是“以权谋私”的高手，不出分文和傅崇矩合伙，所得利润却要“干分三成”。而领彩票需现银，傅崇矩无此财力，只好约朋友曾雅仑合资。曾雅仑不认冯昆山的“干股”，只允傅崇矩占利二成；而冯昆山也不认曾雅仑的入股，只认傅崇矩一人。原说好的照三七成分账，傅崇矩在曾雅仑处只得二成之利，在冯昆山处却需付出三成之利。傅崇矩暗自叫苦：“我白白跑腿奔走，空有三千票之虚名，每期还倒赔一成之利！”

到次年（1906）三四月间，傅崇矩实在玩不下去了，就不再给冯昆山的“入股利润”。冯昆山大怒说：“你既毁约，我只好把什邡钟知县托我经手、在你处所取彩票该付的银钱‘借’来，充我该得之红利！”

更要命的是，这种官办商销的彩票，弊端甚多。票捐局设立后，内设总办一人月薪大洋200元；会办一人，月薪100元；下设委员若干，月薪数十元。另外从总办起，各人月薪加双倍，既领取双薪，每期彩票大奖内还有百分之三的回扣……开办之初，每月发售彩票一次，共印票两万张，每张售10元。每期都有中大彩一夜暴富者，于是百姓争相购买彩票成风，每期彩票卖得精光。“票捐总局”就在正额之外又加出“副票”，来个每期共印五万张，这简直是“杀鸡取卵”，顿时把市场弄得稀烂！

当时省城彩票由各彩票商领销，发全省各地销售。销售滞阻后，每票改售五元，仍十有九家卖不脱，傅崇矩处所剩尤多。外无人买，内不准退。曾雅仑亲戚王西垣又挪借300多元，曾雅仑见势不妙，抽身去也。傅崇矩剩了无数卖不脱的彩票，欠了一屁股的外债，弄得他几乎去撞南墙，连叹：“恨我心计太拙，实不如人。一年之间共亏一万余金，如今势成骑虎，妈呀，给老子咋个办啊！”

彩票局官老爷们巧取豪夺，弄得商民皆困，而官府则大捞好处。自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冬起发行第1期至宣统三年（1911）十月清政府垮杆，六年来四川发行彩票约70期。每期约以50%收入为彩金，余利除局务开支，每月还提两万元补助成都兵工厂（据有的专家称：仅此项前后就有银60万两以上，相当于四川全省某些年份全年缴纳的粮银数）。



晚清各处商铺往往兼售彩票、书报

傅崇矩因经营彩票，同官老爷打交道吃了大亏。1906年，彩票局总办翁又申租赁的福德街谈廷桢州官的公馆，翁因故离蓉要转租，声言无论何人续租，需出他改造花厅的200多两银子。傅崇矩由于多种原因，强装笑脸应承接租，租期以一年半为限，每月租银30两，还另付了改造费。这年5月间，傅崇矩同父母一起入住。因人少屋宽，傅崇矩募集徒工开设工业馆，聘东西教员早晚授课，不料运气实在太霉，竟然连出怪事：女儿和侄女在此屋相继暴死，厨师又在中秋这天抹喉自尽，彩票则无期不亏，学堂也因无款关门……弄得很信科学的傅崇矩也神经兮兮起来：“这房子硬是闹鬼不成？”到这年10月，他为图吉利，将工业馆改为“阜利公司”。

工业馆其实就是个小工厂。原来，这时的傅崇矩又麻起胆子在啃

另一个“螃蟹”了：自造黄包车。

清同治三年（1874），上海从日本首次引进了300辆黄包车，又叫东洋车。1898年，四川商务总局宋云岩在成都创办快轮车（即黄包车）务公司。那年2月青羊宫花会期间，在老南门大桥到青羊宫新修城墙边的土路上，成都首次有黄包车试行，但其后黄包车与轿行因争利打架，官府就禁止黄包车运行了……到1906年，商务局总办沈秉堃很赏识傅崇矩，拨了些银两，委他置备数十辆黄包车作青羊宫花会交通之用。

此时傅崇矩的“阜利公司”就在谈家公馆里生产黄包车。所以说起来，傅崇矩还是成都搞“工业”的老前辈企业家呢！

傅崇矩正想靠造黄包车来赚点银子去填补彩票的“窟窿”，哪晓得谈知州家探知傅崇矩的“工业馆”在此，有木铁工匠100多人，洋车材料堆积遍地，搬迁肯定困难，就乘机要挟涨房租。傅崇矩无奈之极，好话说了几箩筐，房租还是每月涨了10两……黄包车造毕，傅崇矩再无财力供房租，忙于光绪三十二年正月十四日转租贵州馆街的廉价住房。

这时的傅崇矩因彩票积亏捉襟见肘，要把留在谈公馆未搬、约值银200多两的造车剩料青冈木搬回，而谈知州说还欠房租，高矮不准搬走，厉声扬言：“任你打官司，我是不怕的！”

傅崇矩气得发昏，事后逢人就大诉其苦：“对我尚如此不可理喻，他当官时对百姓的手段就可想而知了。诸公，诸公，公理何在！”

价值非凡的《成都通览》

朋友苏星舫对傅崇矩说：“樵村，只怪你乱想汤圆开水喝，才弄得一蹶不振！两年前（作者注：指1904年），你以川中报界名流身份，去日本世界博览会考察，你啥子不买，掏空钱包买了几大口袋各国书籍、图表，在四川是最早从日本购进油印工具。归国时你雄心勃勃写诗：‘秀才出了门，更知天下事。踏遍东西球，遂我平生志。我生不逢辰，长才困专制。今日归故乡，桑邦能展翅！’你还是一心吃油墨饭吧。”

傅崇矩长叹一声说：“你说得对极。归途中我还写了诗感叹：‘出洋反比归家近，入蜀方知行路难。’专制社会中干实事大不易啊……我还是先搞出版、办报吧，开启民智要紧，唯此昏暗中国方能强盛。”

他是很容易激动的人，当下脸红筋涨地呼呼挥笔又写了首诗：“少小从军笔屡投，男儿三十未封侯。士非知己难为用，生不逢时亦自羞。且著新书消岁月，愧无多财到非欧。西方教育东方偏，试看支那胜得无！”

傅崇矩从此一心著述，十余年中，汇集出版了规模宏大的《傅氏丛书》，计有：《中国历史大地图》二十种（从《禹贡历史大地图》分朝编绘到大清统一地图）《万国通商水陆新地图》《四川省文明进步图》《四川省明细详图》《西域古今改革图》《中外商务丛抄》一百卷、《国朝名人言行录》《考订长江水道图》《“山海经”古地今证》……

他还在宣统年间编纂过《自流井》杂志。扬州出盐商，他设计的封面是个穿高领衣、千娇百媚的扬州美女在盐井框架的背景中，这就将扬州、自贡两座盐业城市紧紧连在一起……这种“川盐销天下”的封面设计，以今天眼光来看也是独具创意的。

川中人士无不惊叹：“傅樵村以个人之力亲自编著、校订，出版如此浩繁之图册、刊物、报纸，实奇人也！”



傅崇矩所著《成都通览》

他还当过四川红十字会会长。因他长子傅玉荪、长女傅寿珍及四女、侄女得急病，经中、西医先后治疗无效，都死了，所以他沉痛地说：“可见中西医均不可恃也！”他鼓吹医学应大力改良，小儿要普种牛痘……

傅崇矩对后世的最大贡献，是他费尽心血写的巨著《成都通览》。此书初名《说成都》，1909年问世，全书31万多字，分列400多个栏目，对清末成都的山川、地形、交通、河道、塘堰、物产、寺庙、官衙、仓廒、工厂、银行、邮政、文娱、赌博、妓女、袍哥、官员、学校、商业、行帮、口语、俗谚、童谣、民歌、街道、家具、饭馆……都分项介绍，真是包罗万象。

有人问他："自古史书、志书皆官修。你以一布衣百姓，想传不朽么？"傅崇矩不高兴了，大声说："我以久居成都来介绍成都，比仅是成都过客却来说成都的人好多了。我以亲身耳闻目睹来介绍成都，比仅靠传闻来记录成都的人好多了。我以成都风物百事实录来介绍成都，而不是以笔墨空谈成都。我以调查近事而说成都，不像有的人考据古典咬文嚼字来空议成都……卖弄文字功夫、向官府献媚骨唱颂歌的一些史书志书，历代太多啰，哪还要我老傅来多说！"

确实，历朝四川官修的地方史志，大多为统治者及士大夫流歌功颂德，而对民风民俗、社会下层的记载实在少见。省城商务局总办沈秉堃此时调任云南，他为此书作的序言很中肯："自《蜀都赋》《华阳国志》后，而四川风土殊少记载。虽通省有志，府厅州县有志，近时新编各乡土志，然皆记其往迹，录其大要，未有于风俗人情、日用寻常货物价值汇集成籍者。门人傅生从游有年，恒留心实学，著述甚多。近又著《说成都》一书，邮寄来滇。浏览一通，举凡山川气候、风土人情、农工商业、饮食方言、居家事物，凡百价目、水陆程途，靡不毕载，诚人生必用之书也。以个人之调查，为人群之指南，其裨益社会，岂浅鲜哉！"

荣县籍名流黄芝书在该书序言中，更说出此书价值绝不仅限于成都，他认为凡是中国人要了解西南重镇成都，都该读此书："傅君樵村有《说成都》之作……裒然成巨册，不下数十万言，不假雕镌，自成信史。益州耆旧之传无此详明，蜀中文献之录逊其赅备，盖自有成

都以迄今日未有之新著也！……成都者，全川、全中国人之成都，非成都人之成都也……吾知此书既出，凡蜀人、非蜀人，皆当手一编，以资快睹！”

这本书在诸多方面留下极其珍贵的原始资料，将其称为清末成都社会的“百科全书”是一点不过分的。如说川菜，书中记载的“陈麻婆豆腐”“椿芽白肉”之类四川传统菜肴小吃就有几百种之多。说起抽烟，清末成都这座30万人口的城市，书中记载仅以为人“装水烟”为业者竟达1200多人，可见烟客之多。书中记载清末成都有茶馆454家；理发店有619家、收荒匠714家……连“避蛇蚤”“避臭虫”及逮耗子的行业、方法都有记载。尽管行文大都简略，但各行各业几乎都可以在此书中找到百年前的珍贵资料。

大概受过不少当官的“狗气”，自幼“男儿有志事长征”的傅崇矩也想过把官瘾。1915年，四川都督胡文澜委傅崇矩当松潘县长。这位傅县长看来不是当官的料，他同几个好友、随从徒步上任，沿途写写画画；上任后又四面八方跋山涉水去考察民风民情，还出版了《松潘游记》，备述川边风情，并附图多幅……结果引来官场中斥责声一片：“这个‘傅宝器’不但是‘奇人’，还是个‘怪人’喃！他是去当官还是去旅游啊？简直是白吃干饭！”



1916年傅崇矩署名傅樵斧发行的石印本《松潘》

傅崇矩很快“下课”。他为此曾写诗自嘲：“乙卯三月，出宰松潘。一筹莫展，徒诮素餐。高跻岷岭，亲瞰江源。上雪宝顶，饮玻璃泉。过大海子，游山西天。立玉池上，探金穴前。清风两袖，游记一编。乐哉此游，梦醒邯郸。撒手东归，幸福神仙。影留身去，再订后缘……”据我所知，这首诗应是最早发现川西“九寨沟”一线旅游价值的珍贵记录。

诗中大夸其口，仿佛游玩得多么逍遥、潇洒！其实这个短命县长内心实苦。此后矮小干瘦的他越发借酒消愁、放浪不羁……

松潘县文人周盛祺，在《松潘游记》序言中说："傅樵村以简阳名宿，出宰是邦。下车伊始，首以生聚教诲培养元气为前提，不逾月，百废俱兴，绅民交颂，后以所选的《松潘游记》见示，读后使人异常钦佩。松潘'克服'（郑光路按：指民国）以来，民生凋敝，达于极点，应兴应革之事，不一而足。傅君励精图治，积极进行，使地方渐复原状，并将入松情形道里及一切真象，逐一记载，长数万言。阅者细绎之，岂仅行旅可奉为宏宝，即后来执政者，悉当置诸案头，以作指南之针，其有功边徼实非浅鲜。"

另一位松潘贤达赵翼，也称颂傅崇矩"关心民瘼，其所措施深得治边要领……"如此看来，傅崇矩也很具从政才能。

傅崇矩1918年调任马边任靖国军第四梯团秘书。当年7月7日午，忽然倒地不治，年仅43岁。

对傅崇矩的贡献，早在民国8年（1919）元月1日，孙少荆（署名"行者"）在《川报增刊》上发表的《成都报界回想录》中就说："有两个人是应当特别记一记的。一个是傅樵村君，此君于成都报界可算得一个开山祖师，真正具有记者的天才，只可惜他单有创造力没有持久力，所办的事情没有一件现在还存在的；却是失败为成功之母，若没有他的失败，哪有我们今天的成功。他的报界事业，不但说是办报，就是成都向外埠的通信，也是由他先当起的。现在报界的'大总管'陈岳安君，都是由这位先生那里出来的……"

原来傅崇矩1915年任松潘县知事时，把成都昌福馆经营的"华洋书报流通处"托与其学生陈岳安独立经营。这个流通处成为打破闭塞的四川与外省及世界文化交流的窗口，引进了大量中外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书刊报纸……陈岳安也成为川中报界领头人物，被戏称为"大总管"。川中名流张秀熟也曾评价说："对于开通成都风气、介绍新文化、宣传民主与科学、打开成都'五四'运动的局面，完全靠华洋书报流通处的力量！"

可惜的是，四川如此重要的历史人物傅崇矩长期被人忽视，其等身著作至今除一部《成都通览》外，竟然大都不存于世了；连其生平事迹也不可详考。但是我想："自古真史藏民间"，为国人留下成都清末社会历史如此鲜活记录的傅老先生，就凭一部《成都通览》，也足可永垂不朽了！

参考文献：

关于傅崇矩的史料不多，且十分零碎。作者花大气力查找大量史料写成此文，应是迄今为止最详尽介绍傅崇矩的人物传记。以下为本文主要参考文献：

傅崇矩：《成都通览》，巴蜀书社，1987年。

匡吉珊：《四川通俗启蒙报》，《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二辑，人民出版社，1982年。

孙少荆：《成都报界回想录》，载《川报增刊》1919年1月1日。

成都报业志编纂委员会编内部资料：《成都报刊史料专辑》（18至21辑合刊，1985年至1986年）。

林松柏、吴绍伯：《傅崇矩与成都通览》，《龙门阵》1986年第4期。

林松柏、吴绍伯：《开拓民智的先驱傅樵村》，《四川近现代文化人物续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

魏炜：《我国早期彩票初探》，见http：//jccp_lottery.nease.net/new_page_14.htm。

近代士绅：《关于阅读的絮语》，见http：//longwei.b logdr

iver.com/longwei/64305.html。

《古代海盐的集散中心——扬州》，http：//chi nasalt.com.cn/SALT-3/zgywh031024.htm。

巴金的“家”和《家》

巴金的“老家”

巴金祖籍究竟是何处？尽管这位大文豪名震寰宇，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这个问题都不十分明确。

且先把镜头转回80多年前，1923年4月下旬的一天。春光明媚，成都望江楼下杨柳依依，19岁的巴金和20岁的三哥李尧林，将乘舟东下。到码头送别的人不少，二叔和大哥对巴金兄弟说：“你们这次离家求学，到上海后抽空去趟浙江嘉兴李家祠堂——那是我们的祖籍老家啊！”

成都正通顺街上，那座坐北朝南、富丽堂皇的“李公馆”不就是自己的家吗？自呱呱坠地后，在这里度过了人生最堪记忆的18年……巴金听长辈们说过：祖父李镛当过知县、知州，宦囊丰厚，所以在那条街上买地皮修建了气派的李公馆。当巴金1904年11月25日出生时，李镛已赋闲在家当“老太爷”了。祖父李镛和父亲李道河为巴金取名“尧棠”，字“芾甘”，出自《诗经》中《召南·甘棠》。李镛能诗画，给后辈取名字，当然要引经据典。老爷子想不到的是，日后名震华夏的，不是李尧棠或李芾甘，而是这个后辈1928年自己取的笔名——“巴金”[1]。

这时的巴金疑团重重：李家祖辈是怎么到成都的？祖籍“老家”又是什么情景？

巴金兄弟一月后才到上海，找到了称为“大叔”的远房堂叔李玉

书。1923年6月3日，由李玉书陪同，巴金弟兄俩到浙江嘉兴，来到四伯祖李熙平家。李熙平已80岁，是个须发皆白的私塾先生。巴金急切地问："四伯祖，我们祖辈老家在哪里？"

李熙平拉着两个侄孙的手，泪湿老眼。他告诉巴金：我们李氏祖籍在浙江嘉兴县，世居甪里街。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李文熙游宦入蜀，后来定居四川，才有你们的曾祖李璠、祖父李镛、父亲李道河……而嘉兴李氏呢，李文熙有个兄长叫李寅熙，别号秋门，晚年一直住在嘉兴，是一位风雅诗人，著有《秋门草堂诗钞》四卷……郊外塘汇还有个李家祠堂，是你们的二伯祖李忠清在前清同治年间建的[2]。

两天后，由四伯祖李熙平和堂叔李玉书引路，连同巴金和三哥李尧林共四人坐船去嘉兴近郊塘汇镇祭扫李家祠堂。碧波连天，摇橹唉乃声声……

到了李家祠堂，情景苍凉。我找到巴金1925年写的一篇《塘汇李家祠堂》残稿（此文未收入巴金著作），他满含伤感地描述道：

"由四伯祖口中才知祠堂因斐卿二哥管理不善，加以年久失修，实在败坏不堪。并且斐卿又吸鸦片烟，有时没有烟钱，便把祠堂的东西拿去变卖，到了现在简直不成样子了……我一团火热的心听了这话已冷了一半！""又像破庙的大门一样"，"神龛前放了一张破烂的桌子"，"屋顶是漏的，抬头可见着青天……这就是我们的祠堂！"



嘉兴塘汇镇李家祠堂旧址

四伯祖将蜡烛燃起，他们祭奠后，巴金快然写信回川告知祠堂的可怜现状。

不久，由二伯父李清城出资，委托嘉兴族人修复祠堂。这时，巴金兄弟俩考入了上海南洋中学。1924年1月13日，巴金兄弟第二次到嘉兴，目的是检验修整好的祠堂。

祠堂中供着李氏始祖及李忠清等牌位。墙壁上新嵌的石碑刻着“蓉州二伯祖”出资建祠堂的缘起。为防止管理祠堂的族兄李斐卿再典当供桌，新供桌用砖砌成。李斐卿取出一张皱巴巴的“当票”，巴金兄弟俩花钱把已被典当出去的祠堂大门赎回来。怕这个吃鸦片烟的老兄烟瘾发了再拿门去当，巴金到隔壁棺材铺叫来一个木匠，用铁钉铁圈把门钉牢。那木匠一面钉钉一面嘻笑着说：“现在总取不下来了！”[3]

---

[1] 参见巴金《自传》等多种资料。

[2] 参见《巴金与嘉兴》，嘉兴文化网。

[3] 参见巴金：《塘汇李家祠堂》。

巴金祖辈入川脉络

这次，巴金在四伯祖李熙平家住了十天，经常带堂妹李德妤和李德娴去槐树头玩，买玩具皮球。到1991年，80岁的李德妤回忆起当年的巴金，笑着说："堂哥人真和善，就是四川话有点难懂。" [1]

确实，"老家"祠堂虽已修好，但巴金在"老家"人眼中，其实已是地道的四川人了。巴金祖辈入川详情，至今似未见专文。我根据各种零散资料，在此简单归纳李氏入川经过如下：

巴金祖籍是浙江嘉兴县，李氏世居里街。高祖李文熙（号介庵），1786年随长兄李寅熙（号秋门）到北京，后来教过书。李文熙儿子李璠在《醉墨房仅存稿·先府君行略》中说：介庵公李文熙因为课徒有方，被学生家长感恩，代为"捐布政司'照磨'一官报之，分发四川……"

"照磨"为"从八品"文官。李文熙有了这个"前程"，在1818年"宦游"入川。他当过青提渡盐场大使、崇庆州"同知"等职，后定居成都。我遍查地方志，射洪县有个叫青提渡的集镇，是传说中目连和尚修证成地藏王菩萨的故里 [2] 。李文熙可能先在此当过管理盐场的小官吏，后慢慢升为正五品的"同知"……

李文熙生有儿子李璠，为巴金的曾祖父。据李治墨先生说："李璠历署四川南溪、筠连、兴文、富顺等多县，并卒于定远县任上。" [3]

此后是巴金祖父李镛，他在成都正通顺街购建了森严堂皇的“李公馆”。

徐开垒先生在《巴金传》中说：“（李镛的原配和续弦）两位夫人为李镛生下了五个儿子和三个女儿，其中一子二女早年夭亡。李镛在前两个夫人谢世后，又讨了两个姨太太，为他带来一个足以做他的孙子的第六个儿子。”巴金曾这样回忆李镛：“祖父是一个能干的人，他在曾祖父死后，做了多年的官，后来‘告归林下’，他买下了不少的田产，修了漂亮的公馆，收藏了好些古玩字画。他结过两次婚，讨了两个姨太太，生了五儿一女，还见到了重孙。”[4]

巴金父亲李道河，当过清朝四川广元县最后一任知县。巴金已是李氏一支迁蜀后的第五代人了。

这里有一个可能很少人会想到的有趣的现象：巴金高祖李文熙，熙字与“火”有关（熙下四点通火）；曾祖李璠，璠字与“土”有关（玉通土）；祖父李镛，“镛”字与“金”有关。李镛有李道河等五子一女，名字之中都有“水”；而巴金（李尧棠）及他的兄弟们，名字中都有“木”……

这明显是受中国传统文化五行学说的影响。我早年业医时就常背诵“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很可能李文熙自入川后，就定下为后辈取名的“五行相生”的顺序，以祈求在四川能子孙繁衍、生生不息……

高祖的愿望没落空。仅巴金这一代，巴金就有两兄、两姊、两弟、三妹。整个大家庭有长辈近20人，兄弟姐妹30余人，男女仆人四五十人。这就是被巴金称之为“二三十个‘上等人’和二三十个‘下等人’”的大家庭……

照理说，像巴金这样名震海内外的文豪，上文叙述的其祖籍情况

及前辈入川事略，本该早为世人知晓，奇怪的是并非如此。

我遍查资料，包括专门的《巴金传》之类，对此大都语焉不详。我还查阅了1967年5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彻底批判大毒草〈家〉〈春〉〈秋〉》。本来，善于“挖祖坟”、骂祖宗八代是“文化大革命”的特色和惯伎，但那篇长文中除了空洞地骂“封建地主官僚的孝子贤孙”外，也没啥实际内容。

这大概是巴金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即1966年8月将保存了四十几年的大哥尧枚的一百多封信件全部烧掉，同时被毁的还有1923年至1931年间的家信及大哥自杀前写的绝命书及其他许多抄本等……[5] [6] 虽然少了被“批判”的罪证，却损失了许多研究巴金的珍贵史料。

于是，直至20年前，巴金的祖籍在何处？先人是怎样入川的？都成了模糊的谜团。

---

[1] 参见王学平：《巴金的祖籍情结》，《嘉兴日报》2003年11月18日。

[2] 参见《三台民俗趣事录》。

[3] 李治墨：《巴金家族历史说法正误》，《中华读书报》2006年10月21日。

[4] 巴金：《家庭的环境》。

[5] 参见李辉等：《巴金生平及文学活动事略》。

[6] 参见李致：《我和我的四爸》。

嘉兴“老家”寻踪

到了20世纪80年代，《嘉兴科技报》总编丁士选先生碰上了一件他大叹是“令人耳目一新的事”。原来，曾任国家水利部副部长的汪胡桢，籍贯是浙江嘉兴。汪胡桢和丁士选常有信件联系。1985年12月14日，汪胡桢寄来一封让丁士选“惊得跌落眼镜的信！”信中说：1955年中国派友好代表团访问印度，郭沫若为团长，巴金和汪胡桢都在代表团内。途中闲谈时，巴金告诉汪胡桢自己也是嘉兴人，是后来定居到四川的。汪胡桢要丁士选查实一下，还说：“如调查属实，真的可算是一条大新闻了！”

丁士选立即带一名记者走访杨柳湾，访问百岁老人。丁士选说：“在我所看过的巴金著作中，也没有丝毫提及过嘉兴是他祖居地之类的话。”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巴金《真话集》中有篇1978年写的《西湖》，才讲到过：“我们家原籍浙江嘉兴。”该书1979年8月在香港三联书店出版，国内看到的人不多。

丁士选先生的访问没有结果，忽然想到巴金还健在，何不请他本人亲自核证呢？于是他通过上海《收获》杂志社给巴金转寄了一封信。没想到就在发信这个月的26日，巴金即亲笔回信：“来信读悉，我出生在成都。至于我的‘家世’，我在随想录《真话集》中写着。我们家原籍浙江嘉兴（我的高祖李介庵去四川），在嘉兴，过去（在塘汇）有一所李家祠堂……我有病，写字困难，不多讲了，请原谅。附笔：伯祖父的名字我也早忘记了。”

近80高龄的巴金抱病写信，《嘉兴科技报》编辑部同人们很感动。丁士选先生感叹：“凡炎黄子孙，对自己祖先生地都有一种浓厚情谊。这位世界文学巨匠，也不例外！”[1]

为考证巴金的祖籍，嘉兴市志办副主任徐云飞和编辑陆明，多次逐村访问，最后在塘汇镇西找到李家祠堂得以证实。巴金得悉后十分高兴，于1991年1月9日向嘉兴市赠送了他1925年写的《塘汇李家祠堂》手稿。此文记述了当年他去嘉兴祭扫祖先祠堂的情形，写毕即寄回成都家中，从未发表过。1991年2月23日，《嘉兴日报》副刊才首次发表此文。

我于2002年秋专门去嘉兴，但很失望，没有找到巴金笔下李家祠堂的一片残瓦！有一位85岁的老大爷，他经常带人去看“巴金当年下船的地方”“当年喝茶的茶楼”，但如今其实是什么也没有——祠堂早已被拆毁，不留一点痕迹了！

嘉兴市很看重巴金祖籍这个“文化资源”，2001年在嘉兴甪里街民丰会堂对面大榆树下，修了一座“仰甘亭”，旁边的石碑上写着：“文学家巴金，原名李尧棠，字芾甘，生于四川成都，祖籍浙江嘉兴。据巴金曾祖父李璠撰《醉墨房仅存稿·先府君行略》：李介庵（即巴金高祖李文熙）‘浙江嘉兴府嘉兴县人，世居甪里街’。嘉兴市旧城改造指挥部立。辛巳年夏。”

---

[1] 参见丁士选：《重提一件鲜为人知的事》，《嘉兴日报》。

成都的“家”

成都，才是巴金生于斯长于斯的真正故乡。

走在“李公馆”所在的正通顺街上，这条马路与中国任何一座城市的任何一条马路都没啥区别，车水马龙。故居门前是不能随意进出的军事单位：成都军区战旗歌舞团。

曾任歌舞团副团长的张耀棠老人在巴金旧居工作、生活过30多年，他对我说：许多国外友人，如水上勉先生为团长的日本作家代表团等，到这里参观时，都为不能在旧址恢复巴金故居深觉不解和惋惜…… [1]

我自幼就晓得成都正通顺街很有名。其实那街不足一里长，极为普通。有名的原因，是“山不在高，有仙则名”：街巷里曾有过一座坐北朝南、富丽堂皇的“李公馆”，公馆里诞生了现代文学巨匠巴金。

1904年11月25日，巴金在这条老巷中的封建官僚地主家庭呱呱坠地，并在这里度过了人生最堪记忆的18年。巴金的小说《家》成为“不朽名篇”，而正通顺街上的这个“家”，如今却片瓦无存、旧迹全无了。



巴金故居解放后已成为成都军区战旗文工团

清末正通顺街上的官宦住家不少。“李公馆”的西邻是清末驻藏钦差大臣风荃的公馆，民国时期曾租给英国人作为“领事馆”；东面是赵公馆 [2] 。

街上曾有个大仙祠，逢年过节香烟缭绕热闹得很。街头街尾还有酱园行、茶馆、轿子行等店铺……

当我还是懵懂的初中学生时，就津津有味地读过《家》。巴金在《我的老家》中说，自己“不知不觉地把高公馆写成我们家那个样子”，许多景物“全是如实的描写”：

“几家灯烛辉煌的店铺夹杂在黑漆大门的公馆中间，点缀了这条寂寞的街道……有着黑漆大门的公馆静寂地并排立在寒风里。两个永远沉默的石狮子蹲在门口……每个公馆都经过了相当长的年代，或是更换了几个姓……这所公馆屋檐下也挂着一对大的红纸灯笼，只是门前台阶下多一对长方形大石缸，门墙上挂着一副木对联，红漆底子上现出八个隶书黑字：‘国恩家庆，人寿年丰’。两扇大门开在里面，门上各站了一位手执大刀的顶天立地的彩色门神……”从油亮的黑漆大门进去，是一堵白色照壁，四个土红色的篆字“长宜子孙”，嵌在照壁中央。公馆四进院落，几十间青瓦小房，还有花园、竹林…… [3]



巴金家庭1907年合影。左三为外婆怀抱巴金



巴金故居复原图。成都军区战旗歌舞团原副团长张耀棠，曾在巴金故居工作生活了30多年，他根据考察考证，复原了巴金故居旧貌，并将此图送给巴金



巴金故居旁的“双眼井”

妈妈陈淑芬疼爱和自己生日相同的幼子巴金，大哥尧枚、三哥尧林和两个姐姐都处处照顾这个“四弟”。

巴金儿时，想来曾在公馆前石狮子身上爬上爬下。街上有口双眼井，清澈的井波也一定经常映照他童年的身影，所以巴金晚年曾说：“只要双眼井在，我就可以找到童年的足迹。”

正通顺街上的巴金的“家”如今已荡然无存，好在还有个紧临马路并无清水的双眼井，让人在仰望林立的高楼时，发思古之幽情，产生许多郁闷。

---

[1] 据曾任战旗歌舞团副团长的张耀棠先生给作者提供的史料。

[2] 据曾任战旗歌舞团副团长的张耀棠先生给作者提供的史料。

[3] 参见巴金：《我的老家》。

广元的“家”

巴金5岁这年又有个“家”，在广元。因为1909年父亲李道河任广元县知县。

巴金回忆这个“家”时说：“衙门很大一个地方，进去是一大块空地，两旁是监牢，大堂，二堂，三堂，四堂，还有草地，还有稀疏的桑林，算起来总有六七进。我们的住房是在三堂里面。最初我跟着母亲睡，睡在母亲的那间大的架子床上。热天床架上挂着罗纹帐子或麻布帐子……黯淡的灯光，哔剥哔剥地燃着。”

这个“家”，在广元唯我独尊，连猎户进山误杀了老虎，也会把它抬进城献给“父母官”李道河。幼年巴金随哥、姐在二堂书房跟家塾先生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在衙内桑林中嬉戏和摘吃桑葚，嘴巴染得通红。晚上，母亲在油灯下教巴金兄弟读《白香词谱》，早上，十二三岁的丫头香儿陪巴金到鸡房给闹喳喳的群鸡点名、喂食……

给巴金印象最深的，却是他在衙门角落观看父亲坐堂审案的情景：“父亲猛然把桌子一拍，两三个差役就去把那犯人按翻在地上，给他褪了裤子，露出屁股……‘给我先打一百小板子再说，他这混账东西不肯说实话！’‘青天大老爷，小人冤枉呀！’那人趴在地上杀猪也似的叫起来……”[1]

父亲总爱“大刑伺候”草民，屁股被打得稀烂的“犯人”，挨完打还

要提着裤子给大老爷磕头“谢恩”……

李道河是广元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县令。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他辞官回成都。做了两年县官，回成都后就买了40亩田，别人还说他是一个“清官”！虽仅五六岁，巴金已觉得世界怪怪的[2]。

巴金曾家居广元，很令广元人骄傲。有年我去广元，住利州宾馆。经理自豪地说：“这里曾经是巴金住了两年的家——清朝县衙门就在这儿嘛！你不信嗦？院坝里有两棵老榆树，就是巴金一家人住这里时栽的，我们广元人称为‘巴金树’！”

---

[1] 参见巴金：《我的老家》。

[2] 参见巴金：《我的老家》。

巴金的“家”和小说《家》

当我还是懵懂初中学生时，常和同学跑到正通顺街上寻觅文豪之家。附近老人说：“这个家四进院落，几十间青瓦小房，还有花园、竹林……以前气派得很！”

那时，我们这些十三四岁的初中生，心里又有了新的疑问：“吔，这个家气派得很嘛，他咋个要恨这个家啊？”

那时我们还不知道：要读懂巴金的书，就要读懂巴金的“家”。

百年前的成都，300多条街巷，30多万人口，古老而慵懒。但在闲适空气中饱含着危机，用李劼人的话说，那不仅是“死水微澜”，而且已是“暴风雨前”。

从广元回成都，7岁多的巴金已很懂事。巴金爱在阴暗、污秽的门房、马房、厨房里，听轿夫、佣人们讲人生酸甜苦辣的龙门阵。“下人们”把这个“小主人”当做同情他们的小朋友，向他大倒苦水，无所顾忌地评论“老爷”们的好坏……

巴金眼睁睁地见他们在劳苦生活中屈服、挣扎、死亡：60岁的老书僮赵升病死在门房里；抽大烟的仆人周贵因偷祖父字画被赶出去，沦落为乞丐，最后冻饿死在街头。一个老轿夫，竟用一根裤腰带在公馆大门上吊而死……

每当巴金听着“下人”们绝望长叹时，他眼里总含着泪珠。巴金曾

这样回忆："在富裕的环境里我接触了听差、轿夫们的悲惨生活，在伪善、自私的长辈们的压力下，我听到年轻生命的痛苦呻吟！"[1] 所以他后来说："我写《家》的时候，仿佛在跟一些人一同受苦，一同在魔爪下面挣扎……"[2]

巴金一天天长大，还惊诧地看到一些长辈的丑恶：抽大烟、勾引老妈子、奸丫头、玩小旦、争家产……



巴金小说《家》初版封面

家中变故迭起：可爱的小丫头香儿死了；1914年农历七月，母亲病故，10岁的巴金饱尝了"少年丧母"的人生大悲哀。母亲死后四个多月，二姐尧桢死于肺痨。亲戚中许多姑娘的不幸也不断刺伤着巴金。一位姨表姐在民国以后，还抱着死了的未婚夫的牌位拜堂成亲……

1931年他的成名之作《家》，就根源于成都这个真实的家。但小说中人物虽有“家”的真实影子，结局却有很大不同。

小说中几个女主人公：瑞珏、梅、鸣凤、琴，代表四种不同性格。而真实情况是：巴金的嫂嫂虽然在祖父死后，被逼搬到城外茅舍里生小孩，却并未像“瑞珏”那样悲惨而死。巴金有个像梅那样的表姐，当初跟大哥感情很好。因姑母不愿“亲上加亲”，生生拆散了他们。当巴金1942年在成都重见她时，她早已做了活得滋润的富家填房少奶奶，十几年内生了一大群儿女，且变成爱钱如命的胖女人……这和小说中黛玉般哀怨、痛不欲生的“梅”差之天远。

小说《家》中和“觉民”恋爱的琴，以他一个堂姐为原型。巴金把当时“少数新女性的血液注射在她的身上”。书中的琴是个娴雅的“新女性”，而现实中堂姐的情况却让人沮丧：这个曾读过不少新书刊，有着不少新思想的堂姐，被父母关在古庙似的家里，成了性情乖僻的老处女。巴金1941年回成都见到她，当年亭亭玉立的堂姐，已成“弱骨支离”的“老太婆”！巴金在小说里借用了她写的两句诗：“往事依稀浑似梦，都随风雨到心头。”这其实也是巴金的真实感受。

李公馆还有个丫头翠凤，李家远房亲戚要讨她做姨太太，她坚决拒绝，但并未被李家强迫。她也并不像小说中的鸣凤去爱上了少爷，而是嫁给了一个穷丈夫过平民日子……而《家》中的鸣凤与少爷“自由恋爱”不成，跳水自尽，是《家》中最精彩的故事高潮，让读者泪飞如雨。

巴金说：“我写梅，写瑞珏，写鸣凤，我心里充满了同情和悲愤，我庆幸我把自己的感情放进了我的小说。”

把“家”中的现实生活升华并赋予太多个人“感情”色彩（即“虚构”），这就是小说《家》。巴金曾说：“许多人以为《家》是自传，我早说过这是一个错误。但这声明是没有用的！”

许多亲戚以为巴金把小说当做个人泄愤的工具，一个叔父甚至写信对他说：“谢谢你笔下超生”！巴金反复声明：“我并不是写我自己家庭的历史，我所要写的应该是一般的封建大家庭的历史。”[3]

客观地讲，小说《家》是巴金年轻时的作品，本身并非完美：为了批判，他激情过于显露夸张，冷静剖析和刻画不足，语言也有些枝蔓冗繁……正因如此，巴金自己始终也不满意，先后对其作了八次修改。

事实上，巴金在其他一些文章中，对在小说《家》中被批判的人物如祖父、伯父等，都有更客观和人性化的回忆。我认为弄懂这点很重要。否则，如生搬硬套，把巴金的真实的“家”当成罪恶之薮，不但对这个“家”不公平，而且极可能从中误读百年前的成都，将这座历史文化名城视为黑狱。

---

[1] 参见巴金：《我的老家》。

[2] 巴金：《谈〈家〉》。

[3] 巴金：《家》十版序言。

离开成都的“家”

1917年的春天，川、滇军阀在成都发生巷战。不久，父亲病死。1920年2月19日，祖父因最宠爱的儿子、巴金五叔的堕落败家而大受刺激，痛苦归天……大厦已倾，倾轧更剧，封建大家庭温柔敦厚的假面具已被赤裸裸撕开。祖父死后才一个星期，尸骨未寒，巴金叔父们为争夺遗产，在灵前已吵得不可开交！

20岁的大哥李尧枚中学毕业时就结了婚，新娘是父亲在祖宗牌位前拈纸团决定的。李尧枚这个大家族的长房长孙掌管着全家家务，却性格软弱，饱受攻击、中伤，内心极度压抑苦痛，因此神经有病，常深夜打碎玻璃。（1931年春天，大哥终于用毒药断送了自己的年轻生命。大哥是小说《家》中主角“觉新”的原型。大哥自杀那一天，巴金小说《家》刚写到第六章，题目就叫：《做大哥的人》。）

1923年4月，春天里一个烟雨蒙蒙的早晨，成都望江楼下码头，江水滔滔。19岁的巴金和20岁的三哥李尧林，将乘舟东下，外出求学。

巴金在这座古城整整居住了18年，他似乎没有丝毫留恋：“我把这个大家庭当做专制的王国，我坐在旧礼教的监牢里！”

他在大哥送行的眼泪和惜别声中登上木船。他真的一点不留恋故土，不留恋家吗？事实并非如此。

我再次翻开小说《家》，细读书中的结尾。书中的“觉慧”是独自

私逃求解放，而巴金是家庭支持离家求学。但《家》中描写“觉慧”在木船离岸时的情景，无疑是巴金此刻心情的真实写照：

“他们立在岸上，他立在船头。他跟他们对望着，彼此不住地挥手……他觉得眼光有点模糊，便伸手揩了一下眼睛……他再也看不见他们。他的眼睛所触到的，只是一片清莹的水，一些山影和一些树影。三个舟子在那里一面摇橹，一面唱山歌……”这是80多年前望江楼下江流送别的风俗图画，也是巴金当年和亲人依依不舍别离的真实画面。



1923年春天，巴金与三哥负笈东下临行前的全家合影。后立者：右一为巴金，右二为三哥尧林，右三为大哥尧枚



从左至右：李尧林、李尧枚、李尧棠（巴金），1923年摄于成都

19岁的李尧棠就这样离开了故乡成都。而中国大地上，却即将走来一位文坛大师——巴金。

1949年以前的两次回“家”

1923年4月下旬，19岁的巴金离开成都到南京求学。当轮船随着鸣叫声西出夔门，他伸开双臂向着三峡外的新天地欢呼：“啊，我离开旧家庭，就像甩掉一个可怕的黑影！”

岁月流逝，漂泊日久，巴金却日益怀念家乡了。他这时深深感到：离乡时不知留恋，而家乡却无时不在他心中，在他笔下。

抗日战争开始，1940年12月，36岁的巴金辗转到重庆[1]。1941年1月，游子第一次归乡。掐指算来，离开家乡蓉城整18载。

巴金住在莹华寺街李致家。李致是他大哥李尧枚的儿子。巴金曾说：“大哥是我一生爱得最多的人。”他主动担负起大哥全家的生活费用[2]。

巴金走到那条铺满自己脚板印的正通顺街凭吊。他曾诅咒过的大家庭早已分崩离析。巴金曾说：“我的二叔以正人君子的姿态，把祖父留下的家业勉强维持了几年，终于带着无可奈何的凄凉感离开了世界。以后房子卖掉了，人也散了，死的死，走的走……”

巴金后来回忆凭吊旧址的情景：“我走过我离开了18年的故居。它们在我的眼里仍然十分亲切。我认识它们，就像见到了旧友故知一样。石板道变成了马路，巍峨的门墙赶走了那一对背脊光滑的石狮子，包铁皮、钉铜钉的门槛也给人锯掉了。我再也找不到矮矮的台阶下，门前路旁那两个盛水的大石缸。我们称石缸为‘太平缸’。”



1941年，巴金回成都时与妹妹及侄女、侄儿们合影（中为巴金，右一为李致）

物是人非，李公馆几经易手，门匾曾换为“怡庐”，如今又卖给省城保安处长刘兆藜，门上方赫然写的是“藜阁”，门前还有武装士兵，巴金连大门也没进…… [3]

家族中也变化惊人。巴金回来这个月，他五叔因当“小偷”，又穷又病死在监牢。这位“五老爷”流水般花光了分家所得钱财后，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和窃贼。巴金深为面貌清秀、能诗能文的五叔惋惜：“换一个时代，他也许会显出他的才华！”巴金十分伤感，后来写了中篇小说《憩园》，书中杨老三即以五叔为原型 [4] 。

巴金友人马宗融之妻罗淑，是个漂亮的成都女子。1936年，其处女作《生人妻》在巴金、靳以主编的《文季月刊》第 [5] 卷第4期发表。罗淑1938年2月27日生小孩后不幸病死，年仅35岁，葬在成都老西门外沙湾i。巴金怀着悲伤心情去罗淑墓前祭奠，默默地点燃香烛。他痛惜这位同乡、难得的女作家早逝，决心为她整理出版遗著《生人妻》《鱼儿坳》和《地上的一角》……

就这样，巴金在重回故乡的欣喜中又饱含哀伤，在久违的家乡爆竹声中过了春节。巴金这次在成都整整住了50天。

一年后的1942年4月，巴金再次回成都，仍住李致家。这次回来的目的之一，是要到华西坝医院治牙病。李致年小贪玩，放学回来就和邻居娃娃们打仗、捉猫猫……巴金说："你一天到晚不回家，我给你改个名字，叫李国飞！"

李致家招待巴金的饮食很简单，烧木炭渣的土火锅吃菠菜煮豆腐。李致跟巴金合睡一个大床，每晚李致上床，还要翻几个筋斗玩……这时，巴金往往就坐在书桌前爬格子写文章。

很多青年学生拿"纪念册"来请巴金题词。李致在一旁见四爸题："路是人走出来的……"便自己也做了本"纪念册"，请四爸题词。四爸坐在大书桌前，用毛笔写下四句话："读书的时候用功读书，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

李致说过："随着年龄的增长，对这四句话的理解才逐步加深。这四句话中最主要的是'做人得做好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李致曾对巴金说："第一句是用功读书，我在学习时没有做到，离开学校以后才有了自觉性。第三句是讲真话，我基本上这样做了，但也讲过某些违心的话。第四句话是做好人，这是奋斗目标，还要不断努力。" [6]



为巴金侄儿李致（右）和本书作者郑光路（左）在交谈（雷康摄）

李致曾任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等职，现为四川省文联主席。我每年参加四川作家协会的春节团拜会，总见李先生祥和端坐，细声细语地同认识或不认识的作协会员们闲聊，毫无“官气”。我和他并不太熟悉，记得有一年我对他说我长期在“文化大革命”史、地方史方面作些努力。李先生热情地说了许多鼓励的话，同我亲热合影……从李致先生“长者之风”上，确实可看到巴金对他的巨大影响。

巴金这次回成都住了三个月，创作小说《猪与鸡》《兄与弟》和散文《在成渝路上》等，7月由成都至重庆[7]。

---

[1] 参见2005年6月26日《北京娱乐信报》上《巴金的两个哥哥》。

[2] 巴金：《谈〈憩园〉》，《巴金选集》第十卷，第193页。

[3] 巴金：《和读者谈“家”》。

[4] 参见《罗淑选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

[5] 参见巴金：《我的老家》。

[6] 参见巴金：《谈川剧的书信》。

[7] 参见2005年6月26日《北京娱乐信报》上《巴金的两个哥哥》。

“文化大革命”前的两次回“家”

一晃14年过去，星移斗转，已是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了。1956年12月，52岁的巴金第三次回成都，是以全国人大代表身份回来考察工作的。

他的老友、成都市市长李宗林热情接待。他参观了都江堰、商业场、草堂寺和省图书馆等地方。10日，他出席四川省文学创作会议并作有关创作问题的报告。他又去了正通顺街，在旧居窗下徘徊良久。他说：“我又来到这里，‘藜阁’依然，而那个作威作福的主人已经完蛋了。”

巴金这里所说的那个“藜阁”的主人，指的是刘兆藜，南部县水音乡人，国民党中将师长，抗日爱国将领，1949年12月起义。

巴金这次在成都待得不久，下旬就赴印度新德里参加亚洲作家会议去了。

1960年10月初，巴金第四次回成都。成都市市长李宗林安排他住在幽雅僻静的学道街省委招待所。巴金在这座小楼上陆续写了以朝鲜战争为题材的小说《回家》《军长的心》……

他虽长居异乡，对家乡剧却有特别的感情，曾说：“我在上海重看川戏就有一种旧友重逢的感情！”[1] 巴金在成都住了四个多月，看川剧多达三十多场[2] 。巴金多次称赞川剧文学性强，他认为川剧《评雪辨踪》《拉郎配》等，应当列入世界喜剧名作之林……[3]

这次他在成都同亲朋好友共度春节，还见到少年时期教自己学英语的香表哥（濮季云）。

住了四个月，巴金1961年2月才从成都回上海。

---

[1] 参见李致：《巴金偏爱川剧》。

[2] 参见《巴金说“不”——访巴金侄子李致》，《解放日报》2004年11月24日。

[3] 参见李致：《巴金偏爱川剧》。

1987年第五次回“家”

1987年，巴金83岁，他老了。

巴金熬过了“文化大革命”。他在反思，没停下手中的笔。他晚年思乡之情更浓，1983年他在《随想录》中说：“近来我非常怀念家乡，大概是到了落叶归根的时候吧！”“我多么想再见到我童年的足迹！我多么想回到我出生的故乡！”他在给李致的信中，也多次写道：“总之，我闭上眼睛之前要回故乡一次，实现我多年的愿望！”

他对李致等人多次说：“我这次回成都，完全是个人行为，会会老友，叙叙家常，最好是静悄悄地来，静悄悄地去，不要惊动任何人。”直到将行，他又提出：“一不参加宴席，二不参加会议，三不接受采访。”

据说四川省委尊重这位老人的意见，给有关单位打招呼：对巴金故乡行注意“保密”，仅四川电视台跟踪拍摄，但不报道，留作资料。[1]

1987年10月3日6时50分，在后辈们“太爷爷”“四外祖”的欢叫声中，巴金回到成都。啊，梦中思念的故乡，阔别又是27年了！

4日上午9时后，张秀熟、沙汀、艾芜、马识途和省作协副主席陈之光来看望巴金。这年张秀熟93岁，巴金、沙汀、艾芜都83岁，马识途73岁，有人笑称这是“五老聚会”。马识途笑嘻嘻地说：“我是小老弟，再等7年后，张秀老百岁，巴老、沙老、艾老90岁，我们再相

会！”

曾任蜀风园经理的张绍宁回忆当时有趣的小花絮：聚会时“五老”正谈文论诗，非常热闹。当时保卫严格，但有个小伙子竟意外地从窗口翻进了会客厅，手里拿着一张首日封想要巴金签名。这一“突发事件”把所有人吓出一身冷汗。警卫立即上前阻止这位“追星族”，但巴金毫不犹豫地满足了这位年轻人的要求，在首日封上认认真真签下“巴金”二字 [2] 。

晚上，省委书记杨汝岱、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何郝炬、省委宣传部长许川来拜望巴金。杨汝岱笑着问：“巴老到成都，身体是否适应？”巴金说：“还可以吧，年纪大了，落叶归根，想回家乡看看啊。”

何郝炬说：“我上中学，就读过巴老的激流三部曲！”巴老说：“写得不好。”

10月5日上午近9时，大家陪巴金参观市景。看了新修不久的蜀都干道，又到总府路的商业场。巴金感叹：“我大哥李尧枚就曾在商业场一家公司上班，我10多岁时常到我大哥这里看新潮书报！商业场已非旧貌啰……”

10月7日是中秋节，“五老”去新都，游了宝光寺、桂湖。县里领导都来了，记者密密麻麻。午餐时，众人本想吃豆花，却只有一碗，其他肉肴却多，令“五老”遗憾。下午归蓉，李致和他的三个姐姐、姐夫及小辈共20人，向巴金拜节。重孙辈的潇潇、齐齐、淳淳和兰兰围着太爷爷乱嚷。淳淳把月饼给巴老送上，潇潇和齐齐忙说：“他吃过的！”巴老说：“小娃儿吃过的，没关系。”便把月饼吃了。众人哄堂大笑，其乐融融。

成都的中秋少见月光，但这晚却月华似水。李致说：“巴老，月亮也为你回乡而出啊。”

10月8日上午9时半，巴金去正通顺街旧居。这里早已成为成都军区战旗歌舞团驻地，时任歌舞团副团长的张耀棠老人曾在巴金旧居工作、生活过30多年。此时，他全程陪同担当讲解员。

张耀棠热情地对我详细讲述了巴金当年参观旧居的情景：

当巴金女婿祝鸿生推着巴金的轮椅走进大门后，张耀棠介绍说："巴老，自你1923年离开成都后，1924年省督军杨森修马路，李家院墙改成铺面，门口两个石狮子和两个太平缸也搬走了。1927年由李家人卖给川军29军军需处长罗度能，院里还住过啥李营长和一个姓周的开当铺的……抗战开始，这所院子里办过'大中'中学，时间不长。约在1939年，罗度能把院子卖给省保安处长刘兆藜……刚解放时这里成为西南军区药材库。1952年，四川军区文工团军乐队、歌舞团等入驻李公馆故居及左右院落。"



1987年10月7日，巴金在成都访问故居，听取曾任成都军区战旗歌舞团副团长的张耀棠（前右一）解说故居变迁情况。前左一为马识途，前左三为沙汀（供图：张耀棠）

巴金听得津津有味，张耀棠又说："战旗歌舞团驻处，由三座公馆式的民居东院、西院和北院合并而成的。东院就是李公馆故居，西院是张家院子，那是四川广汉首富张尔嘉的公馆，以前曾是英国'领事

馆’。近年来许多中外来访者误把张家院子也当成你家故居，那是不正确的。”



1987年10月7日，巴金访问故居时为故居题字（供图：张耀棠）

巴金笑嘻嘻地说：“这方面你是专家了，我家里还有你的图呢。”

原来，1986年5月28日张耀棠到上海专门拜会过巴金，将他多年费尽心血研究巴金旧居的成果《巴金故居复原图》赠送给巴金。

旧居已于1971年“文化大革命”中拆除，歌舞团在此修起了楼房。这时故居仅残余约70米的东墙，还有株大桂树。巴金对这株桂树有美好记忆，他曾写道：“秋天，经过一夜的风雨，金沙和银粒似的盛开的桂花铺满了一地，馥郁的甜香随着微风一股一股地扑进我们的书房……” [3]

张耀棠笑问：“你小时一定在这树上爬过吧！”巴金仰望已近枯萎的桂树，怅然无语。

故居已面目全非。离开歌舞团大门，巴金又去了双眼井。巴金由人搀扶着站在井边深情地望了很久，对李致说：“只要双眼井在，我就可以找到童年的足迹！”

10月9日，成都西郊金牛宾馆，国防部部长张爱萍去九号楼看望巴金。据李致说：“张老很尊重巴老，多次向我表示支持巴老关于成立‘文革’博物馆的建议。”

虽然第一次见面，却像老朋友。张爱萍说：“我年轻时就喜欢读巴老的小说！”

巴金谦虚地说：“自己当时是乱写的。”张爱萍说：“我50年代初期还参观过巴老旧居，那时还保存完好。后来拆掉了，太遗憾，希望能重新恢复！”

10月13日，巴金和张秀熟、沙汀、马识途去参观了李劼人在东郊的“菱窠”故居。这晚，在金牛宾馆小礼堂演川剧。张爱萍要李致说几句开场白。李致说：“张老是国防部长，巴老是全国作协主席。一文一武均为川人，天府之国人杰地灵啊！”话音刚落，掌声如雷。

10月14日下午4时，巴金同省文联、省作协作家、艺术家见面。巴金说：“一个作家做人和作文都应讲真话。不能说我说的都是真话，但我力求不说假话。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也被迫说过假话……不能忘记这个历史悲剧啊！”

10月20日，巴金去文殊院，方丈宽霖热情接待。巴金说：“我父亲去世时，在文殊院念过三天经。”宽霖说：“我当年还去李府念过经呢。”

宽霖教巴老一种保健方法，巴金听得很认真……分别时，宽霖送巴金一串佛珠。

归途中，巴金说：“我小时候曾经想出家。”李致问：“为啥子？”巴金笑道：“不满旧社会，又看不见出路。以后看见小和尚烧戒疤太痛，又不愿出家了！”大家哈哈大笑。

10月18日下午5时，在成都住了17天的巴金乘机离蓉。他不断挥手："感谢大家，我还要争取回家乡的！"

此后，巴金几次对李致说过："现在，我哪儿也不想去了，就想再回一次四川！"但这个愿望已难以实现了。2005年10月17日19时06分，一代文学巨匠巴金逝世。

我的儿媳妇李宁作为巴金家族的后裔，参加了成都巴金逝世追悼会。她说："自发前来悼念的各界民众很多、很多……"我说："因为这位文坛世纪老人，他不仅仅属于李姓，也不仅仅属于成都。巴金，应当属于中国，属于世界。"

---

[1] 参见《一个有趣的小花絮》，《成都日报》2003年10月30日。

[2] 1987年巴金回乡事，很多处主要根据和参考李致《巴金回乡日记》。

[3] 参见《罗淑选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

清末成都的外国领事馆

最先入川的外国使臣和外国人

自1985年10月，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正式开馆后，韩国、德国、法国等相继在成都设立了总领事馆。其实早在100年前，古老封闭的成都就建立有外国领事馆了。

大诗人李白在《蜀道难》中惊叹：“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从古至今，四川对外交往艰难。

秦汉后，以成都为起点，经云南至缅甸、印度的“南方丝绸之路”及稍后兴起的经新疆的“北方丝绸之路”，才渐渐沟通了巴蜀与亚洲、欧洲、非洲诸国的交往。但毕竟山川险恶，除极少数舍生忘死的“胡僧”“胡商”（外国和尚、商人），外国人入川者很少。

以外交官身份最早入蜀者，应是唐时的新罗使者。这段史实多被史家忽视。

唐玄宗因安禄山造反，仓皇避乱到成都。倒霉痛苦之时，朝鲜半岛的新罗王不忘旧情，不远万里遣使臣到成都觐见慰问。唐玄宗非常激动，在成都写了一首《赐新罗王》诗赠给使者：“兴言名义国，岂谓山河殊……衣冠知奉礼，忠信识尊儒。诚矣天其鉴，贤哉德不孤……益重青青志，风霜恒不渝。”

风流皇帝这首诗写得拗口，意思却不难明白，大意是赞扬新罗国的奉礼向义和景德王的贤明仁德：新罗国初兴便有“义国”之称，与中国亲如一家，还说什么山川异域呢？两国共有“尊儒”的文化传统，友

好关系如青松翠柏，“风霜恒不渝”！

这首诗在中国文献中少有记载。我查阅到韩国文献《东国通鉴·新罗纪》中有云：“唐天宝十五年，遣使朝帝于蜀，帝亲制十韵诗，手札赐王曰：‘嘉新罗王岁礼朝贡，克践礼乐名义，赐诗一首’。”这首诗最早见于韩国金富轼著的著名史书《三国史记》，且记事更详[1]。

唐玄宗在成都写《赐新罗王》诗，是成都中外交往史上重要一页。据《宋高僧传·唐成都净众寺无相传》等史书记载：玄宗驻跸成都时，于公元728年还迎新罗国王第三子无相入内殿供养，命无相规划扩建大圣慈寺……唐末黄巢之乱，僖宗李儇又逃来成都。新罗国使臣朴仁范不避路途艰险，再次来到成都慰安。

元世祖至元年间，有个叫马可·波罗（1254～1324）的意大利人据说翻越秦岭从陕西到成都，他在《马可·波罗行纪》中曾大赞成都市井繁华、江河风光美景……这成了成都中外交往史上的佳话，现在安顺廊桥石碑上就雕刻有此事。但也有不少中外专家学者说马可·波罗连最具中国特色的万里长城、茶叶、妇女缠足、中国文字等都无记载，说明他根本就没有到过中国[2]。

明朝以后光顾四川的外国人渐多。葡萄牙籍教士安文思于1642年8月28日抵成都，与意大利籍耶稣会教士利类思共同从事传教工作，还被张献忠“大西国”封以“天学国师”……[3]清顺治年间，天主教士巴西略入川传教。之后，又有穆天池、毕天祥、白日升、巴吕埃等入川传教[4]。

雍正、乾隆至道光年间，以闭关锁国为“国策”的大清政府，对入境传教者轻则驱逐，重则量刑，来川的外国人几乎绝迹了……

---

[1] 参见石云涛：《跋唐玄宗“赐新罗王”》诗，《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2] 参见德国学者徐尔曼《中世纪城市组织》，英国学者克鲁纳斯、吴芳思等《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以及中国学者杨志玖《再论马可·波罗书的真伪问题》（载《历史研究》，1994年第2期），等等。

[3] 安文思著，何高济、李申译：《中国新史》，大象出版社，2004年。

[4] 参见（法）古洛东：《圣教入川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

清末领事馆的建立

腐朽的封建王朝虽然把外国视为“番邦蛮夷”，却抵御不了人家的坚船利炮。1840年鸦片战争炮火声后，列强渗透步步深入，传教士在四川各地修教堂、购田产、传教布道。至1902年，全川已有天主堂161座、布道室139处，仅天主教洋教士就达340余人。川、滇、藏蛮荒山野中，居然也常见十字架高耸、“阿门”声悠扬。外国船只汽笛长鸣，在川江上游弋、驻泊，各国商人脚板撵脚板地入川推销商品、收购原料、开办工厂……

因洋务日多，1895年，川督鹿传霖奏准设立四川洋务总局，办理全省外事。局址驻成都永兴巷，设总办数人，委派专职候补道员充任，下辖提调、文案、稽核、日行、管卷、翻译等差役各官。四川洋务总局主要为处理百姓与教会纠纷，知会各地官府交接护送往来川省的洋人及处理洋人失窃事件。据当时资料称，有时外国人走失一只狗，也要洋务总局出示晓谕……[1]

四川最大的水陆码头重庆，成为外国人首先“抢滩”之地。1877年10月31日，英国捷足先登，派首任驻重庆代表贝德禄到重庆，继任驻重庆代表有庄延龄、施本施和贺西、波恩、戈颁等。贺西、波恩、戈颁均被英国政府单方面任命为“领事”。1891年4月1日，清政府无可奈何地同意让英国在重庆设立总领事馆，这是外国在川设立的第一个正式领事馆。首任英国总领事为禄福礼，馆址最初在重庆方家什字麦家院。

1896年3月26日，法国驻重庆总领事馆也正式建立。首任总领事哈士（原驻汉口副领事），馆址设城内二仙庵，负责办理本国在川、黔、滇、甘、新、青、藏等领区内的交涉、通商及侨民事务。

1896年12月1日，美国驻重庆领事馆正式设立，首任领事史密特，馆址初设桂香阁，后移领事巷。

1904年，德国驻渝领事馆也正式开馆，米雷尔为首任领事，馆址设重庆城内五福宫。此外，葡萄牙、意大利也先后在渝设立领事馆。清末，以上各外国领事馆在川“草创”，可谓“精兵简政”，除总领事外，仅有副领事、翻译、文书、医生等数人。

成都毕竟是巴蜀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外国人更想在成都设立领事馆。但闭关自守的清政府害怕洋人深入内陆城市，步步设防。

1901年，法国驻重庆总领事安迪到成都，面谒四川总督奎俊说：“领事馆在渝办案，需层层待批，致迁延稽迟……”请求在成都设立领事馆。四川总督府允也不是，不允也不妥，便用官场上惯用的“拖”字妙诀，不作正式答复，实即默许。法国驻渝总领馆于是在1902年在成都设立行馆。馆址初设三圣街，后相继迁至东丁字街、盐道街、拱背桥街、双凤桥街、上翔街（铁脚巷）、银丝街。1904年7月，法方打出了“成都大法国总领事署”名号……法国驻重庆总领事馆先后派驻成都的官员有安迪、白达、吕尔庚、兰必思、兰尔生、博德斯等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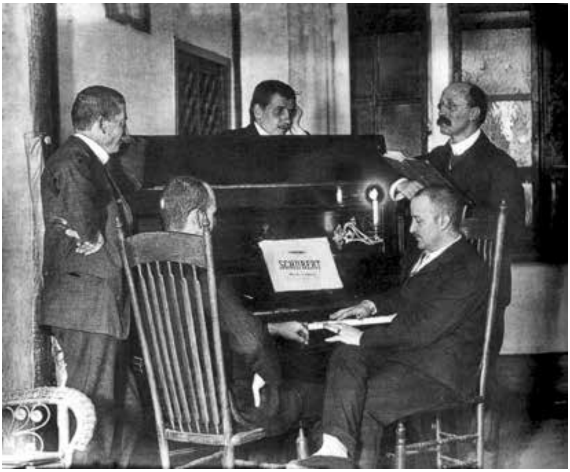
清末成都的德国领事馆（［德］弗里茨·魏司摄）

英国人不甘落后，1902年，英驻渝总领事馆照会四川新总督岑春煊，也以晋省往返不便为由，要求在成都设办事机构。岑春煊急忙奏报外务部，准许英国驻重庆领事可暂居成都，但领事称谓必须含“重庆”二字。1903年，英国驻重庆领事馆遂在成都隆兴街租房，作临时寓所办公，此后数次搬迁，先后驻过张家巷、东珠市街、云南会馆街。英国人自称“成都总领事馆”“英国总领事署”。从1904年至1911年先后有总领事罗三乐、宝士德、费理伯、斯来、施弥德、陶乐尔等人。

1904年，德国在重庆设立领事馆后，经德驻华公使交涉，清廷于1906年应准领事馆人员以重庆领事名义暂驻成都，但领事馆仍设在重庆。据此，副领事卜思常驻蓉城。1907年，领事魏司以“大德国钦命驻川正领事官”名义，先后在成都义学巷、金马街、西珠市街租房设馆，称“大德国领事署”。以后相继有飞师尔称“署理领事”，贝特克

称“大德国全川署理正领事官”。

日本驻渝领事馆1896年5月22日正式开设，可说入川很早。但直到1916年8月，重庆领事馆派外务书记生大和久义郎到达成都，任“驻省日本特派员”；10月，日本驻重庆副领事荒井金造接任，租用成都少城金河街川军旅长杨敏生公馆，设“大日本驻川总领事馆”[2]。



清末成都的外国领事们（［德］弗里茨·魏司摄）

以上英、法、德等国驻成都机构，虽然清政府未公开承认，但已是实质上的外国领事馆。各国国旗自此在古色古香的古城上空飘扬……来蓉侨民也不少，据四川洋务总局统计，仅光绪三十三年（1907）十月至三十四年十月一年中，来往成都的法、美、德、日、俄、葡等洋人就有212人[3]。

古老封闭的成都出现了一道新的风景线：洋腔洋调的外国人，万国旗，气势恢宏的西洋建筑……这着实让锦江之滨古城墙下的老朽们哀叹不已！

---

[1] 参见隗瀛涛主编：《四川近代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

[2] 参见四川省外事办公室：《外事志》第二篇《外国领事馆、侨民及驻川机构》。

[3] 参见傅崇矩：《成都通览》中《成都之外国人游历往来表》，巴蜀书社，1987年。

保路运动的冲击

1911年5月后，四川掀起了震惊中外的大波浪：“保路运动”爆发！

成都人心惶惶，外国人更惊慌失措。因为清朝政府把筑路权卖给外国，激怒了绝大多数四川人；四川闹义和团时“反清灭洋”的可怕局面有可能很快出现！

8月3日，赵尔丰赶到成都接任川督王人文的烂摊子。驻成都的外国领事们立即要求这位新任四川总督保护成都“外交官”和外侨。

外国人的恐惧是有来由的。早在1892年，美、英、加传教士赫斐秋、司蒂文孙等人来到成都，在东较场、四圣祠北街、天涯石北街一带修建教堂，闭关锁国的封建王朝中的百姓，见惯了本国的光头和尚、长发道士，对黄发碧眼、叽里呱啦的“洋和尚”有种天然的排斥心理。民众愤愤不平，谣传说：“狗日的洋和尚专门拐骗小孩，挖小娃娃双眼来制药！”虽然洋教士逢人就笑眯眯地画十字，却仍免不了挨很多冤枉石头……

1895年5月28日发生了“成都教案”。那天是中国端阳节，东较场“撒李子”等民间竞戏热火朝天。黄昏时游人回家，路过四圣祠北街教堂，好事者围住传教士司蒂文孙和启尔德。两个传教士惊慌了，向街面“砰砰”放了两枪，从后门一溜烟逃走。众人怒吼一声，不但捣毁了四圣祠教堂、诊所和教士住宅，还乱吼着跑到一洞桥附近捣毁天主

堂、育婴堂。次日“打教”消息传遍四方，嘉定、叙府等十余州县都开始打洋人、毁教堂……



清末四川总督府官员与外国领事。前排左四为赵尔丰，左五为赵尔巽；后排左三为德国领事魏司，右三为法国领事（供图：塔米拉·魏司）

清政府费了好大的劲才按平此事，将“成都教案”的参与者杀6人、充军流放加杖17人，将川督刘秉璋革职永不再用。此外，赔偿外国人白银50万两。

震惊中外的“成都教案”后，法美等各国趁势在1896年后相继在重庆设立领事馆。默许“打教”的官员们晓得洋人不好惹了。天主教川东主教范若瑟等人常乘绿呢大轿出入省城官衙，官气冲天的总督、巡抚等霎时换了面孔，笑脸相迎。

1900年义和团运动兴起，四川百姓也吼出“灭清、剿洋、兴汉”的口号，在1902年前后达到高潮。鉴于“成都教案”刘秉璋倒霉的教训，四川总督奎俊在1902年7月19日急电驻华各国公使，转告在川各地教士到成都、重庆集中以便保护……

四川叙永等地“反教”，赵尔丰曾予血腥镇压，闹了个“血染川南”，从此才有“赵屠户”的外号。但“保路运动”中，新任川督赵尔丰成

为过河的泥菩萨，已无暇顾及省城外国人了。

原来，赵尔丰狗急跳墙，在1911年8月24日下令开枪打死30多个到督府请愿的百姓，成为全川武装起义的导火线，各路“哥老会”组成的“同志军”攻打成都。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各省相继宣布独立。18日，驻汉口各外国领事馆宣告“严守中立”[1]。

11月27日，大汉四川军政府在成都成立。12月8日，赵尔丰的巡防军乱兵在成都大肆抢掠银行、藩库、商业场、东大街等各街商铺和私宅，火光冲天……

担任军政府陆军部长的尹昌衡挺身而出维持成都治安。尹是四川天彭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同盟会会员。尹昌衡率领新军数营进城平乱，围攻总督衙门，将赵尔丰捕获，在皇城将其砍头示众。

成都一片混乱：既有赵尔丰残部，也有号称十万之众的“哥老会”袍哥。这些草莽英雄们，许多人奇装异服，有绾结成道装者，还有头插野鸡翎子装成戏台上山大王的……散兵游勇和江湖好汉们都杀人放火乱“打启发”[2][3]。

当重庆成立蜀军政府前夕，英驻渝总领事发出文告声称：“如果中国不赶快平息四川的反叛，英国就要进行干涉！”此后英、德、法等领事馆人员惊慌地撤离重庆[4]。

成都的外国领事及其他外侨，绝大多数人其实是热爱中国、热爱成都的。但兵荒马乱之际，人心惶惶，他们决定迅速离开成都！

成都东门外望江楼对面的兵工厂锦江码头，呼呼寒风中夹着微雨。河岸上近百名外国人——各国领事馆成员、教士、医生和其他侨民们，正惊恐不安地守护着包裹、行李、箱子。城内不时响起“砰砰砰”的枪声，乱兵烧房子的烟火处处弥漫……这些外国人愁眉苦脸地望着滔滔江水，无计可施。

这时，一个中年汉子提着行李，也来到锦江码头。他望着这些凄凄惶惶的外国人，有些惊异。这时，一个外国人却突然走过来，用中国话同他打招呼："您好，汤先生！"

原来，这个中年汉子叫汤存心，号仲桓，四川军政府成立后，他在军政府当警卫（宪兵）营长。赵尔丰鼓动"成都兵变"时，汤存心将自己多年积蓄分发给部下，让他们不去参加骚乱抢劫，并救护了军政府都督蒲殿俊……尹昌衡平乱后出任新都督，对汤存心说："在兵变中你忠于职守，使督署免遭破坏，实属难得之举……我要重用你！"他还要与汤存心结拜为兄弟。但汤存心见兵荒马乱，无意仕途了，说："家母年事已高，我要告假回江苏武进原籍伺候老母。"

尹昌衡苦留不住，只好赠银放他回乡……[5]



汤存心（右一）1911年摄于草堂寺

---

[1] 参见四川省外事办公室：《外事志》第二篇《外国领事馆、侨民及驻川机构》。

[2] 参见李劼人：《大波》，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

[3] 参见隗瀛涛：《四川保路运动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

[4] 参见四川省外事办公室：《外事志》第二篇《外国领事馆、侨民及驻川机构》。

[5] 参见吴嘉陵：《六国领事脱险出川记》，《民国春秋》杂志1992年3期。

惊涛骇浪到上海

汤存心早在赵尔丰任四川都督时即任警卫营长，各国领事拜会赵尔丰时就认识汤存心。

一个德国官员说：“汤先生，中国成立新政府，当然很好！但敝国政府与大清外交关系没宣布结束。目前成都秩序很糟糕，外侨生命财产毫无保障，因此我们准备返国……可是我们现在没有护照，怎能出川？我们现在无论是走是留，处境都很危险！”

汤存心慨然说：“尹昌衡都督曾留学日本，是懂得外交惯例的，决不会为难你们！我带领各位领事先生去面见尹都督。”领事先生们转忧为喜，不断点头说：“感谢汤先生！”

来到都督署，汤存心进去禀报尹昌衡说：“现各国领事和外侨久困在河滩，时值寒冬，洋人不但安全无保障，万一生了病也很难办，势将影响新政府与各国的关系！”尹昌衡听后，忙让汤把外国使官请进来。

尹昌衡来到客厅会见众外侨。汤存心说：“各位先生，尹都督接见大家！”领事们忙站起身向尹鞠躬致礼。尹昌衡气态祥和，礼貌地说：“各位先生请坐下，汤营长已将大家的情况谈了。11月22日建立的重庆蜀军政府下令设外交部，江潘为首任部长。11月27日，成都宣布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设外交司，首任司长为蒋寿眉。我如今重组四川军政府，已改设外务部 [1] 。革命政府愿意与各国政府建立新的

外交关系，当然要保护外侨安全！我马上批准发给各位先生和外侨的护照，一切由汤营长办理！”众外侨一致鼓掌表示感谢。



大汉军政府正都督尹昌衡（左坐者）、副都督罗纶（右坐者）接见外交官。后排右一为德国领事魏司

汤存心迅速到秘书厅签发护照，又陪各国领事一起回到河滩。各国领事十分感动：“感谢汤先生使我们脱离危险，正好汤先生要乘船回江苏，我们同船出发吧。路上有你照应，肯定安全得多……”

汤存心望着码头河滩上近百名外国人期待的眼睛，爽快地答应：“好，中国有句老话‘同舟共济’，我们同船走吧！”汤存心此时骤感责任重大，他想：从成都到上海，路途遥远。沿途各地，有的地方是革命军势力，有的地方是清军驻防，江上还有土匪水寇，情况复杂。船只应编号，统一指挥，方能上路！

于是汤存心和领事们将所有木船集中编号，外侨依次登船，在船工一片“开船啰！”的吆喝中起航。

船队首尾相接在岷江上航行，十天后到达合江县，却突遇险情：

革命军正在攻打驻守城内的清兵，两军激烈交战，见长龙般的船队浩浩荡荡而来，双方都以为是对方的增援船只，都向船队开火，密集的炮火当即击沉121号船。情况危急，一时又无法联络，汤存心只好指挥船队快速离开合江县境。掉队的51号船被革命军夺去。两只船损失，汤存心十分难过，外国人反过来安慰他："汤先生，混乱年代中，这是不可避免的！"

一行人好不容易冲破重围，终于到重庆换乘火轮。沿长江，过三峡，汤存心多方联络，一路上惊涛骇浪，又经过不少麻烦，船才到了南京。汤存心原本应在此登岸转陆路回家，但他仍继续护送船队到上海。经过60多天千难万险的远航，各国领事和侨民终于安全到达上海。

当这些外国人在上海码头上岸时，大家都长长地舒了口气，他们对汤存心说："汤先生，万分感谢您不顾个人安危，沿途奔波劳苦……您是伟大中华民族的代表！"[2] 汤存心与各国领事依依握别，这才返回江苏武进县老家。

这些外国领事们和外侨对巴山蜀水十分怀念。如德国总领事弗里茨·魏司，中华民国成立后，他和法国、英国等外国领事及其他外侨很快又回到他们难以忘怀的成都。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德断交，他离开中国，1955年在德国海德堡逝世……

魏司1877年生于瑞士苏黎世，他从1907年至1914年长驻成都，珍藏了他拍摄的两百多幅老成都照片。此间的中国，正值改朝换代、山河破碎、民不聊生之际。七年中，魏司的足迹踏遍巴山蜀水，将当年四川的水光山色、风土人情凝固在他的照相机镜头里。

在祖父母喃喃讲述中国故事中长大的魏司孙女塔米拉·魏司女士，后来在地下室一只旧皮箱中发现了这批照片，令她惊喜万分。2001年4月，塔米拉·魏司带着近200幅由她祖父魏司先生拍摄的老照片来到

成都。这些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和无数次迁徙而幸存的照片在成都展出，再现了清末民初四川成都的真实历史场面，令人震撼！[3]



1911年成都外国领事馆外交官离开成都时和中国友人依依惜别（［德］弗里茨·魏司摄）



1911年外国领事馆外交官离开成都时有中国军人护送（［德］弗里茨·魏司摄）



1911年挂有德国国旗的领事馆船舶停泊在川江（［德］弗里茨·魏司摄）

---

[1] 参见四川省外事办公室：《外事志》第二篇《外国领事馆、侨民及驻川机构》。

[2] 参见吴嘉陵：《六国领事脱险出川记》，《民国春秋》杂志1992年3期。

[3] 参见《老照片邀您梦回“老四川”》，《华西都市报》2001年6月9日。

成都近代慈善事业

清末慈善机构众多

成都民风淳朴、乐善好施，近代的慈善事业更在国内享有盛誉。这是泱泱华夏济弱扶困传统美德的一个具体的、典型的体现。

我少时家居城东府河畔望平街，那时江岸多为田畴，禾苗青青。一只渡船静静地、悠悠地在碧水中来回摆渡。我每天过渡船，要穿过一条古旧曲折的小巷，去天仙前街小学读书。巷头钉了块木牌“茗粥巷”，我始终弄不醒豁此巷名之意。街上有个被大家叫作“吴督学”的补锅匠老头，1949年以前当过教育局的“督学”，街民都说他“满肚子是墨水”。但此时的吴督学却苦着一张黄瘦老脸，每天蹲坐街沿边，叮叮咚咚敲打破锑锅挣钱糊口……有一天我去问他：“吴大爷，茗粥巷三个字是啥子意思嘛？”

吴督学的幺儿子是我同学。他想都没想张口就说：“茗就是茶，粥就是稀饭。明朝以前这里是大慈寺地盘，修有一个茗粥庵，专门给贫困造孽的人施舍药茶、稀饭。”

我说：“和尚硬是爱做好事喃。”吴督学说：“啥子和尚道士做好事哟！茗粥庵原是明代官府在这里设立的慈善机构。清朝也在这里设立粥厂。清朝在成都设有两个粥厂，这里是东厂，北门外豆芝庵还有个北厂。清朝乾隆皇帝年间，成都官府为办这两个粥厂筹措了20万两银子，发交城内各家银号商铺，每年可获利息2万两，拿来作为粥厂的行善基金。清末成都食粥饥民每天约2000余人，大致占全城人口百分之一。清朝快垮杆时，这个粥厂迁到东门城门外去了，只留下茗粥巷

这个街名。”

我说：“一年四季都有人给稀饭吃，好安逸！”吴督学说：“哪有这种好事！穷人寒冬腊月‘又冷又饿，日子难过’，杜甫才说‘路有冻死骨’嘛！所以粥厂只在‘年关’前后这三个月施粥，每年农历十月初一开厂，第二年正月底停厂，以‘成绵道’道台大人为‘总办’，成都知府为‘会办’，成都、华阳两个知县为‘提调’，还有十来个啥子‘副委’，再加上打杂烧火的……热闹得很！”

从吴督学断断续续的摆谈中，清末粥厂施粥时的情景生动地浮现在我眼前：天寒地冻、北风呼号，衣不蔽体的贫民和讨口子们，老的、少的、男的、女的、瘸的、瞎的……全瑟瑟发抖着，可怜巴巴地聚集在粥厂门口。粥厂外边围着大栏杆，食粥者在栏杆外排着长队，伸长颈项眼巴巴地看着粥厂竹棚内，数口巨大的铁锅热气缭绕：那里是吊命的希望啊！维持秩序的衙役在不断呵斥弹压强壮者：“不准乱‘卡位’！你们乱抢乱挤，老弱病残吃啥子？”



清末成都粥厂施粥时乞儿食粥情景

饥民们排到门栏处了，由杂职人员发给每人一根长竹签，竹签上端染有土红色标志，这竹签就相当于“饭票”了。食粥者急不可耐奔入栏内，施粥者收签舀粥，每人可得稀饭一“鱼碗”。饥民们哪顾得上用啥筷子！双手捧着碗就呼啦啦地猛喝起来……

吴督学说：“鱼碗就是土窑烧的‘大土巴碗’，有普通饭碗四倍大，可装大鱼，所以叫鱼碗。按说，一碗清汤汤的稀饭如何救得人命？大清律条，各省粥厂官员施粥，‘筷子浮起，人头落地’！意思是稀饭不能太稀。所以粥厂熬制的稀饭稠得可以立住筷子。吃不完允许带走，每天只上午施粥一次，但贫民也可维持一天了……以施粥120天计

算，每年共需米3000多石。当时米价每石不过400多银子，粥厂基金除米钱外足可开销各‘副委’及差役们的薪水了。煮粥者如想偷米，会暗中掺杂石灰，这样‘出饭’多，但贫民要吃出毛病来。所以‘总办’‘会办’‘提调’大人常要来巡视，‘副委’们每天要监视称米……你不要小看茗粥巷这条破巷子，这里曾经救活不少穷人，功德无量啊！”

这时正值“大跃进”运动之际，茗粥巷中也贴了不少“亩产十万斤、跑步进天堂”之类标语。但我们学校里，饥饿的师生人人菜色、黄皮寡瘦。学校食堂用大大小小的盆子找来许多童尿暴晒，尿水中便慢慢长出绿茸茸的毛。原来当时有科学家称“尿液可提炼出高蛋白”，美其名曰“小球藻”。学校就用那“尿毛”液体合在红苕粉中蒸“尿水馒头”……所以饥肠辘辘的我听了吴督学讲的这些事，不由自主地瓜兮兮地冒了一句：“要是茗粥巷现在还施舍稀饭就好了！”

吴督学大惊失色，忙结结巴巴说：“如今生活这么幸福，你、你小娃娃莫乱球说哦！”说罢转身不再理我了。他当时惊慌失措的神情非常滑稽，事隔几十年，那情景还历历在目……这是我平生最早听到的有关成都慈善事业的龙门阵。

正史经传少有慈善事业的专门记载，只在众多野史杂书中间有只言片语。成都除“粥厂”外，著名的慈善机构还有下面几处：

玉沙街的“育婴堂”：专门收养因家贫而乱甩在街头巷尾的弃婴及偷情而生的“私娃子”，以60名为限。每个婴儿雇奶妈一人，工资伙食都由堂里供给。婴儿“隔奶”前后就由人认养……育婴堂为官办，由“布政使”（相似现在的省民政厅职责）委任一个州县级吏员管理堂务。育婴堂街名至今犹存。

“慈惠堂”：创于清雍正十三年（1735），是省城主要慈善机构，有田数百亩作为办堂基金，官府每月还有津贴，以一候补道员负责主办，称为“总理”。收养鳏寡孤独及盲人等残疾人数百人，教他们“唱道

情”（弹琴卖唱）及“推算星命”（当“算命先生”），到“业成能自谋生为止”。这种“就业培训”如今看来虽不敢恭维，但客观而言，当时对最为弱势人群的这种救助，确实可说是“胜造七级浮屠”了！慈惠堂街名至今犹存。



清末成都一慈善机构育婴堂里的儿童（［美］路得·那爱德摄）



外国画家画1725年中国政府赈灾发粮的情景

“普济堂”：在成都东门，俗称“孤老院”，专门收养年老无依之人。对“孤老”们的考虑还是周到的，堂里除供给伙食外，每人每月还

给三四百文零花钱。

“与善公所”：取“与人为善”之意，设在城内延庆寺，办理施米舍棺等多种善事。

“恤嫠局”：设在骆公祠内（该祠祭祀清同治年间四川总督骆秉璋，其所在为现今和平街）。“嫠”（读“离”音），就是寡妇；“恤嫠局”，就是专门救济“守节”不嫁的寡妇之专门机构。这些“贫嫠”不住堂内，而每人发给牌照，按月赴堂领救济款，每人每月可领得几千文钱。“恤嫠局”当然有让寡妇们树“贞节牌坊”的迂腐含义，但对生存艰难的贫困妇女仍有慈善救助的积极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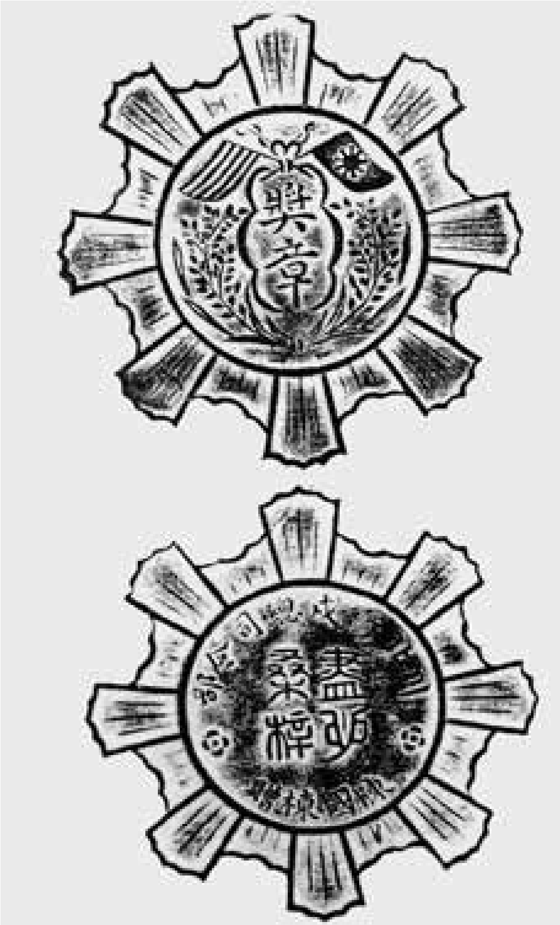
清朝末期，在成都东较场口的昭忠祠街上，官方还相继创设了“苦力病院”（专收治社会底层的贫苦病人）及“济良所”（专养愿从良之娼妓）。这种慈善机构无疑更具社会进步意义了！

宣统元年（1909），一位有心人在其所著书中极简单地介绍了清末成都林林总总的慈善团体。“官办”的计有：掩骼骨，幼孩婢女迷失所，幼孩教工厂，乞丐各路工厂，苦力医院，废疾院，牛痘局，育婴堂，采访局，利民局，济良所，军人病院，戒烟总会；“民立”的有：孤老院，慈幼堂，捞尸会，盂兰会，施棺木，施义地，栖流所，育婴公社，中立公社（戒烟），普益公社（戒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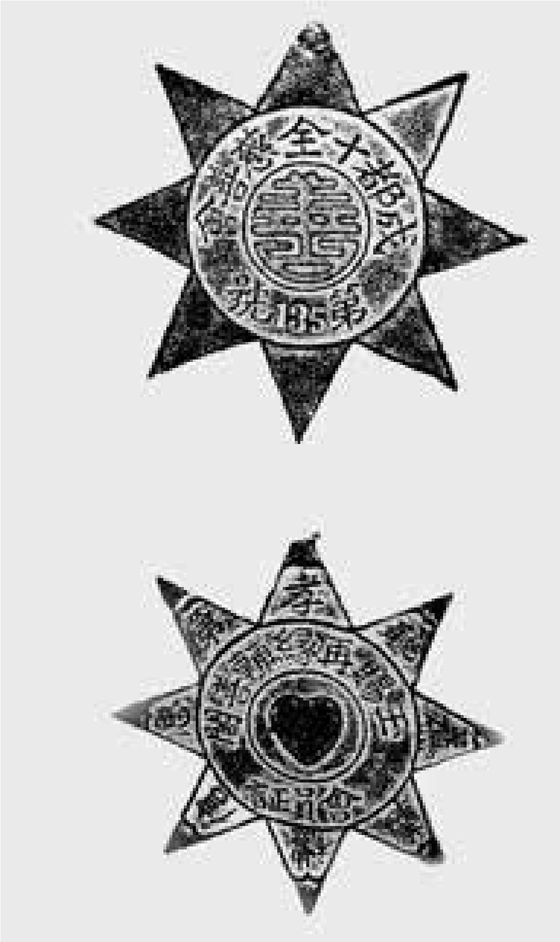
这位先生就是写《成都通览》的傅崇榘。虽仅有上述寥寥文字，但让人了解到清末成都这个城市里，大大小小的慈善团体竟然如此之多，实在令人惊奇！



民国初期四川的慈善公益奖章



民国初成都公益奖章“尽心桑梓”徽章



民国初期“成都十全慈善会”徽章



清末成都广化堂慈善会徽章

我祖父清末当过椒子街“街正”，那“官衔”大概相似于如今的“居委会”主任吧。听父辈讲：除上述官方或民间慈善机构外，每年岁终，各街“街正”大都也要约集本街“善人”们，给穷人施米送钱送旧衣。至于平时施舍棺材、掩埋“干鸡子”（讨口子）的无主尸骸等善事，更不乏其人，这已是不成文的“乡规民约”……这些都说明，成都民风历来

何其慈善仁厚！

民国“慈惠堂”成为中流砥柱

民国12年（1923），慈惠堂街“慈惠堂”内，成都10多个名流士绅正在神情庄重地商讨一件大事。

市政府“督办”官员陈光藻（1890～1961），字鸿文，这年仅30多岁，对公益事业却很热心。此时他侃侃而谈：“我国历史上主要有‘宗族’‘宗教’‘政府’‘社会团体’四类机构行使慈善行为。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宗族’慈善形式，如义田、义塾、义冢等，至宋朝后全国已无处不有。”

佛教界演成和尚说：“‘宗教’慈善也是古今中外各国通例。佛教从东汉传入中国，重要内容就是普度众生，道教也有类似行善仪轨。如今省城天主教教堂里，也把施药医治等慈善事情作为重要教义。”

成都红十字会张立先说：“1912年民国成立后，由杨国屏、李绍严和我，在东桂街文昌宫组成省市红十字会，吴颂尧为理事长，我为副理事长。最初军民皆不解红十字会为何物，误会颇多。1917年川军、黔军、滇军在省城打得乌烟瘴气，我们救护队也不时挨各军乱枪！有天我带人到武城门（作者注：现新东门）救护，见余尸残骸被犬食者触目皆是。忽见一个人蓬头垢面，正拿把锄头在掩埋残尸……他说他叫张鹏武，下苦力谋生，和几个老乡一起做善事，每天在这里掘土埋尸，以让冤魂早日超升。有两个老乡已被滇军抓去，还有三个被黑枪打伤，如今只剩自己一个人，自己肚皮都填不饱，仍坚持行善……他口讷而言辞真诚，我们红会自愧不如啊！我当即给他发了一

张掩埋夫证，叫他每天向救济团领取伙食费！”

堂内众人唏嘘不已。陈光藻点头叹道：“是啊，这方面政府有时还比不上穷百姓！说起‘政府’的慈善行为嘛，如南北朝时的齐武帝自公元483年登基，就正式成立‘六疾馆’，梁武帝公元502年登基，曾设置‘孤独园’，专门收养病苦穷人和孤老。有名的唐玄宗和杨贵妃在梨园‘乐坊’风流快活时，也忘不了在公元734年下令成立‘病坊’，把京城的讨口子收容起来统一管理。到了宋代，政府已设立较完善的救济机构如‘卑田院’等……但自民国后，巴蜀大地连年混战，官方慈善事业还不如前清！目前更是主要靠民间‘社会团体’啰！蜀中已近两百年历史的慈惠堂，因为政乱财窘，近年已一蹶不振。不少人趁机欲染指慈惠堂，全被我婉言谢绝……尹仲老啊，我看还得仰仗你出来主持堂务才好！”

慈眉善目的尹昌龄（1869～1943）字仲锡，郫县人，他1892年中进士，任翰林院编修。1897年后，历任西安知府等职，为成都著名的“五老七贤”之一。此时他摆手说：“曾奂老以前在堂主持筹赈会，因战乱银票化为废纸，惹得穷人一片怨骂……我岂肯重蹈覆辙？”

陈光藻含笑劝说道：“尹仲老，你对于清末新政，凡兴学、练兵、劝工、养蚕、兴修铁路、派遣留学生等事，都曾一手操办。民国后又曾任四川军政府审计院长、四川政务厅长，政声卓著。小小一个慈惠堂，尹仲老实在小试牛刀罢了！”

尹昌龄仍摇头不干。其兄尹元理用“激将”法说：“老四啊，人家鸿文天天上门，叩请你支持，把门槛都踏烂了，把我也闹得不清静……你还这样固执，谨防外头有人说你‘闲话’啊！”



尹昌龄

尹昌龄笑道："我有啥子'闲话'可说！"尹元理说："说你尽管素有'尹青天'之称，只怕还有缺德的地方。"尹昌龄吃了一惊，问："从何处听得？"元理先生晓得尹昌龄最佩服徐子休（也是"五老七贤"之一），就说："是徐三哥听到的。他还向我说，眼前公益事你都不肯做，一旦慈惠堂官产被军方提去，那些孤寡必将饿死！你忍心么？"

尹昌龄默然良久，慨然拍案起身："孔孟之道以仁义为本，墨子也讲'兼爱'。我就来捏这个烫手'炭圆'嘛！"

四川著名教育家陶亮生（当过西康省政府秘书长），曾在慈惠堂服务，他回忆：开始时困难重重，慈惠堂内300多个老弱病残面黄肌瘦、奄奄待毙。尹昌龄叹息说："他们每日靠两顿稀饭吊命，营养不

足啊！”他立令：“堂内节省开支，改善伙食，由每日两餐变为三餐，稀饭改成干饭！”

尹昌龄这位慈惠堂的“总理”，每天尽职尽力到堂办公，却不要分文薪水。办公室里仅有硬椅几把，他中午自掏腰包买400文钱的红苕填肚子，决不沾堂内半点便宜。老弱病残们慢慢变得脸红润了、体力也恢复了。

尹昌龄对他们说：“古人云‘授人鱼不如授人以渔’，就是说送人一条鱼不如教会人家去打鱼，慈惠堂也可转变为生产机构嘛！跛者，可使守门；瞽者，可使习唱；男人可编竹箕扫帚，女人可搞缝纫……如女人缝衣，由堂内趸买布料。做一件衣服，规定利润几成缴堂内，几成归己。而你们照吃公饭，却学手艺挣私房钱……你们也可以自强自立啊！”

老弱病残们欢天喜地。于是慈惠堂在天涯石北街办起“民生工厂”，并在城郊各处逐渐兴办了三四十个生产服务机构，如成衣铺、鞋帽铺、裱画铺、印刷铺等。

尹昌龄说：“这些穷苦孤寡人，大都是被亲人遗弃才无依无靠的。世间势利人多，如今能挣钱了，恐怕又会有亲人来认啰。他们有家中人接回去当然好，能够自己结婚成家更好！凡甘愿出堂的，他们挣的存款全部由本人提去。”出堂成家的人常依依不舍，视慈惠堂为“娘家”，常回来看望。堂内免费提供两餐一宿，热情接待。

育婴堂收养的弃婴，因不知谁家所生，只好以“婴”“慈”“惠”等作姓氏。从育婴堂一直进慈惠堂，弃婴长大了，尹昌龄还要妥善为之办陪奁，行配婚，并注意“盲不配盲、残不配残”，十分审慎。城中有个少女，遭继母毒打，逼她卖淫，她只好投避慈惠堂。尹昌龄命妥加看护，不久并为她择偶。婚期已定时，继母想约流氓上门捣乱。尹昌龄请省主席张群亲来证婚，那恶妇自然不敢乱来了……

尹昌龄德高望重，军阀们也买他的账。

1925年，四川边防军总司令赖心辉任省长，主动对尹昌龄说："1917年7月，川滇两军在成都老皇城内外开战，那时我在刘存厚部任炮兵团长，指挥四十多门大炮轰击老皇城，打得滇军抱头鼠窜，民众也死伤8000多人，我从此被人骂为'赖大炮'，自觉愧对乡里……现我将凤凰山原清军营房拆除，房料堆积如山，现全送给慈惠堂，也算做点善事！"

尹昌龄用这些房料在外东大田坎修成一条街，慈惠堂资产也雄厚起来。

1924年，尹昌龄去见川军20军军长杨森说："清末周孝怀掌劝业道时，在九眼桥附近办过惠昌火柴厂。民国以来，厂房还在却一直驻兵，已破损不堪。火柴虽小，百姓却离不了，长期被洋人用来赚中国人的钱，火柴被呼为'洋火'……我想恢复四川火柴生产。"

杨森（字子惠）慨然说："尹仲老古道热肠，子惠敢不从命！"他立命军队迁出厂房。尹昌龄一盘算，要开工还得大量资金。正为难时，有几个军官来说："仲老要办火柴厂，我们愿投资，成全善事！"尹昌龄说："我不懂做生意，你们投资为何？"军官嘿嘿笑道："按股分红嘛。"尹昌龄不高兴了："让你们把赚的钱分了，那些鳏寡孤独还吃啥子？"军官们面面相觑，悻悻而退。

尹昌龄到成都中国银行去见行长周宜甫，说："我想借万把块钱修火柴厂。"周宜甫说："仲老，银行借钱要有抵押品。"尹昌龄沉吟道："何物值万元？"他忽然从包内掏出一张大红的翰林名片交给周宜甫说："你看！我这三个字值得万元否？"

周宜甫大吃一惊，忙躬身作礼说："仲老大名，岂值万金！不过我是行长，得要首先遵守银行规则。我私人先借5000元给仲老救急，

早迟赐还均可。”

就这样，九眼桥附近培根路上，“培根火柴厂”红红火火地办起来了。厂门外有尹昌龄亲笔书写的木制对联：“慈善事业在良心，假公济乱，绝非人类；生产方能求进步，殖材振乏，特此资源。”

火柴商标人称“娃娃牌”，画了一个小孩端碗吃饭，取“育婴”之意。“娃娃牌”火柴不但行销川中各县，抗日战争中，还远销敌占区内。尹昌龄十分高兴，曾酒酣耳热时对陶亮生说：“办火柴厂乃我平生得意之笔！”

“娃娃牌”火柴后更名为“扇牌”火柴，1941年7月注册。新的火柴盒面画了一把折扇，扇上有尹昌龄亲书韵语六行：“厂中余利，专恤孤穷。若有私心，天地不容。以扇喻善，奉扬仁风。”收藏界朋友对我说：“扇牌火花意义特殊，是藏家梦寐以求的珍品！”培根火柴厂1949年以后改名为成都火柴厂。

慈惠堂声誉远播，清朝后一直官办的普济堂、育婴堂及三所孤穷子弟教养所，1925年也拨属慈惠堂。方正东街丁公祠（祭祀清四川总督丁宝桢）的田产，也送给慈惠堂代管，尹昌龄将其办成“文诚义塾”，选孤儿入校专学国文、数学、英语三科。毕业时，数学、英语优生送到武汉、天津工厂学技术；国文学得好的则推荐到军政部门任司书（文秘）。因这些孤儿从小接受慈善教育，品德优良，人家都很欢迎……

我曾听老报人魏道尊先生讲，每年青羊宫“花会”时，慈惠堂及所属各校的学生穿着青色制服整队前往。二仙庵的老方丈住持做东，用稀饭、油酥锅巴招待尹昌龄和那些无爹无妈的学生，学生们则盘坐于殿前大吃大嚼。尹昌龄回赠道士慈惠堂生产的鞋袜等。是处少长咸集，鸟语花香，其乐融融……

此外，慈惠堂还办有借贷处、培根义学、瞽童教养所、全节堂、女婴教养所、幼稚园等。慈惠堂产业日增，特设了一个“救恤事业董事会”来统辖众多慈善机构，公推尹昌龄为董事长。尹昌龄将历年公私捐助及各项收益除开销外，大半购置田产房产，以租金为不竭之财源。慈惠堂鼎盛时共有田产近万亩，街房二百余间……

慈惠堂事业既大，贪污偷窃难免，工人间也时有吵架角逆。尹昌龄吩咐：“慈惠堂原是古庙改建，堂内有灵官像。出了盗窃财物之事，官府也难以判断。唯有鬼神难欺，就让干系人到灵官神前赌咒吧！”这一招果然灵验，偷盗者、理亏者或暗中抛出盗物，或磕头认错……尹昌龄这招貌似迷信，其实是让犯错者去受“道德审判”，自爱自律，进而做到奉公守法，从此这些麻烦事大减。

家大业大，做善事也容易了许多。抗战中日机频繁轰炸成都，慈惠堂内各处收养的8000多鳏寡孤独都很快疏散。但400多个瞎子怕下乡去无人管，不愿离城。尹昌龄哄他们说：“大风把堂外升国旗的杆子都吹断了，此乃凶兆也。不走，我只好和你们一起同归于尽！”瞎子们号啕大哭，哇哇一片，最后也只好答应疏散。

尹昌龄又召集离城最近的佃农说：“请你们来，为的是疏散瞎子。请你们一家领一个回去照料，为我分劳。我只要求瞎子到你家，要让他摸惯走熟床铺茅厕，三餐同你们一样吃饱。秋收后，你们该减让多少田租，凭瞎子说句话就算数！你们做得到么？”



成都刚解放时政府在慈惠堂为贫民发放救济粮（出自：《中共成都地方组织史图志》）

佃农齐声说："做得到！"尹昌龄忽然翻身下跪，向众佃农行一全礼。众佃农感动得无不大哭……此后都把瞎子带回家当成亲人一样伺候。陶亮生先生感慨地回忆说："疏散数年，瞎子无一横死者！"

为让他人理解慈善事业，当过大官、又是名儒的尹昌龄经常向人下跪。我查阅民国时旧资料，1936年至1937年蜀中大旱，人吃人已是常事。身为省"赈委会"主席的尹昌龄好不容易筹到点赈灾款，又怕有人贪污，赈灾人员出发前，尹老先生涕泪满面，大哭着向发赈人员连连下跪叩头："务将赈款全部发在灾民手中啊，我替水火中的灾民向你们磕头了！"此情此景，实在令人感动，如果没有为慈善事业献身的宏愿，是决然做不到的！

民国要人孔祥熙（全国赈委会委员长）来成都时，参观了慈惠堂各项事业，赞不绝口："慈惠堂成了集慈善、教育、民族工业的综合实业，中国少见！"他立即捐助20万元，以嘉勉四川慈善业。

抗战期间，大量外省难民入川，都由省"赈委会"主要负责安置，难童们大都由慈惠堂收养。这些人疏散在乡下，尹昌龄每隔数日必去看望，闻有传染瘟疫死亡的，他便难过得哽咽不食……他联合成都的

一些外国传教士和医生多方救治，才将瘟疫扑灭。

日机空袭愈演愈烈，尹昌龄和慈惠堂总管理处也疏散到培根火柴厂。尹昌龄为四川慈善业殚精竭虑，1942年冬病逝厂中，终年74岁。据其孙子尹大锡讲：“据当年（1942年）国民政府的褒扬令所述，祖父去世后，慈惠堂的总资产高达数百万……我祖父任慈惠堂总理20年，从未领慈惠堂一分薪水，而慈惠堂的资产增值数百倍，救助鳏寡孤独数千人。但到他去世时，自家竟没有私房一间。他家在马王庙后街，是租住的洪钧亮的私房。祖父去世后，洪钧亮要收回另租，祖父的朋友们才知道他家没有住房，大家凑钱将该房屋买下，我们后人才有房住！”

后来，成都民众在少城公园为杰出的慈善事业家尹昌龄铸造了一尊铜像，焚香礼拜者不绝如缕……

可惜1949年以后铜像遭毁，否则必将成为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的珍贵文物。铜像虽毁，但我油然想起一句老话：“慈善事业，百世留芳，先生之德，山高水长！”

参考文献：

本文除作者收集的口碑资料外，还参考了下列资料：

周询：《芙蓉话旧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

（清）傅崇矩：《成都通览》，巴蜀书社，1987年。

四川省文史馆编：《成都城坊古迹考》，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

陶亮生：《尹仲锡与慈惠堂》。

《四川近现代人名录》，四川辞书出版社，1992年。

关于本书图片来源的说明

本书的图片来源主要为：1. 从1949年以前出版的刊物、报纸、画报等旧资料中引用；2. 亲属及各界朋友提供；3. 本书作者长期收藏的文史资料，如从文物市场购得。使用照片时，凡知晓摄影者名字和来源的，在书中都尽量加以注明。但鉴于有些图片为数十年前乃至百多年前所摄的新闻照片，此后又为各种刊报相互辗转使用，目前已很难知晓摄影者和图片原所有者的姓名，故无法加以注明。今后凡有人认定是本书某照片的所有者，敬请与作者或出版社联系，我们将根据有关规定支付合理报酬，并将在本书再版时注明。